



以文学之名

卷三十 2023.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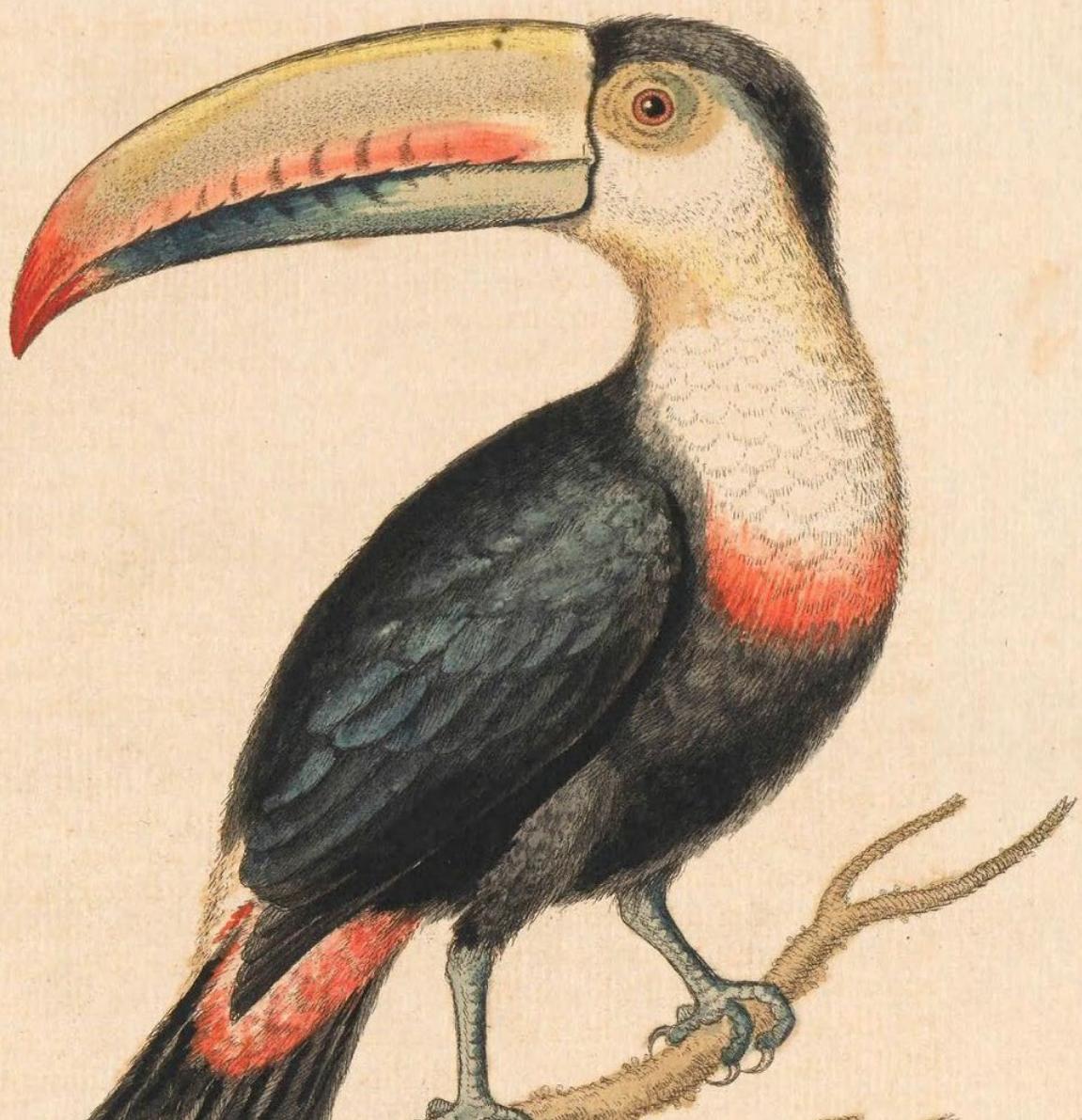
小小鳥

地理课代表的三本书 | 田野中国

为什么我们会希望做一些调整 | 小鸟问答

他像阿甘一样，撞到了这个时代发生的各种事情 | 接力访问

米沃什传 | 新书推荐





小说

小说家 | P11 细叔鱿鱼辉 索耳
新书试读 | P19 非亲非故 /
P27 女嗣 索耳

非虚构

田野中国 | P39 地理科代表的三本书 /
P45 碎片化，被夸大的与被忽视的 /
P47 “到处是水却没有一滴水可以喝” /
P57 一个想当“主 X”的青年 | 三个人的政治光谱① /
P63 一个没有什么观点的女生 | 三个人的政治光谱② 伊险峰
生活亲历者 | P69 2012 年，我在香港街头 阿峰
新书试读 | P81 茨维格的流亡岁月：遍历世界，却不知归处 乔治·普罗尼克
P91 米沃什，承认生命在“此时”和“此地” 安杰伊·弗劳瑙塞克

专栏

接力访问 | P97 044 Dika：“消费我，陪伴你！” /
P101 045 Sally：一份工作，让我回到“人”的视角去接受别人 /
P105 046 孟建英：在贵州从江，认识一个侗族老板娘 /
P111 047 梅若：为什么要为家政女工办艺术节？ /
P115 048 阿峰：把家搬进一辆面包车，他要寻找生活里新的“意义” /
P121 049 3in：“我完全不会说我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
P127 049 不管可以改变什么，“上路吧女司机”！杨樱 伊险峰



题图为电影《我的舅舅》(1958)剧照

小鸟回答 Vol.30

小鸟 | 小鸟回答

更专注一些，做该做的事

i

在南昌

五一时小鸟在南昌，参加南昌陆上书店组织的独立书店节活动。

我们跟观众互动，问现在在关注哪些公众话题，请大家自己来讲一讲。现场有 60 几个人，话筒挨个传，不愿意说的就直接传给下一个。当时我们想的是，要是大家都默默传走，这也是一种试验结果。

几乎每个人都拿过了话筒，包括两个位置阵列之间的摄像人员。

13% 的人觉得 ChatGPT 对工作和生活的影响值得思考；10% 的人关注那几天里比较集中的性骚扰话题和女性主义问题；22% 关注五一假期当下的事，包括特种兵旅行、假期分配、突然爆红的淄博烧烤；7% 的人关心考公考研；5% 的人是小学老师，关心现在的小学生——为什么不会在自然界里欣赏花的美感，小学生抑郁如何解决，课后他们都要做点什么——平时可能不会太注意参加各种活动里老师的角色，他们都在想什么……

很有趣，很杂乱。我们的感受是：

大家对什么是公共话题的理解有各种不同；

大家对公共话题有足够的热情；

大家其实没有什么机会和经验在一个非私人场合探讨公共话题——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公共话题本来应该在公共空间里进行，但如果我们回忆起自己的经历的话，听到最多的劝告甚至警告可能是：

你这些话我们私下里说说还行，出去可不要乱讲！

ii

我们还是想努力去制造一点公共话题的空间。

在一个相对公共的场合，探讨一些公共问题，这是顺理成章的一件事。

第一步是空间，也就是在哪里；更重要的可能是第二步，探讨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是第三步——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步——探讨问题的方式和技巧。

做小鸟文学这个 App 可能算是第一步吧。

那些干涉性的、冒犯性的、公共性的生活方式——更有趣的、更个人化的、不一样的生活，类似于接力访问这样的内容或者算是第二步。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方式来讲。这是我们最近想得最多的一件事：

文字阅读是线性的，但我们希望它能带来更多空间感。

我们还没想好怎么弄，正在跟各种人商量。从人类大计看，文字这东西既安静又丰富，用了几千年，不能败在我们这一代奶头乐手里。我们得想办法弄得更有力量一些。

iii

从武汉回上海，经过苏南

在高铁上，我以为我看错了。那些村子里的房子都扒掉了？它们通常都是散布在路旁的，一小片田，一小片农家房子。

临近傍晚，天色渐暗，成排住宅常常是看得到灯光的，而这些房子没有。这样的情形似乎延绵了沪宁线一个小时的全程，在此之前或许还有不少，但警醒起来集中看，是从南京站之前开始。过几天再度经过沪宁线，确认了这一点。这些房子正在被拆。

我甚至总结出它们的先后次序。正住人的房子；断了电的房子；拆掉不锈钢门窗和太阳能热水器的房子；缺了棚顶的房子；废墟；田野上新土的颜色。

也许过不了多久，这里和其他地方一样绿油油了。

iv

一个发不出声音的摇滚歌手，拜访了五十几个热爱音乐的人

这里也一定有些故事吧。

v

消失的事

看《满铁调查》中说外蒙独立，最惨的是山西商人。在当时的调查者看来，外蒙古大体上可以视为山西的殖民地——所有人的生意都在那里。细想也是，山西发展出钱庄这种金融业，肯定建立在融资需求基础之上，到底生意是什么呢，大家并不深究。离蒙古近，蒙古的肉类，蒙古的皮毛，是中国内地所稀缺的，做贸易的人，希望获得更多生意链上的话语权，向上游渗透，购买生产能力，从 SP 到 CP，再正常不过。外蒙独立，接着又列宁主义化，没收外国资本家资产，也再正常不过。山西商人生意和身家遭受巨创，这还是小事，隐约还有镇压这样的事，于历史中湮没不闻。

又看一本书说广东在 1870 年代前后，持续几十年土客械斗，死伤百万。这大约是一种卢旺达一样的仇杀，但在我们浩瀚的大历史里，它几乎微不足道，轮不上去记住它。

vi

时间总是不够用，总像是来不及

很多事都那么轻飘飘地过去了。沪宁线上拆掉门窗的房子像空洞的眼窝，空洞地注视着列车疾驶而过。在一本书中，看到自发的乡村住宅如何形成街巷村落，如何成就景观；又在另一本书中，看到一份某个江南新区的新农村规划，2011 年到 2020 年，这些景观、村落、街巷、住宅又如何在计划中消失……现在想必已经都收拾停当了。

我们现在做的事。

重启我们的一个过去的项目：资助作者去做一个他觉得有价值的选题。它的要求还是：

- (1) 静态，需要持续一段时间的采访和田野调查；
- (2) 记录在新闻事件之外，或者某个新闻发生之后的长期变化；
- (3) 有可靠的知识结构和信息搜集支撑。

举例来说，基于以上条件，近期出现在视野里的内容有：一个村庄的消失；一个歌手在寻找更多的可能被埋没的歌手；一些在密不透风的体系里试图活出自己的人；拥抱利维坦的人，我们发现其实他们完整的想法很少有机会表达，还有他们周围的人，常常振振有词，关于这个社会是如何被建造成了这个样子……

以往我们主要在征集内容，后来我们觉得应该调整一下，它寻找的是合作者，知识上、信息上、体力上，还有最重要的，志向上的合作者。如果觉得合适，可以给我们写邮件。

所以，最想要跟读者说的，我们会更专注一些。

有限的精力和能力，只能做最应该做的事。

我们会停掉一些栏目，重点经营以下内容：

24 小时文学聚会；

接力访问；

田野中国；

新书试读；

一个新版块，它与“阅读是线性的，但我们希望它能带来更多一点空间感”有关。

我们尽力提供一如既往的多样性和价值。

这一卷封面的鸟

鵙鵙，发音是“妥空”，俗称南美巨嘴鸟。

联系我们

微博留言 @ 小鸟文学，微信公众号“小鸟与好奇心”，或写邮件到 info@aves.art

小鸟

一份新文学杂志。注意，不是文艺杂志。
我们最大的愿望是找到最好的文学作品和作者，并呈现出来。

小鸟问答

这个栏目每月一次，回答来自读者的各种问题。
它放在每月的第一篇，兼有告知功能。





题图来自 [Jean Béller](#) on Unsplash

小说

细叔鱿鱼辉

索耳 | 小说家

笑自己阿爸做什么？

大家不过都是出来搵食而已嘛

1993年7月，某日早晨，我的细叔林启辉冲入广州新滘的差馆，向警察阿 sir 报案，称昨晚被变态佬尾随入屋，险些被其掐死，幸得他装死，之后又凭借学了几年的杂技功夫，爬出阳台，跳到树上，这才逃生。当时细叔身上还穿着垫肩的戏服，脸上涂粉和口红还在，一头烫染过的梦露式短卷发被露水打湿，也不知他在外头躲了多久，也许是这些，才让他的讲述可信，阿 sir 给他录完口供，然后出警，其间细叔就坐在差馆内的长凳上，不知何处可去，虽是炎夏，楼内过堂风都是闷燥，他却只感到孤独的凉。这种感觉似乎在他一生中不断重复。那时他只是扳动了开关。午后，阿 sir 喜气洋洋地通知他，犯人已经抓到，多亏他提供的线索，大功一件。几年来，正是这犯人在敦和、琶洲、新洲等地连环作案，专攻落单女性，扼死后悔辱尸体，完美避开所有目击证人，亦搞到差馆压力山大，动了许多警力，对此案仍无所获，倒是顺带破了几十宗其他案件。广州杀人王的声名远传，连我们乡下都听说了，彼时我阿爸在中学教书，借校内邮递之便，写信嘱咐细叔，“暗暝时小心出街，少食几支烟，莫搞些不三不四的发型”，那信现在还保存在老厝书桌下的箧里，证明当时他们还没闹翻，还算是拍虎掠贼也著亲兄弟。信寄出去，阿爸还怕收不到，还托亲戚上省城寄个声，几百公里路程，声还没寄到，细叔这就出了事。之后就是给阿 sir 领着去指认嫌疑人，那人大概五十岁年纪，鬓发都白，眉毛浓密，拧起来像除猪毛的铁夹，一见到细叔，脸都灰了。阿 sir 问细叔是不是他，细叔回答说，差一点就能确定，还要看他的手。犯人掐过细叔的脖子，手一摊，中指和无名指第一节有老茧，必然无疑。就这样，一时威风的广州杀人王栽在细叔林启辉的手里，后来坊间相传，都把细叔说成是一位女杂技演员。实际上细叔只是练过顶碗，踩过几次单轮车，从凳尖上摔下过一次，因为怕疼，此后就再不肯跟师父学了；细叔自然也不是女性，不过是生得阴柔，自小被长兄阿姊护着，因排行老七，常被乡下伙伴叫作“妹七”，等过了十五六岁，仍变声缓慢，嗓音清亮好似雀仔，直至今日也无太大变化。他倒是也没浪费这把声喉，少年时刈完水稻就习惯躺在垛子上咿咿啊啊地唱，惹得大家都笑衰他，后来上省城来搵食，专去歌舞厅驻留，有时唱些口水歌，

有时唱点粤剧，更多的时候，反串扮成当时的女星。他扮梅艳芳是绝活，不在形似而在神似，梅姐 1985 年在香港海洋皇宫的演唱会录像带，细叔观摩不下百次，学她唱《蔓珠莎华》时卡点的抖肩、大腿摇摆时的幅度，学她唱到副歌时，上身呈九十度剧烈后仰，把发梢都甩拉起来，每根发丝都有它独特的灵魂。为此细叔留了一年的长发，再做个烫染，画好眼影和口红上台，在场的老板们没有说不像的。家里人很长时间都不知他做这一行，包括我阿爸，只知道他留这怪异的长发，这掩藏不住。过年回家，阿公每看到细叔这发型，饭都吞不下，阿嬷夜里还拿剪刀，想偷偷把他长发铰掉，未遂，那改造过的头发就如通了电的传感器，剪刀还没挨到呢，细叔就先跳起来了，脸颊正撞中剪刀尖，血是止住了，却留下指甲大小永恒的疤。自此以后细叔睡觉前，必先把门闩紧，连阿爸也不能放进来。兄弟之中数他们关系最好，细叔四岁时发恶热，针灸难治，阿公本来已经放弃了，是阿爸偷了细叔跑出去，到海边扒了衣服，把他身子浸入海水里，浸一时再抱起来暖一时，这才把细叔的魂捞回来，此后他们的魂就绑在一起，形影不离。细叔刚上中学时，阿爸已经在学校里做预备教师，细叔每天跟着阿爸的单车回家，坐在后座，伴随着车铃响兴奋大叫，阿爸也乐意在众人面前秀他新买的二手车，带着细叔镇头镇尾都兜转遍了，这下谁都知道阿爸的那架单车头，也知道阿公家的单车两兄弟。大家把他们连起来叫了好多年，直到某日，突然不这么叫了，阿爸是阿爸，妹七是妹七，众人都分得清楚，尤其是细叔读完高中离家之后更明显，阿爸也从未想过，细叔在心房内已为他加了许多道门锁。所有人都是。在省城出事后的那个夏天，细叔林启辉回到家乡，特意带了稀罕的榴莲，气味在家里三日不散，没人敢动口，亲戚对细叔也如对这榴莲一般，聚会时围坐三圈，细叔就在中间，好似审问犯人，好似细叔才是那个穷凶极恶之人，而非受害者，大家也是吃饱喝足了无事做，都好奇出事的那一晚到底发生了什么。日头烈烈，穿透院里的芭萝树，烘热众人的皮肤，汗气蒸腾扑在巴掌大的树叶底下，细叔被这许多双眼睛睇住，话都讲不出，半日才挤出一句，磕磕巴巴复述完那晚的故事（当然，他故意隐去不提在歌舞厅做事），众人却听得兴起。细叔说，那个变态佬肯定是个做木工的，他手上的老茧正是长日磨锯子所致，他掐着细叔的脖子就像在丈量木材，品试木头的手感，他把细叔压在身下，膝盖顶腰，细叔便动不了，那人大概有一百六十斤重，俯身时细叔能闻见他身上那股木屑的味道，那股味道恐怕冲多少次凉都无法消除，后来去指认那人，隔着铁窗好远就闻见了，那人躲也躲不掉。听到这里众人笑起来，特别是以前做过木工的六叔公，各亲戚家里的椅子凳子都是他的功劳。六叔公还站起来向大家展示他的手，确实老茧累累，还嗅嗅身上的衣服，说，这辈子果然做不了歹事，一做就被抓，听完大家更起了哄，气氛热烈，细叔的头却摆得愈低，发绺顺着脑壳垂下来，有心人瞧见了，就说启辉的头发长得跟炸姬婆一样，难怪会给变态佬盯上，众人的焦点又拉回细叔的头发上，那可是精心烫染、在舞台上迷得老板神魂颠倒的头发，却对付不了这些乡下的看客。又有长辈数落起细叔，说他上省城后，只顾着讲白话，家乡话竟不讲了，一趟下来，家族聚会开得有如细叔的批斗会，细叔自然不愉快，对这片环境更增厌恶，阿爸虽在一旁坐着，却也不袒护，那个夏天他们的交流加在一起不超过十句，两人的隔阂从那时候开始，也可能更早。阿爸的消息很灵通，也许已经得知了一些风声，只是没能亲自证实。细叔在家里耐不住十天，又要上省城去，依旧住他在新滘的租屋，白天睡觉，夜里到歌舞厅里演出，连唱七八个小时，通宵至清晨五点才回，细叔也不觉疲惫，那时不过二十出头的年纪，后生仔有的是使不完的精气神，每天他都徒步从工作地点回家，几公里路，几乎是走到一半时，第一抹朝晖会从珠江面压射过来，有时早有时晚，他也许是那个最敏锐感觉到太阳直射点在北回归线上来回推移的人，此时海珠桥边的大街上，早茶店早已开铺，鲜虾云吞和叉烧包蒸腾的香味漫出遮挡的布帘，招引来穿白衬衫喇叭裤带公文包的上班族，还有自远郊而来穿着解放鞋的工人，身上还沾着昨日未干的泥土，轮渡从桥下通过时，风把船头的红旗吹得猎猎响，也遮盖不住从船内飘上岸来的广播声，那来自遥远的首都的普通话字正腔圆，令细叔印象深刻，那必是一个个接连不断的喜讯，如同悬挂在桥身的招商信息，巨大的“健力宝”大字在朝阳下透亮。他一般吃完早茶后再过桥，加入在桥头等待的单车潮里，等待一声哨响，车潮便向前涌动，他被众多腿部的蹬圈运动裹挟，眩晕在车铃的齐奏里，等单车潮过去，他一个人的身影还在桥中央踟蹰，好似时代的协奏曲里一个被突然敲下的休止符。但细叔是兴奋的，这个世界突然涌现出这么多辆车，多年后他在日记里写道，他的梦想是有一天能买辆永久牌单车。当然，后来谁都知道，这梦想不值钱了，而歌舞厅也会倒闭，梅艳芳也会变成冷门女星，会离开这个世界，但细叔就待在原地，能多待一天是一天，在歌舞厅里，歌能多唱一首是一首，也确实有那么多大佬，话晒都是他忠实 fans。那些就算不是真的大佬，也要假装自己是大佬的人，很给他面子，上来就当着众朋友马仔的面，夸他唱得好，连点他好几首歌。欢呼声中细叔感到陶醉，这才缓缓开喉，随着乐句扭动四肢，气息自胸腔沿喉管抵达鼻腔，几番折射，在

颅内钻出个洞，仿佛若有光，他便沐浴在这梦幻的光之下，狂喜的震颤周转全身。有人曾用傻瓜相机给他拍下靓照，那张摄于 1993 年 4 月 19 日的黑白照，精准还原了细叔巅峰时期的风采，他当时穿厚重的连衣舞裙，盘发髻，头饰如一颗硕大的火龙果高高隆起，右手拿麦，有力倚在腰间，左手向上前方挑出，似是舞蹈的起步动作，又似是一曲歌罢，撩动观众情绪的姿势，最让人震慑的是他的面部表情，他由上往下对着镜头，颧骨高耸，红唇紧抿，鼻尖似梭，涂着厚妆的双眼射出凛光，似乎要使所有底下的观众臣服。这是我从未了解细叔的一面，即使那只是光影的一瞬，仍然可以想象，现场有多少人为他狂呼，冲上舞台，与他拥抱、吻脸颊，向他敬酒，把蘸醺酒气留在他的舞裙上。而我的阿爸亲眼见证过这些，就在 1993 年的中秋，他趁假期悄悄上省城，从熟人处摸得细叔常驻的歌舞厅，傍晚一过就去蹲着，混杂在人群里，从头到尾看完细叔的演出，细叔毫不觉察，直至舞台灯熄后，细叔从后门溜出去食烟，阿爸也跟在后面，向他借火，彼时天蒙蒙光，细叔一时睇不清是阿爸，只当是陌生人，便跟阿爸同站在一株大叶榕下，无声无息食完了一支烟，阿爸这时行近来，手提着袋子包好的月饼，朝细叔头顶一探，把细叔探得晕头转向，头饰喇喇掉了一地。细叔转头一看是阿爸，痴住了，讲不出话来。阿爸丢下月饼袋子转身就走，走路时他感到地面颤抖，显然是他恼怒、伤心到极点，只想快快行开，当天早晨他就买了回去的车票，迷糊睡了一路，只记得闭眼开眼时似有白头鸟在车窗外叫，依稀是他和细叔当年捉雀仔的情景。阿爸回到家里，饭都没心思吃，闷头躺在床上长吁短叹，阿妈也不知何事，盘问了几日阿爸才肯开口讲，妹七是好难回头了，去大城市无人管，去那种地方卖妓也无怕丑。阿爸的奇遇讲出来阿妈也惊，两人一商量，都觉得应该给细叔娶个新妇，一来细叔也到了年纪，二来家里有新妇在，细叔的路也走不斜，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于是阿爸便多留意起同乡的炸娃仔，尤其是那些出门在外的，他还托省城的同学做媒，只要碰到合适的，得闲就拉细叔出来吃饭。细叔二十四岁到二十五岁这两年，介绍给他的对象不知有几多，单论酒楼茶楼亦都不知去多少回，西关荣华楼和中山五路惠如楼的老板都成了熟人。细叔起初很抗拒，跟人约会时，如同龟鳖，默不作声，人家看他这发型，也当是不正经人，因此都成流水落花，后来不知是不是因阿爸心诚，竟也碰到了个跟细叔投缘的，如今看来，也不知细叔是为了顺阿爸心意，还是没想明白。他们初次见面，聊得好愉快，吃完饭接着约看了电影，在越秀公园附近的一个小录像厅，外边挂着手写的夸张大字黑板。他们挑了《开心鬼救开心鬼》那场，进去是个只有十几个座位的小黑屋，到了放映时间，人们陆续入座，礼貌，与世隔绝般死寂，大家都紧盯着面前那块 22 寸的屏幕，直至一道银光划过，图像慢慢从暗不见底的视网升腾，映得四周一片红，细叔听到了每个人心底同时升起的赞叹，尤其是她，离他最近，所以听得最清楚。观看过程中她不歇地笑，剧情是很搞笑，他也笑，但完全比不上她那样笑得前仰后合，扑洒了饮料，他从未见过有人的笑声可以这样从喉咙根跳出来，以至于完场后他都忘了电影本身，哪怕里面有 Beyond 乐队、尚显青涩的李丽珍，有传唱到如今的“黑凤梨”，细叔只记得她不同寻常的笑。这炸娃仔对细叔也有好感，后来两人感情升温，过年回乡时，两家一往来，那个爱笑的炸娃仔就成了我的细婶。实际上我对细婶没什么印象，她来我们家时我才刚学会走路，她那存在于别人口中的雷暴似的笑声，在我的记忆里却仿佛积压了无数乌云，我一点都记不起来，是阿妈讲我听才知，当初细婶第一次来我们家，我正沉迷于玩辘铁圈跑来跑去，阿妈则堂前屋后地跟着我喂粥，细婶大笑时，声音从院子传至大堂，在梁柱间回响，连供奉的神主牌都要抖三分，我就是在这笑声中扔下了铁圈，大眼碌碌地望着四周，似是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半日回过神来，这才肯坐下来喝粥。阿妈当时只觉得好笑，她相信幼年的我是存在那段记忆的，因为我很少有那种乖乖听话的时刻，可惜的是，后天的教化把这些记忆遮蔽掉了。而细婶也没在我们家待多久，结婚第二年她生下我的堂妹，第三年便和细叔分开，女儿财产她都不要。那时堂妹还未满周岁，细叔也是糊里糊涂，只能丢在老家让阿嬷代管，堂妹要吃奶，日哭夜啼的，阿嬷就把艾草濡湿了喂到堂妹嘴里，这才强行使堂妹断奶。日子一天天过去，堂妹倒是长得好，大脑袋，四肢瘦长但有力，舞起来虎虎生风，抢我的辘铁圈还追不过她。长到五岁时细叔想领她去广州养，堂妹死抱着阿嬷不松手，怎么都撕扯不开，细叔就唸到个办法，硬的不行来软的，就让阿嬷哄堂妹上广州玩，住一段时日，阿嬷再悄悄回乡下。于是堂妹某日一觉醒来，发现阿嬷不见了，哭得肠断，过好几天才缓过来，然后死心，接受要同细叔一起生活。但堂妹一直记得此事，即便过许多年，她仍记得那个受两个大人联合欺骗的世界末日，犹如她记得刚和阿嬷来到广州时，她们这辈子吃过的第一支雪糕，菠萝牛奶味，是细叔给她们买的。他们三人还去了环城东路的麦当劳，那是省城的第一家，那巨大的穿黄色连衫裤的充气小丑公仔，就飘浮在银色的招牌上方，她问阿嬷，那个公仔什么时候可以下来，阿嬷就同她讲，暗暝时就会下来了，公仔也要睡觉，讲完就咧嘴笑露出光秃的牙床。阿嬷的牙早在十年前就坏掉了，所以汉

堡咬不动，薯条也只吃一点，倒是番茄酱吃得满嘴都是，活像被打肿了唇，堂妹笑细叔也跟着笑。在那个短暂的夏日，堂妹、细叔和阿嬷在省城确实有过快活时光，他们还去过动物园，堂妹看到大榕树下卧倒的老虎，大家都争着合影，她也想合影却又胆怯。细叔把她抱起，架在栅栏边，她一边畏缩得直掉泪，一边又欢喜细叔的大手紧护着她的双肩，令她感觉安全。自此她开始认识到，细叔不是那么坏的爸爸，如果要和这陌生又善变的世界相比，他确实是个好人，好到让人觉得不现实。他本该有专属于自己的人生赛道，他本跟人同居，堂妹到来之后，他把对方赶出去，又租了间更大的屋，足以装下堂妹闹腾的手脚。白天他教堂妹习字，用蹩脚普通话教她念“世上只有爸爸好”，让她骑在脖子上，满客厅里凶凶转，或是跟堂妹玩捉迷藏，那时屋子虽大，却徒有四壁，没什么可躲藏的地方，他们次次都躲在床底，但也玩得好嗨，扮鬼似的大叫。有时他们会出门去行街，手拖手，没头没尾游荡，小影子交叠在大影子上，行到长堤大马路再被一间间铺头的巨大灯箱影子压灭。堂妹还记得，他们一起行路时，珠江的风从南边吹来，那时江水刚刚开始有腥臭味，细叔就同她讲，那些都是钱的味道，他还讲自己见过有人半夜偷偷把钱藏在江底，讲的好似真的那样，等堂妹以后出嫁了，细叔说，他就把江底的钱捞上来当嫁妆，堂妹憨憨地就信了。当时在省城想赚钱的人就如江底的泥沙，跟着钞票之流向前奔逐，流到深圳的工厂，然后是香港和澳门的后花园，堂妹虽然小，也隐约感觉被这些不安的灵魂所包围。有一回深夜，细叔带堂妹从外面回来，看到邻居霞姆大开，黑魆魆不见五指，有哀哭声从角落传出。堂妹怕鬼，吓得险扯破细叔衣服，走近发现是邻居霞姆，问了才知她仔偷了存款，说是去特区炒股搞投资，几个月音信全无，昨天包租公来催她房租，说三天之内交不上，就把她的家私扔到街上给收破烂的捡走。细叔听完直骂包租公恶毒，当即把当晚赚来的小费全给霞姆，又回屋拿了一些积蓄给她，这才心里安乐。谁知几天后霞姆家仍然人去屋空，一声招呼没打，那些借出去的钱也没下文了。细叔倒也不在意，只当是做了好事，而堂妹那阵子睡觉时却不安宁，死搂着细叔的胳膊瑟瑟发抖，都因那晚而起，穷人扮鬼吓的，害她夜夜做噩梦，还说今后她都不要半夜回家了。那显然无法实现，细叔夜里去歌舞厅返工，自然得带上堂妹，她又没法独自在家，只能跟着细叔跑夜场，被交杯声、吆喝和舞步踢踏地板声环绕，台上灯球彩光闪闪，她也不理会，只埋头玩细叔给她买的咸蛋超人玩具。细叔第一次领堂妹去舞厅时，跟熟人介绍说这是他的女儿，他们都瞪大眼睛不能相信，他们的台花什么时候结了婚，还有了女儿，毫不知情，像是凭空生出来的，况且细叔和堂妹长得并不像，更令人生疑。起初每轮到细叔上台开嗓，唱起梅艳芳的“喝一口女儿红，解两颗心的冻”，就有人跟堂妹起哄，快看你爸在台上表演啦，堂妹只瞥一眼，还是低下头去，玩回手里的玩具，一来二去，便再无人管她，只当是外头混进来的哑巴野孩子。堂妹就是如此和细叔度过无数个夜晚，直到咸蛋超人给玩到散架，摔断了腿，堂妹也开始上学，细叔这才不带她去舞厅，也是从那时起，舞厅开始行下坡路，准确说不是“行”，是急速向下俯冲，熟客都去得少了，生意亦越来越难做，细叔常驻的那家小南国，于 2002 年冬春交际时倒闭，细叔之后转战别处，也不过是四处飘零，至第二年“非典”来袭，彻底断了卖唱的念想。只不过堂妹的学费还得供上，细叔就想方设法去捞钱，给人家屋里做保洁，去生果档给人帮手，在石牌村的牌坊下卖烟仔，也在老鼠街卖过 DVD 碟，那段日子他熬得艰难，也多受兄弟姊妹的接济，他从不推辞，我阿爸就经常偷给细叔和堂妹塞红包，惹得我阿妈嘟东嘟西，因我们日子也拮据，哪有余力帮他人，阿爸就冲阿妈吼：你去公园看看启辉都搞咩鬼，我不帮他还是做乳兄的吗？阿爸指的是细叔跟团去做马戏，四处巡演，都演到我们老家县城的家门口了，起初在小礼堂演，海报铺得猩红满目，画着硕大的蛇身美人头，只不过蛇身画得离大谱，倒像条鼻涕虫，都没人去看，后来又被人赶出礼堂，用面包车把全部家当都拉到公园，重新搭起戏棚，这才反而热闹起来，尤其是细叔演的美人蛇，二十元一位，来参观的在棚外都排起长龙。讲来也巧，我和阿爸事先都不知细叔来这边做戏，那时恰逢我生日，阿爸带我去公园玩，看到有人做马戏就跟着看，排了半天才进去，棚里装饰成洞窟的外貌，射灯映得蓝幽幽的，细叔就在最里面的玻璃缸里，只露出一颗头，眼神依然闪亮，背后是一块红幕布，衬托得他的脸有如霞光飞起，头发则自太阳穴往四周扩散，也似飘在云中，脖子以下是一截干黑细小的蛇身，跟脑袋不成比例。我开始有被吓到，而细叔脸上仍挂着笑，是日常面对顾客程序般的笑。光线昏暗，我们起先并没有认出对方，毕竟也好几年没见了，我站在离他五米远的地方，跟他有一搭没一搭地倾偈，他问我多大了、有无兄弟姐妹、上几年级，得知我今天生日，还给我唱了英文生日歌。我只当对方是个好看的姐姐，他声细，不知是否捏着嗓子，仿佛来自播放着一段远古卡带的录音机喇叭，我很快消除紧张，往他的方向行近了几步。也许从某一刻起，他认出了我来，但没有说破，仍像先前那样跟我聊，我问他蛇身子怎么来的，他说天生就这样，还摆动蛇尾巴给我看。他还讲自己的来历，说他来自北方的农村，他阿妈因避雨被蛇咬了一口，性

命无碍，肚子却一天天肿起来，之后就生下半人半蛇的他，所有人都嫌弃他，包括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受尽了人间苦楚，他便逃进山林里，后来碰到好心的捕蛇人收留，教他说话看字，因唱歌好听，给马戏老板看中，这才来这边做事。这故事大概讲过千百遍，他讲得楚楚动人，我当时竟然真信了，讲到最末他也哽咽，本来最后他还要唱首歌，但也唱不下去。这时参观时间到了，有人来催促我离开，我便跟他告别，转身时细叔突然叫了一声我的名字，我扭过头去看他，看他那亮闪闪的眼神，我认出了他，脑子里顿时嗡的一声，跑出去撞在阿爸怀里，紧张到全身发颤，盯着阿爸想讲什么却讲不出，脸憋得通红，眼眶都挤出了眼泪。阿爸以为我给美人蛇惊怔了，也慌起来，抱着我揉了半晌，这才从我口中得知真相，又惊又气，把边上的草地都踩出一个凼来，便也买了票进去，让我在外面等着。我等了仿佛有个把世纪之久，等着阿爸的火气把那吊着的黑棚子掀翻，但最终没有，阿爸静静地行出来，精气神好似给吸走了一般，见到我就拉我回家，路上一句话都不说。无人知他们在棚子里讲了什么，也许是某个秘密的交易，自此阿爸似乎接受了这样的结果，接受了在这个世界上，有他一个乡下教师无法理解的规矩，几天后细叔的马戏团从我们县城离开，而且再也没有出现。细叔这趟并没有分到多少钱，返到广州依然做点小本生意，龙洞、赤岗、棠下、罗冲围，都有他的身影，堂妹有时放了学，也过来寻他，帮他拉客，拉多了细叔就赶堂妹回去，让她好好写作业才是正经事。堂妹的功课一直学得很好，可不是写作业写出来的，主要是靠天赋，聪明，都不用去奥数班，题也能解出来。细叔很是为堂妹骄傲，觉得苦没有白吃，逢人说起自家的炸娃仔，白脸上都飞起笑的褶皱。那时细叔也不再年轻，人说苦在相中，纹理也悄然爬上嘴边和眼角，有次雨天送货，重摔一跤，摔坏了颧骨，消肿后周围肌肉仍然接不上，脸部动作大点，那里便出现一个坑、一道浅影，却是生活无法填补的深坑，照镜子时他都心惊，破相至此，重返舞台的希望已然渺茫。在家里他也不敢哼歌，怕打扰堂妹，以前买的堆积如山的盒式卡带，连同那台老化的录音机，在一次搬家中当废品卖掉了，他只有在外头做点工，和工友在水沟边食烟仔，食饱了精神足了，才亮嗓子唱几段“照相馆”再次禁闭，独自渴望着安慰，你远去连带爱意暖意也流逝”，又或是“漫长路，骤觉光阴退减，欢欣总短暂未再返，哪个看透我梦想是平淡”。因他烟仔食得多，痰哽在喉中，声音都像磨砂，以前他还嫌自己声音太过清亮，现在反而更似梅姐的声线了。工友都听得出来，好似天上掉下来个神仙，早前竟不知细叔还会这种技能，有人说笑道，歌唱这么好听，他们得多听几首，不然下次就只能在电视上听了，细叔听到这话，也就跟着一笑，笑声里既有遗憾，也有快乐，在无聊日常的汪洋大海之上，普通人浅薄的情感如同冰片浮荡，倏忽间便不知被卷到哪里去，这点他体会最深。到了年末，有天夜里，细叔刚放工，有个熟悉的工友匆匆赶来，把他拉去烧鹅铺头，说是发生了不得了的事，那人嘴边还留着未嚼完的鹅肉的慌乱。他跟着去到店里，那柜台上的大电视画面闪来闪去，拍医院门口的灵车，被无数记者和摄像机团团围住，接着底下的字幕就宣布了梅艳芳的死讯。那些来送别的艺人一个个出场，发表讲话，亲昵地叫着阿梅阿梅，细叔都不知他们在讲什么，只傻傻地望着那些严肃而僵硬的面孔，觉得天地间的面孔似乎只剩那么一个，所有人都长得这般，如此而已。他魂荡荡地走出去，工友跟上去，想拍拍他肩膀安慰下，谁知他一拍就倒，腿脚好似蒸熟的虾软起来，把工友吓一跳，但细叔马上用力爬起来，装作什么事也没有，还回头冲工友笑，这才离开原地，行到黑巷子里四处无人，这才放声哭，把苦水都掏出来。这一日细叔记得深刻，2003年12月30日，距离新年还有两天，眼看这年就要熬到头，结果老天还要跟他开个超级玩笑，梅姐患病的消息，细叔先前看过报，她这么后生，比细叔也大不了几岁，细叔怎么也料想不到她的离世。世上唯一明白他的人也走了，也是从此时起，细叔改了心态，辞了所有工返到城里，除去学校接送堂妹，什么也不干，昏昏迷迷度了半月，家里的米袋都空了，细叔这才四处筹到些钱，买辆二手单车，圆了当年的梦，再添置个大锅桶，炒好鱿鱼放在里面，骑着车在宵夜档的大路上贩卖。卖的当然不只是炒鱿鱼，细叔重新烫染了头发，化好妆，穿上艳丽衬衫，仍像当年在歌舞厅一般，亲自下场陪人喝酒、划拳，请人点歌唱，一支歌十元，拿到小费就说多谢老板，转到下一桌继续作陪。开始时大家还觉得怪，久了就变得有趣，照顾他营生的客人越发多起来，一晚下来也能挣几百。细叔又挨得苦，几乎夜夜都去，凌晨才回来，后来远近有了名气，大家都喊他“鱿鱼辉”，谁都知道他那精准可比瑞士名表的出现时刻，也只有每当他推着那辆载着炒鱿鱼的单车从街角缓缓走来，深夜的节目才开了幕，满街的宵夜档才有了魂。有人还专门跑过来这边食宵夜，就为了跟他攀谈几句，细叔最早不懂跟人聊天，也是日子久了练出来的，撞到新面孔，几杯酒下肚，也能跟人打得火热，话题尽处，就翘起兰花指，抚摸鬓角的头发，唱几段“孤身走我路，独个摸索我路途”，有时即兴生智，把故事改入歌词，唱出来也引得全场叫好，辉哥辉哥地叫，细叔也觉得享受，似乎好久没经历过这样的时刻，比以前在歌舞厅唱歌时有过之无不及，这辈子兜兜转转，还得豁出

面子，才能掉进一个舒服的坑里。如此唱了几年，细叔还清了债务，包括借我们家的钱，但他有意避开我阿爸不见，自觉没面，其实家里人都知他做什么讨食，知他不容易，这么多年也都看淡了，唯独他自家炸娃仔，也就是我的堂妹，逐渐和他隔阂起来，因学校里同学取笑她，笑她阿爸不男不女、屎窟鬼，还成群结队地捉弄她，在她座位上粘嚼烂的口香糖，跟老师打小报告，捉来虫子偷放在她笔盒里。堂妹一声不吭地受着，不敢跟第二个人提起，心里却越怨恨起自家阿爸，都搞些不正经的营生，害她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考试考得再好有什么用，有这样的阿爸，在别人眼里就永不能翻身。而细叔全然不知，见堂妹一回到家就把自己锁入小屋，交流渐少，还当作是炸娃仔大了，青春期早到的小情绪难以捉摸，细叔也不便太管，两人相依为命多年，细叔觉得两人自然有种默契，也是最了解对方摆碗筷的姿势、开始犯困的钟点、双腿并拢膝盖是否能相碰的人，从某个时候开始，很早的时候，细叔就不再把堂妹当成自己的炸娃仔，更似是自己的小妹，甚至，是某个迅猛生长而终将无法被自己理解的生命，就如他自己无法被阿爷阿嬷理解。终有一日，堂妹也会重蹈他的命运，不断往下复制的家庭关系怪圈，细叔早预料到这里，他给心里的闹钟上了发条，预设它会何时响起，但从未想过会是某次家长会之后，穿着高跟鞋、短发英气的班主任把一张揉成团的纸扔到他手里，他小心地打开，睇完又小心地叠好，一张从作业本撕下来的格子纸，上面写清楚了堂妹对他的看法，他过目不忘，记住其中的每个标点、歪扭的笔画，如侵入心脏的一块黑斑。过了些日子，他才能平静下来，和堂妹交流此事，然而每次交流都无效，堂妹甚至会冲出家门，走到大街上，漫游到隔日晏昼才返，早已饿得无气无力，仍不服软，以示对细叔反抗。细叔一来心疼，二来怕她出事，倒也没什么办法，只能暂时休战，令问题延宕。直到该解决的时候再解决好了，细叔想，堂妹年纪还小，等大个女了自然会理解他的。想虽是这么想，细叔仍觉委屈，当时已有电视台的记者寻到宵夜档来，找他做采访，他也顺着把那些委屈，通通丢进乌黑促狭的摄像镜头里，当焦距拉近，细叔脸上纹路的暗影愈深，有熟悉的后生仔过来跟他打招呼、递烟、碰杯，细叔就拉着人家讲，1995年他老婆跟他离婚，丢下个女仔给他，这么多年来，一分钱抚养费也没给到他，他辛辛苦苦把女仔养大，供她读书，现在好了，日子好过点，他宝贝女仔反而不认他，嫌他做这行丢人，睇低他，细叔边说边擦紧酒杯，情绪也难抑制，说他就去问他宝贝女，你那些同学的父母，有在街边扫地剪草的，有在厂里戴手套焊金的，有在商场里做保安马仔的，你有未笑过他们？不然笑自己阿爸做什么？大家不过都是出来搵食而已嘛，有什么不同？问得旁人也无从回答，有同桌的年轻姐妹便挽住他手，安慰他，他越要落泪，用指头去擦拭，把眼影也弄花了。如此讲自家女，讲了一段时间，后来细叔也不讲了，记者再怎么问，细叔就唱一段咸水歌，装傻装过去，家丑就关起门来自己吞。自读初中起，堂妹就执意搬出去独自住，虽然也在同一个小区，往来比以前更少，细叔给她零花钱也不要，自己在外面打零工，竟似要划清界限，细叔也无奈至心死，依旧踩着那辆单车载着炒鱿鱼夜夜到档口，那里的熟人朋友都知他情形，都尽量陪他聊天，照顾他生意，他也报以更卖力的表演，插科打诨，逗人笑得碌地，杯子里的酒水都洒几圈，大家欢喜细叔也欢喜，这是扮不出来的，细叔知道，这里早不是一般的生意，而是他情感的依赖之地，这片地方若失去，又不知向哪里才能找到替代品，人生没有几次机会的。省城人可以什么都没有，唯独少不了吃，吃宵夜更是至上之乐，虽然历经几次谣言，说是上面有人要整顿宵夜街，有人都看到车辆四处巡逻，有些档口便连夜逃离，倏忽之间，那些个熟悉的地址，便留下个干干净净的豁口，如惊愕来不及合上的嘴巴。卖牛杂的德仔就是这样消失的，前一日细叔还接到他的电话，他们聊到失眠，惴惴不安，风暴就要打到他们身上，但最终没有，整顿的事情不了了之，德仔白走了。细叔想到这里还觉遗憾，德仔说他要回老家梅州，大不了换个地方接着做，细叔却没有家乡可回，或者说，细叔若是回去了，就不是所谓的“鱿鱼辉”了。回去了也不是当年的“妹七”。两头都不是。老厝里的老人倒想他多回来，带着堂妹回来，一屋人才齐齐整整。自前年起阿爷折了腰骨躺在床上，每日长叹一口气，叹这妹七不好好做人，叹到日头光景也无，照料他的三姑就驳他说：多少个妹七都给你叹走了，你一叹就把门给堵了，他还能回得来不？这话也是讲给阿嬷听，阿嬷常在门口盘桓，谁要是从外面回来，她肯定是第一个知。自她八十五岁以后，话说得少了，我们逗她也不应，经常静鸡鸡地坐一日，烧柴的烟气从窗口垂下，跟她的银发混作一体，那时病已在她体内，内含她的全部声气，我们的眼光探不到那里。直至有一天，堂妹暑假回来看阿嬷，两人在灶前坐了好久，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却好像什么也没聊。后来堂妹跟我们讲，阿嬷有地方唔妥，果然话讲完没多久，阿嬷就如被抽掉底座的积木塔倒下去，和阿爷做起了邻床病友，两人眼巴巴隔着几米，躺着讲话，你一句我一句确实能聊好多时间，三姑反而是个多余人，根本插不上话。再没过多长时间，阿嬷也讲不出话了，医不见好，她还不肯就医，一直念叨说这就是老人病，人老了就会得这个病，没什么可强求的，而我们就是要强求，最终似乎也没怎么

延缓她的脚步。临终的两个月内，她始终半睡半醒，疼痛令她屈腿、坐起、颌首呻吟，而再后仰、卧倒、四肢打开、仰头呻吟，一遍遍重复和循环，肉体似是某个无可解的结。细叔也回来，去床前看阿嬷，她倒是有所反应，紧拉着细叔的手，喉内也只剩下模糊的鸣音，混合着供台上小型播音机外放的佛歌、窗外的鸡叫，还有团仔游戏时兴奋的尖喊。那阵时阿爸请了高僧到家里，高僧自称从东北长春净土宗得到秘传，一见阿嬷，就道出其中玄机，有魂灵在纠阿嬷，这魂灵不是别人，正是阿嬷早年堕下的炸娃仔，在细叔足下，因当时生活艰难，不想再生养，阿嬷就去市镇上讨了药吃下去打掉了，这些往事阿爸也大约知道，如今和高僧的说法一一验证，混淆不清，反而变成一种全新的有力讲述，我们也只有去相信，这样才能受些安慰，不然看着阿嬷实在难受。阿爷甚至从床上爬起身，激动地讲，他早就知道，伊是上了启辉的身，启辉才变成这样不正经的。讲这话时细叔也在场，我们看到一团红云顿时爬上细叔的脸颊，在浅凹的阴影里逗留，旋即散去，好像什么事也无。

今时不比昔日，细叔也不再是血气方刚的当年，有些话只当耳边吹风就过。之后阿爸依高僧的吩咐，在家里做法事，要求全家的男丁参加，细叔也不推辞，于是老厝大堂内佛歌诵经之声，月余不散，把阿嬷的床也搬进来，让她好好听着，直对门口的八仙桌则放着佛像和香烛果供，一眼望去，底下几个蒲团，留给高僧和阿爸兄弟几个。高僧大声念一句，众叔伯也跟着念一句，“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长寿经》念到后来，声音愈大，气力愈厉，浑厚男声黄钟大吕，把屋内的砖墙都震得响，中间偏偏夹着一丝袅袅的音节，是细叔的声音，遮盖不住的温柔动听，念到最后愿词，也是他念得最亲切：愿世间的父母儿女兄弟姐妹，此世既是一屋人，勿要由爱生怨痴缠下去了，能解则解，本就没有什么不可解之事，速速就去！念完扑通数声，高僧向蒲团跪倒，串珠在手腕簌簌地绕三匝，众叔伯也跟着跪，紧接几人再起身，重复急急念经。如此伴随着喧闹，阿嬷仍在床上喃喃自语，不断坐起，又卧下，机械地解她身体的结。在屋外旁听的妇人们则出了神，堂妹趴在门槛边，也是一副恍恍惚惚的样子，不知是被愿词打动，还是被眼前的奇异景象所震慑，或是想不通像阿嬷这么好的人，怎么会受这种折磨。自阿嬷患病以来，她常给阿嬷按摩，那肉体就如几蚊重的棉花，手劲已经入不去，一入怕就散了，想来人生来死去，本就这么单薄，世俗中再多的沾染，到头来也是轻飘飘，越按下去越不忍，可家里这么多人，只她按摩管用，比那止痛药都管用，她手一放上去，阿嬷整个人就舒缓下来，显然是两人的心有灵犀。有天夜里堂妹和阿嬷讲悄悄话，也是和那个纠阿嬷的婴灵讲话，如果那真的存在，也是她的姑姑。虽没有见过，也可以料想姑姑也跟她长着同样宽大的鼻翼和嘴唇，这便是一家人证明，就如愿词所讲的，都是几辈子修来的缘分，都是这片大地上的亲人，何苦相互折磨。堂妹背着我们所有人，也背着阿嬷，跟姑姑诚恳认了错，希望姑姑能宽谅，并且从阿嬷和细叔身上离开。她的悄悄话是起到了效果，两日后的五更时分，家养的一只鸡突然脱出鸡笼，从厨房的窗户飞跃出去，扑刺刺的响动把众人都惊醒，大家摸黑寻半天，并没找到鸡，只找到一片天边的玻璃蓝。等我们怅然回屋，经过大堂时，发现阿嬷只吊着一口气了。我们围在阿嬷身边同她告别，她走时安详，高僧先前告诫我们要节哀，以便阿嬷被接引到极乐世界，但细叔仍哭到无力。我们劝他说阿嬷是解脱，解脱却从来是说来简单，做起来难，他后来走到院子的芭萝树下，晨曦透过叶片落在他的长头发上，烫染弯曲的发绺泛着白光，也可能是白发。他老了，多么像一个孩子，就像从未离开家的妹七，他就是他，这么多年也没有变过。如能这样想下去，那个“姑姑”是否从他体内离开了，也不再需要答案。堂妹也接受了这一点，从此以后，她看向细叔的目光也回归了温柔，回到一九九几年，他们初遇的时候，他们手拖手在城市里如两个无依的游魂般乱逛，被岭南之风吹得心旌摇荡，亲眼见到暗暝来临时，珠江边上的船坞逐一被灯光照亮。堂妹可能已经记忆模糊，而细叔记得真切，那过去的还可以再复现。我们又看到了细叔和堂妹拖手的样子，就在阿嬷的葬礼之后，大家从山上来，穿过一片蔗园，他们走在后面，边走边聊，挨得很近，那一瞬间自然就发生了。这条路这么窄、这么长，要讲的话却怎么讲得完，他们聊到了过去，聊到钱，聊到那个把钱藏进珠江底的玩笑。细叔说那不是玩笑，是约定，他真的捞到了珠江里的钱，存在银行卡里，等再过几年就当作堂妹的嫁妆撒出去，听完这句话堂妹又险些掉下泪来。

本文是作家索耳首部中短篇小说集《非亲非故》中的一篇。

八篇小说，从二十世纪初到千禧年，自由穿梭在真实岭南与异质空间，横跨南方人类秘史。卷入金山猪仔苦力贸易的外曾祖母一家、狂飙突进的“铀博士”、在宗族社会挣扎生存的表姐妹、失业十年的奥特曼皮套演员、自挪威归来的陌生远房亲戚，在省城反串梅艳芳的细叔……以文学人类学视野，拆解和重构粤西；敏锐地捕捉时代黄昏放出的蜻蜓，把它做成标本。



非亲非故
索耳 著
中信·春潮
2023年6月

“写完长篇小说《伐木之夜》后的三年，完成了一个集子，都是中短篇小说。是对我们的文化基因、历史渊源、现实困境所做的一次回望和精神的反思。这个集子有一个比较强的形式感，通篇不分段、几乎一逗到底，是对‘标准语’的抵抗，希望构造一个独立又特别的语言空间，使读者有意无意地将自我填充进去。”



索耳

1992年生，毕业于武汉大学。编过杂志，做过媒体，策过展。曾获香港青年文学奖、浚先生奖、“《钟山》之星”文学奖、南方文学盛典“年度最具潜力新人”提名。出版有长篇小说《伐木之夜》。《非亲非故》是索耳首部中短篇小说集。

小说家

这里是华语作家的首发原创小说。我们尽力挑选出最好的作者，也等待最好的读者。



题图来自 [Max Zhang](#) on Unsplash

小说

非亲非故

索耳 | 新书试读

各自的口音都未必能使对方舒适，但他们依旧无话不谈，
即便如此，他们也没有好好地告别

七月初，为了迎接一位从国外归来的亲戚，我们家族在芳村码头安排了一个烧烤屋的摊位。隔着珠江，能望见对岸 28 层高的白天鹅宾馆。家长是这样说的：即便去不了那里吃饭，至少也要能望见嘛。当然，我也被叫了过去。当时我情绪不太好，因为长篇卡了壳。饭局上我一言不发。长辈们对我很生气，我知道，但他们永远也不会对另外一位同样不怎么说话的家伙生气，那个人就是这位亲戚。因为长期滞留国外（三十年，或者四十年），他已经不会说中文，他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分不清那到底是普通话、粤语还是家乡的雷州话。而每一种我们都会。正因此我们感到了骄傲。渐渐地，我注意到，长辈们也在用一种同样艰难的、三种语言糅合而成的语言去跟他交流，也许是不自觉的顺从，或者是刻意的、自上而下的亲近。即便如此，他还是很难打开话匣子。为了活跃气氛，长辈们相互之间用这种全新的语言交谈起来。“听说汝屋企小妹最近掂煲了？”“嗨，咪提了，真素羞家！”聊的自然都是家长里短的琐事。我惊奇地发现，往常存在于他们话语里的那种让人难以忍受的粗鄙，这次完全消失了。这位亲戚就坐在我的对面。整个过程里，他只是沉默地盯着对岸宾馆窗户反射的蓝光。大概过了很久很久吧，他才缓慢地开口，大伙一下子安静下来，听他说起一件他四十三岁在挪威旅居时的事情。经过刚才的语言训练，大伙都已经完全能听明白他的讲述。当时他住在一个高山社区里——他说签下租赁协议书后，房东问他要不要额外买下一面镜子。起初他以为自己听错了，没有理会。第二天，房东又敲开了他的房门，问他要不要买镜子。为什么要买镜子呢，他问。在这个社区里，每个人都有一面镜子，房东回答，如果有镜子，你至少每天还能看见自己，没有镜子的话，你就会看不到任何一个人，那样你会因为孤独而发疯的。这里每年都会有人发疯。这还是在拥有镜子的前提下。他觉得自己被房东说服了，就跟房东买了一面镜子。只有巴掌大，还贼贵。过了一个月，他认为房东所言不虚，因为这片社区实在是人烟荒凉，也互不来往。没有这面镜子，他也许真的会自杀的。这时候，房东又敲开了他的门，传达一项社区自治委员会的指令。这场因为孤独而造成的心灵滑坡的势头实在是难以遏制，房东像机器人一样措

辞（他开始怀疑房东是不是真人）：委员会一致决定，在最高山峰的山体上，悬挂一面巨大无朋的镜子，整个社区都可以投射到镜面里头，这样一来，我们就相当于有了一个兄弟社区。这样一种集体的治疗势必会比个体的方案有效得多。不过，建造这样一面镜子，也是一笔庞大的花销，应该由社区里的每个人分摊。房东问这位亲戚，是否愿意掏这个钱。问清楚这笔钱的数目后，这位亲戚断然拒绝了，因为他根本掏不出来，当时他刚离婚，身上的钱在旅途中也花得差不多了。得到拒绝后，房东告诉他，第二天还会再来的，果然，房东第二天又来找他，不仅如此，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每天房东都会按时来拜访他，要求他掏出项目的钱款，房东的态度没有变得更好，也没有变得更差，而我们的这位亲戚，他也并不把房东的到访当成是一种骚扰，相反，他还挺乐意房东过来看他的，否则还觉得不习惯。就这样，又过一段时间，他渐渐发觉，虽然没有掏钱，那座山峰上的大镜子仍然在动工建造。他亲眼看着那面大镜子一点一点地给安装到山体上去。完工的那天，房东告诉他，已经不需要他掏钱了，在那之后，房东也不再光顾他的房间。他开始想念这个跟他年纪相仿的男人。有一天，他走出房门，打算去寻找这位房东。他披上了厚厚的鸵鸟皮氅才不至于在路上冻僵。在草坪上他瞧见了那面悬挂着的大镜子，反光使他睁不开眼睛，他走到另一面去，镜子反射的日光把草坪屠戮成了一片白垩。他能够清楚地在镜子里看到整个社区。确实是一个整齐、优美的社区。他边走边观赏着镜子里的景色。因为畏惧积雪的反光以及疏淡的人情关系，他很少出门，因此，这些景色对他来说是新奇的，说也好笑，他竟然在镜子里观赏着这些，而忽略了周围一模一样的真实。一模一样的景色。但他不由自主地认为，镜子里那一头更有吸引力一些。这些富有吸引力的景色也让他忽略了某个事实，他本来可以早点发现的，等他走到山坳那里，才停下脚步，瞪圆了眼睛。那面巨大的镜子里并没有他本人。那里有花草树木，有阁楼屋檐的融光，有圈养的羊群，有游离的云彩，一切该有的都有，只是没有他。他奔跑起来，以为那样就可以在镜子里留下痕迹，但根本没有。根本没有！因为极度的恐惧他忍不住放声尖叫，一边叫着一边跑下山去，也许用“滚”这个字会比“跑”这个字更准确，他说，当着我们的面，这位亲戚恶狠狠地自嘲，没有比那次更加狼狈的经历，这就是他在挪威的经历，他告诉我们，当他终止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以为这个故事还没有终止，还想继续听下去。包括我。我是一个作家。他，还有我们，两大阵营相互沉默了五分钟之久，谁都没有能力去打破这样的沉默，形状古怪的沉默，直到服务生把我们订好的椰子乌鸡汤端出来，一不留神把汤水飞溅到这位亲戚的手臂上，他才大喊了一声：烫死人了！这时我们才猛然意识到，这位亲戚确实是我们的亲戚，刚才的那句话确实是我们所熟知的家乡话，甚至是比我们更加地道的家乡话，我们任何人都无法说出这么地道的家乡话，因为我们离开家乡太久，在广州待了太长时间，尽管在平时的家族聚会里，我的三个表姨，还有几个比较年长的远房叔叔，他们还会有意地用雷州话相互交谈，因为他们经常回老家，所以他们的雷州话也讲得比我们好一些，在我们年轻的一代里，我指的是我自己、我堂弟、表弟和表妹，对于家乡话的掌握度远不如家乡话之外的语言，我的表弟还偷偷在学着拉丁语。在这位亲戚喊出这句话时，我们不约而同地羞愧起来。这时候，趁着我们这股劲儿没过去，这位亲戚借口离席去打电话。当然，他也有可能真的打了电话。我们根本不知道他干了什么。回来后，他告诉我们他已经把账结了。长辈们一阵惊讶的叹息，我知道有些人已经开始后悔，当初订位的时候就应该顺便结账的，因为让这位亲戚、被招待的对象来结账实在是一件不符合规矩的事情，同时我又意识到，争着来付账确实是家乡的传统，一种长久不衰的礼仪。是，他就是我们的亲戚，没有疑问。我还没来得及提起这位亲戚的大名，他叫李杰心，按辈分我应该叫他心叔，但我还没有这样叫过他。我们隔着一张桌子，两米远。这样距离，对于两个之前素未谋面的男人来说，已经非常远。我不知道该在什么样的时机去称呼他，即便是我们结束饭局，在珠江边走动时，我也只是走在人群后面，远远看着他。他说了一句：我们下次应该去对岸吃早茶。白天鹅宾馆·玉堂春暖餐厅。米其林一星。本来应该是三星，至少也应该是二星的。我只在那里吃过一回（至少也是吃过一次的），前公司老板请的客，在我离职的那天，他点了香茅焗乳鸽、天鹅栗蓉酥、腐皮卷、伦教糕、虾籽烧刺参，还有几款菜我不记得了，每一道对味蕾来说都是极致的冲击，不过，对我来说，那些冲击也就留在了餐厅里，然后消散；生活里有更多的冲击，我的记忆里没有预留本。天气很热，我们身体的盐分在蒸发掉。从江面上反射过来的夕阳碎成了一地的玻璃碴子。夏至刚过，太阳直射的位置，估计就是我们的老家，半岛边上，临近海南。我想象着我们那里的人被晒得跟乌鸡一般黑的样子。当然，在这里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一伙男人沿着江边散步，或者可以说是游荡，也不知道是谁拿的主意。这是属于我们七八个人的可笑。一些沿江跑步的人，间或从我们身旁擦过。转过一杆路灯时，有一个女人跑下草坪，朝我们走来，起初我还以为是跑步的陌生人，她却走到心叔身旁，两人抱了一抱，接着心叔向我们介绍说

这是他的女朋友。我们不得不相信，尽管这见面的方式有些草率，不符合我们家乡的规矩，不过，我们之间谁也没有作声，似乎变得比之前更沉默，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心叔的女朋友是一个沉默的女人，相反，她还颇为高调；这位仿佛用几块钱从街边的娃娃机里钓来的女娃娃，长得酷似关之琳，尤其是那双嘴唇，上唇薄而长，下唇厚而窄，口红也涂得恰到好处，把上唇的两个唇峰精致地勾勒出来，相互之间的距离不至于过宽，也不至于过窄，一眼看过去，依稀就是那位把五六岁的我迷得神魂颠倒的“十三姨”。她大声地跟心叔说着话，并不忌讳我们听得见，同时大声地笑着，笑的时候嗓音低沉，比我们任何一位男士的嗓音都要低，所以每次她笑起来的时候，我们都产生了深深的自我怀疑，或者是怀疑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人故意假扮了这种笑声。就这样，连着这个和我们、和我们的行为习俗格格不入的女人，一行人走下码头，在路边的树林里，商量着接下来要干些什么。如果要玩游戏，我们之间随时都有人奉陪。我的四叔公，一个身体硬朗的九十一岁男人，衬衫的胸兜里随时装着一副扑克，我们都承认，他是我们所有人里最接近家乡而远离这座城市的人，但我们都不想打扑克，因此，我们首先要做的是阻止他把扑克牌从胸兜里掏出来，不断用语言去打断他，“有咱啦！四叔公！”用手去抓住他伸往胸前的小臂，怎样都好，反正就是要阻止他掏扑克牌的欲望，因为他无时无刻不想把扑克牌掏出来。最后心叔的女朋友提议说到城里去打电玩，她说的城里就是指天河那边，既不会是荔湾，也不会是越秀，像她这样二十多岁的人就会说这样的话，我也恰好二十多岁，所以我很清楚她的语汇，她的语汇就是我的语汇，目前，我们还没有说上一句话，别说她，就连心叔，我们也没有交谈过，我只是远远看着他们，最近的时候也有三四步的距离，他们两个人的身体紧挨着，他们的谈话从未停止，好像在阻挡着任何人的加入，即便我们走到大路边上去等车（因为面前有一条江，又游不过去，地铁又太远，要是在洲头咀那边就好了，那样我们可以扶着人民桥过江），他们也一直絮絮叨叨地说着话，其实吧，我一点也不关心他们在说什么，我只是比较好奇他们的神态，心叔会把手绕到女朋友身后，轻轻抓着她的肩胛骨，他女朋友则用相反的另一边的手搂住他，手指捏着他T恤的下摆，我判断心叔可能喜欢女朋友胜过女朋友喜欢他，如果说爱情是一个共同体、一块蛋糕的话，心叔可能吃掉了四分之三的部分，女朋友吃掉了四分之一，不过，事实远没有比喻这么精准，我知道的，我马上会推翻自己所下的结论，无论如何，能吃到蛋糕都是一件好事。过一会儿车到了，我被安排跟心叔和他的女朋友坐同一辆车，其他长辈们也许已经无法忍受这对情侣的聒噪，无法忍受和他们坐在同一辆车里，态度和一开始相比简直天差地别，而我正好相反，我很自然地拉开车门坐进去，好像我本来就应该这么做的。在车上，他们俩开始找我说话，我不记得是心叔还是他女朋友先跟我说的话，反正是他们其中一个人先说了一句，然后我很自然地加了进去，完全没有任何困难，即便是在这之前我从未和他们任何一个人说过话。心叔的女朋友说她讨厌坐车，尤其是轿车，哪怕是劳斯莱斯的幻影或者宾利的雅骏，她讨厌车里面的空间关系，不管是多么高级的轿车也改变不了的空间关系，她说，坐在车上的感觉就像待在自己房间里一样，她同样深刻憎恶着自己的房间。她说她家里有五套房，白云山脚下两套，五羊邨一套，凤凰新村一套，番禺那边也有一套，自己又在外面租了两套，但这些房间现在都空着，没有一套她是想住进去的，跟选择困难症无关，她只是纯粹厌恶着房间里所留下来的自己的痕迹，比如胡乱搭在椅子上的人皮似的裙子、乱糟糟的床单和被子、滚落一地的书、卫生间里几个月不换的滚动纸筒，每次她不得不审视着这些，诧异、惊恐、憎恶，正因为没办法忍受，她才从家里跑到外面去，她宁愿在外面游荡也不要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她说，最难忍受的那一部分，只是生活中的非理性，黑格尔说什么现实是理性的，全是狗屁，全宇宙最不可理喻的人，就是试图把世界纳入他的理性轨道中去，她说这个人就是黑格尔，我留意到她提到“黑格尔”这个名字时，后面两个字出现了连读，并且她不会翘舌音，每个字又很用力地去读，就像每个南方人试图去讲一口标准的北方话那样，以至于她每次提到黑格尔，我都产生一种错觉，仿佛她说的不是这个德意志的哲学家，而是她的某个富豪的大表哥。她的大表哥是全宇宙最不可理喻的人。很好。心叔一直在后座上微笑着，其实我很想再从他口中套出点故事，挪威那个故事很好，应该还有别的，他在国外见过世面，至少比我这种书斋作者要强，但他应该不会再说了，像他这样的人，一天贩卖一个故事足矣，多了就不值钱了，我知道的，于是我掏出手机，要加心叔的微信，希望能建立长久而持续的关系，结果他女朋友也掏出了手机，也要加我的微信，这时我感到了稍许困惑，我可一点也不想加她的微信，事实上，谁的微信我也不想加，我的通讯录里只有寥寥几个人，一个是我爸，一个是我现在工作的领导，必需的，还有一个就是在美的女朋友，但我们从来不通过微信联系，我们通过无汽可乐联系，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她从那边给我寄美帝产的无汽可乐，我也给她寄国内的无汽可乐，反正无汽可乐在世上寥寥无几，我们不过就是想换换口味。想到这里，我就问他们俩，你们喝无

汽可乐吗？心叔的女朋友等我重复了第二遍才明白我的意思，她说她不喝可乐，然后转过头去问心叔，你呢？心叔说他喝可乐，但不会喝无汽的。我说，我就知道，全世界只有我和我女朋友喝无汽可乐。我说的是事实，我和她成立了一个“无汽可乐俱乐部”，三年过去了，尽管我们每认识一个新朋友，都会询问他关于可乐的事情，可直到今天，俱乐部还是只有我和她两个人。我提起这个的意思是，我可以和心叔，还有他的女朋友交朋友，就像这样面对面，peer to peer，我们可以聊天，即便刚才还觉得存在某种“无法交流性”，但这种解冻也是随时都可能发生，谁知道呢，不过说起要建立线上联系，这种联系比见个面聊聊天要深刻多了，哪怕加个微信好友，万年不聊一句，他始终在我的通讯录里，同样会让我很焦虑，我现在开始怀疑自己刚才提出要加心叔的微信是不是出自一个由衷的动机，还是别的什么场合的召唤，也许我掏出手机这个动作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正左思右想的时候，车到了目的地，我叹了口气，问题终结了。心叔的女朋友本来还想我们三个在车上自拍一张合照来着，问题也终结了。人生就是无数个这种问题的终结。我们站在电玩城的门口等待着长辈们，不自觉地等着，以为他们一定在我们后头，可是等了好久也没见着，于是就先走进去，在前台那里买了一堆币，心叔掏钱买的，我也不跟他抢，他也知道我不会跟他抢，所以掏钱包的反应比在烧烤摊上迟钝得多。我在一旁把游戏币装进口袋里，他买了太多的币，这个数目甚至超过了八九个人可玩的数目，默默估算起来，这些币足以让我们把大厅里每一样游戏机玩三遍，如果只是我们三个人玩，那就是可以把每一样玩九遍，九遍！这是什么概念。这趟玩下来，我们几个肯定会躺在地上大吐的，直到把今晚吃的烧烤都吐出来，吐出来的也是心叔的钱，一地的金币在地砖上咯噔咯噔地响。我把牛仔裤的四个裤兜都用上了，每个兜都沉甸甸的，走起路来，像是无数条蛇在里面钻，我可从来没有试过这种情况，想到自己玩游戏玩到吐，就忍不住觉得滑稽，一种人生新成就的达成嘛，我问身旁的这两位，你们不会玩吐了吧，他们回答说当然不会，心叔的女朋友紧抓着心叔的手，指甲几乎要嵌进去，显得非常狂热而激动，可以看出来她已经进入状态了，于是我给了她一把币，她接过去，发出了一声禽类的尖叫，比我所听过的任何口技表演都要逼真，这时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如果她不是在广州有那么多套房，她完全可以去当口技表演者谋生，她的声音，我现在才意识到，无比地接近鸟类的声音，准确说，是用专业的录音器在树林里录下来的高清录音，是一种在广东已经灭绝的鸟类——“禾花雀”的声音，真的，她可以去表演口技，完全能养活自己，甚至赚得盆丰钵满，这跟她有多少套房都没有关系。她可以走到户外（她本人又是如此地厌恶室内），在森林里和鸟类生活，模仿更多的鸟类的声音，把它们的声音都记录下来，我们需要这么一个记录者，因为野生的鸟类在不断地减少，广东人又是这么的爱吃，只要是活的，看到就逮着来吃，她要是能把这些濒危的鸟类的声音记录下来，就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更应该是一种赎罪，一种为口腹之欲的赎罪。这也是我们所有人都有的罪过，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有这种欲望。在大厅里，她先是玩了单人摩托，接着又玩了丛林射击，心叔在她身旁，即便不像刚才那样被她紧抓着，同样地，一部分的身体也被强制着和她接触，他们紧张地黏在一起，好像如果不这样，整个游戏就没法进行下去，而我，一个旁观者，也被吸引到他们身旁，主要是被她那种新奇的声音所吸引，我的注意力既不在前方花花绿绿的屏幕上，也不在他们交缠的躯体上，当“他们”合力打败了游戏里的敌人，顺利进入下一关，我感兴趣的并不是她肉眼可见、在低胸吊带衫内乱颤的乳房，而是她兴奋发狂的嗓音，这股嗓音同样让我感到燥热；我们三个人纠缠在一台游戏机前面，谁也摆脱不了谁，这样下去，我们三个人之间其实只有一个人在玩游戏，那么兜里的游戏币可玩的次数就再次翻倍，不仅仅是九次，而是二十七次了。二十七次！可怕的数字。这时，长辈们朝我们走过来，他们简直就是为拯救我们而来。化繁为简。我们三个人立马分开，若无其事的样子。他们告诉我，他们乘的那辆车堵在珠江隧道里了。我说，隧道？我们从未经过任何隧道。话刚说完我就有些后悔，因为自己可能说了假话，我、心叔，还有他女朋友一直在车里聊天，我们根本不知道车子有没有经过隧道，车里唯一知情的人是司机，一个剪着板寸、身穿polo衫的大叔，他几乎没怎么讲话，根本没有办法插入我们的话题，“你哋真系好运。”四叔公说。他说他们在隧道里待了四十分钟，一动也不能动，四下里黑漆漆一片，车厢里都是闷热潮湿的空气，就像躲在焦臭的战壕里，又或者是躺在上世纪的骑楼诊所里的那种感觉，四叔公当过兵，也打过仗，闻过死亡的味道，而这些距离我们很遥远，所以每次他向我们描述他的那些记忆和闪回，我们都会短暂地失去共情的能力，不是缺乏共情（他总会强调这个），而是时空阻碍了我们达到这一点，我们也能理解他那种迫切掏出扑克牌的愿望，因为“人生太短，玩乐太长”，这是他的原话，他当年在战场上也是这么干的，一有空就跑去跟后勤兵一块玩牌，但后来救他命的不是那些后勤兵，他们全都死光了，两个同班战友替他挡了子弹，一个被子弹从喉咙射入，打烂了肺骨和左腰，另一个被弹片从后背打进，从前胸破出来，肺液溅了他一脸，

所以四叔公常说，自己活着三个人的份，得抓紧时间玩乐，不然等进了棺材就玩不了咯，四叔公今年九十一岁，天天跟我们说他没几年可活了，但其实他身体很硬朗，跟七十岁老头似的，不过，在年轻人眼里，老头就是老头，七十岁和九十岁也没什么区别，在我的视角里，他从我一出生就是这个样子，一个邮票般的固定形象。他在闷热的车厢里，感觉有人在摸他，从后颈摸到胸前，再沿着腰部摸到屁股，来来回回地摸，他认真描述的样子让我们都感到有点好笑，别说亲戚之间不会这样做，他也是一个快百岁的老头，有什么可摸的。但他严肃而气愤的语气又或多或少说服了我们——这事也许是真的，不是他的某种谵妄或幻想。在车上，他强忍着这一切，他向我们提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猜想他指的不仅仅是发生在车上的“一切”，他说自己的忍耐力并不好，在班上，他只能处于倒数的位置，湖南人的忍耐力非凡，贵州人更胜之，大概是善于吃辣椒，作为战俘被拷问时，耳朵被人一刀割下来，也咬着牙一声不吭；但是最厉害的还是广西人，还有云南人，这两个地方的人是审讯部最头疼的，一走进审讯室，痛感神经就跟关闭了一样，四叔公说，而广东人是最怕疼，也最怕死的，所以他当时就想，倘若自己不幸被俘虏了，实在受不了就招吧，谁叫自己在挨疼方面没有天赋呢，他又不是湖南人、贵州人、广西人或者云南人，在身体和道德的抵抗力上，他都不如这些地方的人，所以应该提前获得原谅，因为这种岭南式的敏感和脆弱，应该提前获得宽容，应该有这种想法而不为此羞愧，四叔公告诉我们，他就是用这种方法来抵抗羞耻，为此多活了几十年，我们默默听着，并不作声，他在我们面前已经把这件事反复讲了太多次，虽然每次的讲述都裹挟着第一次的激情，而我们不再有什么反应，哪怕是一个眼神、一个词语，除了心叔和他的女朋友，他们目瞪口呆地看着四叔公，同样地陷入了沉默，他们的沉默和我们的沉默本质上并无二致，我们终究要用这种沉默去面对这个老人。“或者，”心叔清了清嗓子，说，“我可以通过游戏来搞明白系谁下的手。”我们纷纷把目光投向他，因为除了四叔公，我们都还没有真正相信四叔公刚才的指控为真，而心叔首先站了队，他说，可能这才是我们来电玩城的真正目的和意义。他的意思是，游戏能赋予真诚边界。他这话我可不爱听，因为自始至终我都不知道目的和意义在哪里，我们为什么要见面，为什么要吃这个饭，今天出门前半个小时，我还在被窝里呼呼大睡，出门前二十分钟，我还在犹豫应该用哪种理由去推辞掉这次见面，如果这次我不来，这些故事就不会发生，我也不可能把它记下来，结果我这位新交的远房亲戚，一个半生不熟的人，告诉我：游戏可以自证，游戏不是游戏。他说，你们听说过一款叫“刺杀肯尼迪·重装”的游戏吗？一个瑞典人做的游戏，规则很简单，用一支老式步枪和三发子弹，一遍又一遍地爆掉在埃尔姆大街上款款而来的约翰·肯尼迪的头颅，仅仅是听起来简单，打死肯尼迪是不够的，想完美通关、得到全部的1000分，你必须按照任务手册来，第一枪必须射失，不伤及任何人，第二枪必须从背后射中肯尼迪的右肩下方，子弹从喉部飞出，穿过坐在前排的康纳利州长的后背和肋骨，击中车辆仪表盘发生反弹，打伤州长的手腕……这一枪的复杂程度超乎想象，而第三枪是要精准地击中肯尼迪头部右侧，没有第二枪困难，但也是足够困难的，所有发出的三枪都必须要在6秒之内完成，一次细微的失误都会被扣分，反正就是，这款游戏出来以后，没有一个玩家可以得到任务的满分，最接近的玩家也只是刚过700分而已，离满分还差一大截，换句话说，根本没有人可以完美地完成这个游戏，而这个游戏只是真实还原了历史，这就是1963年11月22日那天，被指控为唯一真凶的奥斯瓦尔德所完成的一切。奥斯瓦尔德不是人类吗？这款游戏想说明的不是这个，而是想反向证明美国政府的调查报告是多么的荒谬，“独狼理论”是多么的荒谬，这个世界的当权者所圈定的话语是多么的荒谬，肯尼迪案不是一个人做出来的，其背后的荒谬也不是，世界上所有的荒谬都是许多人一起造出来的，所以说，游戏能做到的是，揭露并证实这种荒谬，心叔说，这次我们也可以这样做，他说完这些，我们都半信半疑地一致往四叔公瞧去，四叔公却没让我们瞧明白，转身就往一台赛车游戏机走去，我们也跟着过去，围着他站成一圈，所有的游戏币都在我手上，于是我一次又一次地把币递给四叔公，像个雷德利·斯科特式的机器人一样，他一次又一次地接过去，投进底部细长的凹槽里，反复开启新一轮赛车游戏。我本以为身上的币足够多，可是很快地我的四个裤兜干瘪了下去，时间过得这么快，只是四叔公一个人在开着赛车而已，他用完了所有的游戏币，也只是一瞬间的事情，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注意力都不在这个上面。我们只是焦虑而紧张地盯着彼此，唯恐有人把手伸向座位上的四叔公，也唯恐自己把手伸过去，也唯恐有人或者自己把手伸过去而没有察觉到。不知不觉地，三四个小时过去，四叔公从座位上站起来，疲惫不堪，甚至比在战场上还要虚弱，双腿不住地发抖，心叔首先扶住了他，我们一行人慢慢地走出游戏厅，在离门口不远的花坛旁边的长椅上坐下，椅子上还有一些水迹，在游戏厅的这段时间里，外边竟然已经下过了一场雨，夜风吹过来，似乎没那么热了，几个长辈就坐在我对面，低着头，大概每个人都在回想着刚才的场景，思忖着，自己为什么会置身于那样的

场景之中，难道我们真的相信，在我们之间，真的有人去向四叔公下手吗？四叔公身上并无油水可榨，他的口袋里只有一副扑克牌。我们差不多隔个把月会举办一次家族聚会。一般在大舅家，因为他的房子最大。女人们也会过来。她们在厨房里忙碌，男人在客厅聊天。四叔公是来得最早的那个。我们会尽量和他聊天以避免他掏出扑克牌。我一般会被安排去和弟弟妹妹们玩，因为长辈们认为我是最具有童心的那个，但其实童年时我只有一个人玩。大舅会弹起家里的三弦琴。其实没几个人在听。有时候我们会吃柚子姜撞奶，吃表婶做的白酒芝士虾和烤生蚝。那是她的拿手好菜。所有食材都是从老家带过来的。我们相处得不错。那也是因为我们都在广州这个地方，一个看起来不是异乡其实是异乡的大城市。我们都不是彼此最亲近的亲戚。我们心里都清楚。一旦回到乡下，回到那个鸟不拉屎的老家，我们可能十年、二十年才往来一次。我知道。因为童年时见证了这一切。我见证过我们一起坐在某个人的喜酒宴上，却相互连一句话也不说。当我们在老家时，彼此是陌生人，各自有各自的亲戚，而到了广州，我们各自成了对方的亲戚。就在我们坐在长椅上胡思乱想的时候，心叔女朋友的叫声把我们惊醒，四叔公躺在地上，出气多进气少，怕是不行了，我们感到了一种巨大的恐慌，却面面相觑，一丝办法也没有，就在大舅掏出手机呼叫救护车之时，我们其余人却想象着一个滑稽的境况，得把真相告诉医务人员和警察，四叔公是玩游戏玩死的，而不是别的什么原因，这个活着三个人的份儿的年老长者，枪弹也无法撼动他分毫，却因为过度游戏而死，如果警察问起他为什么要玩游戏，我们只能向警察坦白，是心叔教唆他去玩的，或者说，都怪心叔买了太多的游戏币，还有就是，心叔女朋友当初就不应该提议去电玩城。反正他们还算不上我们的亲戚，暂时、目前还不是我们的亲戚。这时心叔女朋友扶起四叔公的上半身，熟练地在他的后背和胸口进行着推拿，左几下右几下，没几下四叔公就顺气了，可他依然一动不动，闭着眼睛，像睡着了一样，心叔女朋友告诉我们，四叔公已经没事了，我们心里的石头总算落地，可心叔女朋友说完话后突然抽泣起来，特别伤感，眼泪鼻涕跟钟乳石似的往下掉，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面对一位年轻女性的哭泣也是很艰难的，和面对四叔公之死一样艰难，心叔同样显得手足无措，他那么爱她，却站得离她那么远，似乎是一种天然的躲避，像我们老家所有的男人那样，把女人的情感，这个顽皮而鲜艳的小甲虫关在玻璃瓶子里，不管他去过什么地方、有多么高的学历、见识过多少世面，也没有办法改变血缘中的这点，过了一会儿，等到心叔女朋友稍复平静，她才告诉我们，她曾在一家北方县城的老人院里当过义工，刻苦训练过标准的推拿手法，跟她同队的人都走了，只有她一个人留下来，在她待的一年里，院里的所有职工都在外逃，在那里，她认识了一个年老的河北男人，跟她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既不是亲戚，也不是故友，但他们俩比任何亲戚和故友都要熟悉，他们在一块儿聊的天比任何亲戚和故友都要多，“在我们这儿，”那老人说，“没有人不想着逃离衰老和死亡，而只有我们正朝着衰老和死亡奔去。”就如同一个关于世界、关于我们这个老人帝国的巨大隐喻，护理员、医生、清洁工、厨师、账务、办公室主任、副院长，甚至连院长也悄悄地跑了，剩下她一个人，她也不能包办所有的活儿，无论推拿的手法多么熟练和巧妙，也应付不来那么多老人，她一遍又一遍地在老人身上练习，提高着推拿的效率，那些衰老的躯体似乎是为此而生——一种练武用的木桩，她的技术越来越高，而木桩也在不断地死去。有段时间，她甚至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好的推拿师，可以到世界上最好的疗养院去工作，去奥地利或者墨西哥，但每天半夜里，她只能待在华北平原的床上痛哭不已。院里的老人越来越少，最后剩下河北老人在内的几位。河北老人让她走，她不走，河北老人说，只是时间问题，她说，那就等着。可河北老人并不愿意别人等待着自己的死亡，既然她不走，那他走，他联合其他老人密谋了一项行动，弄来一辆车，夜里偷偷开走，逃离了老人院，幸亏她那晚上失眠，听到了车声，骑着摩托沿着公路追上去，没开出几公里，就看到他们那辆车撞在树上，里面的人已经没气了，怎么推拿也无济于事，即便是世界顶级的推拿手也无济于事，尤其是她的那位至交，或者说忘年交，那位河北老人，她猜想，在车撞上树的那一瞬间就已经死了，甚至更早的时候就死了，还在开车的时候就出现了心脏麻痹，所以导致了车子撞在树上。她把他们从车里抬出来，整齐地排列在路边，她没哭。警察来的时候她也没哭。她一个人回去的时候也没哭。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到刚才那个瞬间发生之前，她都没有为此而哭过，也再也没有给任何一个老人推拿过，她甚至忘了这件事，忘了推拿，忘了所有的经络和腧穴，忘了一指禅缠法和关节拔伸法，直到刚才给四叔公推拿，那种触碰的手感使她的记忆一下子复苏过来，那种经年累月训练出来的肌肉记忆，以及那个时候的悲伤，四处一片黑暗，那个河北老人就躺在她身旁，既不是她的父亲也不是她的祖父，他们各自老家隔着几千公里远，他们聊天的时候，各自的口音都未必能使对方舒适，但他们依旧无话不谈，即便如此，他们也没有好好地告别，就连最后一次推拿，她也无法给他做。心叔的女朋友越说越伤心，四叔公这时醒过来，我们惊奇地发现，他的脸

色比先前红润许多，站起来时身子也变得轻快了，他还说自己的视力也变好了，从这儿能看到南岸那边的广州塔，我们自然不相信他的白内障就这样被治好，更不相信他能望到广州塔，不过刚才那番推拿，是确确实实起了效果的，这点肉眼可见，着实让长辈们对心叔女朋友的态度大大改观，他们开始上前询问、关心、讨好这位跟我年纪相仿的女性，围在她身边，拼命地想和她交谈，而在此之前，他们压根就没有怎么接近过她，也不屑于和她说话。我能理解他们这种兴奋和恐慌，毕竟他们也在逐渐变老。在这个时代，他们在加速变老。但心叔女朋友说她要走了，她要回家，尽管她一点也不想回到自己房间里，不过总比待在这里要好得多。长辈们挽留不住，便把希望放在一旁的心叔身上，希望他能劝她留下来，可心叔站在那里一言不发。过分地一言不发。直到她离开，我们这位冷酷、真正的亲戚才告诉我们，他从来就不认识这个女人，一个在江边突然出现、偶遇的陌生女人而已，他这样说时所流露的真诚，让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说了假话。

本文选自索耳首部中短篇小说集《非亲非故》。八篇小说，从二十世纪初到千禧年，自由穿梭在真实岭南与异质空间，横跨南方人类秘史。卷入金山猪仔苦力贸易的外曾祖母一家、狂飙突进的“铀博士”、在宗族社会挣扎生存的表姐妹、失业十年的奥特曼皮套演员、自挪威归来的陌生远房亲戚，在省城反串梅艳芳的细叔……以文学人类学视野，拆解和重构粤西；敏锐地捕捉时代黄昏放出的蜻蜓，把它做成标本。



索耳

1992 年生，毕业于武汉大学。编过杂志，做过媒体，策过展。曾获香港青年文学奖、浚先生奖、“《钟山》之星”文学奖、南方文学盛典“年度最具潜力新人”提名。出版有长篇小说《伐木之夜》。《非亲非故》是索耳首部中短篇小说集。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非亲非故
索耳著
中信·春潮
2023年6月

“写完长篇小说《伐木之夜》后的三年，完成了一个集子，都是中短篇小说。是对我们的文化基因、历史渊源、现实困境所做的一次回望和精神的反思。这个集子有一个比较强的形式感，通篇不分段、几乎一逗到底，是对‘标准语’的抵抗，希望构造一个独立又特别的语言空间，使读者有意无意地将自我填充进去。”



题图来自 [Lan Lin](#) on Unsplash

小说

女嗣

索耳 | 新书试读

我们如此讨厌她，
也许正是因为她和我们实在太像了

我舅舅的女儿，一位刚上初三的中学生，在学校附近的堤坝上来回走了三百五十七圈，第三百五十八圈的时候，她走到一半，停止，然后沿着梯子下来，汇入心态不一的围观人群中间，声称自己看到了四架飞往广州、三架飞往美国、一架飞往尼德兰的飞机，没人相信她，虽然这个学校的师生都饱受飞机不断升降的噪音困扰，但也没人对这个机场有异议，要说有什么的话，有些人在底下围观时，心里隐隐期盼着她一脚踩空，倏地摔下来，倒不是说有什么深仇大恨，仅出于一种猎奇的期待，很简单，对这个一丁点儿想法都没有的人，全世界只有她的父母，也就是我的舅父舅母，全程战战兢兢地盯着半空，就像是航天工程师屏息目送着冲向天际的神舟五号，确实，女儿是他们最得意的作品，即便不是他们造出来的，也是他们教出来的，他们从福利院里领回这个女婴，用十四年教成了现今这般模样，矜贵、好笑、极自私、不可理解、满口谎言，舅舅的女儿爱说谎，用我们这儿的方言来说，叫车大炮，她车起大炮来连她爸妈都忍受不了，她爸妈已经是我认识的人里最会车大炮的那一批了，对，舅父舅母，包括我父母，还有他们的同辈人，六七十年代的过来人，在无数的车大炮中存活下来，而我的舅父舅母还是其中最优秀的亲戚，仍然受不了她的谎话，每次聚会时，我们倒宁愿她是个哑巴，她也确实不爱搭理我们。任何人。只要一张口就是谎话。她只对电子设备真诚，她的 iPhone X、PS4、Beats Solo3，对了，她还是一个拥有十几万粉丝的视频博主，当晚回去就在主页上更新了一期，就是她在堤坝上行走的片段，三百五十八圈，她穿了一双琥珀色的圆头皮鞋、白袜子，在画面中心，两条修长的腿规律晃动，跟地面摩擦出一种毛糙的声响，过一会儿，视线从近到远，你可以看到下面聚集的人群，整齐的黑蓝色校服，还有一些从树丛里探出来的脑袋，由屏幕边框和堤坝边缘切割的镜头焦点上下变化，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她像只被系着脖子的鸽子，跳跃着，俯视着地上的米粒。有人在弹幕里写道：你真是个艺术家。我的表妹是艺术家吗？可能是个表演艺术家，她演技非凡，我记得几年前，她还是个小不点，他们家来我们家做客，来之前，舅母特意嘱咐我妈，做一盘表妹最爱吃的生蚝煎蛋，里面一定得放小香菜，结果我妈忘了

撒香菜，吃饭时表妹一脸阴雨，没吃几口，就说菜里有毒，别说，她演得确实挺像那么回事，捂着肚子在地上打滚，脸憋得紫红，汗水把上下两层衣服都浸透了，不知情的还真以为她中了含笑半步癫什么的，真的，她这段戏应该拿去给电影学院当样板，我们两家人给演得团团转，她爸妈赶紧送她上医院去，检查完，医生说咩事都没有，还说，这是他见过的最健康的人体，如果表妹的身体出问题，那我们所有人的身体都会先出问题，听起来挺幽默，不过没说错，她从小到大，连感冒都没怎么得过，舅父舅母更是龙肝凤髓地喂她，喂成了一米七几的大个，两条大长腿就那样杵在地里，往上接着微微隆起的胸部、立体的锁骨，肩膀温柔的曲线向后背和两边延伸，不知何时，她已经长大成姑娘了，在某个阳光明媚的聚会日，某个瞬间我才反应过来，一个如此蓬勃、健康的人体，在外婆家庭院的网床上躺着，两只穿皮鞋的大脚盘挂在尾端的绳子上，淡淡的香水气偶尔传来，原来在那些大人相互谈笑的间隙，表妹悄悄长大了，我这么迟才发现，因为我之前都在阴影里注视她。如今，她站在我面前，气势都压我半头，看上去她才是我姐。她也从不叫我姐。我只是关注她视频博客的十几万粉丝之一。当然，表妹也不是我唯一关注的博主，她也是我的十几分之一，她更新得也不频繁，一周两次，相当规律，符合她的学生身份，在她当晚更新的视频里，我留意到一些以前没有的东西，比如，影像背后有别的声音，若有若无，我都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听见了，像是旁边有人在说话，陌生的语言，这门语言首先让人无法听清，然后才是无法听懂，我戴着耳机一遍遍听下去，这时，画面上出现的一个影子吸引了我，很隐蔽，在屏幕的角落，在堤坝下面围观的人群中间，这块图像一直随着表妹来回踱步的镜头上下晃动，我好不容易才辨认出其中的一道身影，某个穿着校服的学生，看不清样貌性别，竟然和表妹一样。步伐完全一致，三百五十八圈。唯一区别是一个在堤坝上，一个在堤坝下。这个人确实让我好奇，这也不是什么巧合，我觉得，可能这个人和表妹相互认识，可能这个人隐藏在她的粉丝列表里，十几万分之一，和我一样，我、表妹和这个人的共同纽带，秘密的纽带，曝光死，我很了解，生命中不可言说之事，甚至比生命还要深，只是相对意义上的区别而已，我比她的父母，比所有的大人，都多了一条跟她连接的纽带，有次和舅父舅母吃饭时，他们随口冒出一句，让我帮他们多照看表妹，我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他们怎么会瞧得起我呢，饭桌上的话怎么能当真呢，那是世界上最大的谎言温床，这句话更像是一句反话：离我的女儿远点。他们巴不得我离表妹越远越好。他们大概察觉到了什么，凭借多年来、在一次又一次的行骗中所获得的敏感，他们知道，他们不说。我知道，我也不说。有人知道，有人也不说。保持这样下去，就是有利的循环；不刻意盯着看，影子自己就会消失。只是没料到，几天后的星期五，太阳热辣辣的，每个人头上都顶着某种形状的蒸汽，在这种天气里，我竟然在世贸大厦里闲逛时碰到了表妹，表妹竟然也在这栋大厦里闲逛偶遇了我，当然，“闲逛”只是我们的说法，我们都有各自的目的，我其实是在等一个在网上勾搭来的男友，这个男人号称器大活好，我们见过几次，而表妹也在等她的男友，从我们一打照面的那一刻，我就了解了一切，多么尴尬，就像那首歌的歌名，《给亲戚看见我一个人食吉野家》，这一对亲戚在这个场合相遇，竟还不如两个陌生人相遇，是我先跟她打了招呼，因为我确实没法扮演得像一个陌生人那样，然后我们沿着每层的环形步行道一起走，绕完一圈，再顺着自动扶梯去上一层，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聊天很艰难，这是可以预料的，我问一句她答一句，话题库很快就清零，但暂时谁也没法离开谁，这个奇怪的联系是我刚刚才发现的，因为她在我旁边，她和我一道被传送带输送上去，离我的距离只有几厘米，我们离得越近，这种感觉越明显，熟悉、淡淡的香水味，她的香水不止一种，但显然用起来还比较生涩，没穿校服，穿的是一件黄色条纹的连衣裙，梳理过的短发刚好整齐地中止在肩膀的弧线处，妙哉，青春洋溢，我们手臂外侧有过几次接触，像闪电一样，我也曾有过这样的年纪，感觉是一个遥远的梦，难以描述，就像面前的表妹，对我来说就是难以描述的，我对她说也是难以描述的。今天没有课吗？我问她，她说的是，我知道她撒谎，她逃了课，我问她来这边做什么，她说，来做指甲，又一个谎话，这里并没有什么好的美甲店，随着我们越上越高，她的谎话也逐步上升，一个不可限的终点，这时，我提起了前几天的事情，为什么要在那么高的堤坝上走，为什么要让父母担心，她有点惊讶我知道这件事，我说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就在当晚就知道了，我们这个大家族，亲戚之间是一个看不见的共同体，现在通讯又这么发达，谁有什么事情，一传十，十传百，就全通知了，最后我说，别小看这些上了岁数又无事可做的家伙，他们知晓所有的信息，表妹没说话，嘴角向下撇了撇，意思大概是，这就是为什么她要向我们撒谎，她这时不太想跟我说话，但我坚持逼问她，为什么要上堤坝，终于她耐不住透露，却跟我预料的理由不同，不是为了发视频博客，而是因为机场停机坪上的某个人，她说，只有站在那个位置，才能看到那个人，我以为她说的是视频里跟她一起踱步的那家伙，不过很快我知道自己想错了，表妹指的另有其人，你肯定没发觉，她说，虽然坐过很多次飞机，但你肯定没注

意到那个穿着橙黄色工作服、在停机坪四处走动的人。有这么一种人存在吗？我回想着，好像有点印象，不就是机场的维护人员吗，打扫卫生什么的，表妹马上否定我，不，他的工作不是打扫卫生，他没有什么工作，或者说，他的工作就是目送那些飞机离开。一架，两架，三架。像是数着绵羊入眠的人，他比任何人都了解飞机的数量、形状、大小和航班信息，但没有人留意他。他也从不坐飞机。好吧，我没法确定这是不是表妹编的又一个谎言，又一个即兴表演，她能力很强，如此严肃地表达着这些，鼻翼因紧张而向两侧微微外扩，这是我们家族的鼻子，熟悉的鼻子，无论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我都能第一眼认出这个鼻子，跟照镜子似的，我没法逃过这个群体幻术，里面的每个成员都无法逃脱，可是，面前这个稚气未脱的少女，跟我们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不知道从哪个垃圾堆里捡来的”，我们父母经常这样骗自己的孩子。她为什么也有我们的鼻子？这等于说，我们的鼻子不受基因支配，而是文化所导致的，因此，瞧着她很容易感到怜悯，怜悯这个词听起来有点过，我知道，可这也恰好是我关注她的原因。我们岔开那个“停机坪人”的话题。陷入沉默。电梯到了顶层，上面无路可去了，事实上整栋大厦都没啥可逛的。每个城市都有一个世贸中心，过时的建筑、没落的大厦，九十年代末、新世纪之初的记忆，每个城市都有这么块地方，短暂地辉煌过一阵子，所有人心头肉，逛街的首选之地，然后很快就冷落下去。这是我的记忆，却不是表妹的，她出现在这里，本身就有点奇怪。顶层只有一个电玩城的入口，里面很吵，电子音夹杂着翻滚的人声，进去玩一把，我提议，表妹没说话，却也跟着走进来，我们在里面转了一圈，她的眼神有些冷漠，看上去对这些游戏没感觉，也是，它们对她来说有点落后了，而且这大厅里大多是男孩子，含男量太高，让她感觉不适，而我就不一样，这就是我所舒适的环境，小的时候，我就故意表现得像男孩（这个可笑的表达！），因为我爸妈希望家里唯一的孩子是个男性，所以我就要比男孩还男孩，二十三岁前一直剪着五厘米长的短发，从小学起就给人叫“男人婆”，打架冲在第一，学抽烟，穿球鞋，也比那些男孩更会打游戏，不信可以问，当年霞浦区海滨三路第一八神庵是谁，是我，在那些逃课的午后，在那些游戏厅叮咬着蚊虫的褐色布帘背后，我日复一日地用游戏手柄锻炼着自己的手速，用一枚币就可以随便通关《拳皇 97》，把大蛇打得满地找牙，不信，我可以证明给你看，为了证明这个，我在前台买了一枚游戏币，让表妹帮我挑对手，她选中了一个染绿毛穿夹克的哥们，十七八岁吧，她觉得这种已经看起来够流氓了，说实话，对我来说就是小菜，我当年见过比这个流氓一百倍的，在我手下也讨不到一点好，当然，说的是打游戏，我在那绿毛旁边坐下，把币扔进去，他看了我一眼，我没理他，直接点了 2P 对战，角色三对三，我把暴走八神庵放在第一个，其他角色选什么都无所谓，我手一摸到摇杆和按键就兴奋了，似乎是解封的肌肉记忆发热发烫，表妹在身后紧盯着，游戏开始。游戏结束。前后不到一分钟，勾脚下轻脚站轻脚前轻拳轻葵花两段接八稚女，我还以为会操作生疏，并没有，这些手部动作已经融入生命里，成为我的一部分了，绿毛几乎没怎么抵抗，不需要抵抗，说起抵抗这件事，他和表妹一样，十几岁的年纪，跟我三十几的人比起来，那是微不足道，他们只是我的后辈，还没遭到生活更大的抵抗，毕竟，我也是一位人到中年的女性了，见识过各种各样、更深刻更痛苦的抵抗，怎么能跟这些小年轻较真呢。从游戏厅走出去时，表妹跟在我后面，她的眼神有些变化，带着点仰慕，从楼梯扶手的反光处看见的，我们顺着原路下楼，下到半路，她突然问我，可不可以看看我的文身，我其实吓了一跳，她怎么会突然问这个，而且她竟然知道我有文身，忘记是哪一次了，她说，在外婆家的海边看到的，当时我正脱了衣服，在海里游泳，我说她怎会看到呢，原来是那次，因为我的文身在肚脐下方，子宫的表面，不算太开放的位置，正常情况下很难看到，除非是那样特殊的场合，她提及这件事时也有些羞涩，一个画面顿时在我脑海里浮起，带着金黄的色彩，胶状的发热的氤氲的神秘的视角，当我在水中漂游时，像一条无尾的金枪鱼，在阳光和热浪里交替隐现，而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这个刚刚发育的女猎人，正偷偷躲在木麻黄的树洞里，暗中观察着一切，就像我在偷偷关注她的成长一样，她也在偷偷关注我。不知从何时起她就在那里了，也不知道何时离去的，她对太多东西都有强烈兴趣。这条鱼很迷人，她想，全身上下都很迷人，最迷人的是那道印记，她想知道印记的秘密，也想有这样的印记，我竟然没有察觉她这种想法，如果我提前预料到，就会毫不犹豫地阻止它发生，从最开始就阻断它，它可不是什么好东西，绝对不是。虽然我是这么想，奇怪的是，我的做法却完全相反，我把表妹带到一个隐秘的紧急出口，楼道里没什么人，我把上衣掀起，松开腰带，那道文身就迫不及待地跳出来，进入表妹的眼睛，只是那么一瞬间，我立马整理好衣服，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那记文身的内容就是没有内容，没什么意义，就是一记文身而已，证明在我的子宫上方存在。疼不疼，她问我。这个问题可以有两种答案，如果她指的是用针在皮肤上刺，或者是，双腿张开，给人用冰冷的金属，一把钳子，挤进那道缝隙里，也可以说是挤进那个洞里，生或死的闭合里，然后把那个黏糊糊的小怪物弄出来，我甚至都

不想看它，只是一泡液体，如果她说的是这种痛苦，那根本不算什么，真的，一点都不疼，仿佛飘在云端，晕晕乎乎的，身体的某个不起眼的部位给分离出去，就像平时剪掉指甲、理完头发，作为生活的废弃物，扔掉，告别，绝缘，直到过了很久，某个时刻它突然隐隐作痛，如果她指的是这种痛，那它就是难以忍受的，因为它也许不存在，不知道在哪里，或者说只是一种空虚的感觉，我希望表妹永远都别有这种感觉，而是，永远保有好奇，虽然很难，否则我会后悔，后来我已经后悔了，跟她告别后，回到家里，在浴缸里泡澡，出神了好长一会儿，有点后怕舅父舅母会找我算账，他们的宝贝女儿要是给我带坏了，也去给自己画一个图案怎么办。监守自盗。要是只是这种程度的好奇，倒也还能接受。我们今天不约而同地放了男人的鸽子，好好笑，都怪这热天气，我确信自己从大厦走出来时，已经失去了那种兴致，可就在泡澡的时候，它又回来了，甚至比早前更强烈，吃晚饭时、在阳台上歇息时、做瑜伽时，它一直在那里，我躺在床上，翻开《月亮与篝火》，这本书我已经反复读了不下二十遍，过了一会儿，就连帕韦泽的词语对我也不管用了，我想念那个男人，安静的，在床上，一个旧的低沉的梦，上次的感觉超棒，我们缓慢得像上世纪日本 AV 里的主角，马赛克画质，在狭小的温泉旅馆里，边做边喊着对方的名字，然后在对方的身体上睡着，这是最好的睡眠方式，若非如此，今晚我就得眼睁睁到天亮了，我越想越精神，坐起来上网，打开表妹的视频博客，果然更新了最新一期，在她的小房间里录制的，她百分之八十的视频都诞生自那里，一个十来平米的空间，第一眼能看到天花板上菠萝状的白色灯具，门后的吊兰，浅黄色的墙纸，左边墙上贴着巨大的 The Who 乐队的海报，右边墙上挂着一个砸烂的仿制吉他，而直对着她的书桌，也就是她常坐的位置，墙上挂着她四岁的照片，戴小圆帽，皱着眉头，眼睛形状像两个螺丝钉头，嘴巴撇着，完全是个丑孩子，也是，否则她就不会出现在福利院，第一次见到她时，她才两个多月大，可怜的小玩具，眼睛睁得大大的，里面全是泪，还以为她是来还泪债的，结果混成了混世魔王，这位魔王正出现在镜头里，屏幕中央，我的面前，看上去刚洗完澡，头发还没干透，穿着简单的 T 恤，素面朝天，她经常这样出镜，脸上凸显的苹果肌以及满屏的胶原蛋白不由得让人嫉妒，在进入正题前，她先聊了聊今天的经历：天气好热，出门逛了商场，连吃了两条雪糕，做了美甲，等等。她在屏幕前展示指甲，淡朱色的，原来她真的做了，她絮絮叨叨讲了十分钟，但没有提到我，没提到如何偶遇了我这位亲戚，也没提到去了电玩城，预料之中，提到那才是怪了，我也希望她最好别提，接着是表妹的节目时间，她用几种语言来唱一首网红歌曲，对了，表妹有很强的语言天赋，相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这些人连普通话都讲不好，她却讲得字正腔圆，跟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似的，我们没这种命运，除了普通话，她还会东北话、陕西话、上海话、四川话、福建话、广东话，还有我们这里的方言，介乎闽南语和粤语之间的一种口音，也是她的母语，但对她来说是最难的，她说自己十几年来坚持在学习这种语言，却也没完全掌握，我们也不信她说的，她不可能不会说，只是不想说，她打心底里觉得我们的方言是全世界最粗鄙的语言，没有之一，说方言的我们，则是全世界最粗鄙的一群人，所以她不和我们交流，就算有交流，也是讲普通话，越讲普通话我们就越觉得她装，因为我们没人讲普通话，我们最德高望重的外婆，甚至连一句普通话都听不懂，那次她老人家八十大寿，聚会庆祝，我们全部人都去了，每个人都约好给外婆准备一个小礼物，表妹的礼物是她的表演，俄罗斯歌剧中的某个唱段，在兴趣社学来的，表演时，我们把她团团围住，如同在观看一个从遥远的异国进贡而来的珍兽，珍兽在仰面，领首，打着响鼻，盘旋，呢喃，踢蹄子，时而向东，时而向西，看起来那么陶醉，可我们没有人知道她在唱什么，可能连她爸妈也不知道，看着他们笑眯眯地点着头，我们也就跟着晃动脑袋。后来是外婆终止了这场表演，唉，她像头牛长叹了口气，我们都安静下来，她说，这炸娃仔唱的是什么歌咧，我一个字都听不识。有些人开始笑，表哥家的媳妇就说，不如唱首雷州歌，外婆爱听，大家都爱听，然后我们就怂恿她唱一首我们这里耳熟能详的民谣，表妹涨红了脸，感到极大的耻辱，冲着我们大声说，她永远也不会唱这种歌，然后就跑了出去，因为这件事，半年内她都不愿意出现在我们面前，不过，她的表演其实很精彩，当我隔了一段时间再回想起那个场景，只会觉得是一种奇异的美，她不是我所认识的那个表妹，是另外一个人，树影在脸上变换，袖子闪耀，如同成熟清香的菠萝蜜，那么一瞬间，忘记了她长什么样子，歌喉也很迷人，充沛的元音自腹部往上挤压出来，我从不知道原来表妹唱歌这么好听，在视频里，她也用了俄语去唱那首网红歌曲，俄语也好听，她一直在学习，考了 C1 证书，据说以后要去读莫斯科的大学，很有前途、喜闻乐见，体现了两国几十年来的深切友谊，并且在未来的几十年，还将继续世代交好下去，这同样是舅父舅母的夙愿，这颗种子几十年前就播下，当年在乡下当知青时，两人因偷偷收听苏联歌曲而结识，一块板凳大的收音机在监视的阴影下传来传去，约会时，他们相互教对方刚学会的曲子，在月下，在操场上，谷垛旁，小溪边，糖厂生锈的铁墙周围，压低声音笨拙、细细地吟唱着，

不敢大声，惊天动地，那个巨大的声音会跳出来喝止他们：打倒苏修主义，让他们难堪，噤声，闭口，直到解冻期到来，舅父骑借来的自行车带着舅母在田野上欢快地奔驰，高唱《喀秋莎》，直奔民政局，痛快把证书办了，尘埃落定，接着就是满怀希望地造人，他们觉得自己的孩子一定像钢铁般的保尔·柯察金，而且一生下来就会唱《黑桃皇后》，弹得一手漂亮的拉赫玛尼诺夫钢琴协奏曲，他们这样期待着，舅父还梦见普希金走到他面前，亲手递给他一个婴儿，然后舅母的肚子就一天天大起来，四个月后某一天，恰好这天舅父没去接舅母下班，舅母就自己坐车回去，走到楼下的巷口时，黑咕隆咚的，她突然就摔倒在地上，剧痛让她失去前一秒的记忆，她不记得究竟是自己摔倒的还是被推了一把，那只手，巨大、不可名状的力量，始终在她的记忆里缺席，而且永远也找不到那个人，那个可能是前来报复的人，因为在城里的计生部门工作，舅母确实得罪了不少人，所以这种猜测很合理，在医院里她产下死胎，哭到虚脱，出院后整个人瘦了一大圈，再也无法生育，他们试过很多办法，不奏效，某块东西在生命中被勾除，孩子变成他们聊天的死穴，他们小心翼翼，不去触碰它，一年年过去，显痛转为隐痛，渐渐归于岁月的静美安详，熬过漫长的更年期后，舅母不再因为回忆起那个死去的孩子而在深夜痛哭，而是屈服于孤独，人类的最强杀手，孤独，再强的人也无法抵御，再加上我们亲戚间的挑唆，在我们这个地方，无子无嗣的人，死后灵魂注定要到处漂泊，空中、水里，无处安放，所以他们决定去领养一个孩子，就是我面前这个幸运的女孩，虽然不是一生下来就会俄语，但因为她的语言天赋，似乎也暗合了舅父家孩子的命运，他们爱她，加倍爱她，远胜于那个死去的孩子，为她报语言班、钢琴班、舞蹈班，表妹确实很多才多艺，这是她明显的优点，就像她的缺点也很明显一样，我们不能紧盯着她的优点，不看她的缺点，也不能只盯着她的缺点，不看她的优点，当她在视频里用各种语言唱歌时，她就是百灵鸟的化身，自然界完美的造物，令人艳羡，我还没见过她跳舞，不过一想到这个，大脑里就有画面，她的身材，站在舞池中央的样子，注定是一个特别的标本，我应该记录下来，这本来就是我的工作，然后，机会第二天就来了，那天晚上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趴在桌上，可能是听着表妹唱歌就睡着了，清晨时，我被手机上的消息提示音惊醒，是表妹发来的，她邀请我去观看下周的排练，学校的兴趣社组织的芭蕾舞剧，她在里面饰演黑天鹅，希望我能去，在短信里她一再强调，于是我回复她，当然乐意去，实际上我回完消息后就开始激动了，我这才意识到，这是我们第一次线上联系，也是第一次主动的联系，抛开那些不可避免的聚会和偶遇，我的这位表妹，跟所有人都不对付，竟然主动邀请我，窗外阳光照进来，我差点以为是从西边照进来的，或者是一直都弄错了屋子的朝向，虽然有点夸张，这就是我当时的感觉，直到几天后准备出门时才放松下来，我还精心化了妆，选了一身显得年轻的衣服搭配，喇叭牛仔裤加一件轻薄小礼服外套，喷上最贵的香水，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就算不是职业的观众，也是一位真诚的观众，还提前四十分钟到了现场。在学校的音乐厅里，几乎没几个人，射灯注入舞台木质地板中央，像一汪盈满的池子，余光向上反射到现场的几百个红套座位上，散出柔软的幻影，六七个穿着白色舞服的少女，分布在台下四周，吃零食，嬉闹着，在过道里练习脚步，里面没有表妹，她发消息来说她在二楼东出口的栏杆上，让我过去找她，我顺着方向走过去，见到她时，她正跟一个男孩在一起，两人手里都夹着雪糕棒，她在视频里说过，紧张时会吃雪糕，她的小怪癖，有一次期末考前连续吃了六条，是她的最高纪录，结果题还没做完，就拼命地拉肚子，在视频里她什么都说，现实里却完全相反，她指着男孩，向我介绍说这是她男朋友，虽然刚才一照面我就认定他就是那个男孩，她这么一说，我反而有点怀疑，要是她是在视频里介绍自己的男朋友，我会绝对相信。男孩的长相跟我预料的完全不一样，很普通，剪着平头，没有我的初恋帅。初恋的图像一下子从脑子里蹦出来，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回忆起这个人了，确实是个帅哥。没有对比没有伤害，可为什么会突然冒出来这种对比，我也解释不清楚。表妹不应该找这样的男生，或者，这个男孩就喜欢说谎的她，说的谎越夸张，他就越喜欢，这种被骗的感觉很享受，我们在栏杆上聊了一会儿，他们都很小心，把握分寸，语气中甚至含着点钦敬，不知道表妹先前是怎样向男孩介绍我的，其实我很自卑，那些亲戚是怎样看待我的，我清楚得很，现在这个场合，反而有点不习惯，在类似陌生人的两人面前，我却获得一个较高的地位，聊得越多，这个男孩越显露出他的浅薄，一个小卖铺家庭之子，我觉得，或者一个隆江猪脚饭店店长之子、鹅饭店之子、烤生蚝店之子，都行，这种家庭的小孩我见得太多，就在十几年前，现在也没有一丝变化，不知不觉间，他们舔完了雪糕，留在手里的小棍等风干了，用打火机点着，火苗在旋转，看着它，渐渐低矮熄灭，然后往楼下扔去，那里恰好有棵南洋杉，直坠入那绿惨惨的怀里，在枝叶上拐弯，终于消隐。楼道里有人叫表妹的名字，大概是舞伴来催场，她的眉毛皱了下，很不情愿地朝着声音的方向走下楼梯，我们跟在后面，像她的随从，像捧着洁白、长长的衣服下摆，我也很好奇，我是怎么把自己放到那个位置的，本来是那个男孩独有的位置，

他很擅长做这种事，他站在表妹身后时，几乎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近似空气中的透明，尽管他离我很近，步伐在楼梯上的响声清晰可闻，反而有点怪异。我想起在表妹的视频博客里，这个男孩在坝下来回踱了一千多步，很认真地，完成了一个任务，看不出有任何受逼迫的意思，他自愿去做，源于最纯粹、本能的机制，请继续下去，想到这里，我停下脚步，让他们先走过去。五分钟后，表妹走到舞台上，开始合练，男孩消失了，我回到观众席，找到一个前排的位置坐下，足够近，能清晰地分辨出她们起舞时的羽毛，还有脚尖和地板摩擦的声音，女孩们一个接着一个，独舞试练，唯独表妹跟其他人离得远远的，僵硬地站立，没人搭理她，她也不去搭理别人，她有这个资本，不知为啥，我心里铁定这一点，否则一个让全校人围观的怪女孩不应该出现在这个舞台上，在等待她表演的时间里，我左顾右盼，突然定住，瞧，我看到谁了，竟然是舅父舅母。就坐在我斜背后不远处。此时他们正好看到我，连躲避的时间都没有，他们的眼睛里顿时闪过好几种神色，惊讶、生气，又有几分迟疑，不用看到这些，我心里都明白得很，在他们眼里，我是一个怎样的角色，出现在这个场合又意味着什么，在这一瞬间，我猛然意识到，这很可能是表妹的诡计，她的计划、她的恶作剧，跟她十几年来所熟练的车大炮本领一样，她故意把我们约在这里，却不告诉我们对方会来，她在舞台上似乎已经忍不住发笑了，我能想象得出，她嘴角是怎样抽动的，接着我离开座位，硬着头皮，走到舅父舅母那里去，跟他们打招呼，他们让我坐在身旁，脸上已经堆起了笑容，老干部式的笑容，对两位来说，同样是不经过一点思考就能发生的肌肉反应，也是家庭聚会上，每个人都能拿得出手的技术动作，这东西靠些天赋，当我们聊天时、吃饭时、打牌时、合影时，脸上都挂着笑，当我们什么也不干，坐在一起面对面时，还是挂着一样的笑容，长时间地保持笑不是一件简单事，有次我们几家人在黑沙湾的港口渔村里吃火锅，从中午吃到傍晚，又碰上了场暴雨，没人带伞出来，也没人舍得花钱打车，于是滞留在那个小房间里，十几个人面对面微笑了八九个小时，肌肉都僵了，回去后不得不往脸上针灸，折腾好几天才缓过来。这就是我们长久以来烙在脸上的宗族文化，不论男女，生下来后，除了第一声的啼哭，余下的时间里只能训练去笑，男人在屋外头是谄媚的笑，女人在屋头是顺从的笑，倘若把这种笑刨除，我们就知道该干什么，不知道对方是谁，不知道对方长什么模样，就像眼神不好的外婆常常认不出我，因为我不笑，亲戚在外面的场合也认不出我，因为我不笑，我从小就只会那样笑，也不好好读书，跟人鬼混，高中没毕业就跑去珠三角打工，二十年来没存什么钱，勾搭过很多男人，却没一个成事的对象，这年纪看着也快四十了，在我们这里，完全是失败的女性范本，四十岁的女人如果还没嫁人，对这里的人来说，就是最大的怪物，怪物中的怪物，史前的怪物，应该被关入洞窟，这样的反例典型，不是该写进学前教育的课本里，就是应该记入胎教的程序里，让每个尚未成形的女婴在小海马阶段就开始引以为戒，这就是我存在的意义，对前辈，对后辈，对亲友，对陌生人，对所有人，在这片红土地上，我走在街上，所有看到我的女孩应该感到脸红，一个羞耻、符号、冲击神经系统的脑电波、致命的毒素和瘫痪，只要我出现在亲爱的亲戚中间，聚会或独处，他们都会感到呼吸困难。我想起舅父舅母之前说过的话，帮他们多照看表妹，这语气还在脑门里荡漾，太假了，假到虚无，但这甚至都不算是我听过最假的话之一，因为我从他们那里听过太多的假话了。刚一接触，他们眼神里就暴露了所有，怎么会放心把表妹交到我手里呢，他们的宝贝女儿，垃圾堆里淘来的天使，一只不甘心当配角的黑天鹅，就在我坐在舅父舅母旁边，气氛尴尬之时，她开始动了，轻快地，溜到灯光下，其他人都默默退下去，只把目光留在她身上，从头到脚，她踮起脚趾，好像比平时又挺拔了几公分，黑裙反衬着明晃晃的大腿，一只手臂弯过头顶，另一只水平指向台下，整个人像陀螺般转起来，著名的三十二圈挥鞭转，我知道，在电视上看过，她能完成这个动作，跟电视上的好像也没什么区别，她那条向外挥动的腿，似乎不知疲倦，永远都不会停止，远远不止三十二圈了，三百二十圈，这个数字，多熟悉，她在堤坝上大概也是走了那么多圈，所以这才是她的目的吗？那个什么停机坪人是骗人的鬼话，她只是在练习，不知疲倦，不会停止，谁知道练成这样得花多少时间，让人着迷，她那条腿，频繁地从自己画出的圆圈里甩出，跟着沉默的音乐的节拍，因为她的腿，我想到了别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性欲就来了，比上次还要急，比任何一次都急，跟月经一样，它也是从阴道里涌现的，但比月经频繁得多，两者是双胞胎姐妹，你捆着我，我绑着你，它是我一生的困扰，不合时宜地在想男人，想那个房间、那个床罩、那个窗帘和灯光，还有一丝丝甜蜜发泡的气息，不可视的缭绕，飘游，汇合于上空，是梦的金色轮廓，自眼耳鼻舌身意入，潮水顺着脊椎俯冲，在屁股湾歇息，吸口冷气，酝酿着新一轮的风暴，幸亏这时候表妹突然停下来，把腿收回去，动作比刚才还要快几倍，似乎是出了差错，她提前收起舞步，有点生气，退闪到舞台后面。我应该感谢她的失误，否则身下的椅子会很难堪。我听到她父母惋惜地叹气。大厅里本来就很安静，这一刻我感觉再也无法跟他们待在一块了，

于是站起来，说去上厕所，就在入口的过道两侧，女厕里光线昏暗，表妹就站在镜子前，还有她的小男友，我刚一进去，她就跟我说，你都看见了吧，我问她看见什么了，她说是你跳舞的才能，显然她没有这种才能，不管怎么练，用过千百种办法都没用，她始终无法完成那个动作，不说百分之百，连百分之十都达不到。我安慰她说，那本来就是很难的动作，正因为她跳得好，他们才会选她来跳这段舞。她马上反驳说，不是因为她跳得好，而是她父母花钱买来的，黑天鹅值两万块，就是因为让她来跳，才值这么多钱，难道你感觉不到吗，她对我说，当她在跳舞时，其他人是用什么眼神在看她，表妹边说边瞟着镜子，眼角一动一动的，别当她是小孩子，她早就不是了，她什么都知道。她还知道什么？小男孩站在那里，木偶似的，从裤袋里一颤一颤地掏出纸巾，又一颤一颤地放回去。我问她为什么要故意把我和她父母约到一块儿，她有点得意，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就是好奇，这种相遇的化学效果，单单想一想，就能让她兴奋，接着她反问我，舅父舅母不是她真正的父母，她是被领养的，对不对，听到这里我脑子嗡了一声，本不应该吃惊，她很想知道答案，尤其是从我口中，看得出来，我的答案是她唯一信赖的答案，她的眼神里写得明明白白，一丝沉重、起起落落的希冀，全维系在我的嘴巴上，但那个器官没有动。动不了。我不想动。她说不用我说，她都知道，她早就查探过自己的生父母，他们是谁、住在哪里，这些信息都印在脑颤叶上、记在手机里、写在纸条上，由她和小男友共同保管，只要有机会就去找，说不定，等一会儿排练完，他们就会去，一定能找到，当找到亲生父母后，一切就拜拜了，跟这个家庭、这个家族说拜拜，她早就想说拜拜了，所以我就是她最后道别的人，她说，仍然是掩盖不住的得意，那舅父舅母怎么办，我问表妹，她说，管他们呢，反正他们并不爱她，这话从她嘴里说出来，恐怕是我听过最荒谬的语言，比我们的方言还要荒谬十倍，但表妹很严肃地强调，她的养父母并不爱她，如果爱她的话，就不会逼着她跳这种傻拉叽的舞，在这个年代，白痴才会跳这种舞，她却六岁就开始练，启蒙老师来的第一天，那老女人从她家门前喷水的草坪经过，影子印在她房间的窗户上，像极了动画片里的科学怪人，她忘不了那一幕，刚开始的两个月，她被不停地训斥，用棍子矫正，脚趾肿大得站都站不稳，舅父舅母却在门后偷看着，大气也不出一口，有一次老女人骂得实在厉害，说表妹是她见过最蠢的学生，舅母这才从门后走出，表妹以为是来求情，舅母却说了一句，陈老师，指责这孩子没有才能不是你的任务，你的任务是教好她跳舞，说完又钻回门后，继续他们冷静的科学观察，难以相信，这就是她慈爱敬爱的养父母，这就是他们十几年来的爱，表妹说，连她生父母的一根汗毛都比不上，所以再见吧，最后她喊我家族里的小名，细姐姐，这个称呼我已经很久没听她提过了。表妹和小男友走出卫生间，顺着一侧的通道到出口处，悄悄溜走了，我跟在他们后面，看在眼里，然后往座位的方向走，舅父舅母还在等着排练的下半场，完全不知情，没过多久他们的小天鹅又会出现在舞台上，他们这样想。这两个在机关单位待了半辈子、衣着光鲜、正儿八经的老人，在我眼里变得好渺小，渺小得装不下一句真话。我当然什么也没说，也不会说，因为我从他们眼里又看到了鄙视，当我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就想把我弹开，抹除掉，好，如你们所愿，我跟他们告辞，理由是约了别人见面，那就去吧，他们说，以后别来这里了，听到这句话，一股怒气直冲脑门，脑盖热乎乎的，火山口最后濒危的关卡，我瞪着两位老人，话到嘴边却又咽了下去，垂下头，向大门退去，毕竟快四十岁了，不再是十几岁的热血少女，路上我在想，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是怎么从窄走到宽，又从宽走到窄的，只有一点没有变化，就是我的性瘾，在别人眼里，就是不断放大的污渍，他们没有想过的是，其实我也是旁观者中的一员，我只能眼睁睁看着它越来越大，我掏出手机，找到那个男人的号码，拨过去，对方似乎才刚起床，嗓音迷糊，更吸引人了，我让他订一个房间，立即马上，刻不容缓，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有点慌，我安慰他，像安慰自己的孩子，没事的，一切都好，好得不得了，他按我的指示订了房间，离我比较近，我马上叫车开过去，在二十八层楼上，是想象中的样子，一样的天花板、墙纸、地板、床单、窗户、灯光和气味，我比他早三十分钟躺在床上，听着外头呜呼的风声，狠揉着窗户玻璃嗡嗡作响，好像风越来越大了，我才想起前天的天气预报，说是今晚有热带风暴登陆，每年都有各种各样的风眼从我们头顶飞过，留下一片狼藉，我们却欢呼它的到来，因为夏天的旱热早已让我们无法消受，再也撑不下去了，热汗不断从我的头顶、胸脯、胳膊窝、大腿涌出来，怎么擦也擦不干净，床单已经湿透了，男人赶到的时候，他也快融化了，朝我扑过来，膝盖抵在我的腿上，头低下去，钻进我的肚子里，我挥出右胳膊，勾住他的脖子，他的后颈跟我的臂弯形成经典的三角，他感到痛，向后仰去，露出喉结，以及重心压向尾骨，尖锐的刺，危险的幻肢，他刚好坐在我的脚掌上，维持不住平衡，摇摇晃晃，荡来荡去，我顺势把他推到一边，他的上半身子从我这里脱离，两只高抬四十五度的腿却盘起来，成一个圈套，套住我的首级，力气巨大，我被拉得弯下腰，喘不过气，下巴伸进床垫里，滑行，他掉下床，也拖着我的下巴移动了二十厘米，我注视着他，

隔着脑袋在地板上形成的阴影，他回视，仿佛那双控制的手离开了游戏键盘，接着我也着陆，头发掉到他的舌头上，嘴唇和牙齿爬进他的胃，他用双腿把我裹住，我伸直手臂，刚好够着他的耳朵，从上往下摸，直至锁骨，触及一个坚固、威风凛凛的岸，退回或搁浅，我抱着他，四处翻滚，把每块地方都搞得湿漉漉的，无地自容，或者说，每块地方都是我们的容身之处，这是草薙京和八神庵的终焉之战，我和他，在一个潮湿的下水道躯壳里，不断使出无限连招，谁的动作中断，谁就是输家，我们谁也不想当输家，现实里却把所有的硬币输个精光，一枚接一枚地投进游戏机的凹槽里，一次就是叮咚地一响。这就是我那些夏天的记忆，把家里装硬币的储蓄罐清空，被父亲发现后，换来一顿毒打，揍我就跟揍一条狗没区别，我不仅忘记了自己的性别，还忘记了自己的种族，我什么也不是，我只是漂游着，蝌蚪一样，在炎热的蓝色夜晚里，从南走到北，从东走到西，追赶自己的影子，最终还是回到原点，回到自己的故乡，闭塞顽固的小土地。我惊醒过来时，已经是半夜，我们之间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停止的，他的腿还压在我身上，像具发臭的尸体，我轻轻地挣脱开，走下床，窗外传来暴风雨的奏鸣，网上说风暴几个小时前已经登陆了，在离我们不远的小镇，那时候的风雨声最吵闹，我们却睡得最香甜，现在我很清醒，打开房间里的电视，调成静音，只剩下画面在闪，剩下几种颜色，人的肤色、植物的绿、任何情形下的黑或白，只感到熟悉，一切都可归因于似曾相识。我想起表妹的视频博客，那些好几百条的影像记录，我竟然一次不落地全看过，每晚入睡前，必须打开电脑上网，检查她有没有更新，如果没有新的可看，就会陷入生理性的难受，她是怎么让我上瘾的呢：各种根本听不懂的语言、乱糟糟的脑洞、中二的发言、变来变去的发型，不是游戏就是动漫，日常分享的赛博美食，都快溢出屏幕了，还有，爱化魔鬼的妆，周末的换装舞会，一边自弹自唱，一边盘点校园里的帅哥，随手一个 DIY，就是一个布娃娃，还是市场上买不到却特别想要的那种，如此种种，我好像全经历过，又好像全然没经历过，两年前，第一次发现她的视频博客时，她发了一条在游乐场的记录，标题叫“争端破纪录！琴日食五条雪糕”，那天穿了一件黄澄澄的 T 恤，露出汗津津的手臂和脖子，镜头特写到手里的雪糕，乳白的，冒着奶泡，融化的液体滴到地面上，她准备登上旋转飞机，紧张得原地转圈，最终还是被推上去，机器呜呜叫起来，她大声尖叫，闭上眼睛，似乎整个宇宙都在升降，风把她的头发重重抓起，轻轻放下，抵达最高处时，她已不再害怕，跟着其他人一起发出催促、刻意拉长的呼声，她是否看见了什么，那个停机坪上的人，或者说，她就是那个人，向往飞机的人，向往飞上太空的人，哪怕是在这种玩具上折腾，也能令她兴奋，过一会儿，时间到了，她从上面下来，蹦蹦跳跳，像只吃饱了的猴子，如此可爱，现在我回想起来，才发觉表妹原来是这么可爱，太迟了，我们已经告别过了，如果她真的已经找到亲生父母，她昨天一从音乐厅离开，消失在门后的光线里，我就能想象出她和亲生父母见面的情形，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然后钻进怀里，几条手臂箍了一圈又一圈，电视剧重播过无数次的老套路，自那一刻开始，我便已经失去她，我们家族也失去她，这样一个我们讨厌着、跟我们毫无血缘的外来客，想到这里，我突然想到，我们如此讨厌她，也许正是因为她和我们实在太像了，不光是鼻子，是由内而外的像，我们痛恨她，也正因为痛恨自己，我们痛揍自己，揍得鼻青脸肿，想把自己从人群里赶出去，扔出家族的门槛，却又一次次地、慢吞吞地爬回来，哪怕走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哪怕是挣扎着，也要回到故土，没有这个宗族的文化黏液，我们无法赤裸着活下去，一代接着一代，越抱越紧，越恨越深，终于每个人都变成膨胀又空虚的泡沫。表妹从我们这里离开，很难说，她可能只是从一个坑里，跳进了另一个坑里。在这个热闹的台风之夜，我的身体却瑟瑟发抖，下体突然传来痛楚，就是那个文身的地方，那天表妹亲眼见过的，一个无害的烙印，一点也不疼，我这样回答过她，现在却有一种古怪的感觉，非常沉重，从皮下五厘米的地方，如同悬挂在几十斤的铁球，把我直拉回地面，把我撕扯得剧痛，喘不过气来，那个孩子来报复了，我知道，不只有他，他还带来了他的兄弟姐妹，他们抱在一起，原来他们是这么重，我才明白，记忆复苏，那些画面返回了，他们是如何从我身体的通道里分离出去的，相互碰撞，绒毛缠绕，被冰冷的铁手攫取，如此清晰，如此痛楚，根本忘不了，就算在那个地方文上印记，也封存不了那段记忆，每次跟新的男人睡觉前，他们抚摸着我的文身时，我就会跟他们重复那个故事：在很多年前，我是如何失身的，在某个夜黑风高的草地上，我是如何进行那段马虎、脏乱的第一次性爱的，然后意外怀孕，连这个也是羞耻的，所以这个文身是为了记住羞耻，不让它重演。这个故事我讲了太多次，讲得太多的坏处就是，到头来忘了什么是真、什么是假，说不定我才是家族里最擅长车大炮的人，大炮王，打炮王，都是我，所有都是我。这时我已经全身贴在地板上，呻吟着，声音很大，那个男人却在床上呼呼大睡，呼噜声和我的叫声交杂在一起，是圆号和双簧管的复调，是圣·桑献给萨拉萨蒂的切分音回旋曲，是马勒在草稿上写给阿尔玛的痛苦独白，这些乐章一直持续到天亮，我的肚子才渐渐恢复平静，连同窗外的

风雨，好像什么也没发生，除了一地的树木残肢。我穿好衣服下楼，走在路上，小心地避开它们，它们很快就会被装进垃圾车里，运走，不过半天工夫，然后在垃圾山里慢慢腐烂消失，而它们的母体还在原地，光秃秃的，不必担心，很快新的嫩枝又会长出来，但它不会再高大，我们这里没有大树，每年夏天台风到来，它们无法存活。活下来的都是些微不足道的东西。我在路边拦了辆车，直奔舅父舅母家，必须告诉他们昨天发生了什么，她们是他们唯一的女儿，就算有什么选择，也是发生在他们之间。我不知道表妹失踪以后，他们度过了怎样的一夜，总之不会比我好到哪里去，可能都报过警了。车子一停下，我就马上冲到电梯里，一个刚下楼遛狗的大妈被我吓了一跳，嘟嘟囔囔，狗把屎拉进草丛里，我快速按下键钮，在上升的密闭空间里，我有几秒钟的时间准备好要说的话，事实上，对这些话我一点信心都没有，出了电梯，按响门铃，脚步声传来，我心快跳到嗓子眼里了，门一打开，出现在我面前的竟然是表妹，我们隔着张开的缝隙对望，她显得也很惊愕，她穿一件宽敞漏风的吊带睡衣，头发还没梳，脸上挂着几绺，皮肤泛红，似乎刚从一个甜美的梦中醒来，就这样相互看着，谁也不开口，这时舅母的声音从内屋传来，一边叫表妹喝完茶几上的牛奶，一边问她是谁来了，听到这里，我忙不迭地转身溜开，都来不及打招呼，找到楼梯，一口气从十几层溜下去，像个慌不择路的逃犯，我觉得自己被摆了一道，又被表妹摆了一道，已经不知道是多少次了，但这一定是最后一次，我发誓，再也不管她的事情了。回到家里，全身扔在沙发上，过了好一会儿，还是很生气，生气得肚子咕咕叫起来，昨晚到现在都还没吃过东西，于是我把冰箱里的所有东西都掏出来，燕麦面包、鱼子酱三明治、速冻饺子、羊肉片、火腿、酸奶、两串提子、昨天泡了一半的生菜，厨房里还有一袋米，煮熟了，吞食下去，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饿，这就是我这辈子最饥饿的时刻，自八十年代出生以来，我就从未饿过肚子，我们这代人不比上一代，要什么有什么，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只嫌肚子太小装不下，这一次却全反过来了，我吞食到一半的时候，顿时感到了惶恐，照着这样吃下去的速度，很快就能把我的存款吃得一干二净，本来就没多少数目，再吃下去，余下的半辈子可能都得去还债，我没有后代，难道最终连自己一个人都养不起吗？还好后来我停下来了，吃完这些后，差不多也有八成饱，心存侥幸地躺在地板上，一股奇怪的预感渐渐浮起，手脚都不在它们原本的位置，有什么事情忘了做，我打开电脑，找到表妹的视频博客，狠狠地点下取消关注，删除网页历史记录，文件被硬盘分解、吞噬，我能听得见，声音永远都这么动听，只有听到这个声音，我才能快乐起来，如释重负，表妹的一切都和我无关了，我又变回了那些憎恶她的人群中的一员，回归冷冰冰的观察，隔着一道网床、一张饭桌，或者一道门缝，看似很近，其实比两颗恒星之间的距离还要远，我们就像用望远镜看星星那样，观察她一步步地长大，每一寸发肤、每一个行为都扭成我们讨厌的样子。我想起我那第一个被取出来的孩子，性别已经无从知晓，但我相信是个女孩，如果活到现在，跟表妹也差不多大，可能比表妹还要大一点点。不知不觉，那个魂灵竟然这么大了，而我的年纪永远停留在那个时候，无法再和她交流，我得重新学习和那个魂灵对话，从牙牙学语开始，从齿里迸出最简单的几个元音，总有一日，能学会他们的语言，然后告诉她，那个魂灵，我的女儿，让她远离多年前那黑暗的一晚，那片学校后坡的草地，远离那个喜欢穿黑夹克、染着一绺黄毛的家伙，我的初恋，只要我想起这个名词，就能马上联想到夕照下的墓碑，一股腐臭的气味，还有泥土在身上堆来堆去柔软的感觉，他那张漂亮的脸在我身体上方晃动，直到天色渐暗，棱角都变得模糊，他开始亲吻，我们本来没想这样的，只是在草坡上聊聊天、抄下作业、交换下零食，他还带来新租的碟片，徐克拍的恐怖片，还说周末一起看，刚过去的那个暑假，我们确实一块儿看了很多电影，像《孔雀王子》《阿修罗》《霸王卸甲》《原振侠与卫斯理》，还许诺说以后每个假期都要一起看电影，但那晚聊天时，不知怎的就聊到了我可能会辍学，跟着一个亲戚去深圳打工，他马上就接着说，要是我去深圳打工，他也跟着我去，然后我们都不说话了，似乎感到了一点羞耻，随着太阳沉下去，他的动作越来越大，胡茬快把我的脸扎出血，我反抗着，他用一只手把我双臂都反捆在身后，我们沿着坡滚落，他的拳尖碰到我的额头，髌骨击打在我骨盆上，一点细碎的风声从头顶穿过去，随即好像什么都听不见了，大片安静的黑暗悄悄包围过来，只剩下裂开的疼痛，持续很久，仿佛扑不灭的烟和火，憋了一段此生最长的气，再一点点地放出来，每放一点就要筋疲力尽，他停下来，趴在我身边喘息，宛如一张老藤椅，也没有多大的快乐，快乐已经永恒地从我们身边溜走了，新的生命取代了那个位置，她进入我的体内，使我的皮囊充盈、鼓满、滞重，长出了森林，三个月后又被钳出来，当时我却懵懵懂懂的，只是呆滞地躺在那里，疼痛还没有减轻，他穿好裤子，伸出手想拉我一把，没有拉动，就转身走下了草坡，我让他先走，这才起身整理衣服，四处都是黏黏的，回去的路上，我还感觉有东西不停从两腿间流下来，钻进鞋袜里，一个礼物，不负责任的玩笑，神奇的化学反应，回去后我把衣服洗了很多遍，风干，干干净净的，似乎没

发生什么，直到真的辍学那天，我也以为是应验了预言，而不是因为变大的肚子，我甚至都没办法回到教室去，我爸把我关在房间里，他就是这样，暴怒起来谁也劝不动，原因是我怀孕这件事是他看出来的，而不是我主动说的，一周后我妈把我偷放出来，她不知道那时我已经偷了家里的几千块钱，除了这叠钞票，我一无所有，接着，孤身坐上北上的汽车，到医院做了人流，然后在佛山的一家酒店打工，跟许多操着字正腔圆普通话的北方女孩，一起泡在无边无际的消毒液的空气里，我的工位从厨房到大厅，花了一年，穿着制服戴着迎宾条带站在前台时，看看云、日光的明暗、迎风抖动的白色桌布，听听皮鞋亲吻地板的响声、挤来挤去的方言、玻璃缸内给各种海生动物输氧的气泡声，日子真是漫长，我当时想，我才十七岁，还有这么漫长的日子要过，漫长得让人沮丧，没想到，又一个十七年过去，这次却像只是放了个屁，屁一放完，我已经是这个年纪了，跟小时候同院子的那个越南女人有什么区别，挺着个粗犷的腰身，每天到晚在院子里踱来踱去，在我出生前，她就存在了，从两千公里外偷渡过来，安身在我们大院里，给一个跛脚汉生了两个儿子，多少年来，她就是我父母在饭桌上的谈资，她也一直在我们的眼前晃荡，除了那么一两次，她溜回自己的国家，说实在的，我不知道哪个才是她的国家，无论法律上还是情感上，此岸还是彼岸，我都不知道她到底是越南人，还是中国人，或者两者都不是，越南女人只是我们对她的叫法而已，我们也不知道她叫什么，那种语言，听起来仿佛燕子在呢喃，她也会我们的方言，但她很少说话，整个世界除了她的两个儿子，只剩下脚步了，小时我不懂，现在我才意识到，她那粗壮的双腿走动交错摩擦出的声音，窸窸窣窣，包含了多少无可救药的荒诞和孤独，这声音持续在院子里回响，我们所有人都笼罩在这声音之下，psychoacoustics（心理声学），我就是在这些声音的影响下长大的，将自己一步步丢进垃圾桶里，她好歹还有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把她拴在院子里，不管怎样，她也溜不回越南，那我呢？是什么把我拴在这块弹丸之地？无可救药。父母和我很少来往，比那些亲戚还要疏远，住在同一个城市里，两个月见次面，在大排档里吃顿饭，然后挥手再见，每次吃饭，他们都精心打理过头发，似乎跟上次没什么区别，在我们见面的间隙，他们可能已经打理过好几次，但这些我全然不知，反而在表妹身上，哪怕一根由于贪睡而压弯的头发，都在我的掌控之中，透过那些视频，我每天坐在电脑前，反复检视着这个女孩的变化，变化隐藏在荧光的闪烁间，我们同时起着微妙的变化，时间流逝，这变化令人窒息，我对她的关注超过了一切，超过了自己，而取消关注这个动作又是如此痛快，发生在半秒之内，类似于一次轻率的抛锚，只要绳索还在，船和锚也都在原处，几天后，我收到表妹的信息，她给我发了一段视频，这段视频可以解答我的疑问，她说，希望我不要生气，看完这个视频，就会真相大白，看起来，她没有把这段视频放在网上，以后也不会，这是我们之间的共享秘密，收到视频时，我有些犹豫，却还是按捺不住好奇，把它点开，滴答，它马上把我带回了几天前的那个台风夜，她和男朋友从音乐厅离开，坐上去往她生父母住址的公交车，她出现在画面里，坐在靠窗的位置，风扬起头发，一道晦暗的背影，应该是男朋友从她身后的角度用手机拍的，画质没那么好，他们心情却还不错，疏疏落落地聊几句，还聊到等会儿和长辈见面时，该说什么话，该摆什么动作，他们把这个当成重要的仪式，这个确实是重要的仪式、只有一次的机会，窗外的风景起落，也只有一次，一瞬间，从高架桥上的一片绿榕顶坠下，露出城中村里被烟熏黑的屋瓦，五金店和衫裤行的招牌，肠粉店外头一夜未收的彩伞，麻雀在上头不安地散步，绕过匝道，继而上升，从铁路上方穿过，桥洞里的鱼反射着粼粼波光，车子继续往前，越来越远离市中心，出现了糖厂的大烟囱，风把那些酸甜的烟气挤成一条条的，它从更远处的海滩刮来，大王椰被吹得东倒西歪，他们从海湾边上驶过，潮光涌动，屏幕里铺满高光，直至抵达那个小区的柏油马路中间，才渐暗下去，他们下车，沿着马路走了一段，他们要进入的小区是新建的廉价小区，还没多少租客，很荒凉，这时候风越来越大，雨点开始卷进来，表妹奔跑进咖啡厅前的遮雨棚下，镜头跟在后面，蒙上一层水汽，他们站在那里，心情忐忑不安，虽然事先已经约好在这间咖啡厅里见面，见面也是精心布置好的，看得出来，唯一的意外在于这场热带风暴，让他们显得有点狼狈，额角上的水珠还在发亮，他们推开门，是一种奇怪的声响，两块木板夹着铁轴挤压出拉长的低音，接着被屋内的轻音乐冲淡，表妹第一眼就看到了坐在角落的两位，其实里面也没什么人，显得每张桌子都特别大、特别空旷，他们走过去也在这些大桌子旁坐下，和她年轻的父母面对面，如果是和舅父舅母比较的话，这一对夫妇过分年轻，年轻得让人大吃一惊，不只是表妹和男朋友，连我也吃了一惊，他们看起来比我还年轻，头发和皮肤一样黝黑，穿着朴素，男人粗大的指节带着烟熏的泛黄，女人戴着发夹，身形瘦弱，米白色大圆领衬衣凸出有力的肩骨，他们一定对面前的年轻人也很好奇：张口就来的普通话，拿着手机也不知道在拍什么。他们从乡下来，这对夫妇自我介绍说，用一口浓重的本地话，比我们之间流通的口音还要浓重十倍，我们自以为我们的口音已经含有城市的优雅，而他们还停

留在二十年前，甚至三十年前，那是我的童音，对表妹来说却是无法理解，她一声不发，听她的年轻父母讲下去，她还没跟他们打过招呼，这可能才是最艰难的一步，比起爸爸妈妈，他们更像是哥哥姐姐，当这对夫妇焦虑地提起，今天辗转了几个小时才坐车到城里，没想到碰上这场风暴，他们一边望着子弹般的雨点射在窗户上，一边说，新种的几亩香蕉林要遭殃了，不只是香蕉，还有甘蔗、虾塘，只不过香蕉的损失会更大，香蕉比任何东西都脆弱，每次风暴一来，它们就被拦腰折断，有的头部的茎叶甚至被扫到十米开外，绿油油地伏了一地，全部死亡，他们希望明天表妹能和他们一起赶回去，早点回去就能多挽回点损失，听到这里，表妹突然慌乱地站起来，离开桌子，转身冲出咖啡厅，镜头马上跟着跑了出去，小男孩叫着她的名字，等一等，声音刚从嘴巴里出来，就马上被风抹除掉，痛快有力的消除，不留一丝痕迹，画面同时变得潮湿，透明一片，表妹由此消失，一个新生人类消失于画面的格式单元里，这段漫长的视频终于看完，我却出了一身汗，倒好像里面的主人公就是我自己，在雨中奔跑，全身被浇透，全身冰凉，被大风推着一会儿往左，一会儿往右，歪歪扭扭、慢吞吞地往前跑。我能理解表妹为什么会冲出去，来自乡下、没读过什么书的年轻父母，生下她说不定也是归因于十几岁的一时冲动，跟那一对把她宠溺上天、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暮年父母相比，谁都知道她会选哪个。我走到浴室里，歪歪斜斜地，往瓷缸里注满水，将身上的衣服一件件地脱下，跳进去，水逐渐从下半身覆盖到脖子，它把我包裹起来而非使我沉下去，半个小时后，我才感觉自己干净了，平静下来，这些日子来到底做了多么可笑的事情，哪怕你做得再可笑，也不能使这个环境更可笑一点，而你越想让它改变点什么，自己就变得越发可笑，无休止地可笑下去，在这个圆形、苍白的卵里，我按时吃饭、活动、睡眠，非常安全，不用担心在外头漂游时被人扔石头，不用担心各种陌生语言的侵蚀，接触的每一个人都是兄弟姐妹，每一份友爱里就含有一份毒素，我在这份友爱的保护之下，同时也生吞下这些毒素，并不是说没有意识到毒素的存在，而是它们让我感到安全，安全第一，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哪怕它可能是幻觉，哪怕很早以前我的妇科医生、我的高中同学、我的挚友，在一次手术后拿着弯头圆钳对我说，我这辈子都没法再怀上孕了，听到这句话我信以为真，我相信，从此将永远安全下去。两天后，也就是风暴过后的一周，却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在卫生间里，验孕试纸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果，完全推翻所有，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仅有这次，刺破了外部的所有屏障，我怀孕了，仅有这次，我想要把这个消息告诉那个男人，电话打过去，对方却提示是空号，一遍遍地反复提示，就像以往在我身边出现过的男人一样，他们潇洒转身，无法再接受我的任何消息，接着我打给表妹，她是我下一个想要告诉的人，或者说，她才是我最想告知的人，接通电话后，气氛改变了，此时她正在后台的化妆间里涂着口红，一点点地把黑色的羽毛填充到身上，舞裙齐胸的部分正发出金色的弧光，她马上就要出场，接受那些来自剧场暗处的掌声，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她时，这位陌生的亲戚、外来的天鹅压低声音，装作毫无感情地说了两个字：恭喜。

本文选自索耳首部中短篇小说集《非亲非故》。八篇小说，从二十世纪初到千禧年，自由穿梭在真实岭南与异质空间，横跨南方人类秘史。卷入金山猪仔苦力贸易的外曾祖母一家、狂飙突进的“轴博士”、在宗族社会挣扎生存的表姐妹、失业十年的奥特曼皮套演员、自挪威归来的陌生远房亲戚，在省城反串梅艳芳的细叔……以文学人类学视野，拆解和重构粤西；敏锐地捕捉时代黄昏放出的蜻蜓，把它做成标本。



“写完长篇小说《伐木之夜》后的三年，完成了一个集子，都是中短篇小说。是对我们的文化基因、历史渊源、现实困境所做的一次回望和精神的反思。这个集子有一个比较强的形式感，通篇不分段、几乎一逗到底，是对‘标准语’的抵抗，希望构造一个独立又特别的语言空间，使读者有意无意地将自我填充进去。”



索耳

1992 年生，毕业于武汉大学。编过杂志，做过媒体，策过展。曾获香港青年文学奖、浚先生奖、“《钟山》之星”文学奖、南方文学盛典“年度最具潜力新人”提名。出版有长篇小说《伐木之夜》。《非亲非故》是索耳首部中短篇小说集。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来自 [Soviet Artefacts](#) on Unsplash

非虚构 地理科代表的三本书

伊险峰 | 田野中国

政治光谱上的各类年轻人，
他们都读过什么？

杜斌是材料学博士。我们见他的时候，北京高校疫情防控管得严，但他是博士，当时尚能以做实验为名跑到校外来。

我们约在西单一家商场里的 Wagas 见面。他迟到了。来的时候严肃致歉：鄙人女友早上拉肚子，我送她去医院，耽误了时间。

我们知道他严肃，加微信的时候就感觉出来。但见面之后的体感还是很不同，他很重视这次“会见”，如果我们约定的地点不是 Wagas 而是某个礼堂，他的聊天风格无疑会契合得多。窝在一个小圆咖啡桌旁边，硬件限制了他的气势。

“在不同的阶段，对我的人生起转折作用的有三本书。”杜斌看我一眼，摆出一副开讲的架势，我怀疑在他的认知世界里，我是一个迷途中挣扎的“小同志”，而他毫无疑问掌握了人类光辉前景的密钥，恨我不幸，怒我冥顽无知，但又很有长者之风，所以总是语重心长循循善诱。

“第一本书呢，是集中在高二下学期到大一上学期这将近两年时间读的，叫《农业学大寨始末》，宋连生写的；第二本书是小说家叫邓贤的，他到缅北考察之后写了《流浪金三角》，你可能知道这个事，解放战争结束后，一小股国民党残军逃到缅甸，建立一个反共的基地，最后一路被缅甸打被国际社会打，我们也会打，一路跑，金三角局势全搞乱了，成为现在的毒品王国。第三本呢相对独立一点，中央党校一个姓万的老师，《人的全面发展：从理论到指标体系》，这本书我没全看，我看的是第二单元，人的全面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论述。”

杜斌说他看过很多书——他爸爸也这么说，并且论据不着边际，说他看过“二十四史”，我们当时没纠正他这种说法，就当成老父亲“儿子是自己的好”的自豪之情吧——论据是他家从山东搬到北京时，搬家公司提出抗议：书太多了，足足有三吨。

我对重达三吨的书具体是什么模样没有什么感性认识，只是疑问既然有这么多书，为什么不同凡响的会是这三本。

“为什么这三本对你来说很重要？”

“我这个年龄说这几个事就挺不容易。之前知道农业学大寨这个词，看了这本书知道山西黄土高原艰苦环境就不用说了，陈永贵带着全体农民三战狼窝，打造一个海绵田，炸掉几座山变成良田，把黄土地变成海绵田，夏天能保墒能蓄水，雨来了能蓄水，春天来了能保墒。生生地把黄土高原改成了塞上江南，让那儿的人民……”

“你确认？你去过大寨了？”在我的知识谱系里，那里并没有变成塞上江南，不论是大寨、昔阳县还是晋中山西或者黄土高原，如果只是一块田变成塞上江南，那有什么好说的呢？挑水上去也可以，谁家里还没有一个大花盆呢……不过，他能把保墒蓄水什么的顺嘴说出来，业务不能说不熟练。

“我没去过。一直想去。但是可信，家里人老一辈都在乡下生活过，可以参照他们的经验。”

“山东和山西并不一样。”他老家是山东日照。

“种地打鱼的经验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是地理科代表。山西的地质条件，我知道得七七八八。”

还是那么自信。他好像并没有开玩笑，也不是一个会开玩笑的人。那次聊完之后，我们的感受是：相比开玩笑，我宁可他不开玩笑。

与杜斌见过面之后，我特意跑到图书馆借了《流浪金三角》和《农业学大寨始末》来看。

宋连生这本书出版于新世纪初，我以为隔了三十多年，更多科学认知，对水文土壤生态环境更长期的观察，应该会让我们的观察者有更深入的科学认识，甚至就是单纯从对“农业学大寨”的认知来说，找到一些新资料来佐证历史，也是很正常的事，当然，更有可能的是反思能力和深度……结果都不是，他引用的所有材料还是在1970年代，你说它是当年陈永贵和大寨的钦定官宣版本也并不意外，唯一的时代特色是，它把自己装扮成学术书的样子：加上了参考文献索引，比如：1974年的《大寨红旗》、1975年的《昔阳学大寨》和《全国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经验选编》，还有《普及大寨县》。



可以确认的是，看这本书不需要太多地理知识，杜斌说自己懂得七七八八，主要是在表达志不在此——相比水文知识，这本书有更重要的地方。

“第一个是自力更生。第二是讲科学。第三是以互助组起家的，做起来之后还是继续帮助。后来还推广先进经验。当然了，受制于当时的条件局限，跟文化大革命搅在一起，走了一些弯路。影响是什么，他奠定了我的一个方法论的基础，第一自力更生，第二讲科学，第三是我最常干的，朋辈互助。这也是现在高校里面经常出现的一个词。只有靠互助，才能搞起来。这是当时共产主义精神体现。这是我方法论的基础。”

这倒是证明了宋连生没有白写这本书，他至少收获了一个真正读懂这本书意义的人。在这本书里，宋连生热情洋溢地讲述了一遍当年大寨的故事，同时以更饱满的热情赞美了当家人、领路人的工作方法：

“60年代初，还不是这样的说法。陈永贵当时的法宝是开会。先开支委会，说服党支部的几个委员，支委们统一思想了，再开党支部大会，就这样一层层地开下去。谁要是不同意，就说服教育，给他讲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正在受苦受难，给他讲亚非拉美人民还没有解放。一次不行两次，三次不行五次，发扬愚公移山精神，每天说服不止，早晚让他同意了，就算解决了问题。这种办法应当是行之有效的，

因为一个村子总要有个权威性，陈永贵的说服教育总要比强迫命令来得温和些。但如果说村民们真的心悦诚服了，恐怕也言过其实。”

我感兴趣的点其实在于，如果没有那本跑到他前面的《农业学大寨始末》，他是否了解有“大寨”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关键点，就跟他生命里突然会出现一个缅北的“金三角”一样，这完全是一个随机事件。作为一个习惯于在班级里有一个“首长”感觉、并且很在意“权威性”、热衷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杜斌来说，他的思想武器，或者说工作手段，甚至是方法论到底从哪里学来。

但结果就是这样。这个自力更生的故事强化了杜斌的某种选择，让他的语言体系、他的思维方式、他的处世哲学，或者换一种他自己的语言体系——他的战斗性、他的理论水平、他的思想武装完全走到一个不一样的体系里。

那天与杜斌告别之后，他觉得意犹未尽，一是没有说服我——“一次不行两次，三次不行五次”的愚公移山精神没有来得及施展于我们身上；二是当天他表现不够从容，没有展现出他的完整风范；三是没有赢得我们的信任。后来，他决定从三吨书入手，来强调他知识体系的完备。

他在微信里发来几张书房照片。

第一张照片：

《解析几何》
《钛合金相变及热处理》
《材料科学名人典故与经典文献》
《无机化学》
《精细无机化学品生产技术》
《热学（第二版）》
《粉末烧结理论》
《最想要的英文句式书》
《光的语言》
《分析化学》
《XX 结构力学》（没看清前面两个字）
《中国式联合重组》
《化工工艺学》
《无机材料工艺学》
《非金属矿加工与应用》

其中有两本包着书皮的书。

第二张照片：

《自控力》
《学哲学用哲学》
《分析化学》
《国际贸易地理》
《无机材料科学基础》
《无机化学 XX》（还是看不清）
《基础化学》

三本包着书皮的书

《物理学的故事》
《全球通史》
《材料科学基础》
(看不清)
《工厂供电》

《全球通史》

有两本书横着架在其他书上：

《平易近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第三张照片：

《机械基础知识入门》
(看不清)
《XX 基本理论概要》
《中医诊断基本功能与临床》
《塞尔伯恩博物志》
《英文字根字典》
《XX 写作教程》（疑似）

(两本看不清的书)

《好词好句好 X》
《瓦尔登湖》
(看不清)
《实用建筑五金手册》
《现代西方经济学》

横着放的：

《有色金属冶金 1200 问》
《八股文百题》
《法语》
(两本看不清的书)

我猜想，以他的好胜心和竞争意识，这应该是他的大部分书了，或者至少是搬到北京之后的大部分书。它基本上涵盖了大部分范围。可以确定地说，没有三吨。

在三张照片提供的信息中，包括 12 本看不清楚和包着书皮的书，一共 54 本书。其中：

材料学专业相关的书占大多数，有 24 本。

外语学习相关有 3 本。包括一本法语教材。

通识相关 3 本。《物理学的故事》和《全球通史》接近于通识教育类书籍，但看起来不会比《上下五千年》更高深。

哲学相关 3 本，姑且叫为哲学吧。《学哲学用哲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和《平易近人》这几本跟哲学、马列主义哲学和时政读物有关的书，似乎并不能说明太多问题。

写作相关有 3 本，这也不代表什么，并且，我怀疑这些东西可能与考公务员有关。

经济相关 2 本。《现代西方经济学》和《国际贸易地理》，都看不出来是哪个版本。所以很难判断这些书对于他意味着什么。他对经济兴趣看起来不是太大，不过，即使再不重视经济，生在这个时代，总是要懂得一点全球化道理。

励志类、心理学相关有 1 本，《自控力》在这个书架里，看起来像一本专业书。

文学相关有 2 本。《塞尔伯恩博物志》勉强算作文学类吧，就像《瓦尔登湖》勉强也可以算作博物类，他的文学品味都偏向于博物学。《塞尔伯恩博物志》的另外一个版本叫《塞尔彭自然史》。我不知道他对这些书的热爱程度，但我很高兴我们在这么少的一个选择范围里，我们居然还可以有交集，这交集算起比例来，已经在 4% 上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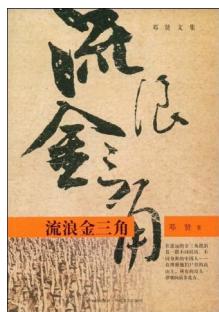
中医相关的有 1 本，可以理解成是生活服务。不过，可能比一般的生活服务信仰更坚定一些。

实事求是地说——这是杜斌的口头语，他特别喜欢说“实事求是”——这不能证明什么，比如他希望以“看书多”而赢得思想深邃的印象，它们无法让我信服他。从这些书看，他是个目光狭窄的人。他的阅读范围大概不会超过一个高中生的水准，而且他似乎只看学校里的事，当然作为一个学生，哪怕是博士这也是可以原谅的，但如果他试图扮演一个马列主义权威，试图要解释世界，而且时刻准备着“治”点什么“理”点什么的人，这几排书说不过去。

这些东西让我觉得兴趣寡然。如果我没看到这个书架，我还会想，为什么一个人会在看很多书之后选那三本书作为人生最重要的书，现在，我觉得一切都很正常。

我的成见更加深了一步。并且我还安慰自己，有的时候也不用为成见而自责——哪怕你的身份是个记者。更何况他爸爸有时也会诧异：他怎么会变成那个样子？

但显然，三本书，至少我认真看过的那两本，对我们来说有更多的启发。它不是“加速”了杜斌“变成那个样子”的过程那么简单，更重要在于它的时机。因为在恰当的时机出现，它不光变成了锚定某个重要人生节点的参照物，而且它还会发挥持久的影响力。怎么说呢，这东西可能像青春期的初恋或者暗恋，你说某个初中生高中生能有什么伟大的感召力和影响呢？但他（她）占据了时机；它可能还像那个鸟的隐喻：一只雏鸟第一次睁开眼，那第一个出现在眼前的活物成了它的妈妈。



“一个是什么事都不支持的条件下，它最后打赢了。认同这种方法，认同这种精神。这是理想的状态。同样的是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怎么挣扎拼杀，最后还是一个荒诞的结果。最后在泰国北部血性的中华儿女，国民党残军，一个赢一个输了，我在学习上就是这种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想拼想杀，压力巨大，最后高考生也是一刀死也是一刀。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掉下来砍脑袋那种。有些时候心理投射，高考好与不好，成与败都是这个结果。这个艰难奋斗的过程与我的经历产生投射。在情感上我倾向于大寨，但在现实上，我可能觉得金三角，我的数学成绩怎么学都学不好，甚至还在往下掉，像金三角的感觉。高考前夕，高三下学期，《流浪金三角》这本书我翻了三十多遍。就是从这本书看到的东西。大寨是理想中的自己。现实中的自己是金三角。”

杜斌总结《流浪金三角》于他的意义的时候，也是相当认真的。

当然，能接触到什么样的书，也很重要。

柴子亮说他家从小一直都是有书看的，王小波，也有托尔斯泰，中国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书架，某种意义上确实可以塑造一个人的阅读结构，可能也会潜移默化影响到某个人。他讲到从其他小说家那里读到史诗、宏大，指的是托尔斯泰的《复活》——他的家中恰好有这本书。“宏大而悲情”，他的语言一向准确。“俄罗斯这种我觉得还可以，反倒是前段时间很火的《月亮与六便士》我欣赏不来。我看的非小说类的书比较少，基本上都是哲学类的。”

张岳阳会强调他的阅读经历中有一本叫《存在与时间》的书。“我觉得海德格尔那种虚无主义真的很能击中年轻人的点，我去买了，发现那种叙述方式真的导致我对德国哲学有种恐惧。”但《存在与时间》某种意义上是他学习德语的一个原因。“多会一门语言，很多字对你来说就不是乱码了”。他认为德语比法语简单，只有四个格，他很谦虚地表示，“可能因为学得不够深”，所以会有这样的感觉。他还尝试过拉丁语，因为音乐剧的原因。而“玩一点日本的游戏”，因此会点日语，这就更顺理成章了。

看书，对于张岳阳来说不是负担和压力。这一方面来自于他学业上的压力很低（他

没有参加过重要的升学考试，只参加过多个单科竞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获得成本很低。这在一线城市是普遍现象。“我有同学在读 PPE（政治哲学经济），他从高中开始读德国古典哲学，人称黑格尔四代弟子。他老师是先刚，黑格尔在大陆的主要译者，对对，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算的。人‘德古’师承都可神秘了，包括施特劳斯派也是。”

在张岳阳看书的历史中，自己买书占一小部分。初高中读书多，自己买书为主，虽然并不缺买书的零花钱，但“买自己喜欢的书”的时候还是具有一定的叛逆色彩，所以他会上连续多天吃泡面为代价，买合适的书。金庸之类的武侠书是从高中图书馆借的。入北大之后，他认为大学图书馆只是提供更好的专业性书籍。

不过，不管怎么样，读书的视野与思考问题之间具有很强的张力。最早介绍张岳阳与我们认识的人，说他是马会的小粉红，在他的政治光谱里与通常意义上的小粉红有相当大的差异。

他的知识结构，按他的说法是以政治哲学来建构的，这其中历史又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谈到最重要的问题，他会说：“我本科一直隐约希望自己对这个世界有贡献，留下点什么……反正这一点我是没有变的：希望世界变得更好，比较幼稚。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比 common good 更重要。至于 common good 是什么，这是一个很难解答的问题。对吧？什么是共同的善？政治哲学帮我思考这些问题。没什么结论，但是其实选择机会真的到你面前的时候，可能是非常好做的。对。”

黄易说他最早什么都看，魔幻言情都市穿越再到社会现实，“严肃小说”也看——这是一个与网络文学相对的概念。这种“自我探索”式的网络文学历程与家庭背景关联度不高，所以像黄易也需要更多时间从网络小说向他说的“严肃文学”转换。

“后来我读了三岛由纪夫。他就很有艺术感，就是很刚强，跟那种柔美的日本文学不一样。是一种极致的、竭尽全力的感觉。而且感性和理性拿捏得很好。菲茨杰拉德也喜欢。《了不起的盖茨比》故事一般，文笔非常华丽，非常符合我的风格，”他有写作理想，所以他在看小说的时候还会有一些功利心，“我发现写作还是一种天赋，题材是可以学习的。”“石黑一雄也不错，知道是因为他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嘛，我就看了那个，那个管家的故事（《长日将尽》）文字特别优美，而且是那种会议和插叙的感觉，会把你一下子带进去。我不是看了太宰治嘛，后来就看了村上春树，接触日本作家比较多。”

大部分聊天对象提及的小说都是随机的。《复活》的“宏大而悲情”与柴子亮对托尔斯泰的整体把握并没有关系，一位毕业于山东大学但现在屈居于生产线上的委培生爱看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我猜是福克纳的，因为在讲述中特意强调是日本人写的小说，而我并没有找到日本人写的同名小说，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喜欢与美国南方作家没有任何关系；另一位北大地理系的同学喜欢耶茨《年轻的心在哭泣》……这些都没有踪迹所循。

回到前一篇提到的那个问题，[《一九八四》有多重要？](#)对于每一个人来说答案并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我们会讲到杜斌的故事，也会讲郭星、唐光明等很多人的故事，我们会知道，为什么它不像我们想的那样重要，甚至为什么它是反着的。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比较的幽灵》中讲了一个“倒转的望远镜”的故事。1963年2月2日，那天印尼总统苏加诺接受印度尼西亚大学的名誉学位，他邀请外交使团一同出席。安德森给一位年长的欧洲外交官做耳语翻译。苏加诺那天一如既往地讲他最擅长和喜欢讲的两个主题——民族主义和领导者。“本来风平浪静，突然，他开始谈起了阿道夫·希特勒。而且是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方式——不是将其说成大屠杀的刽子手，甚至不是法西斯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而是说成一个民族主义者。更让我惊讶莫名的是，这位总统必定是疑心没几个学生曾经听说过希特勒，他试图赋予元首的遥远幽灵以地方生命，以他特有的、别人学不来的公共演讲风格，像说腹语似地说道：‘比方说希特勒——哇，希特勒真的是绝顶聪明——也许他想，光有物质基础，幸福还是不可得的，所以他提出了另一个理想，这个理想他称之为第三帝国。这个第三帝国实实在在地会给德国人民带来幸福。’”安德森身旁的老外交官显然觉得哪里听差了——他没有怀疑苏加诺，而是怀疑起安德森的翻译水平，“你有把握吗？他真的是在说这个？”安德森极力向外交官解释这一点，他说，外交官“怒气冲冲地回到了大使馆，比从前更确信苏加诺是个疯狂而危险的江湖骗子”。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接着写道：

对我而言，我感到晕头转向。在我的年轻生命里，我是头一回被邀约透过倒转的望远镜来看我的欧洲。苏加诺自认是个左派分子，他也明知希特勒统治的恐怖。但他似乎是平静安详地看待这些恐怖，虔诚的基督徒就是以这样的平静安详，沉思以上帝的名义干下的数世纪的集体屠杀和摧残折磨；或者，是他保持了轻快的距离，如同我的学校老师谈到成吉思汗、宗教裁判所、尼禄或皮萨罗。从今往后要像从前那样想到“我的”希特勒，那就难了。

.....

我找不出一个好名头来称呼这种体验，直到差不多四分之一世纪之后，那时我在菲律宾，为了自学西班牙语，结结巴巴地读何塞黎刹的极端民族主义小说《不许犯我》。在故事之初有一个令人头晕目眩的瞬间。年轻的混血主人公，长期旅居欧洲之后，最近返回了1880年代的殖民地马尼拉。他从马车车窗望出去，看到了市里的植物园，发现他也是（可以这么说）处在倒转的望远镜的末端。这些圆圈自然而然、不可避免地隐没到它们在欧洲的姐妹园子的意象当中去了。他不再能够实际平常地体会它们，而只能近在咫尺同时又远在天边地看着它们。小说家引人注目地把这一无可救药的双重幻影的动因命名为：el demonio de las comparaciones。原来那就是1963年所遭遇到的，我心里说道：比较的幽灵。

啰嗦地引用这么一段文字的目的，只是说，我们看到的、倒转的望远镜那一端看到的与真实的世界存在不可估量的差异。这是我们在探讨任何问题前时刻提醒自己的。



伊险峰

出生于辽宁海丰张，满族。人生第一份工作是在沈阳铁路局，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媒体，也写东西。

田野中国

基于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面向大众实践公共写作，用文字留住日益消减或者瞬间消失的各种现实。



题图来自 [Airam Dato-on](#) on Unsplash

非虚构

碎片化， 被夸大的与被忽视的 伊险峰 | 田野中国

信息碎片化的时代，
年轻人如何构建自己认可的“真相”？

柴子亮从小就对他爸爸到底是不是有钱人心存疑惑，他爸爸在阿尔斯通做代表，在世纪初与政府有很多合作，地铁工程之类，所以他爸爸的名字会出现在一些官方色彩浓厚的新闻里。他没事就旁敲侧击地打听，问多了父母烦，就学会变着花样来搜索，各种信息来拼凑。

“我很喜欢问些过去的事情，我什么想知道，我爸的那些信息也是我查的。百度上都有，公司信息就是天眼查啊，他以前也有新闻报道，我爸不是有百度词条的那种名人，但是总归有他最早的一些报道采访。”

柴子亮给自己找借口：了解父母的收入状况，可以更好地规划支出，做未来的打算。天知道他是怎么把一种窥视欲搞得这么冠冕堂皇的，他喜欢做些拉大旗做虎皮的事，比如阿尔斯通现在还是他了解贸易战的“素材”——“就阿尔斯通最早不是法国的垄断企业嘛，后来被美国硬性拆分。那也是出于跟贸易战一样属性的。像现在的中兴华为一样。”

瞬间把一种“贸易战”“过来人”的沧桑加持在身上，也是一种能力。

“我很喜欢查东西啊，有时候我就连谈女朋友都会去百度一下她的名字。我也查过我自己，但是重名的太多了。现在人不都是用手机号注册很多网站 App 嘛，所以输入手机号就可以查到很多东西，比如微博。你刚刚说年轻人很容易被贴标签，其实各种各样的标签如果交叉集中起来也可以说明一个人的属性，比如你看一个人的微博标记了一些高中的信息，再看这个人的其他地方标记了大学的信息，那你就很容易知道这个人是谁。（那你怎么看一个人在虚拟网络里展现的性格？）网上的性格也是真实性格的一种映射吧。他肯定有某一种倾向，只不过网络表达更集中一些。”

“在互联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

关于互联网最著名的那句话最早来自于《纽约客》，1993年7月5日那期杂志上刊登了一幅漫画。一条狗坐在计算机前的一张椅子上，与坐在地板上的另一条狗说：在互联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这句话在相当长时间里是鼓舞人心的，并且作为匿名者、普通人占据更广泛的话语空间——信息民主化的一个标志性迷因。

柴子亮叱咤游走于互联网的时候，这句话不但早已经不做数，而且柴子亮可能还会告诉你，证明你是一条狗的若干条路径，并且这是互联网的魅力本身。

“我平时上网主要是看知乎，之前上的是贴吧，但是后来贴吧散了嘛。主要是看，不怎么提问和回答。其实在用知乎的时候我知道得很清楚，什么时候自己是在消遣，什么时候自己是把它当工具。工具的时候主要看一些经验，学习知识，都是主动检索；消遣的时候就是首页知乎推给我什么我就看什么，传说中的奶头乐嘛，就跟我偶尔刷一下抖音一样。看新闻的话我会用微博，不会关注谁，就是看热搜上的新闻排行。”

很长一段时间，我理解的“碎片化”如同柴子亮所说，它的最基本形态就是：大家从互联网上获得零零碎碎的信息，把信息看作知识点——上学时的应试训练告诉我们，我们对知识点的敏感和占有能力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竞争优势，所以，这种能力没有什么可指摘的，某种意义上还值得鼓励。

柴子亮至少以他的聪明才智，运用碎片化信息得到若干回报——如果不是他习惯于给自己制造出来的冠冕堂皇的标签的话。

“你问我为什么会学医？这是一个好问题。如果回答了这个问题你其实就了解了全部。我读的是五年制本科，学医是一个地域性很严重的学科，你在哪里读书，你的导师在哪里，可能就决定了你今后的职业走向。”他离开上海，“追随”女朋友到了武汉，他把自己带入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从地域到行业。他看起来很喜欢这个选择，而且，所有跟医学相关的知识，与他的家庭无关，通过知乎上各种信息的组合，他为自己框定了一个不一样的人生。

赵捷的爸爸一面抱怨儿子对碎片化信息的热爱让赵捷不能建立起正确的世界观，另一方面又觉得也可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玩法，“他们是先碎片，再建构，”他为儿子的碎片化做理论总结，同时表达“我儿子不管怎样都是我儿子”的自豪感，“这是一种超乎寻常的能力，我们目前还没有判断它的可能。”

我们问赵捷，你的“先碎片，再建构”是怎么回事？

他先给我们讲了一堆关于“信息的压迫性”，我们不懂。他说：“我顺着这件事情的了解，可以看成压迫性的。我觉得对一件事的了解，目的都是要跟人沟通和对话，我没有主动性去了解这个事情。”唔，这倒是跟他性格里有些东西是重合的，“关于文革，我在历史课本里了解，苏联是在涉猎范围之内，我会有一个固定的印象，如果不在我要探讨的点上，我就把它放在那里，不去管它。也许等到有人要跟我探讨这个东西了，我才会启动它。”

听起来是一个有待对方启动一个话题，“但我要看对方是否值得聊。”赵捷看出我们的疑惑，赶紧补充前提条件。“我会把我的固有印象拿出来，看你是怎么看的。如果我没遇到这样的人，我不会主动跟他说。”

但是，你有什么主动性的“兴趣”呢？我们理解，所有兴趣，当然应该是主动的，不应该是压迫性的。

“我对甲午海战感兴趣，”这兴趣大概也是一种随机举例吧，否则为什么这一场战争会特别被提出来，“我想知道为什么那场战争为什么输了，为什么输得那么惨烈，我看到的大部分信息都不会说太多前因后果，但很多因素会被涉及到：国力原因，装备原因之类。实际操作上我都是不了解的，这是探讨细节的，初中历史学到的那些东西，笼统介绍几个关键人物，所以我真是真的看海军战史的海战，看一些细节。”

“你怎么了解这个事情？时间隔这么久，如何判断这些细节的真伪呢？”

“纪录片，网上资料，还有书，还有回忆录。有些东西我是能看进去的。那些研究成果非常浩瀚，我看跟具体的回忆录之间的关系。”

“这是你‘碎片’之后‘建构’的环节吗？弄懂甲午海战要看什么类型的书，有人指导过或者有专业的建议吗？”

“我确实想过，有些书的索引我还是特意去关注的，因为我对甲午海战兴趣比较浓厚嘛。以前，初中那时候，很少去深究一些东西是哪里来的。事与事之间的关联，我看的是不多的。谁提出什么样的观点，意味着什么，我是不会把时间分配在这里

面的。它可能还是需要一个契机，我在时间上做出来取舍。正常情况下，我去微博了，我去二次元了，我去游戏了，时间都会分布在这些话题上。”

赵捷知道在微博里是没办法把一件事说透的。“那是个碎片化的地方。”他对此有清醒认识。所以，他也讨厌在微博上讨论时政，“它不是表达观点，它只是表达情绪。有些时候我看那些观点也没极端到哪里去，但它用了极端情绪化的表达。”——碎片化不能讨论问题，碎片化只能回到情绪上的宣泄。

赵捷的结论与很多资深的人类观察者有相近之处。陈嘉映在他的书中有一次谈及他与作家马原的一次无意义的争论：

……（马原）说一本小说的好坏就看它卖多少，我就反驳他，马原一开始也许信口那么一说，听我反驳，就把那当成自己的主张来极力辩护。当时有好几个人在边上，可能我们也有点儿话语权力的欲望吧。最后我追问得马原理屈词穷。但这有多大意思呢？他原来的说法本来是在表达某种东西，例如我们不该太强调为艺术而艺术，应该考虑受众。他不是要提出一个命题，在字面上去争那个命题的对错没多大意思，有意思的是探讨怎么把他原来想表达的意思表达准确。……你又何必跟他争实际上他自己都不持有的观点呢？（《走出唯一真理观》）

赵捷在看到太多碎片化的非理性之后，“你了解更多是更好的，这个道理我明白。但看得太多之后，我觉得有些观点还是不想主动去接触了。”

这是我们意料之外的碎片化的另一个负产出吗？它至少限制了赵捷对更多问题的兴趣。他像我们以前提到的那样，把自己包裹起来。

“先碎片，再建构”。赵捷的方法论，他没有提那些“索引”“事与事之间的关联”是如何完成和寻找的，听起来是认识某种事物的一个常规操作方式，如果不是一个研究者，单纯从兴趣角度出发，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

李汉超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种思维的有效性，他认为这个过程很简单，就是“人类正常的方式”：“我看一本英国历史学家的书，罗伯特·康奎斯特，专门研究斯大林和苏联的历史学家（他是揭露斯大林大清洗的第一人），1968年，苏联档案还没有公开，他利用从苏联偷运出来的不知道真假的材料、零星的一些记录，康奎斯特就着这些资料，怎么讲出一个故事，怎么证明大清洗是存在的。你说他运用什么方法？就是运用常识。用这个像我说的历史的碎片，最大程度地还原真相。”李汉超用历史学家罗伯特·康奎斯特来证明它是“正常的人类的思维方式”。“我特别不喜欢问 what if 或者 what about 这类的问题。我对历史事件，态度就是，我手里的信息有 80% 或者 90% 的把握存在，我就认可它的存在。”

如果对比这三个人，赵捷、李汉超和柴子亮，他们在处理信息的碎片化来源上，方式方法在本质上其实没有什么太大不同。但更多时候我会觉得李汉超的思维路径更靠谱——原因大约是世界观可能更为接近。

对于柴子亮，他用知乎上获得的碎片化信息完善生活甚至在高考择校上的选择，那是在近乎完美地使用互联网；他从他爸爸曾经供职的阿尔斯通去研究中美贸易战，唔，这个就要重新评估一下了。为什么？我反思自己。其实从这里入手去思考华为中兴在商业世界里扮演的角色，不失为一个好的切入点……我时时疑惑是因为柴子亮接下来大谈“老大和老二必有一战”——是对这个观点的疑惑，让我对柴子亮的思考路径突然游移起来。

而对于赵捷，可能更多会觉得他是在盲人摸象。他给我们讲了两个例子，前面提到的甲午海战是一个，另一个是说他对“北约”的理解。高中时，他去美国做交换生，同行的同学带了一本叫《狼群》的小说，他借来看。“那本书的主角是一个雇佣兵，讲北约与欧盟的关系，讲中东战争，那时候我才了解北约是怎么回事，美国起什么作用，为什么美国人要主导欧洲的事，”他说，“在那之前我是只看动画片的，傻了吧叽的。读一遍之后回家又买了一套，上下两册，又看了一遍。”这是他理解北约的开始，然后开始跟他爸爸探讨欧盟北约的历史，自己百度……“从根本意义上，它是个组织。我信息点也是这样，它由哪些国家组成，他们在一起干什么，就了解这些事情吧。这些东西都是从那个军事小说开始的。”

我去豆瓣看了一下这本书的评价，我从那些碎片化的评论中（我也一样要依赖碎片化信息）觉得这事不靠谱。比如有一个评价是这样的：

第一次给一本书打 5 星，军事、战争、佣兵团、恐怖组织、真实、文化、信仰。里面涵盖的不仅是暴力血腥，还有超乎想象的庞大的内核，庆幸大学在图书馆里有一个什么书都想翻的习惯，不然这个名字岂不是错过了一本精彩过瘾的书。

被我暗自里评价为“你看看人家李汉超”的思考路径，简单重构一下大约就是：

世界地图 - 对地缘有概念 - 跟着大人一起看国际新闻 - 对地缘政治产生兴趣 - 基辛格这种传说中的人物和他们的《论中国》《大外交》之类的书 - 《货币战争》与罗斯柴尔德家族这样的传奇 - 大国竞争格局“嫡学”、“入关学”等各种知乎风格的知识 - 《经济学人》这样的全球化思维方式的媒体观点的介入 -……

李汉超用来对冲知乎风格知识的方式看起来是《经济学人》，这最后一段路径是李汉超自己所独有的，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更习惯沉浸于知乎对知识的处理方式中，比如柴子亮就挣扎在这个过程里去理解他爸爸的阿尔斯通，并在这个体系里用零和思维的方式反复论证“老大老二之间必有一战”……我们往往容易受限于既有信息的信息茧房，解决它需要一点运气。

当然，这是另一个大问题。



伊险峰

出生于辽宁海丰张，满族。人生第一份工作是在沈阳铁路局，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媒体，也写东西。

田野中国

基于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面向大众实践公共写作，用文字留住日益消减或者瞬间消失的各种现实。



题图来自 [Jon Tyson](#) on Unsplash

上那么向上一滑。

现在我们随便拿过来一段尼尔·波兹曼对“印刷机时代”（阐释时代）与“电视时代”（娱乐业时代）的对比，会觉得恍然隔世了。

印刷文字对于我们的身体和大脑都提出了相当苛刻的要求。但是，控制你的身体是最低限度的要求。你还必须学会注意书本上文字的形状。你必须看穿它们，这样你才能直接了解这些形状所代表的意思。如果你仅仅专注于文字的形状，那么你就是一个让人不能容忍的低效读者，会被人当作傻子。如果你已经学会了怎样不受外貌的干扰去理解意义，那么你就应该采取一种超然而客观的态度，这包括你要能够区分文字的感官愉悦、魅力或奉承语气（如果有的话）和文字所表达的观点之间的逻辑。同时，你还必须能够根据语言的语气去判断作者对于所写内容和读者的态度。换句话说，你必须知道笑话和观点之间的区别。在判断观点性质的时候，你要同时做几件事情，包括把判断推迟到整个观点完成时做出；把问题记在脑中，直到你已经决定何时、何地或是否能回答他们；用你所有相关的经历作为现有观点的反证。你还必须能够舍弃那些同所涉观点无关的知识和经历。在做这些准备的时候，你必须摒弃原来认为文字具有魔力的看法，更重要的是，你要接受一个抽象的世界，因为这本书里几乎没有什么词组和句子要求你联想具体的形象。在铅字的文化里，我们可以说某个人不够聪明，需要给他画张图才能帮助他理解。而现在，聪明则意味着我们不借助图画就可以从容应对一个充满概念和归纳的领域。（《娱乐至死》）

非虚构 “到处是水 却没有一滴水可以喝”

伊险峰 | 田野中国

碎片化带来忽视，带来放大效应，
除此之外，它还意味着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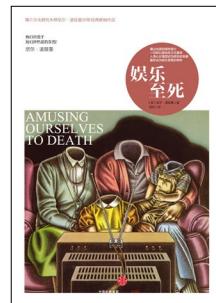
在心里盘算着为李汉超“世界地图”式信息源辩解的时候，我会反思我们对“碎片化信息”担忧中是否包含一种夸大的成分。对于一个尽力获得更多信息的年轻人来说，碎片化的信息扩大了来源的丰富性，提高了效率，很大程度上它并非是个问题，而且与其他时代的人比起来，现在的碎片化可能只是新形态而已。

比如经常被作为碎片化代表而提出的（互联网上“奶头乐”的一部分），类似于“60秒了解一部电影”“三分钟看名著”这样的导读式的信息，它与更早年间的连环画、小人书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呢？六十四开的小开本小人书，每页一张图片（有时只是黑乎乎的电影剧照），下面有一行不超过一百个字的说明，三十几页，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这么一个薄薄的小册子，完成了对某部电影甚至某部名著的阅读——你对它背后的东西有了一定的了解，可能够了。未来，如果你有兴趣去读原著，你可以收获更多，但现在够了，而且它也没有什么坏处。

我想说的是，碎片化的信息大量涌现并且正在改变、重新塑造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们难免也会如我们所担忧的那样，放大某一部分的感受，忽视了一些真正的变化……关键是你不知道哪个才是影响深远的。就像赵捷在前面所说，碎片化信息引起情绪宣泄，然后又引起他对某一件事情的真伪探讨避之唯恐不及——这是一件大事吗？赵捷的态度是典型的态度吗？是他过于敏感了，以至于夸大了反应，或者同样出于敏感，因此他捕捉到了某种变化的前兆？那么，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呢？

上一次这个级别的问题的出现，可能还是电视占据人们的生活空间——从客厅到家庭结构，它的标志性是万事万物娱乐化，我们现在一面娱乐化，一面碎片化。那时人们担心“十五分钟注意力”、“十五分钟名人”对我们的生活的无序切割，我们现在短视频以秒来作为标准。那时遥控器代表了注意力的分散，我们现在就是在手机

不同的，我们还没有从最初的互联网打击中完全反应过来，不管是夸大它的影响，还是忽视了它的破坏力，我们还没有产生当年面对电视和娱乐业时代来临时，那些警觉的观察者……我们或者可以认为，经历过电视主导的娱乐化的半个多世纪，即使如尼尔·波兹曼这样的警觉者，也不大会表达他的警觉、担忧、恐惧和挣扎了。



我们已经从柴子亮式简单的碎片化信息的理解和处理，经历了赵捷、李汉超式的整合和组织，以及前景不明的影响走向。它更复杂了。我们其实随时都在遇到新的衍生问题。

李汉超看到罗伯特·康奎斯特对斯大林时代大清洗的知识，他做出了一个基于“人类正常方式”的理解。这其中包含的是实际上是尼尔·波兹曼所说的“能力”：“阅读文字意味着要跟随一条思路，这需要读者具有相当强的分类、推理和判断能力。读者要能够发现谎言，明察作者笔头流露的迷惑，分清过于笼统的概括，找出滥用逻辑和常识的地方。同时，读者还要具有评判能力，要对不同的观点进行对比，并且能够举一反三。为了做到这些，读者必须和文字保持一定距离，这是由文本自身不受情感影响的特征所决定的。”（尼尔·波兹曼说完这段话，没忘顺道讽刺一下电视时代的观众特征，“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好的读者不会因为发现了什么警句妙语而欣喜若狂或情不自禁地鼓掌——一个忙于分析的读者恐怕无暇顾及这些”。我因此想到我身边不时传来的手机里的罐头笑声，定制化的，它们连表情、笑声甚至气息都为你准备好了。）

娱乐化的升级版，碎片的娱乐化更不需要这些能力。某种意义上我们面对李汉超他们提出出来的问题——“如何处理碎片化信息给你的第一印象”“它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你对其后的更多信息的判断”——是不合时宜的。

陈一真，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后来又师从 LSE 研究冷战和苏联斯大林时代历史的知名教授，总之他称得上是一位专业的历史学者。我们与他聊起斯大林，他选择了回避。

“苏联没有那么坏，我看《红色工程师》，”陈一真说，“摧残肯定有，肉体上封杀你，这个是有，但也有一些作家，延续了继承了俄罗斯的文化传统，在二三十年代，只是现代人不知道，他们有很多作品。”你看，他说起斯大林，尽管全世界的学者提供了大量的研究、发掘了大量的信息、资料足以证明大清洗的存在以及斯大林对知识分子的敌视和迫害，但是他还是宁可相信或者撷取一个非常小非常小的“红色工程师”来说这世界不是你以为的那个样子。

我们还跟他提起过李泽厚，他突然间嘿嘿笑起来，我问他笑什么，他说他文革时写了本哲学史，我问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他八十年代反水啊”，但是李泽厚比我们想得要丰富一些，他有思想家的底子，而且显然也是在不断思考与进步当中——如果八十年代他不“反水”，他的人品就会更高尚一些？甚至，学问和思考就更纯粹一些？而且，八十年代对前面十几年的“反水”不正是思考进步的结果吗？

斯大林，或者李泽厚，还有以前说到鲁迅时杨楠采取的态度，“他从来不批评同事”他是北洋政府的，杨楠也是宁愿放大这样的信息，而忽略鲁迅本身的丰富和复杂性。鲁迅并没有指望着在教育部赚一辈子的钱，他批评同僚和政府的热情一点也不少。但就是这样两个信息，可能会让杨楠放弃了更多的探究一个丰富的人的可能性。因为一些无关紧要的并非决定性的信息，决定了自己的立场，然后决定对这些信息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我们会说盲人摸象，或者说以偏概全。摸到的恰好是他不喜欢的那一部分，于是放弃了全部。

或者相反。陈一真说他对斯大林和社会主义苏联的好感与家庭背景有关，“我们家里的切身体会吧”，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服务于一家“一五”期间国家重点工业企业，那是苏联和东欧专家援助的工业领域 156 个项目之一。你的祖父与苏联专家有过接触，“而且，即使中苏交恶，他们也没全部走光，到 1966 年才全部离开”。

这是碎片化信息的一种表现形态吗？这些碎片化信息起到一个阻隔作用，它让你产生一种“站”“粉”“黑”的情绪化态度，你接下来有意地继续享用支持你的信息或者排斥否定你的信息，进入到信息茧房中。如尼尔·波兹曼所说——我们看到，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手机互联网时代发扬了电视时代的娱乐精神，然后放大了所有他认为麻烦的那些东西。

他们不再彼此交谈，他们彼此娱乐——

就像印刷术曾经控制政治、宗教、商业、教育、法律和其他重要社会事务的运行方式一样，现在电视决定着一切。在法庭、教室、手术室、会议室和教堂里，甚至在飞机上，美国人不再彼此交谈，他们彼此娱乐。他们不交流思想，而是交流图像。他们争论问题不是靠观点取胜，而是靠中看的外表、名人效应和电视广告。电视传递出来的信息不仅仅是“世界是个大舞台”，而且是“这个舞台就在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

什么是看法，什么是情绪——

当然，每个人对于这个事件确实都有一些看法，因为在美利坚，每个人都有权保留自己的看法，而且在进行民意测验的时候，这些看法往往特别有用。但这些看法和 18 世纪或 19 世纪的看法完全不同，也许称它们为“情绪”可能更合适些，这就是为什么每个星期这些看法都会改变的缘故，这一点从民意测验的结果中不难看出。

还有我们最关心的假消息和真相问题——

电视通过创造出一种可以称为“假信息”的种类改变了“得到消息”的含义。我这里所说的“假信息”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及克格勃的特工们所说的“假情报”，意思几乎完全一样。假信息并不意味着错误的信息，而是意味着使人产生误解的信息——没有依据、毫无关联、支离破碎或流于表面的信息——这些信息让人产生错觉，以为自己知道了很多事实，其实却离事实的真相越来越远。

我们担忧的很多东西——虽然我们在李汉超、柴子亮、赵捷他们面前试图掩饰，但毫无疑问还是在不断地验证一些判断，发现一些现状之间的关联的时候，表现出这种担忧——在互联网之前的电视娱乐时代已经存在，手机放大了个人的选择，也放大了那些担忧的冲击力。有的时候，我们会忧心忡忡地跟他们表达，我们可能担心的不是碎片化，而是片面化；在另外的时候，我们会说当你用公务员鲁迅去否定整个鲁迅的时候，可能犯的是“非黑即白”的错误；还有一些时候，我们会想，信

息的民主化了，是否应了柯勒律治诗中所说：到处是水却没有一滴水可以喝。

夸大还是忽视，对于碎片化这个话题，我们现在所谈及的，或者说我们与他们几个人所谈及的，似乎只是个开始，感觉只触及了一些皮毛，但似乎已经包罗万象：

——开始的时候，大家说互联网信息匿名化，民主化，似乎秉承了安迪·沃霍的“人人可以成为五分钟名人”的电视时代特征，只是它用“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来表达自由空间的可能性：

——我们还记得在 Google 还代表人类正义和技术想象力的时代，他们如何坚持把所有的信息都变成搜索数据，把所有的书都切成碎片，我们还记得来自欧洲（保守的）、来自知识分子（陈旧而保守的）的抵制：

——娱乐化导致了原子化，原子化导致了个人化，我们每个人成为身份的奴隶：一个人只剩下身份：

——身份决定我们的立场，我们的“站”与“黑”，“粉”与路人。我对一件事怎么看，可能并非逻辑：

——我们以投票和民主的名义，把“站”放大：

——与胜利者站在一起，碎片化与威权主义之间有某种关联吗？如果某个人总是赢家，那么选择相信它，或者与它在一起，是正确的选项吗？

我和杨楠、嘉怡聊天的时候，我们讲过《好奇心日报》做过的一个栏目：好奇心人类学。

当时一个很受欢迎的栏目，我们当时想，现在人的组合方式已经发生变化了，以前用地域、用城市农村、用民族（实际上还是地域与文化）、用身份等等来做出人的分类，现在大家在线上。这个人看豆瓣，那个人混知乎，混 B 站，微博，每个人在某个网站上面发展出友邻，发展出识别性，发展出群组意识，然后这个人出现在线下社会中，你会通过这个人的谈吐衣着，然后说，啊，这个人一看就是豆瓣的，看起来爹味儿很重，一定是混知乎的……我们当时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互联网上的人类学，我们去看各个社区的特征。

做得挺好，我们很满意。

很长时间以后，我们才意识到可能有一些问题。

这问题还特别直白而且简单：并不是所有的事都是在线上完成的。

比如疫情来了，比如某个引起争议的工业污染项目，它的争议一定是发生在某个具体的地方的。

线上的确是可以产生某种共同的人类，但它们最大的特点是身份政治的产物，它可以探讨几乎所有话题，可以产生共情，可以同仇敌忾，但它是乌尔里希·贝克所说的“娱乐化的政治”，用我们的话来说，它是一个“气氛小组”。用另外一种话说，它很难形成一种真正的“共同体”。

这时，你回顾历史，会对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的报纸在民族主义发生发展史上发挥的作用就会有更多的理解。这是一个共同体的产物。而共同体是有坚实的共同需求为基础的。

那是我们对“好奇心人类学”的一次反思。

后来，差不多隔了一年，我看到蒂莫西·斯奈德《美国的痼疾》那本书，他完整地表达了他对此的担忧并精确地指出症结和问题所在。

而到底如何应对一个实际发生的危机，如何共同面对一个当地的利维坦的侵害，甚至包括新冠疫情——当地的解决方案、应对措施，针对性和主动性都更重要，也可能更准确。

否则，你就会一起来希望有一个统一的解决方案。

2022 年 3 月底，“上海不能封”的说法有不少支持者，它在某种意义上是为“本地”找到的一种最合适的、代价最小的解决方案，它是当地为主体的决策层对于整个社会成本进行综合分析之后得到的共识……我们在其后看到的事态发展证明这种意识并没有得到尊重。一个地方性缺失之后、没有“共同体”利益为依托的结果。当然，“共同体”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总是有人用更大的共同体概念来指导他人的选择。

美国也是一样的。没有“地方媒体”的舆论场，只能把目光投向白宫。所以美国疫情所引发的最终矛盾，既不是医疗能力也不是病毒变化的争议，而是特朗普。最终

人们采用的是互联网上最普遍的“站队”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绪，这些情绪变成政治态度，同样像乌尔里希·贝克在 1980 年代所担忧的那样，他们以为他们在行使民主权利——实际上没有对利益的判断，没有真正的意见，它是娱乐化的一部分。号召大家去争取共识？不管是中国的互联网社区经验，还是极化了的身份政治为底色的新两党政治，没有多少人去关注共识，对那些希望找到“具体的解决方案”的人来说，收获更多的也是失望。

有很多人已经去探讨为什么地方媒体与互联网媒体特性之间存在落差。有一种说法是对于传统地方媒体来说，它有传输成本，物理意义上的，这种成本一直到有线新闻网产生才真正被统一的全球性或全国性新闻所覆盖，这种物理性制约对扩张是不利的，但对于服务当地是有价值的。泰德·特纳很快就做成了当年的美国首富。

这只不过是一种看似合理的说明，实际情况可能要在更大的时间范围内去思考。我能想到的是马克思的那句话：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所有问题是现代性问题。革命会带来传统的社会组织形态发生巨大变化，互联网强化了身份政治，极化了个人的表达，一定程度上当然也重新组织了人类社会……“好奇心人类学”是这个变化中的一个很小的节点上的总结，它恰好记录了烟消云散的那个过程中传统社会的碎片分崩离析过程，各自茫然的时刻。

未来，到底会变成什么样，二十世纪后半段以来的娱乐化大潮流（它包含了娱乐化的电视和碎片化的互联网）会如何塑造社会，并没有定论。乐观一面在于，基于共同利益和价值取向的共同体或者社会，肯定在未来的某个地方等着我们，就像无数人尝试去做针对地方的线上媒体，未来也一定会出现，只是它需要一点时间；而悲观一面可能更实际一些，就像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所说：

20 多年以前，当论及另一个社会时，我就几乎逐字逐句地写下了人们现在即将读到的内容。在未来的黑暗中，人们已经能够洞察三条非常明显的真理。第一条是，今天，举世的人都被一种无名的力量所驱使，人们可能控制或减缓它，但不能战胜它，它时而轻轻地，里面猛烈地推动人们去摧毁贵族制度；第二条是，世界上所有社会中，长期以来一直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恰恰正是那些贵族制已不存在和不能再存在下去的社会；最后，第三条真理是，没有哪个地方，专制制度产生的后果比在上述社会中害处更大；因为专制制度比任何其他政体更助长这种社会所特有的种种弊端，这样就促使它们随着它们原来的自然趋向朝着那个方向发展下去。

这个问题从梭罗的电报时代就已经开始，他当年的问题至今还有效：可是我一个缅因州的人通过电报了解得克萨斯的人在想什么的意义何在呢？“这些源源不断的信息与它们的受众之间很少或几乎没有关系，也就是说，这些信息并没有可以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和精神环境”。尼尔·波兹曼在几十年前认为梭罗问题继续存在而且被放大，这时他想到柯勒律治的那句诗：“到处是水却没有一滴水可以喝”。

附：其它一些被采访者提到的代表性的书和作家

《羊脂球》
《平凡的世界》
《活着》
《三国演义》
《西游记》
《水浒传》

——郭星小学时脚踝骨裂，在爷爷家养身体，在爷爷家书架上选择的书。当然，还有“毛选”。

《美国种族简史》（与罗永浩的推荐有关，托马斯·索维尔这种保守自由派知识分子在中国成功为导向的社会氛围中有相当影响力）

《最好的告别》（冷门的美国医生写的散文《最好的告别》，奥巴马在某一年推荐过）

《二手时间》（S.A.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中比较多被提及的一本。这位作家被多人提及，但往往表现出对此“看不懂”，或者讳莫如深的样子，她的书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尴尬的存在）

《基辛格：理想主义者》
《邓小平时代》

《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 25 个司法大案》

三岛由纪夫

托克维尔（因为政治家重新思考了中国命运和未来，号召全党人士都来学）

石黑一雄（最近比较容易读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汉娜·阿伦特

张爱玲

白先勇

《红楼梦》

《了凡四训》

《曾国藩家书》

《道德经》

李清照

屈原

——徐徐和小英在祖父指导下的国学训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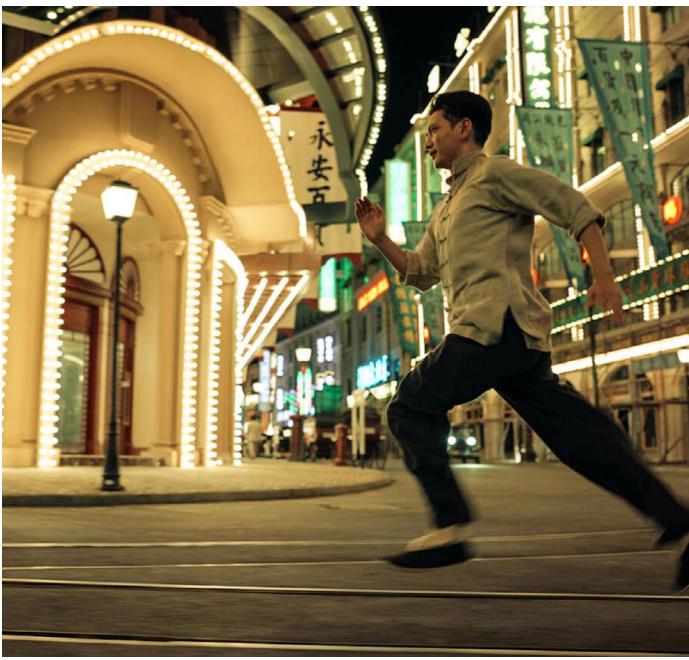


伊险峰

出生于辽宁海丰张，满族。人生第一份工作是在沈阳铁路局，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媒体，也写东西。

田野中国

基于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面向大众实践公共写作，用文字留住日益消减或者瞬间消失的各种现实。



题图为电影《1921》(2021) 剧照

非虚构

一个想当“主 X”的青年

伊险峰 | 三个人的政治光谱①

朋友问他，
你是认真的还是放屁？

我看到唐光明的时候，他是个正在减肥的胖子。唐光明穿一件白色的印花 T 恤，一条卡其裤，说别人一般叫他明哥或者萌萌。我还是叫他唐光明。我们约在普陀一个 Shopping Mall 里，他家附近，典型的上海区域商业中心那种地方，各种叫得上名字的餐饮店配置一应俱全，在星巴克、汉堡王、奈雪的茶等街边店里最后选了喜茶。他点满杯红柚，我点美式，我们需要等待 90 分钟。

见他之前，觉得他年龄有点超标，我们规定田野对象是出生于九五年到〇五年之间的人，他出生在 1994 年，大一岁。不过介绍他与我们认识的人说，这人有点不一样，他的理想是当“国家主 X”。

我们从奶茶的热量讲起来，他讲他现在减肥，讲他这一年胖得有点失控，他现在体重有 96 公斤，快 200 斤了，而他身高是 178 厘米。上大学前体重 130 斤，大学毕业前 150 斤。他在一个半月前决定减肥。现在这个有自制力的唐光明对自己的安排是：早上吃代餐，中午在办公室吃麦当劳 500 卡套餐，也就是一个蔬菜牛肉汉堡，一个玉米杯，一听零度可乐，晚上吃代餐或者自己煎一块牛排。如此一个半月，再过半个月有望变成 85 公斤。他细数这些数字，包括对食品热量的分析——汉堡很科学的，生菜番茄和两薄片牛肉，都是经过美国 FDA 认证过的卡路里指标……

唐光明是个很懂礼貌的人，很贴心，时刻注意周边是不是有点吵，会不会影响录音。后来他也说自己从小就扮演懂礼貌的孩子的角色，招邻居那些看着他长大的老头老太太喜欢，每次见到他也会说“你小时候老可爱的！”

普陀区的住处是唐光明父母在上海买下的第一套房子。他的父母都不是上海人，虽然来上海 26 年了，也没有办下来户口。父亲 1967 年生，江西鹰潭人；母亲 1969 年，江西德兴人。唐光明看着我在一本新笔记本上写下 1994、1998、鹰潭、德兴这些字，似乎很高兴我知道这些城市的名字怎么写。然后笔记本上陆续出现开发商监理、建筑工人、自学等词语，这是他爸爸的履历。从一个普通的建筑工人到

开发商房产副总，目前在张江替政府背景的甲方外包一个双子塔的大工程。他母亲 1994 年跟着丈夫一起来的上海，开始在一个温控器厂做工人，后来觉得效益一般，也去了工地，现在也是工程监理。

唐光明 1998 年来上海，4 岁。在此之前，他跟着德兴的外公外婆生活，直到他在电话里无法辨认爸爸妈妈的声音，还表现出无动于衷的样子，才被接到了上海，从此在工地附近的各种房子里长大。他们家在上海没有任何亲属。

外公外婆在唐光明记忆里所存不多，如今光辉形象都由他妈妈口述而来：外公是抗美援朝的老党员，本来是准备过鸭绿江保家卫国的，但是恰好到他那一批停战了。后来做公安，追过越狱的犯人，抬手开枪撂倒目标，立了三等功。外婆也是党的干部，所以他们在德兴的条件好，住在组织分配的房子。唐光明的妈妈是家里的小六，上面最大的哥哥比她要大出 20 多岁。晚年外公愤世嫉俗，经常对坐着汽车的官员破口大骂，认为官员被腐蚀得不像样，如今已经去世。现在家里长辈只剩下外婆，由在德兴的舅舅们照顾。

唐光明爸爸那一支的家庭背景就比较普通，工人阶级，爷爷奶奶都是铜矿厂的工人，从鹰潭调到德兴，二婚组成家庭，40 岁时生了再婚后的独子，就是唐光明的父亲。现在，唐光明一家过年已经不再回江西了。

唐光明很小时就意识到了歧视，因为自己上小学交学费要比别人多交一笔钱，还因为他在上海不停地搬家，先开始住在人民广场附近美欣大厦，后来去了杨浦，在江湾的红旗小学读书，说到这里他开始笑，“你看这个名字多么根正苗红”，三年级他 10 岁的时候，父母买了第一套房，就是现在住的这一套。

初中时全家搬到了闸北，读民办扬波中学，然后从这里考到了市北中学，是市重点。2008 年的时候父母在宝山买了第二套房，父母现在还住在那里。因为宝山到市北中学太远，高中他就住校了，成绩因此一路下滑，“没人看着，哥几个你做语文我做数学你搞定英语然后互相抄一抄”，结果高考的时候去了上海师范大学，“给母校丢了脸”。

关于高中之前的生活，唐光明强调三件事。第一件事是成绩不错，扬波中学他的学号是男生 11 号，到初中毕业的时候，他的成绩差不多在全年级 250 名里排前 50 的样子。扬波中学 80% 的学生都会去市重点，他也没有落空。

至于那个第二和第三件事，分别是陆续“倒追”他的女孩，和影响他一生人生走向的爱好：历史。

相比历史他似乎更爱讲爱情。讲他的女生缘好，讲他年少帅气，讲篮球技术了得，还要讲自己不是很主动，讲漂亮女生会来要 QQ 号。顺道讲了他初一有了手机，诺基亚直板机，每月 100 块钱零花钱，全部用来发短信，买套餐，跟女朋友腻个没完，短信发完就删，不留把柄，那似乎是〇六〇七年的样子。有电脑也是那个时候，拨号上网，兼容机。也是聊天，QQ，也打游戏，那会儿加的 QQ 全是熟人，同学、亲戚什么的，不用漂流瓶功能。说起这一类怀旧事情的时候唐光明就会眯着眼睛笑，看起来很憨厚。

除此之外唐光明的生活挺安静，他的时间大多留给他的第三件事，也是他最重要的爱好：历史。

他记得自己对历史和政治感兴趣是从一本《伊索寓言》开始的，然后就是《上下五千年》，看的时候大概是小学三年级，10 岁。他还记得小学图书馆是废柴，基本上形同虚设，他都去书店找书来看。没有人推荐或者指导过什么。

作为中国古代史爱好者，唐光明的兴趣点通过三国和《明朝那些事儿》得到了扩充，但始终在通俗读物范畴内，没有走入严肃或者研究型书刊里。其实关于他对古代史的兴趣还有更聚焦的点，就是皇帝、权力关系和强人政治，到底是这些东西和日后他对政治的分析形成了映照，还是他从记忆里挖出了这些东西用来印证自己的观点的正确性，都不太好说。后来他说起外族入侵，还有大一统，中央集权之类的，反复但是高度简略地引述自己看过的古代历史，表情都非常严肃。

唐光明认为自己有义务帮助中国恢复古代历史上那种疆域辽阔，国力强盛的阶段。这神圣的义务出现在他的生命中的时机并不是很早，至少在上了大学之后。在那之前，他只是依凭自己对历史的兴趣执意要选择文科，虽然自己理科成绩更好。高考填志愿的时候，他只有一个意向，就是学法律。爸妈希望他学建筑，这样可以很轻易把唐光明的未来嵌入他们所在的行业，“人生可以少奋斗十年”，唐光明引述他爸爸的话。但是唐光明希望自己进入公检法系统，所以所有的志愿都填了法律，同

济法律系，华东政法，上海大学法律系。一本志愿里唯一不相关的就是上师大广告系——结果人生偏偏落到了这里。因为他最钟爱的历史没有考好，据说那一年也是比较难。但归根结底，是因为他的高中基本上都在玩乐和谈恋爱。他没有选择复读。

后来他会埋怨是爸爸的一个决策让他从此和公检法梦想无缘。提前录取志愿他本来填了华东政法的经济侦查，“如果录取了就会像《猎狐》里的王凯那样去捉贪官”，他用一个我没看过、大概很火的一部电视剧来想像自己的可能性，爸爸不同意，他已经在选文科还是选理科这件事上拿过主意了，这一次他爸爸并不想妥协。结果他的同班同学，那个报了华政刑侦志愿的就录取了，他为此很后悔。他填的提前录取志愿是父母想要的，国际金融法。

为什么要学法律？因为想要当主席。在我见唐光明之前，中间人曾经转发了一个群聊截图给我，上面是唐光明自告奋勇说他愿意接受访问的聊天记录，因为我们的要求里有一条是“爱国青年”，他觉得他再合适不过。

唐光明的室友为此拉了群，在那句“我可以”之后，他紧跟着“我的理想是当国家主席”。室友似乎也没听过这个内心深处的理想，于是问了一句“你是认真的还是放屁”，唐光明说是认真的，他还更认真地补充，这样一来我的访问就会变成国家主席唐光明童年时代的记录，哦不，是青年时代。

这个谈话记录看上去太像开玩笑，中间人转发给我的时候，也带有“看这里有个神经病”的意思。在见面的时候，这些对话原封不动地出现了，只是聊天的人变成了带着录音笔的我。他唯恐我觉得他在开玩笑，因此非常认真地重复了自己的理想，当国家主席。

为了扩充这个说法，他说，当主席当然有当国家元首的意思，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建设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谈话到这里的时候，他说，我们终于进入正题了。

进入正题以后，唐光明还是保持了谦逊礼貌的态度，这一点我很欣赏。

“按照现在的人生轨迹，这个理想只能是理想，基本上是不现实的。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发生大动乱，这样我就可以做个军阀之类的，但是再次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似乎也不是很大，”他沉吟道，充满了忧虑，“现在看来，大动乱就是中美贸易战这样的，或者可以有所作为，以民族英雄的方式现身。”

唐光明决定要从政。

但是从政目前还有不少障碍。他大学毕业的时候就去考公务员，后来发现他能去的岗位比如宣传部门，不招聘广告专业的学生。所以他目前的计划是去英国留学，回来以后可以一箭双雕，首先能解决自己的上海户口问题，其次可以考公务员，他计划从基层做起，从事宣传或者税务之类的工作，然后一步一步往上爬。去英国他要学的还是 marketing，因为上师大这个学校没什么说服力，他只能去全世界排名 100 名左右的学校。至于为什么是英国，理由有三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说英语，以及他最近对美国的观感太差，也觉得反华啦枪击案啦不安全。还有勉强能算一个的理由是喜欢英超。

唐光明现在还不是党员，他觉得可以先进入体制然后再入党。他没想过党龄这个东西也可以算个加分项。经我提醒，他又说党和政府的工作可以分开来算，感觉稍微有点慌乱。

不过，唐光明从大学的时候开始，还有一个人生阶段性目标——要赚很多很多钱。所以，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在一家生活服务类网站，做了一年；第二份工作在一个美食视频网站，两份工作做的都是市场推广。赶上了互联网投资热，老板底薪给了 1.5 万，每个月还有业绩提成，所以按照他的标准，“赚了很多很多钱”，买东西基本不看价格，东南亚旅游住的全是五星级酒店，买电脑专门用来打游戏，那时候手上大概有 20 多万，全部放在了股市里。

结果就遇到了贸易战，特朗普一发 twitter 他就会少很多钱。这个时候他意识到国家经济发展对每个人有切实的影响，资产亏了一半的时候他的人生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用一种宏观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比如发现很多行业都没有钱了，不景气的迹象越来越多。最重要的是，那个叫“日日煮”的美食视频网站工作没啥前途了，他跳槽去了一个做化妆品外贸的公司，月薪还是 1.5 万，没有绩效。

“钱够花了就可以了，那我奋斗的意义是什么”这样的想法就出现了。其实这个还可以展开讲讲，唐光明对自己的社会地位有一个分析：家里是中产阶级，肯定能过下去，再怎么样也能生活。而且自己这个世代，获得阶级跃升的可能性太小了。从

300 万积累到 800 万再到 1500 万，然后去买房，基本上是不可能的。99% 的应届毕业生 10 年在上海都无法买房。既然如此，那么我奋斗的意义是什么？如果是为了房子，同样一套房子，市中心 1000 万，郊区 200 万，就是个地理位置，这说明房子本身的真实价值没有那么高。那种毕业拼命赚钱，然后买房，然后住进去，看起来好像没什么意思。当然了，如果中了彩票就不一样了。他也买彩票，2 块 10 块，中过一次 50，其他就没什么好运气了。

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自己做的事情应该对这个社会更有帮助，虽然每个人好好工作就是有帮助的一种形式，但这样还是不够。像自己做外贸电商的运营，没有什么太大的自我价值。只恨自己不是理科生，不然就可以去华为、海思这样的公司，做的事情利国利民。

2018 年的时候，唐光明把所有的苹果产品都换成了华为全家桶。他打了一个比方，就好像小猫小狗，他碰到了肯定会救，但不会主动去做那种志愿者。支持国产产品也是一个道理，全部换成华为，就是一种他的行动。不过 iPad 他还留着，上上网课下载一点工作软件什么的还是 iPad 好用。

至于耐克啦阿迪达斯啊，已经全部换成了李宁和飞跃，他觉得鞋子嘛，这些也可以了。

国家利益就是个人的利益，现在他觉得自己和学生的时候有很大的不同。学生的时候不会感知这些东西。现在不一样，只有中国经济好了，每个人的生活质量才会提高，因此，他坚决支持中美对抗。

至于中美对抗是不是中国经济不好的根本原因，唐光明没有想过。他给自己的转变划了一条线，高中大学的时候就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愤世嫉俗是一个类别，在唐光明的体系里人大概有这么几种：爱国、支持国家的人，愤世嫉俗的人，行尸走肉的人。他见到的女生全是最后一种，淘宝打游戏买零食，没有别的生活追求了。至于政治，根本没有遇到过可以谈政治的女生。他爸就是愤世嫉俗，外公据说也是愤世嫉俗的，但他不记得了，全是妈妈说的。

他爸的愤世嫉俗说的都是社会上遇到的事情，生意上的问题。唐光明的愤世嫉俗是从境外网站看来的。那时候翻墙出去看各种揭黑新闻，官商勾结腐败擅权之类的，“卧槽，还可以这样”，就愤世嫉俗。他说，现在想起来也不知道真假。

他着重说了对权贵阶层的感观。红二代红三代。我补充说这是特权阶层。他马上接下去说是的，比如方方，正厅级干部，湖北作协主席！疫情期间让警车送自己侄女去机场！我提醒他说他刚刚考公务员，说至少要当上一个处长，那么如果他仕途顺利一直往上走，那不就成了方方？

他的反馈是他知道权力越大贪腐的可能性越大。他并不反感贪污和权力（这个时候他似乎忘了刚才说过方方……）他认为贪官和管理能力可以有机结合在一起，至少历史上有很多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至于现在的更高的高官，他认为，他们肯定也不是 innocent（清白）的，但他认定，我们的最高领导层不会叛国。这是唐光明的一个设想，或者说他看待问题的前提。

两三年前他就不再愤世嫉俗了，因为他认为你看到的都是别人想让你看到的，他说他感受到了“外部的压力”。我没太明白这是什么意思，直观上理解，他是接受了某种阴谋论——但那是更愤世嫉俗的人的选择啊。

他看出我的疑惑，举了一个秦岭事件的例子。这事对他影响很大。他一直以为最高层铁板一块，决定一切。秦岭事件发生之后，包括陕西前省委书记因此落马，说明地方官和中央不是一条心的。为什么地方官可以这么嚣张？中国应该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这个是他一直以来以为并坚持的主张。他看过很多宣传报道，认为执政者改革肯定会触及个方面的利益，因此最高层巩固自己的权力，以此实现中央的统治，是个人都能理解。他的出发点是为了让中国变好。

对于这个观点，唐光明说这是他的善良揣测。理由是最高层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古代皇帝就是这样。当官的每个阶段都不一样，官越小反而越追求特权，升上去之后格局也会变大，下面的人是不是和国家利益一致不好说，最高层肯定是一致的。

他对自己的定性是爱国，半个爱党。这些观点他基本上从来不在外面讲，有一个微信群例外，那里面有六个人，政治观点差不多是一半对一半这样。跟他观点对立的一半人觉得中国哪里都不好，全部否定，尤其是他的室友，看书，喜欢文学，看不上中国文化的发展，认为经济发展了文化没有发展，严格的审查制度让文学和电影发展都很艰难。

这个群本质上是一个游戏生活群，政见会引发争执，所以现在大家自觉地绕开政治话题。不过疫情他觉得就是个很好的写照。吹哨人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群里大家都认为武汉政府腐败，官员不作为什么的，后来有了外部参照就觉得，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也是冷酷无情的，也不过如此。

他们还争执过肖战粉丝举报AO3的问题。他不太熟悉这个，第一次说的时候说成了AO2，我提醒他这是同人文学网站。他认为，在举报这个问题上，举报者是没问题的，责任在于审核者。知乎上有一些人的观点是举报的人都是错的，这个他不能同意。我跟他探讨了打小报告的道德问题，以此类推举报是不是真的没问题，是不是需要考虑。他最后的结论是，AO3跟他其实没有太大关系……这个时候他又忘了他对利益共同体的理解了。

我们最后的话题落在他的交流上。事实上他无人可以交流，除了那个小组。他也不会在网上跟人吵架，也不会去说服别人，因为知道别人无法说服他自己，他也不能说服别人。鉴于这一点，他说他肯定不是小粉红，因为小粉红会到处打来打去，他把小粉红和出征派理解成是同样的行为，他觉得这种行为就是很戆的，戆是上海话，意思是傻。

然后说到了去留学，目前他已经在学雅思了。他觉得自己是聪明人，因为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妈妈怀疑他有多动症，带去儿童医院看病，看多动症需要测智商，测了个131，妈妈就带回家了，很骄傲，多动症这回事也不提了。他还记得测智商用的是华东师范大学心理系编的一本小册子。为了证明这个智商，他说自己小学五年都是在奥数班的，即便有末位淘汰制也一直留到了小学毕业。

临告别的时候他去Shopping Mall一家宠物店拿洗澡的狗。狗是小区里捡的，取名可乐。可乐出了宠物店就尿尿拉屎。一截屎拉在水泥地面上，他让我拿好他没喝完的喜茶，拿出一个塑料袋捡屎。他还有三只猫，一只捡的、两只买的，现在跟他爸妈住在宝山。他自己搬回老房子住两年了。搬回来是因为新谈了一个女朋友，河南人，同居一年以后分手了，因为女孩子太小，还不想谈婚论嫁。

唐光明有两次结婚冲动，第一次是和长跑女友，但是毕业一年之后他觉得这个女生变了，而且准备结婚的时候提了很多条件，过于物质；再一次是和这个，但是人家不愿意。现在唐光明改变了那种应该成家立业的想法，他决心要对社会做点贡献了。

他的朋友圈只看得见他发猫猫狗狗的各种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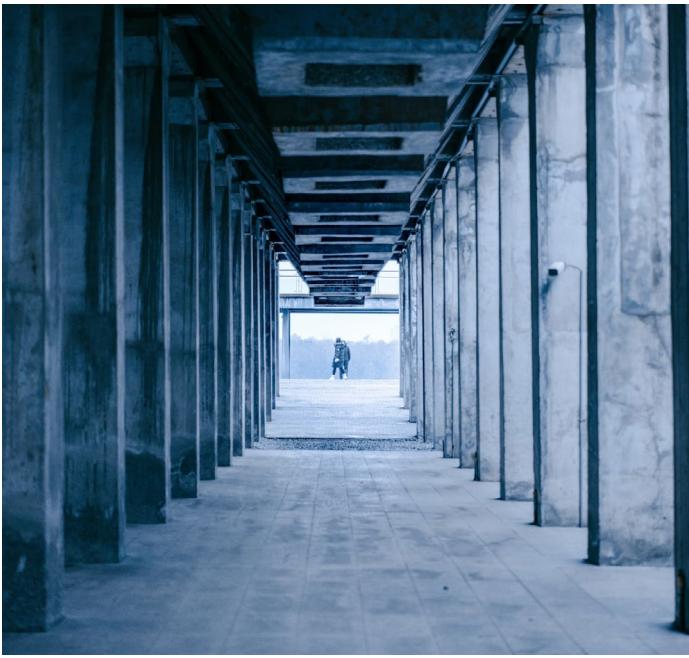


伊险峰

出生于辽宁海丰张，满族。人生第一份工作是在沈阳铁路局，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媒体，也写东西。

田野中国

基于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面向大众实践公共写作，用文字留住日益消减或者瞬间消失的各种现实。



题图来自 [Katherine Gu](#) on Unsplash

非虚构

一个没有什么观点的女生

伊险峰 | 三个人的政治光谱②

其实她对许多事情都有看法，
而且不是温和的。

一个女生，来自曾经的重化工重镇吉林省吉林市，毕业于当地最好的一所高中。我们聊天的时候，即将从立信会计学院毕业。

她姐姐在沈阳，比她大十八岁，几乎可以算是一个长辈。姐姐爱党爱国，挣钱买学区房，老公上进，有一个儿子，也上了初一。她旁观姐姐的生活，觉得意思也不大。所以她希望远一点走。

她的同学上海及周边人士居多，在他们眼中，东北遥远而且落魄。她所在的吉林市，更是不明不白，总是要跟人解释这是个城市的名字，而不仅仅是一个省的名字，这个市早先有化工业，很了不起，现在提不起来。她自己想了想，吉林，应该算五线城市吧。

吉林市打车六块钱起步，最远也就二十多块钱。没有市中心。真的没有市中心？我们头脑当中越小的地方，似乎更要有一个市中心。她想了一会儿，很确认。各区资源水平差不多，都有一个大商场。我们猜更有可能的原因是财力不够，就这样了。对于千禧年前后出生的她来说，不知道老城在哪里——如果有一个老城，那还代表着过去的渊源，至少也代表了曾经存在过的市中心。如今，没有。再次确认。

她身上有很多的标签，最重要的一个可能是下岗职工子女。跟很多次聊天一样，在见面和聊天之前，我们对聊天对象有很多想象的成分——这些想象来自于成见、经验、基于价值观的判断，当然也会有按图索骥的期待。我们总是试图想总结一些东西出来。这其中最可怕的一个，是我们头脑中自己的成见，或者说，我们都有自己对世界的固定的看法，既希望对方变身为一个靶子，正好成为批判的对象，又希望验证自己对世界的揣测——你看，果然如此。

我们可能跟赵捷所说的一样。我们把无数碎片纠集在一起，希望它联结为一个完整的存在，这个存在最好还在我们意料之中。我们尽力希望摆脱这样的困境，这比

我们想象的要付出更多的精力。

就像这“下岗职工的女儿”这种标签，暗含着各式信息：她不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在东北一个前工业化城市里，一个下岗职工能说明一些问题。与中产阶级和有钱人相比，可能包含着更多的个人奋斗和穷苦人的色彩，我们对下岗那段时间有了解，但希望知道一个正在上学的人怎么看待这种生活状态。

但是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我们预料那样。女生的父母都丢了工作，他们曾在一家当地著名的酒厂上班，榆树大曲，至少有一段时间里还有些名气，丢掉工作之后父母开小饭店。开了不久黄掉，黄了再开，就是那种街头不起眼的小饭店。这些都发生了。

但也仅此而已。对于 1999 年出生的她来说——她的记忆大约要到 2004 年左右才开始，她对贫富的概念可能要到 2010 年前后，而这些对于在十几年前下岗的父母来说，或者已经度过了最危急的岁月，或者窘迫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总之对于她来说，下岗之类的概念于她不是生活中排位很靠前的存在。但她知道她父母是下岗职工，提起下岗的时候，别人会带着同情的目光，但在她自己的记忆里，她只是被教育，她们家不是有钱人家，要省着过——但大部分有点居安思危的普通人家，都会这么告诉自己的孩子，勤俭持家，不要大手大脚，父母挣钱不容易，我们不是有钱人。

她自己的记忆里，最快乐的事情是小时候爸妈太忙（可能是下岗工人生活的窘迫和奔波吧！）所以没有人管她，她可以成天在外面玩。除此之外，别人有的，手机之类的东西，她也没有落下。不愉快记忆只是初中不怎么交补课费，但那时候老师里有个亲戚，对她照顾有加，她在班里排名第一，可能也不需要补课。到了高中她拒绝了班主任的补课——一小时五百，几乎所有同学都在那里补课。她以家里条件不好的名义提了这事，她上高中应该在 2014 年到 2017 年之间，下岗肯定不再是个问题，那更是一种主动性的有意为之。她说班主任教历史，历史也讲不明白。如果有钱，那就去补课，她说，没有什么对老师的更多评价。不过，其它课的老师比如教地理教数学的也都会补课，“英语老师是很好的人，不做这种事。”

或许还可以说说阶层固化。

我们聊天那天有一个新闻：衡水中学高三学生张锡峰的演讲在网络上爆红，衡水中学是著名高考中学，他在那个名字为《这世间，唯有青春和梦想不可辜负》的演讲中说，“我就是一只来自乡下的土猪，也要立志去拱了大城市里的白菜”，很显然，这种代表“低阶层”“乡下”“穷人”来挑战阶层固化以及必须不能让阶层固化的演讲，具备流行的所有要素。它正好在这一天出现，我们顺势问起，她表示好像在朋友圈里看到有人说，但也仅此而已。她对这些不感兴趣。那你有感觉到自己阶层的变化吗？唔，我也就那样。没有感觉。她不觉得下岗的背景为她一生抹上了悲壮色彩，也不认为父母日子过得艰难。

对了，她姐姐对阶层更敏感，姐姐认为只有读书才会改变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姐姐对教育狂热，对她儿子各种培养，目标 985 之类，她挺反感。姐姐对她好。但她们很多观念不一样。“我姐觉得读了一个好大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人。我爸我妈和我都不这么认为。”她姐姐觉得好人的定义方式，就是得有一个好学校、好工作。“我们俩一聊这个问题，她就说我啥也不懂，她就不跟我聊了。”她姐姐出生于 1981 年，也学会计，念了大专。“我从来不主动跟她交流，因为我们政治观点不一样。我觉得不可交流。”

她也并没有在社会上感觉到阶级差异。

容易被拿来说事的消费时尚与攀比，于她还是不那么熟悉的概念，这与她的学生身份更有关，而与地域和阶级身份关联度不高。作为吉林市最好的高中，各种阶层的子弟都会出现在这所学校里，当然会有攀比，但因为大家都穿校服，这攀比也仅仅显示在鞋和包上面。耐克，匡威，就这样。

（和我们一起聊天的嘉怡插嘴说，她所在的哈尔滨国际学校，感觉富人要更多一些，她说在她们那里耐克就不算名牌，可能得是三万块钱的一件羽绒服，也可能是限量版要抢的球鞋。）

我们希望她能讲一讲凋敝的吉林，好像也无从讲起，我们在说起某个城市时，无形当中有若干个概念，比如繁华是什么，一线感觉是什么，有人用高楼，有人用星巴克或者麦当劳，有人用地铁，有人用万达广场，大都是些五十步笑百步的东西。

但我们恰好用这个话题打开了聊天的局面。就像开始所说的，读大学之前，对大

城市的印象多是来自于沈阳，这与她的姐姐把家安在沈阳有关。北京上海广州——它们放在一起被叫作北上广是另外一个概念，与奥运会世博会之类的东西有关。而她得出吉林市是五线城市的结论，也没有什么确切的理由，只是想象当中的结果。虽然对城市概念不多，但她知道应该尽可能去大城市，她不大会用开阔眼界之类的词，但很多传说中的人和事都发生在这些城市里，比如许子东，因为梁文道，她知道了这些人——以前在吉林的时候，许子东与张爱玲没有什么差别，都是活在文字上的人物。现在在上海，他是一个空间里她和另外一些人共同分享的嘉宾老师，一起悼念钱谷融教授。“这个城市提供可能性。”

还有树。还可以逛公园。她喜欢看植物。吉林不但没有市中心，连公园都没有。我们觉得难以置信：“真的没有？”

“松花江，江南公园，还行，但那不是公园，那是景物。我们河那儿不叫公园。吉林只有儿童公园，江南公园，儿童玩的。上海公园里有植物。”

还是难以置信。或许是对这种表述本身。“柳树也算植物啊。”我想起吉林雾凇的图片里总是有很多柳树松树的。

她沉吟了一下，打开另一个话题。“松江都没有梧桐。松江不是一样的上海。松江就是乡下。松江和吉林差不多。松江没有意思。”

立信在松江大学城。

很多预期当中可以成为问题、继而转化为态度和价值观的事，其实于她来说都处于平面状态。或者树和许子东也是，像个菜名一样存在，但是什么菜，不好说。

喜欢许子东，是因为知道了梁文道。梁文道是她同学的推荐。一个叫马雁的故去的诗人，是因为在微博上关注了，她热情表达她的喜欢。可能恰好诗人很友好地对待粉丝，于是接触了更多的诗人，于是更加喜欢。

她对这些东西的兴趣，可以说以自我为中心，她自己也会说对某些东西因为不知道而没有兴趣。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跟同学们并没有太多话说，这可能是与他人不大一样的地方，但总的来说，如果大家都是热情而且话很多的人，也未必会有太多的有价值的信息交流。毕竟很多事情都在网上。

很多时候，她对自己有些判断，比如说上高中以后学习能力不行了——这判断是来自老师们的成见还是来自她对自己的感受，不好说。反正在高中之后，她的心气不如初中。在她们这一届，考到北大清华有二十来个人。她们班没有，她们班浙大北外上外之类，最好的是到人大。因为学习能力的判断，她把目标调整为立信，可能在整个吉林省，对这个学校感兴趣的人并不多，它的命名方式与一般的大学不一样。这样更有把握一些。无形当中，她践行了一个高考择校公理：选城市比选学校重要。

所以立信对她说也是一个通道。让她来到有许子东、有树、有公园的另一个世界的通道。她并不喜欢财务，按她自己的说法，她以惊人的挂科而让同学关注。在她表述中，她与同学几乎毫无交集，没有什么话说，他们考各种证，而她只是看各种与专业无关的书。她也没打算在这个专业里有所作为，所以那些银行金融机构之类的校招，她也不会参加。她只关心她关心的东西，别的不关心。她把朋友圈设置成无须审核——即使删掉那些好友，他们也并不知道。

政治观点于她没有那么重要，虽然很多人提及这些东西的时候，要用上“撕裂”“崩溃”“坍塌”之类的色彩强烈的词。你要问起的时候，她说她有自己的观点，她说她会和同学在网上聊天交流。用缩写，拼音的缩写。以躲避审查。她觉得这样安全。否则你就得猜她是什么政治观点。她喜欢戴锦华是一个重要标签。但是，只是交流。她不喜欢吵架。

这两年最大的事当然是疫情。她知道李文亮，也知道方方，但不大喜欢方方，与很多人的见解不一样……你或许可以理解或者从中总结出这与大家对情绪和观点的感知能力更强，而对事实关注度不够有关。但在她印象里，出乎意料地认为方方是个犬儒主义者。这也让我们很意外。

“不喜欢方方。我觉得她很犬儒主义，日记里面，我觉得没特别批判武汉。”

“你觉得她过于温和，没有力量？”

她没有说出问题出在哪里。

“后来方方被小粉红攻击的事，你关心吗？”

“不关心。因为我不喜欢她。”

“你喜欢的戴锦华都没有为此事发声，为什么强求方方一定百分之百说得准确，或者要明确亮出观点？”

“对哦。你说得对。我是不是双标了？”

很多时候，你要跟她有不同意见，她几乎下意识地就说“嗯，你说得对”，或者是“懂了”。到底是避免争论还是认为对方言之有理，不好判断。因为太快，你都怀疑她是否真诚。至少，我们肯定没有平等地聊天。

她喜欢的话题同样与她关注的几个意见领袖有关。戴锦华在探讨什么问题，一个叫“狗子岛”的公众号在探讨什么，这些话题会让她有意识地接触更多社会内容，但不代表对她有什么影响。

上大学前没看太多书。她总是表示遗憾。文学方面的书看得多，历史政治很少。她觉得这样也没什么不好。为什么要看这些呢？大屠杀和战争，都不会看。她说的是旁边坐着的嘉怡手里的书，《现代性与大屠杀》。她们前一天刚见面。

她补充说这些只是兴趣。她并没有对某类知识表达出特别的兴趣。

还有很重要一点：是否打动了她。特别喜欢马雁、《流言》和《小团圆》。后两个是张爱玲，前一个诗人后来看了一下，一样也有点刻薄。她当时的解释就很重要：“刻薄里面有温情。”《小团圆》写了一个梦，醒来快乐了很久很久。她说张爱玲有写过，人短的是磨难，长的是人生。

那个时候我们问起恋爱的事，她说初中有个男生喜欢她，她无感。高中喜欢过一个男生，但男生是同性恋。“全班都知道他是同性恋。”

“就瞒你一个人？”

“不。我也知道。他不知道我喜欢他。”

男生看的书很高级，看哲学，看福柯，性史之类。还看《2666》，借给过她，她没看完，太长了。但这男生看完了。除了分享小说，他们也会分享电影分享歌什么的。他有男朋友。

可能是很随机出现的一个人，这个介绍她看罗贝托·波拉尼奥的男生，没有让她成为波拉尼奥小说的爱好者，但那个介绍梁文道的人打开了上海、打开了梧桐树的世界；让她结识马雁的机会让她不断地发现新的诗和诗人。生活就是这样一点点打开的。这是她说的“提供可能性”的那一部分的迷人之处。

她还会想去某个书店做店员。

“有目标？”

“杭州有个书店，陈家铺，要在山底租房子，每天上山。”

这时，她不大有高中拒绝补课时拿出的态度。她上大学一个月要花掉三千，而她父母的退休金加在一起也不过八千左右。与我们想像甚至期望中的那个人设又远了一点。但她不这么认为，不认为她每月花掉三千块超出了她和她家的承受范围。她没有提非分的要求——有钱人的那些宏大的计划，比如去国外读书，定期的出国或者国内的旅游。不，她是一个克制的人，虽然想不出来为什么花掉了这么多钱。

我们甚至一起看她的支付宝。

“五月，3600，四月4200，天啊，我也不知道花哪儿了。”

“居然都是吃货。有六七块钱的，零零碎碎的。”

“感觉没有什么大件。居然都是自己吃的。”

她并没有想过爸妈一个月会花多少钱。不过，她飞快地就她所知算了一下：他们有一个小房子，租出去了，自己租了一个大的，收小的租金，再贴点钱租个大的。吉林吃东西很便宜，自己买菜，花不了多少钱。她在上海念四年大学，父母并没来过，上大学是姐姐送她的。姐姐现在在一个教育机构里做前台，嫁了一个老公，是技术工人，与石英之类的技术有关。她并不是十分了解。沈阳的姐姐一个月能挣四五千，姐夫一个月能挣一万多。她和姐姐唯一的共识是对父母要好一点。

她毕业的时候，进了新东方，校招。这是2021年，新东方跟本命年犯了六冲一样一步一个坑。每次有裁员砍业务的消息传出来，我们都会问她一下，怎么样？你还好吗。她不在义务教育那个阶段，她教高考作文，所以她一直还没有被裁员。新东

方几乎是她唯一的选择，校招那些银行金融机构不在她考虑范围之内，“我也不懂，所以，他们也不会看上我”。她这么总结。她不觉得在新东方当写作老师有什么价值。她觉得做记者从事新闻翻译作品字幕组都是在做有价值的事情。

那天话题在进展到“工作是不是有价值”的时候，场面有点尴尬。

她说她想做保安，每天看书，啥也不干。我们在很高的道德高地上提出一个问题，那保安工作有价值吗？发快递有价值吗？这么问很操蛋，对方怎么回答都显得愚蠢。她换了个概念，说不是价值，应该是做有意义的事。

“哈，那保安没有意义吗？做国家主席比做保安更有意义？做个医生比做个语文老师更有意义？”

“我只是觉得做课外机构的老师，没有意义。”

“保安没有意义？小区不需要？”

“可能不需要。”

“清洁工呢？”

“这个有意义。不是因为需要他，没有清洁工，城市就乱套了。但这么说感觉好自私啊，好冷酷啊。”

那天几乎在各自慷慨激昂的演说中结束。

几个月后，我们再度问起她职业是不是遇到问题。她说她已经回到吉林省，准备考研。她希望自己读个中文系的研究生。在夏天聊天的时候，她还说她从来没想过这个事。不是因为钱的问题，而是因为她觉得有点难——她从来没学过中文系的课程。但几个月之后，她的想法已经变了。



伊险峰

出生于辽宁海丰张，满族。人生第一份工作是在沈阳铁路局，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媒体，也写东西。

田野中国

基于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面向大众实践公共写作，用文字留住日益消减或者瞬间消失的各种现实。



题图来自 [drown_in_city](#) on Unsplash

非虚构

2012 年，我在香港街头

阿峰 | 生活亲历者

这里属于有信仰的人。

阿峰是小鸟“接力访问”栏目第 48 位受访者。他在描述自己 2012 年为期 7 天的香港生活的时候，有着相当动人的回忆。后来他把当时的经历整理成文字，并发布在贴吧和天涯等论坛上，阅读者众。如今事隔 11 年，于阿峰、于香港，生活都已然不是当年的样子。重发阿峰当年的随笔，是以为纪念。

注：因为可以预知的原因，极少数社会背景字句被删减，省略号内容为删减部分。除此之外，行文保留阿峰当年的习惯，未作删改。

重返西安扛起背包，感觉一切都太轻了。搭车去太原拿到证件，又连续两天的火车去往香港。从北到南，都是阴天，看着低沉的天气，风景在窗外连成画卷。水田旁的村落，村落中的灯火，灯火映着餐桌，餐桌上的一家人，我和火车都是他们彼此的过客。

第一次被南方冲击，是在杭州。当踏进深圳的那一刻，我又一次被南方冲击。快节奏与繁华，烈日与口音，路人的脸上都不见笑容，我在闷热的风中乘了一辆摩的前往关口。

看着通行证上的“团队 L 签”，为这不公平的地域限制有些遗憾。之前听说过旅行社有专门面对“团队 L 签”提供自由行服务，只要拿着其签发的团体单子通过关口，就可以在香港自由活动。在关口外面四下搜寻无果，只好病急乱投医，大胆地走向一旁巡逻车上的安保人员。“我是团队 L 签，想去香港自由行，请问您有没有这方面的方法？”

面对这样的询问方式，安保人员在拒绝与帮忙的情绪中犹豫了会，问我：“你要去香港做什么？”“找朋友。”

他看了看我的通行证，打了一个电话。两分钟后走来一位戴着草帽身着休闲的阿姨，对我说：“你想过关自由行？跟我来吧。”

跟着走进关口，我为面前办“团队 L 签”的旅行社阵容吃惊，密密麻麻数十家。摊

位的前方正是安检过境大厅。这种诙谐又有力的对峙，让我感觉到相互间的纵容和忍让。安检大厅的国家安全人员，每天都会看到这些摊位，也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但并未处分和取缔。说明他们也知道这种地域性的法规备受诟病，又不想把矛盾激化，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有自由行需求但非允许自由行户籍的居民，让开一条“正义”的灰色通道，提供方便。这种充满深意的纵容，是规则处于过渡期间的产物，迟早要被完善后的更科学的法规替代。

一刻钟后，她拿给我一张单子，说：“用这张团队单子就可以自己过关，在香港不要触犯法规，也不要超过七天，否则你和我都会有麻烦。收费是 35 元。”

“下一站，天后。”预达天后地铁站前的报站，让我想起 Twins 那首《下一站，天后》的一语双关，回忆起中学时的卡带。在天后站的 A2 出口，远远看见了那张笑脸，两个月没见，阿豪瘦的有些过份，还扎起了短小的辫子。深情的拥抱，互相给了一拳。

此时的维多利亚公园……不同的社会团体、党派和宗教组织都在路旁摆起摊位，拿着话筒做着宣讲和募捐，并售卖一些游行的 T 恤……阿豪也与自己的社团在这里集会。他递给我一张宣传单说：“我的新团体叫丰剩，今天趁着香港所有社团集会的日子，我也要宣布正式成立。”

阿豪在旅行结束回到香港之后，很快花光了积蓄，四月份还没有到教游泳的季节，所以他也不能授课，便断了经济来源，以至于经常挨饿。后来他注意到一个叫马克的美国人，每天晚上都会背一大袋的面包香肠和饮料来……放在他的桌子上然后离开。阿豪便不再担心食物问题，他很好奇这位从来不穿鞋的美国人是从哪里背来的免费面包。后来马克带他去了一处商场的地下垃圾房，看到那个地方阿豪惊呆了，垃圾桶里一大包一大包干净的食物和饮品，都是商场当日卖剩的和即将过期的。之后他们招集了一些港大的学生，一起去商场的垃圾站捡这些刚刚丢掉尚未过期的食物，并将这些食物分给很多流浪汉和路人。这样一个以剩食回收再分配的公益社团雏形就出现了，取名为“丰剩”，丰富的剩食。

“现在丰剩刚开始，大家要研究的问题很多，目前还是从环保入手，而且这些大学生也没有社会运动经验。”阿豪有些担忧，推着一个搬运的手推车，上面摆满了各式面包，带着几个大学生向广场和路边的团体去派发，并附上一张“丰剩”的宣传单。

我在内地初遇阿豪时，对社会运动心存偏见，以为只是一帮愤青或者极端人士，在那组织一些干扰社会秩序的活动。到香港才发现，他们才是一群真正替这个社会的弊端去面对、去承担、去呐喊、去争取的热血青年。政府过于思考权利与稳定大局，商人过于思考金钱与自我利益；社会运动者穿插在两者之间，他们有议员有公民，有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不求自己可以获得什么，只求为社会向前进步奉献力量和智慧。他们不一定富有，但是心存正气，真正在为理想和公平而前进的一帮人。

很多人说这是一种叛逆，我觉得这正是一种顺应，顺应道义与历史进步的车轮。记得高中时同学和老师说我叛逆，原因不是我遮眼的长发，也不是早恋，而是我与年级主任的一次争辩。高考前夕，每次放假回家，都会有各种收费名目，后来放假就几乎等同于收费。大家觉得这是高中最后一年，忍一忍就不去计较。

有一回放假，学校通知带一百五十元的试卷费，算了算实际需要交的还不足五十元。返校后，同学们出于质疑，接近九成拒绝交费。当时觉得不交会显得无赖，交又会纵容校方继续无序收费。看到这样的对峙会继续恶化，我找到了年级主任去啃螃蟹，说：“只要学校出示所收每分钱的单据，这一百五十元具体都是些什么试卷，算清了一分钱都不会少。”年级主任勃然大怒，不知其是算不清，还是觉得权威受到了挑衅，“你是谁啊就来给我要单据，还来查学校的帐，你有什么资格和我说这样的话。”说完把我赶出办公室，他用一种官僚气息把对话机制在根源上打破了，失去了学生与学校之间的沟通，也失去了公开与监督。这件事传到了班主任那里，他说：“不交费就把家长叫来学校谈话，也不允许进教室上课。”用粗暴的流氓手段进行震慑威胁，同样没有直视学生不交费的根本原因。大多数人不愿在高考前分心，也不愿让家长操心，便纷纷妥协。除了两位家庭困难的同学，未交的仅剩我一人，其实那一百五十元就在我口袋里，只是想让收费这件事情公开透明。一天，班主任在课堂上，公然以这件事情对我进行了调侃：“那位抠门的不愿意交钱的同学，你不是很爱算清楚吗，你来上讲台把这道题算一算。”引起全班同学的哄堂大笑，我瞬间感觉到人性的悲凉，不只是因为老师的调侃，而且是弱势群体的笑。他们到底是在笑谁，笑我还是笑他们自己，笑我在傻傻地为集体争取权利，还是笑他们自己没有骨气。感觉自己所有的坚持，所有对正义的幻想，都被毁在那哄堂一笑。原来不是官僚气息猖獗可恨，

而是集体早已丧失尊严与气节。

游行队伍的热情高涨在午夜的香港岛，从维多利亚公园到铜锣湾到湾仔到中环，一直向西区走去。有人戴着V字面具，有人打着鼓，有人扛着标语，有人拎着酒瓶，时而喊着口号，时而唱着歌。我和阿豪在路过中环时就离开了游行队伍，来到汇丰银行的地面广场……

“对了，这就是马克。”我原想是一位强壮的山姆大叔，却看见一位金发碧眼，消瘦的像个姑娘，扎着中国古代发髻，盘着瑜伽腿型，正在路灯下读书，光着脚的马克。

“你这次来香港，丰剩可以解决你的吃，中环会提供沙发，更重要的还要让你体验一把在香港不花钱的生活。”

整个人的思维被新鲜的空气所感染，每个人的血液里都似乎流淌着摇滚精神……



马克

我来到这里的时候，除了一群流浪汉，平日已没有人驻守。在每周二四六的晚上占中成员都会回到这里开会，现阶段转变为讨论一些社会时政或文艺性的东西。这些流浪汉，是马克睡在街头时的同伴。当马克和阿豪成为朋友后，他的这些同伴也都被阿豪邀请了过来。

马克和我同岁，眼神中透露着安定、智慧。他已经过了两年不花钱的生活，平日里都光着脚丫，是一位素食主义者。他每到一个国家和地区都会学当地的文字和语言，他去过日本，写的一手漂亮的汉字。也会用心地观察当地社会，研究出一套不花钱又能吃能睡的生活方式。他把这种不花钱的精神，带给了阿豪。这种不花钱精神就像是把极简主义推到一个极端。



街边帐篷

人和背包都塞进帐篷，躺了下来。跟着游行队伍热闹了一天，汗液让皮肤变得粘乎乎，六月香港街头的闷热让人难以入眠，没有风扇没有空调，只有像大棚温室一样的帐篷。我被自己的内分泌逼出帐篷，问阿豪哪里可以洗澡。阿豪看了看手表，“十一点之前还可以在附近的一个体育场的更衣室洗澡，现在这个点只能在马路对面的公

厕洗。”

“走，我陪你去洗。”说完阿豪拎着两个矿泉水桶，和两瓶捡来的豆浆，带我去公厕。我问他为什么带两瓶豆浆，他变得得意起来，“我和马克在商场里捡到很多这样大桶的豆浆，但是喝不完，也没有冰箱储存。我们想让这豆浆再次废物利用。有一天我看到一本书里说豆浆是酸性的，而人体的汗液是碱性的，两者在一起可以进行中和作用。这就表明豆浆在洗澡的时候可以当洗发水和沐浴露。既能为生活减少开支，又能避免浪费。”

阿豪一边说着，一边往女厕走。“现在你又要打破一次自己，就是进来女厕洗澡。”看着我站在门口死活不愿意进去，阿豪开始循循善诱：“你是想在男厕所里面闻着骚味踩着尿吗？不想的话就跟我进来干净的女厕。放心，现在是凌晨两点，哪还有姑娘跑大街上来上厕所。我瞬间有被这强有力的广告词戳中心窝的感觉，跟着进了女厕。

每人在面池的水龙头里灌了一大桶凉水，带着各自的豆浆，选择各自觉得干净的隔间。整个过程我不敢吭声，唯恐被哪个冒失的姑娘报了警。感觉每个毛孔都在吮吸豆浆，营养奢华。冲洗完毕，拎着水桶和换洗衣服，头也不回的撒腿就跑。

第二天醒来已经中午十点多，透过帐篷的缝隙，过往行人步履匆忙。在中环金融中心工作的人，可以称得上是白领中的白领，精英中的精英。感觉就这样走出帐篷，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情，别人西装革履步伐豪迈，我光着膀子躲在帐篷里面。灵机一动，我夹起一本书，并用余光去扫视有没有被人围观，已经虚伪到节操为负的境地。突然觉得这样的作秀透露着自己生活的态度不够认真，有时候越心虚越想装出点什么。

堃哥见到我时，我正在星巴克为手机充电。“嘿，哥们，你看谁来了。”堃哥戴着墨镜，露着嘻哈的笑容。

他把我带回了传统视野里的香港，山顶公园，兰桂坊，铜锣湾，黄大仙，霓虹闪烁的维多利亚港湾，乘着船出海，去香港著名的小店吃名吃，喝早茶，一切看起来都那么正常。堃哥发现我的兴致不高，我说已经被香港的另一面冲淡了。堃哥和阿豪属于香港的两个阶层，堃哥是一位当过古惑仔留过洋正在修行的生意人，阿豪是意气风发寻找未知的社会运动者，他们对生活与美的理解不同，对社会的感悟和追求不同，所以带给我的成长也不同。

堃哥问我有什么想去的地方，我说想去拜访下黄家驹的墓地。他二话不说开着车，拉着我穿过九龙的街区，来到了将军澳公墓。十五段六台二十五号，家驹望着维港的东面在此长眠。他的音乐陪伴了我十年，也将伴随我一生。在这个人都用浮躁歌颂情与爱的年代，他们在黑暗中拿起吉他，叫醒音乐，叫醒生活，去歌唱亲人，歌唱自由，歌唱理想，歌唱和平，歌唱远方战火里的重生。在以往听到他的音乐，我不知歌词为何如此亢奋，听到了也只是听到了，感觉自由与梦想毕竟离我很远。当我踏出家门的那一刻，当我冲出自束缚的那一刻，当我在看到这个世界更多面的那一刻，在路上恍然听懂了他的呐喊。

“一个人如果按照自己的内心活下去，要么成为一个疯子，要么成为一个传奇。”家驹是他这句箴言很好的践行者，他的一生像是一场追梦之旅，在娱乐化的创作氛围中始终坚持自我。他告诉别人 BEYOND 不是一支地下乐队。只是主流音乐太浮夸，经过长期的洗脑，把真正的音乐衬托成了小众。音乐并不是娱乐，音乐就是音乐，是生命里的音符。

“我不知道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我只知道什么是年轻人应该做的事。”在那雪白的墓碑前敬上一支香烟，用扫把清理墓碑一周的尘埃。

傍晚跟着堃哥和嫂子回到了位于西贡的家，没有麻烦女佣，他们亲自下厨为我做了一桌饭菜。西贡夜里的海湾，有夜市有游艇，有月亮有群山，有啤酒有家人，还有出来散步的牛。这些牛并非家养，而是自生自灭的野生牛，受法律保护。他们跟香港人一样共同在这片土地生活，享受这里的森林，享受这里的海滩，享受这里的路灯和街道，享受这里的自由和平。

中环的银行街区，并没有散发出太多的铜臭。他们也都是身边的普通人，只是会比你多算几道计算题，比你更专注于金钱在量上的变化。对于金钱的本质，为什么需要钱，如何将钱花的漂亮，他们似乎懂得并不多。钱变成了一种使人愚蠢的介质。在发明最初，它的作用是帮人等价平衡，帮人交易互换，是一种智慧的发明。但人类思维经过千年演变，却把钱认作为地位的象征，生命的根基。已经越过了金钱被

赋予的职责，造成两个后果：一是让人不再思考社会间的关系，凡事都习惯用金钱去解决，解决的多了人际关系就会变得粗暴愚蠢，误以为有了钱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二是让人误以为有了金钱就拥有一切，一切价值都与金钱等量互兑，一分金钱对应着一分的生活质量，忘了生存需要的是沟通和智慧。或者说给他十块钱让他想办法在香港生活十天，就等同于让他用十块钱买一根体面的上吊绳。

马克在夜里十一点准时出现了，到沙发旁的柜子里翻出几个编织袋，对我和阿豪使了一个眼神。我们接过编织袋，开始向着九龙进发，马克光着脚就像这个城市的游侠。

从中环地铁入口的三岔门翻了进去，又在尖沙咀的出口翻了出去。简单来说就是我们逃票了，逃票的原则是有座位也不坐。我曾因为逃票和阿豪有过几次争执，我觉得享受服务就应该付费。阿豪说香港的地铁实在太贵了，而且一直都在垄断涨价，香港市民几番抗议游行，港铁公司依然没有表态，现在只有非暴力不合作了。绕过几条街道，从安全出口进入一座商厦的地库。避开巡逻的保安，溜进了停车位旁的垃圾房。一边望风，一边在灰暗的灯光中翻寻哪个垃圾框里有新鲜食物。之前马克被抓住过一次，保安警告他垃圾也是财产，也是受保护，这样做是违法的。我只能说，尽情的去保护垃圾吧。

垃圾房里堆积如山，都是楼上商场里丢出来的东西。终于找到了超市的那几筐，果汁和豆浆还是冰的，面包和香肠都还没有过期，寿司也是今天卖剩下的，一切都充满了社会良心。一个小时前这些食物还在柜台上摆放，只是明天再开门的时候就不能销售，不必担心它们是否已经腐败过期有食品安全问题。如果是在内地，商家只需更改生产日期，垃圾摇身一变成为财产。特此向香港商人致敬，虽然很多吃物已经在丢出来之前被故意糟蹋一番。

看着那背不走的还躺在垃圾堆里的食物，心里甚是不安。这个社会每天都在浪费和过度消耗，从餐桌上的剩饭剩菜到商场里的专柜。所造成的环境破坏被我们忽略并承受着，我们经常会抱怨，就像北京的雾霾，但我们从来不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埋怨工厂，埋怨政府治理，但一切的根本在我们每一个参与地球生活的人。从自己做起，做一个简朴的人，简朴并不是去受穷受苦，而是一种生活态度。

我不知道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我只知道什么是年轻人应该做的事。

装满了几个编织袋的食物，扛出地库。路过奢侈品店，路过快餐厅，路过眼神惊愕的路人，背向尖沙咀的露宿者中心，他们铺着纸板睡在路旁，睡在街头，有男人有女人，有老头有小孩，有大陆人有外国人。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他们就是没有家，也吃不饱饭。或许是因为他们不努力，或许是命运不公平。望着他们在接过食物的那一刻，所露出的渴望眼神，这一切已经不重要了。我愿意去承担和面对偷垃圾的罪名，去平衡这个社会的资源。

每次派发完，除了留给自己那一部分，仍会有所剩余。我们继续将其背回“占领中环”，整齐地摆在靠近马路的桌子上。写下一行大字：一切免费，饿了就食。

拎着豆浆在体育场的更衣间洗完澡，浑身清爽。顺路在街心广场灌了两桶饮用水，穿着背心裤衩穿梭在西装革履间。已经习惯了街头的生活场景，没有了第一天钻出帐篷时的虚伪。阿豪终于在十二点醒来，他有起床气，一般没什么火急火燎的事，大家都不会打扰他休息。马克在我醒来时已没有踪影，他白天行踪诡秘，或许超人还有另一面。

“等会带你吃个印度大餐，然后去找马克，他会请我们看一场电影。”阿豪一边拿着牙刷在嘴里干呕，一边坏笑地对我说。

“你请我吃大餐？还是印度大餐！不是说好不花钱的香港生活吗？不会是要逃单吧！”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在香港岛密不透风的楼林里走的晕头转向。二十分钟后终于到达了一处低矮的建筑前，白色讲究的门牌上写着锡克庙。走进蓝色的大铁门，这里就是阿豪要带我吃印度大餐的地方，原来是吃斋饭。在走廊的一块方格子里找了两条稍微帅气的方巾，绑在头上。在洗脚池前脱了鞋子，冲刷干净。打了一杯香甜的奶茶，光脚走进一旁的食堂。坐在蓝色花边的地毯上，几位大胡子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似乎在说：“小子，来蹭饭的吧，这里属于有信仰的人。”

阿豪递给我一张餐盘，摆在我身前的地板上，示意我举起双手像乞讨一样。不一会儿，一位拎着一箩筐印度大饼和菜糊的老人走了过来，听不清是咖喱味英语还是印度土著语，我只是用诚恳的目光不停地点头说谢谢。他向我的餐盘里舀了两勺掺杂着肉末的绿色菜糊，并朝我的手里丢了一张大饼，丢得非常精准和有力度，就像我给路边乞者丢硬币一样。跟着走来一个胖子，在我的菜糊上盖了一勺米饭。他问我还要不要加一勺，我以为是问够不够，我点了点头说着谢谢。他便朝着我的菜糊里又丢了一大勺米饭，可以肯定他再来半勺整个盘子都会溢出来。阿豪在一旁不停地笑：“你要这么多吃得完吗？在这里浪费是要受鞭刑的。”

“不会是认真的吧？用餐时间有没有限制。”

“没有，不过会错过下午的电影。”

一瞬间，飘香的大饼和菜糊被两勺米饭给毁了。毕竟在有限的肠胃面前，再好的美味也会随着量的增加变成糟粕。对于这种场景，要么想办法浪费得体面些，要么继续学外语。

腆着已经有些下垂的肚子，前往旺角的影城与马克碰头。他没有手机，只有一块手表，所以约定必须守时，地点必须明确。如果没有提前预约，想找他只能靠偶遇。

看见他时，正散着头发在楼梯的台阶上看书。他合上书，扎起辫子，从背包里掏出一双拖鞋，说：“等会我们要看一部3D电影，我有眼镜，但是你们没有。不过没关系，我会给你们借两副。”我有些奇怪，对阿豪说：“电影院是会给观众发眼镜的。”

“对，走正门会发，只是我们不从正门进。”

马克走进了影院二楼的电器城，他穿鞋是为了不被商城的工作人员围观。在一处3D电视的货柜前观望踩点，货柜旁边有一盒试看的3D眼镜。我和阿豪上前帮忙将店员支开，马克见机行事。就这样在慌张与镇定间“借”走了两幅眼镜，看完电影会再完好地还回来。

突然有种不详的预感，总感觉下一秒就会被这两个疯子害得遣返，永不能踏入香港一步。我还是非常热爱香港和香港人民的。不过看在马克为了帮我借眼镜竟然穿上了鞋的份上，我也愿意打破下自己的原则，一起逃票看电影，替电影院减少空座的浪费。愿意为朋友牺牲自己原则的人，才是真性情的朋友，我很尊敬他。

在香港很多故事的发生，都在这被人忽视的安全通道。又一次溜进了商场的安全通道，黑暗与寂静营造着恐怖和紧张的气氛，顺着楼梯爬到了影院的那层。马克轻轻地推开安全门，把放映室侧门厚厚的帘布垂下，避免楼道的光线传进放映室里。在帘布背后打开放映室的侧门，像一个刚去完洗手间的观众一样，从容地进去寻找席位。

戴着让人眩晕的红蓝镜片，抱着随时都会被遣返的紧张心态，看着惊悚重口味的《普罗米修斯》，尽量克制住自己酸胀的胃不要吐出来。

看完电影马克脱了鞋又消失了。阿豪从背包里掏出一个人面具套在头上，引起路人不断地回头。总觉得这些人也会顺便望我一眼，毕竟他是我的朋友。于是我刻意与阿豪保持着距离，不断地默念：“我不认识他。”我的闪躲更加刺激了阿豪的兴趣，于是不停地往我身边靠近。我一直躲进了地铁里，在拥挤中终于没有空地可躲。

“你为什么要求别人把头套摘下来，而不把自己的脸面摘下来。”

“你没看见这些人都在围观我们吗？还不停地拍照。”

“他们拍照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太平淡，太规矩了，这一点新奇的东西就能让他们发一条微博。你旅行这一路受到的这样的围观和拍照还少吗？”

“两种被拍照的感觉不同。”说完我一把抢过阿豪头上的面具，塞进背包。阿豪已经被面具憋的面颊通红，说：“你这样不行，得慢慢改变自己。”他又收回面具套在头上：“你再抢我的面具我就报警了，我今天非得让你放开一些。”

回到中环，见行人不多，我套上了面具站在路边。有些掩耳盗铃的感觉，别人看不到我的脸。我的脸能证明我是谁？还是外人看着面具上的两个空洞，就能缓冲这种四目相视？我也觉得自己在先前生活中披上了太多的外衣，像面子也像面具，帮我不停地加剧或者缓冲着各种正视。旅行一路而来，我都在努力打破自己，面对自我，去丢掉这些枷锁。

阿豪把一张红布铺在地上，拿出一杯白色的颜料和刷子。又找来一根粉笔递给我：“帮我在上面描出‘流浪’两个字的空心体。”

“你又要搞游行吗？”我边写边问他。

“明天晚上你在这的分享会，主题就定为流浪吧。随便谈谈，反正也没多少人。”

当时也正为分享会这件事情所烦恼。我面对不了自己成为一次谈话的中心，尤其是面对思想前卫的香港人民。我怕我会变得失声，声带萎缩，上学时回答问题都会面部发烫。现在也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让发烫的面部更加发烫，直到把大脑烙干，像核桃仁一样；要么把这些热量变成一种散发出去的能量，去辐射他们，感染他们。如果这样的辐射可以给人带来癌症，我希望他们把我说的话摔得粉碎，同时我会送给他们一副面具。

他用刷子浓浓地填充，晾干后用两根竹竿撑起来绑在桌腿上。看着高举的红布，展开在香港的金融中心。我要占领这里，虽然没有多少路人理我，或者我的脸上已经写满了流浪。

夜里感觉自己需要一点空间的时候，都会选择在维港吹海风，人越多的地方越能隐藏自己。看着水面趴满的船只，看着姑娘动人的容颜，看着高耸入云的楼房像灯塔。又仿佛这里充斥着灯塔，是否看到的就是真的光明，有时候光线太强烈反而会让人什么都看不清楚。

从维港遛弯回来的时候，马克也背着一大袋食物回来了。帮他把面包和豆浆摆好。马克不抽烟也不喝酒，他每次看见我端着酒瓶子的时候都会说喝酒会坏了人的思维，会让人不理智。

我要占领这里，虽然没有多少路人理我，或者我的脸上已经写满了流浪。

他不知从哪里推来一辆带前杆的黑色自行车。他脱掉汗浸的上衣，蹬着在汇丰银行绕了几圈。看样子他很喜欢下坡冲刺的感觉，同时他那及腰的金发也会像漫画里一样飘荡。我不假思索地脱掉上衣，带上面具，跳上后座。

凌晨两点的港岛街区已经没有了多少车辆，也没有了执勤的警察，一下把香港的味道拉回到八十年代的港片中。这辆自行车必须要有自己的名字，就像舰艇的番号一样威武，叫逆流号，或者叫疯子号，都不行，太过奔放；叫听风者号，或者叫流浪者号，也不行，太过文艺；那就叫狗蛋号吧，用我的乳名来命名它，因为它看起来和我一般年纪，也像我一样从乡村来到都市里撒野。狗蛋号驶过教堂，驶过24小时的便利店，驶过电车轨线，驶过关了门的地铁站，驶过立法会，它一定喜欢这种被赋予新生命的感觉。

受够了蒸锅一样的帐篷，我捡了两张纸板铺在帐篷外面，但汽车飞奔中摩擦路面的声音依然让人难眠。马克走过来，示意我躺在他的小木板床上，他睡我的纸板。我说不必了，睡大街就要睡得彻底。执拗不过马克，他非说我是客人，自己已经睡惯了纸板。我被如此礼遇感动到更加无眠。迷迷糊糊中我问马克，你在路上寻找什么。他说不知道。

不知道自己被围观了多久，睁开眼时已经晌午。严肃有序的路人疾步穿行，头顶电梯给我投下角度变换的目光，唯有流浪的大旗岿然不动。

阿豪去教游泳课了，带着伤腿去挣后半年的旅行经费。马克依然坐在书架前看书，每个专注者的内心都有一个宇宙，他只是在默默构建那里庞大丰富的体系。那个宇宙与他不是用黑洞来勾连通融，而是用意念去维系。他可以在困惑的时候，在里面找到对话的智者；可以在受伤的时候，去躲在里面疗养；在看到内心宇宙不断扩张和突破时，会一个人傻乐，却很难变成语言去传达给别人。所以很多专注的人，在别人眼里都是疯子。

马克问我今天有什么计划，我说晚上有个分享会，待会可能会去图书馆静一静理思路。他说太好了，正好他也要去那里。他摘了眼睛，拎了几块面包，跟我走去锡克庙吃午餐。我问他带面包做什么，他说：“去看望一位老朋友，等会你就知道了。”

发现又热又饿和又冷又饿同样让人煎熬。路面和钢筋水泥的灼热，商场让汗液瞬间凝干的冷气，这种交替让人不禁有些生理紊乱。皇后大道东绿化带旁的石阶上，坐了一位身形佝偻的残疾老人，他眼神不好也有些神志不清，身旁堆了一些拾来的瓶子和编织袋，还有似乎是昨晚躺着睡觉的纸皮。马克把拎着的面包递给老人，老人接过没有与我们进行眼神交流，依然坐在那儿捏瓶子。马克说这些人都是他的朋友，他熟悉睡在街头的人群。

我们都是同龄人，但他神情里所透露的坚定谦和与生存的智慧，让我不得不对他再次心存敬佩。他总是不去过多言语，避而不谈自己在美国的家庭，也看不出七情六欲。至少在香港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也没有人熟悉他的过去。他的行为让人启迪，

随时都会触动我，他也随时都会在我的视野里消失。他好似放下了原有的一切，没有物欲，没有浮躁，没有面子，没有伪善；又拾起了一个在我们看起来沉重的世界另一面，这一面是我们不断逃避的。正如昨天逃票去看的电影所示，人类一直在研究自己的根源，有人说上帝创造，有人说自然进化，有人说外星人带来的；人类一样在研究自己的归程，有人说去了天堂，有人说死了就是死了，埋了等腐烂或者烧成灰烬，有人说生命还会轮回。我觉得人类更应该研究活在当下的生活，研究街头的露宿者，研究浪费的食物，研究扭曲的规则，研究呆滞的思维，研究生活的发散，研究前行道路的狭窄。其实不去研究只因没有勇气去面对，因为当下的生活要比生与死还要恐怖，研究和改变会触及到利益、流血、责难、灵魂。

又一次走进锡克庙，马克吃的并不多，只是一小勺的米饭和一点菜糊，大概是我吃的一半。看着他瘦弱的身形，我问他吃这么少不饿吗。他说了一句我非常认同的话：“人只有在饿着的时候才会思考很多东西，吃得太饱会让人懒惰。”

“对。就像人经历穷困时，才会更懂得关心和融入这个世界，更明白一些与生命有关的东西。年轻时的富有常常会让人忘了自己是谁。”我们很多人总是面对不了年轻时的贫穷，会用物质作为评判周遭环境与人群的标准，去衡量自己的计划和行为。有的人也会抱怨出生的年代和家庭造成了他没有车没有房。其实自己的贫困与他人无关，与物质生活无关，与教育程度无关；与非理性羡慕有关，与丧失争取的勇气有关，与惯性思维的引导有关。饥饿和贫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被它们冲昏了头，给自己行为准则上贴了很多的限制标签，最终被这些标签羁绊成牢笼里的奴隶。标签里那些“没钱就不能去幻想”的暗示，只不过是一种类似于自宫的术语，让其一生软绵绵地妥协和装腔作势。

马克把餐盘直接带入后厨，站在餐盘回收处的窗口前帮忙清理残羹。我也走进厨房，在水里清洁餐盘。半个小时的工作，让我觉得这顿饭是我应得的，没有了来蹭饭的感觉。坐在院子里黑色的长凳上喝茶看书，享受午后片刻的安宁。

马克没有从正门走进图书馆，而是进了地下一层的展览厅，从展厅旁的员工通道进入电梯，上去了阅览室。因为他不穿鞋，工作人员不让他从大门进入。他算是一个规范社会中的衣冠不整者，所以没有给他进入图书馆的资格。其实，穿不穿鞋属于个人选择。我们的规范正欲创造出更多的机器人，这些场所是给机器人充电和拷贝信息用的；如果不是，那么这些规范就是在筛选一些呆滞的人，然后划分为三六九等继续传承筛选；如果还不是，那么这些规范就是一些人在审美上追求统一标准，给他们营造一个简单整齐的生存空间；如果还不是，那么这些规范还真是够无聊，坚守执行这些规范的人真够反人类。

中央图书馆的窗外是静静的维港东段，我拿着本子坐在窗前，思考着几个小时后的分享会。觉得旅程并没有什么值得去提，那就分享下内心的迷茫，或许会从听众那里找到答案。

回到中环，在公厕里洗了把脸。在镜子中对自己挤了一个笑脸，为什么依然生硬的如此难看？难道我真的不会笑还是面部肌肉拼接的有些意外。我告诉自己演讲的时候尽量避免笑，或者干脆带上面具。不是因为严肃是一种美，只是避免笑容中的不美。

离分享会的开始还有半个小时，“占领中环”的现场还只是我自己。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顶着蘑菇头，穿着简洁的黑色连衣裙，在“占领中环”外不停的踱步，时而往我这边张望。很像那些年我曾追过的女孩，如果她是我的听众，就算只有其一人我也不会失落，分享会就会真切的变成了一场聊天，或者是将内心迷茫的倾诉。不论她会不会给我答案，一切的场景都会充满治愈系。她果真走向了我并对我说了一句粤语，我笑了笑说我是内地人，她用并不娴熟的普通话：“那今晚在这里举行分享会的人就是你，你是那个大陆的旅行者？”

“是的。”我没有被瞬间治愈，反而更紧张起来，请她坐在沙发等候。

开场前的一刻钟，陆陆续续到了二十人左右，阿豪也撒着拖鞋戴着墨镜下课归来。我把阿豪叫到一旁说：“分享会结束后的筹款还是不要搞了吧，会很破坏气氛，而且我也会觉得尴尬。”阿豪问我：“你为什么会有尴尬？如果你遇见一个去远行的人，你会给他一些支持吗？”我说我会。阿豪说：“那就对了，你还是放不下面子。大家给你就收下，这是你旅行需要的，而且你也给他们带来了旅行故事，是你的劳动所得。”我说：“这些道理都懂，就是做出来很困难。如果你觉得这是必需的环节，那请你帮我来主持。”在后来的旅程中，我又有过两场正式的演讲，但筹款问题依然是让我和

阿豪有所分歧。

我觉得人类更应该研究活在当下的生活，研究街头的露宿者，研究浪费的食物，研究扭曲的规则

时间到了，今天我要面对这二十几人进行我人生中的第一场分享会。听众大都是学生，也没有旅行经验，看来也不会有人排解我的迷茫。今天的分享会，只能变成一场旅游技巧的分享了。因为他们这个年龄段的迷茫无非两种，有钱没时间和有时间没钱；剩下的都是一大堆悲观的问题，如何获得父母支持，有没有坏人，遇到危险怎么办。

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我扫了一眼下午在图书馆写的开场讲稿，突然间除了喉咙沙哑，还有些耳鸣，被自己这没有见过世面的生理反应折服。为了考虑香港同胞的普通话水平，我故意将语调放慢。“一切都在瞬息万变，时代的主题只不过是暂时的聒噪，热闹纷扰过后，人依然会思考最质朴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而活着。出来旅行是我想去寻找答案的方式，我却在寻找的过程中变得更加迷茫。每天都有很多人在路上，也许他们在意的是风景，或是看风景的心情。其实这个真实的世界有更多的面等着我们去感悟，去发现，去理解，去沟通，让内心历练。”我有一种被自己恶心到的感觉，实在说不下去了。这个场景有些像电影《顽主》里的葛优与美萍的对话，葛优脱口而出与其聊人生哲理，聊尼采，聊弗洛伊德。美萍听得沉醉，对葛优说：“突然发现你特深沉，你平时肯定特爱思考吧。”

如果我再继续这样装着调子下去，他们肯定不会在这场分享会中有所收获，一切都只会停留在那种“特爱思考”的印象。我必须在营造完哲理的气氛后，将主题拉回他们渴求听到的旅行故事。于是我将自己从旅行前的祈盼和煎熬，讲到旅行时的精彩与疯狂，又讲回到现在的迷茫和不安，将整个心路历程和值得一提的故事与他们分享。多希望突然有人站出来，像知己或者导师一样，给我一个肯定的方向。但最终听到的依然是那些悲观的问题。

两个小时的分享会结束了。阿豪做了简明的总结，拿起一本书说：“如果大家想支持一下他的旅行，可以捐一些钱来让他走得更远。我现在和周峰去吃饭，有意愿的可以把钱夹在这本书里。黑色连衣裙的姑娘给了我 20 港币，我便将那纸币夹进书里，当作书签。

在一家潮汕餐馆里，叫了两瓶啤酒。阿豪对酒精过敏，不过今天还是陪我喝了一杯。阿豪说：“这些天的香港之行一定给了你不一样的感受。我这里有一千块钱，你必须收下，算是我对你的支持。不过你不要有压力，这一千块钱是我上次旅行回来骗的保险金。我旅行前在香港买了旅游保险，回来时在内地派出所开了证明说我的东西被偷了。我已经把保险金的一半捐给了别人，现在再拿出一千块来支持你，加油！这顿饭算是给你送别了，反正你后天就要离开。我明天要去上游泳课，所以你就自己活动吧，放松一天。”

“真的很幸运，结识了你和马克，在香港的每天都在奇遇。”突然气氛变得煽情起来。

大概凌晨三四点的光景，众流浪汉已归来，刮起了凉飕飕的风，塑料瓶子在地上啷啷的滚动。我光着膀子枕着衣裤沉浸在睡梦里，马克突然把我摇醒，问我要照相机。弄不清状况就指了下帐篷里的背包，让他自己取。

他说有几个保安在我们的帐篷边打探，把我们的东西搬来搬去，还用警戒线把展览区围了几个圈。我一屁股坐起来，心想不会是来半夜清场或毁尸灭迹的吧。穿上衣服，看个究竟。马克拿着相机戴着面具在一旁录像，与保安保持着一米的距离，不上前也不离开。

“干嘛呢，怎么乱搬这里的东西？”我实在憋不住，就算看热闹也要明白个究竟，好在明天告诉 ** 成员。

“要刮大风了，来检查这里有没有易刮走吹翻的危险品，帮忙收好。”一位制服笔挺的警员望了望我，又严肃地离开了。

看来在香港睡大街都是受保护的，不由肃然起敬。风果然越来越大还飘起了雨丝，我重新钻回了帐篷。略微地呼吸到了一丝被保护而不是被管理的自由。

次日醒来拉开帐篷的那一刻，完全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帐篷外密密麻麻挤满了人，连我们摆的沙发和桌子都被人霸占了，不禁怀疑这又是要搞什么非法集会。更要命的是集会者全都是女人，穿了多款统一制服的东南亚裔女人。坐着或站着一堆一堆

的聊天吃东西，气氛格外热烈。看似有组织没纪律，但也乱中有序。我迅速拉起帐篷，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拎着豆浆去体育场洗澡，这一路没有了匆忙的上班者，依然全都是女人。我是不是还在梦里没有醒，常走的公园小径也散座着谈话的女人。感觉完全是有人在戏弄我，会不会是大家都中了巫术。下雨后，她们钻进了商场和桥下。

终于在更衣室里看到了马克，解开了我的一脸惊愕。原来周末是香港的社团和组织的活动日，香港人几乎都有自己的社会团体或宗教团体，团体也都有自己的活动中心，所以很少看见走在街头。菲佣和印尼佣也都在今天休息，但是这些佣人没有自己的活动场所，没有家也没有钱去酒吧或者咖啡厅去坐一天，所以只能在大街上与朋友相聚。她们也分了不同的小组，穿着各自统一的服装相互在街头辨识，带着吃物，铺起桌布，席地聊天或玩游戏。

洗完澡装着雨伞和相机去往大屿山，我要奔向那里长长的沙滩。我深深地爱上了香港的云朵和海湾的痕迹。这里是香港本土居民也很少来的地方，很多老外在这里居住、冲浪。这里也是阿豪曾经当救生员的地方，他盯着这片海看了八年，都看吐了。

从海边回来时，聚集的人群已经散去。有三位大概是醉了酒，哭笑着坐在地上聊天，时而尖叫。福建大叔还在看他的歌词本，他也是一位住在这里流浪汉。他曾经在东南亚做了多年生意，后来被人骗得血本无归，没有脸面回去。他总是穿着一身火箭队的篮球队服，每天醒来后就去街上唱歌唱到傍晚，然后骑着自行车去篮球场打球，一直到球场关门才回来。他有一个神奇的歌本，总会琢磨到天亮，有他喜欢唱的歌的歌谱，也有他自己写的歌。他的梦想是当一名歌唱家，他听说我来自山西，给我唱了一首《人说山西好风光》。

一位蒙古壮士，坐在桌子旁看着福建哥，光着膀子喝酒打节拍。他是第一次来到这里，但是语言不通，不会说英语也不会说普通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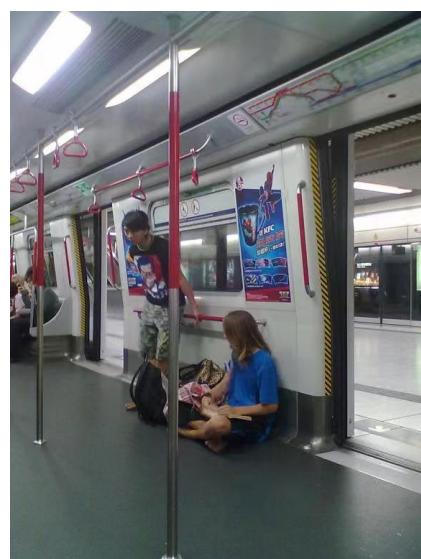
络腮胡的巴黎小伙也是第一次来，他来香港出差，多次经过，今天终于鼓起勇气和我们坐在一起聊天。

会讲粤语的英国腔青年抱着吉他在一旁哼唱，他已经在香港混迹多年，出没于街头和酒吧。他是在路过时，被这里的气氛感染。

大家吃着马克刚捡回的面包和香肠，没有统一的语言，只有手上的乐器。蒙古人敲着手鼓，英国腔弹着吉他，我们用不同的语言合唱着《国际歌》。

大家最敏感的时候，就是蒙古壮士酒瓶空了的时候。因为巴黎小伙总是劝他不要再喝酒，他便举起拳头对着巴黎小伙。他带来的酒喝完了，丢给巴黎小伙一百块钱，指着瓶子，让他去买酒，似乎认准了这个软柿子。蒙古国虽然在国际上没什么地位，但是人民都充满了骨气，继承了战斗民族的大拳头，可能与酒精有关。蒙古哥一不开心就举起拳头想揍那巴黎小伙，最后小伙只好认怂，不停地来回跑腿给他买酒。

我已近乎把这里当成了家。离别那天，马克夹了本书，说要送我一截。我问他下一站去哪里，他说印度。我问什么时候，他说等找到一艘去印度的货船，他想搭便船。曾有人提出给他买一张船票，被他拒绝了，他一直坚持着不花钱的信条两年了。



阿峰和马克

马克从来都是夹着一本书，有时间就拿起来读。我也背着书，但却没有这种精神，所以我在他这里学到了。我们都是在这个世界上成长着的年轻人，都有着各自的社
会责任和使命，虽然现在都以这种流浪的方式飘在这个世界的不同角落，但内心的
诉求，很少人会读懂，大都成了穿梭在空气中的过客。

我跑进便利店买了一大桶可乐递给马克，希望他可以感受到家乡的味道。留下我的
邮箱和家庭住址，告诉他保持联系。他说中国是去不了了，曾经因为签证过期在
内地滞留，被关进拘留所里审查数日，而后被驱逐出境才来到了香港。也因为同样
的问题被日本驱逐出境，不能踏入，他说监狱里的日子很特别，不愁吃穿也可以静
下心来读很多书。

这次告别似乎成了我与马克的永别，因为在这半个月之后阿豪给我发来信息，马克被香港警察带进了监狱，可能是偷窃垃圾也可能是签证过期。马克在监狱里拒绝
会见任何人，变得更加神秘。再后来有人在街头看见过马克，他依然没有穿鞋。也许现在他已经乘船去了印度继续流浪，也许他被遣返回美国见到了家人。

我想对他说，世界大同是人类文明向前不可阻挡的趋势。迟早有一天，我们可以
自由的来往地球的每个角落，没有了政治集团划分的国家界限，没有驱逐出境，没
有永不能踏入。



阿峰

89 年，“行者的理想”行动主理人。行者的理
想源于 2012 年的间隔年旅行，2013 年是一
场街头分享会，2015 年是一本册子，2017 到
2022 年是一家青旅和青年空间，2022 年底至
今是一辆游动面包车。

生活亲历者

如果我们相信他人的存在，如果我们关心，那
么我们写下的就有了意义。这是一个非虚构栏
目，讲述亲历者的生活，但这生活里折射的往
往不只是亲历者一个人。



题图为电影《黎明之前》(2016)剧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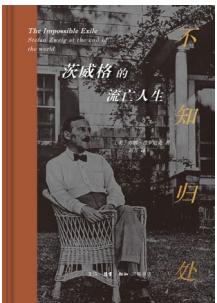
非虚构

茨威格的流亡岁月： 遍历世界，却不知归处

乔治·普罗尼克 | 新书试读

“我们都只是幽灵——或记忆而已。”

《不知归处：茨威格的流亡人生》一书聚焦茨威格晚年的流亡岁月，通过茨威格与家人、友人的往来书信和关于他的诸多传记、文章等一手资料，发掘他的生活日常、精神脉络和行为逻辑，探究他丧失故土、母语、文化参照、朋友、书籍和希望之后，陌生的世界在他眼中呈现的景象和这景象对他的冲击，并试图循此探寻这位著名作家自杀的动机。经出版社授权，我们摘选了前言部分，分享给读者。



[点击链接购买本书](#)

1941年11月某天临近中午时，斯蒂芬·茨威格从一张窄窄的铁床上醒来，另一张铁床上睡着他的妻子洛特（Lotte）。他从玻璃杯里取出假牙，穿上皱巴巴的长裤和衬衫。一群马从他寓所旁的石路上橐橐地走过，栖在树冠上的鸟儿们尖声叫着，几只虫子悄悄爬过他的皮肤。这位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文学名人、人道主义者，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托马斯·曼、赫尔曼·黑塞及阿尔图罗·托斯卡

尼尼均是挚友，来自维也纳，习惯用紫墨水写作，总是穿燕尾服出游，还没过60岁生日。

点燃今天的第一支雪茄，他走出散发着霉味的小木屋，沿绣球花杂生的陡峭台阶而下，穿过马路，走进优雅咖啡馆（Café Elegante）。在那里，他坐在一群黑皮肤的骡夫中间，花了半便士享用美味的咖啡，和同他合得来的老板练习葡萄牙语。这并非易事，因为他的西班牙语总是跳出来碍事。之后，他又重新登上那些台阶，在兼作客厅的游廊里坐着工作好几个小时，时不时抬起头，越过棕榈树翠绿色的扇形叶子望向壮美的马尔山脉。比他小27岁，曾做过他秘书的洛特，就在不远处校正他那部关于国际象棋的短篇小说，女仆正在室内努力对付冒烟的炉子。

在用过鸡肉、米饭和豆子做成的“原始”的午餐后，茨威格和洛特按照一本国际象棋大师的棋谱下了一局。棋局结束之后，他们进行了一次漫长的散步。此时他们居住在里约热内卢上方山中的一个名叫彼得罗波利斯（Petrópolis）的小镇。他们沿着小镇主街漫步，然后转向一条古老的小径，来到一处风景如画的丛林，在欣赏了遍地的野花和潺潺流水后，又回到小木屋继续工作，写信回信。茨威格当时正阅读从地下室发现的一本蒙尘的蒙田著作，并认真做了笔记（他写道：“在使我们……和平、独立、天赋的权利，被一小撮偏激分子和意识形态的狂热牺牲掉的那样一些历史时代里，对一个不愿为这样的时代而丧失自己人性的人来说，一切一切的问题都归结为一个唯一的问题，那就是：我怎样保持住我自己的自由？”），继而入睡。如此这般，日复一日，月复一月。

但在今天，这种令人绝难相信的处境击败了他。在写给洛特家人的一封信里，茨威格表达了自己的惊异：“我不敢相信，在60岁这年，我会身处巴西一个小山村，身边围绕的只有一个光脚的黑人女仆，同往日生活中的那些书籍、音乐会、朋友和交谈相隔万里。他留在奥地利的所有财产，位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家族纺织行业的股份，在1934年第一次流亡时设法带到英国的部分家产，他早已权当尽失丢了。他穷尽一生，费尽心血收集的大批名人手稿和音乐曲谱散落在世界各地。在写给居住在伦敦的嫂子的信中，他再次强调：“我最迫切的愿望是，你能让所有我们留下的东西物尽其用……这就算帮了我大忙。对那些今生无缘再见的东西，我也会少些遗憾。”

但这里也有一些特别的事情，尽管迄今为止他们远离了构成往昔生活的所有要素，茨威格声称，“在这里我们感到非常快乐”。这里风景异常优美，当地人民淳朴可爱，物价很低，而且生活多姿多彩。他和洛特在积攒必要的力量去面对艰难的世道——“唉，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力量。”他写道。只要想到被无法言说的苦难吞没的家园，他们的快乐就会被破坏。关于纳粹占领区日常生活的新闻，甚至比军事情况的报道更让人沮丧。茨威格担心他在巴西陶醉于和平与繁荣时，世界上其他地方成千上万的人正在挨饿。巴西对欧洲爆发的自我毁灭的战争免疫，这在其当权者中引发了一种新的国家主义，他们开始幻想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去左右战局。幸好善良的巴西人民一直未变。“我们希望能给你寄一些当地非常便宜的巧克力或咖啡和糖，”他写道，“但一直找不到机会。”

隐居在郁郁葱葱的彼得罗波利斯的茨威格写道，欧洲如今的困境是远超巴西当地人想象的，就像中国之前的困境对他这样的欧洲人来说无法理解一样，既认为不可能，又一直放不下。为什么这个享誉世界文坛的作家，这个为自己的文学成就骄傲，更为能够团结起欧洲文学界和艺术界而自豪的人会蛰居在贡萨尔维斯·迪亚斯街34号，过着他自称为修士般的生活？但也正是这种距离，这种茨威格向他的出版商描述为“完全与世隔绝”的巴西避难时光，使他保持了自由。在这段时间里，他完成了自传《昨日的世界》（The World of Yesterday）并“从头到尾修订”了之前的创作。彼得罗波利斯的乡村生活“似乎将奥地利翻译为一种热带的语言”，他对一位流亡同胞如是说。对茨威格而言，维也纳在黑暗中愈行愈远，但这座城市作为一个艺术乌托邦的虚构角色却愈来愈清晰。在这个意义上，他和他的老朋友约瑟夫·罗斯（Joseph Roth）有些相似。有人曾这样描述罗斯：“随着奥地利版图的不断缩小，他的奥地利爱国主义愈加强烈，这一情绪在其家乡沦陷后达到顶峰。”

驴队驮着香蕉从下面的道路经过，女仆在隔壁厨房里轻声唱歌，茨威格忍不住开始回顾自己一生中最精彩的时光。他最珍视的是1888年老城堡剧院（Burgtheater）被拆毁之前，维也纳人最后一次齐聚这座宏伟建筑时的场景，因为这证明了他生活的社会环境对审美有多么热忱。最后一场演出的帷幕刚刚落下，茨威格写道，悲伤的观众纷纷涌上舞台，只为能捡到一块舞台地板的碎片——“他们喜爱的艺术家们曾在这块地板上演出过”。多年之后，在维也纳环城大道附近许多资产阶级装饰华丽的

家里，那些碎片“被保存在精致的小盒子里，就像神圣的十字架的碎片被保存在教堂里一样”。茨威格总结道，这完全是维也纳各阶层参与的“对戏剧艺术的狂热”。此外，这种强烈的痴迷——不只欣赏，还有吹捧——也促使艺术家在创造性方面达到新的高度，他宣称，“艺术总是在其成为一件全民族生活大事的地方达到顶峰”。他从纸张上抬起头，满目皆是墨绿和金黄色的棕榈，是翠绿中掩映的山峦，是广袤的空荡荡的天空。他生命中的那些人都去了哪里，他惊讶地想。茨威格是个精于世故的人，他原以为他已听过世间所有的声音，却从未听到过如他的新家这般的寂静。

世上有一种天才，他们的独树一帜吸引着人们去探究在这些天赋异禀或邪恶之后的秘密。同时，世上还有另一种备受瞩目的人，他们虽然不是天才，却像是强效的透视镜，折射出历史上的重大时刻。

斯蒂芬·茨威格，这个富有的奥地利公民，焦虑的流亡犹太人，了不起的多产作家，不知疲倦的全欧人道主义倡导者，社交达人，无懈可击的东道主，高贵的和平主义者，平民主义的捍卫者，神经质的感觉论者，爱狗厌猫人士，书籍收藏家，总是穿鳄鱼皮皮鞋的人，衣着华丽、神情抑郁的咖啡狂热分子，世上孤独的心灵同情者，偶尔沉迷女色、时不时与男子眉目传情之人，疑似暴露狂，被定罪的谎言家，权贵的阿谀者，弱势群体的捍卫者，随着衰老开始变得怯懦，在死亡面前又成了一个坚定的禁欲主义者——斯蒂芬·茨威格身上兼具了人类社会中诱人和堕落的魅力。

他们虽然不是天才，却像是强效的透视镜，折射出历史上的重大时刻。

时至今日，茨威格的作品在欧洲依旧拥有生命力。他的中篇小说在法国经常再版，而且总是登上畅销书榜单，他的作品遍及商店的橱窗和机场的传送带。茨威格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同样受欢迎，在德国和奥地利也有大批的崇拜者。但是在英语国家里，尤其是美国，茨威格的作品在几年前却几乎绝迹。在我长大并开始接触文学的岁月中，我从没见过任何一部茨威格的著作，我的朋友中也几乎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当我了解到 20 世纪 40 年代北美的学者是如何狂热地研读茨威格之后，他的作品如今这种大面积的绝迹令我非常困惑。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茨威格如此迅速地淡出了公众的视野呢？

茨威格几乎所有的故事都在揭示战前欧洲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但他的流亡生涯让人了解到，在这种文化被翻译成新世界的风格时，是具有煽动性的。茨威格的人生阐释了在危机四伏之时艺术家的责任感这一永恒不变的命题：忠于灵感还是忠于人文关怀，政治在艺术中扮演的角色，以及艺术所发挥的教育作用。他的生平引出了人类的归属这一问题——是我们对家庭和民族的责任，还是理想的世界主义。他在写作中描绘过的形形色色的生命，他在萨尔茨堡家中“露台避难所”斑驳的树荫下曾与许多欧洲的人道主义者和艺术家交谈，这一切都使茨威格成为那个危机四伏的年代里不可或缺的催化剂和重要的桥梁。在自传《昨日的世界》的题词中，他写道：“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这句引自莎士比亚的话，在茨威格跌宕起伏的人生中有着不同的诠释。

茨威格意识到，他自己从荣耀到困窘的陷落只是欧洲所处的巨大困境的一斑。他在《昨日的世界》的序言中曾这样宣称：“从未有过像我们这样一代人的道德会从如此高的精神文明堕落到如此低下的地步。”但即使是这种共通的悲剧也无法缓解此般堕落对他造成的冲击。自从被从欧洲文艺界的“奥林匹斯”驱逐至后来凄惨流浪的几年中，他从未停止过诧异和震惊。“由于我脱离了所有的根系，甚至脱离了滋养这些根系的土地——所以像我这样的人在任何时代都真的非常少见。他这种时不时源自‘庄严不复’想象的呼号，总带有些殉难者的意味。

1941 年夏，在由美国奔赴巴西的前几天，茨威格写下了这些序言。当时他住在纽约州的奥西宁（Ossining），他正是在这里完成了自传的初稿。如果说他在彼得罗波利斯的家是偏僻、荒凉的，那么这所位于哈得孙河镇，距新新监狱（Sing Sing）一英里（约合 1.6 千米）之遥的住宅则是窘迫和孤独的。洛特在给远在英国的家人的信中这样写道：“在奥西宁根本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也没有什么美丽的风光可以去欣赏。”事实上，当地唯一据说著名的地方就是新新监狱，洛特写道，“但每个人都试图忘掉这点”。茨威格的朋友朱尔·罗曼（Jules Romains），欧洲笔会的主席，曾对这个他称为“阴森的郊区”的住宅提出过质疑，他担心这样的住宅可能会令茨威格更加消沉。

在 7 月的一个下午，茨威格第一任妻子与前夫的女儿苏斯·温特尼茨（Suse Winternitz）在拉马波路（Ramapo Road）7 号住宅的草坪上为他拍了一系列照片。

他坐在一把藤椅上，平时一样，衣着整洁，一丝不苟：柔软的浅色长裤，白色的衬衫和波尔卡圆点的领结。虽然已经 59 岁，但他修剪整洁的胡须和从额头向后梳的头发依旧漆黑，双眼深邃，只有眼角的鱼尾纹和严重的眼袋显露出他的实际年龄。他身子前倾，翘着右腿，可能正倾向对话者。在那天拍摄的照片之中，茨威格在其中一张里姿态紧绷，表明他刚刚听到什么感兴趣的事情。另一张里，气氛放松下来，但他看起来却仿佛是世界上最悲伤的人。在这两张照片中，他的目光都透露出一种凝重。人们经常赞赏茨威格像鸟一般优雅的社交礼仪，但在这些照片之中，鸟儿却一头撞到它误以为是天空的玻璃上。

在自传中，他察觉到“在我的昨日和今天之间，在我的青云直上和式微衰落之间是如此不同，以致我有时仿佛感到我一生所度过的生活并不仅仅是一种，而是完全不同得好几种”。他被迫“像罪犯一样”离开了“国际化大都市”维也纳，他在那里长大成人，备受青睐，汲取文化养料，成为咖啡馆聚会的贵宾。茨威格在流亡美国期间经历的戏剧般的绝境，对每个见过他的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并触目惊心的。1941 年 7 月阳光灿烂的一天，克劳斯·曼（Klaus Mann）在纽约第五大道遇见了他。一直仰慕茨威格的曼发现这个曾被他称为“不知疲倦发挥天赋的人”看起来与往常迥异——不修边幅且神情恍惚。茨威格在黑暗的思绪中迷失得如此之深，以致他根本没注意到曼的接近。直到被打招呼的时候，茨威格才“像一个听到自己名字的梦游者”一样惊醒过来，突然变回人们熟悉的那个优雅的世界主义者。尽管如此，曼仍然无法忘却第一眼看到茨威格时他那荒凉的眼神。几周后，流亡的剧作家卡尔·楚克迈耶（Carl Zuckmayer）和茨威格一起用了晚餐。茨威格问他，继续像个影子一样活着，到底还有什么意义。“我们都只是幽灵——或记忆而已。”茨威格总结道。

最重要的是，茨威格明白流亡从不会是一个静止的状态，而是一个过程。“你才刚开始流亡生活，”他在 1940 年曾对安德烈·莫洛亚（André Maurois）这样说，“你会看到世界是如何一点点地抗拒这种流亡的。”那时，茨威格已经在欧洲来回游历了很长时间。他向一个朋友概括自己当时的处境：“前作家，现为签证专家。”他们从 1940 年 3 月到 1941 年 8 月底离开奥西宁为止，带有日期、印章、签字和手写号码的领事图章，还有入境信息极其详细的登记记录和有效期，都被记录在茨威格的英国护照上。满满 19 页既稠密又神秘的记录，仿佛是《天方夜谭》（The Arabian Nights）里刻着玄妙咒语的护身符。

怎样才算得上好的流亡？流亡者的生存概率是由其内心的刚毅程度、思想的开放程度以及外界的支持组成的方程式决定的吗？为什么托马斯·曼、卡尔·楚克迈耶以及茨威格的指挥家朋友布鲁诺·瓦尔特（Bruno Walter）可以在美国大放异彩，而茨威格、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和剧作家恩斯特·托勒尔（Ernst Toller）却在新大陆的各种遭遇面前选择了退缩？戈培尔（Goebbels）曾经嘲笑这些流亡的作家，把他们称为“行尸走肉”。这轻蔑的称呼一针见血地点明了流亡者心中巨大的恐惧，茨威格就曾被这种恐惧折磨：这种将驱逐、分离视为永别的恐惧。这对欧洲社会来说全然的恐惧，在新世界的海岸边又再次出现。

“二战”期间，移居国外的艺术家和学者数量庞大得惊人，有历史学家把此种情形同拜占庭帝国陨落后希腊学者的逃离相提并论。茨威格的美国历程，通过这个新世界各地的酒店一连串的房间，从一个不名之地到另一个不名之地间成百上千的车站，折射出 20 世纪 40 年代欧洲支离破碎的思想的停滞。所有的大堂和咖啡馆里都挤满了流亡者，他们穿着宽松的裤子和笨重的大衣，彼此用母语低声抱怨。在从那个地狱般的政府机构弄到证件、工作及工作证明前，他们就居住在偏离市中心的社区的长椅上，在那里，早期流亡者的遗物，甚至一家商店、一栋建筑物的残骸都会唤起他们对家的怀念。

布鲁诺·瓦尔特将快乐流亡的秘诀归为铭记“这里”和“那里”的区别。作为受挫的流亡者的典型，茨威格的流亡历程堪称毁灭性的——或可称为“罗得妻子综合征”。他过度解读了故乡和当下环境的差异，并且总是忍不住回望过去。他在拉马波路 7 号撰写的回忆录写道，如今他们“像半个瞎子似的在恐怖的深渊中摸索”，“不断仰望”那业已失去的大陆上的“曾经照耀过我童年的昔日星辰”。

从未有过像我们这样一代人的道德会从如此高的精神文明堕落到如此低下的地步。

在我们这个文化价值永远错位、颠倒的时代，茨威格亲历了世界在他面前一点点变陌生的过程——他丧失了故土、母语、文化的参照、朋友、书籍、使命感和希望。

他的经历不仅令人感伤，还神秘晦涩。这不禁使人想起托马斯·曼的兄弟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的一句话：“被征服者是最先体会到历史蕴藏了什么的人。”

在 6 月的一天，我沿哈得孙河逆流而上，想去看看茨威格流亡美国期间的那所住宅，他在那里有时一个星期就能写上 70 多页自传。我想去看看那里还留下了什么，是否还有什么可以昭示他的存在，当他从窗口眺望时会看到什么样的风光。我努力想象他从老宾州车站（Penn Station）那座不朽的建筑搭乘火车北上的情景。当时大批戴软呢帽的商人蜂拥而至，在举国备战的时期带来了无数卡其色坡跟鞋和白色水兵帽。

茨威格多少次乘坐火车，路经银灰色的高楼大厦，到达曼哈顿另一头满是绿色石头的河边？而维也纳要温柔许多，公园散落在城市之中，拥有历史悠久的葡萄园的维也纳森林（Wienerwald）将城市三面浪漫的风光连在一起。对痴迷于探究个体至高无上的自由的作家来说，回家之路上新新监狱的高墙，配有探照灯的瞭望塔，会对他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我从停车场走上一段很长的斜坡，经过光秃秃的教堂和破旧的商场，穿过一个棒球场内场，来到拉马波路。一小段十字路口在茨威格搬来之前刚刚建成，茨威格住的房子要比周围的古老一些。他写《昨日的世界》时住的房子已经被从之前的果园或屠宰场中迁到了山坡上。房子原来所在的坡上，现在散布着一些新种植的低矮灌木，还有一棵深红色的日本枫树。只有位于前门和车道间一棵茂密的老橡树看起来像是经历了 1941 年的酷夏，它的根紧扣着不平坦的地面，远远看去就像一堆缠绕的蛇。

正门上小拱门的白色木质圆柱的油漆已然剥落，而且通往前门人行道的木板也不见了。我绕着房子走来走去，透过一扇蒙尘的玻璃窗看向发暗的室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棵枯萎的吊兰，在一个仿制的黄绿色蒂芙尼台灯下是一个白色的篮子，里面塑料的三色堇做成的彩虹已经没了颜色。侧门旁一块金色的牌子上写着“小心居住者”。纱门的玻璃上粘着一枚贴花，上面用华丽的哥特体写着“内有恶龙”。

我敲了敲门，然后等了又等。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里面的门打开了，出来一个体格魁梧、头又小又圆的女人。她戴着巨大的塑料眼镜，赤褐色的卷发在根部变成了淡黄色，宽松的 T 恤上印着一个红色的词，“DEVILS”（恶魔）。

她狐疑地打量着我，并没有打开纱门。我告诉了她的名字，询问她是否知道一个名叫斯蒂芬·茨威格的著名欧洲作家曾经住在这所房子里。她打断了我：“是的，我当然知道。十年前有个写书的女人对我说过同样的话。她希望让我让她进来。我告诉她我不知道这个人写作时坐在哪儿。我不知道他是坐在楼上还是楼下，游廊还是地下室。谁会知道这些呢！我不知道他从哪扇窗户向外望，也不知道从他工作的地方望出去会看到什么。我不知道他吃什么，也不知道他穿什么衣服。无论他曾经坐在哪儿，他的椅子都早就不见了，还有他的桌子。我没有他的笔，也没见过他的打字机。就连前面的草坪也早就不一样了，因为一场关于房产边界线的荒谬的索赔，要我出钱砍掉那些不属于我的树。我给市政府写了信，我说尽管放马过来，试试让我负责。我有原始合同的复印件证明……”

她又说了一阵子，我不时地点着头，目光落到她身后栅栏那里一排又高又漂亮的老树上，那些树影下的草地可能就是茨威格坐在藤椅上拍照的地方。

在离开英国前所写的一篇感人的随笔中，茨威格推测英国人在面对世界大战时之所以如此冷静，与其说是因为他们的礼仪修养或教育背景，还不如说是一种全民性的对园艺的热情。他写道，相较于其他，“是人类本性不懈的联合传达出的沉着、前所未见的力量，促使每个个体形成一种一对一式的永远的联合”。可怜的茨威格，在自身狂热的精神逐渐幻灭时，还在思考英国人的冷静之谜。

忽然之间，那个女人结束了她对法律的抱怨，转而说起自上一个不幸的茨威格寻找者离开后，她亲自去图书馆查了这个冒失的闯入者研究的作家的事情。

啊，我想，在有关茨威格美国生活的更多证据消失之前，我的这次访问可谓非常及时了。“你发现了什么？”我问。

“嗯，当斯蒂芬·茨威格先生住在欧洲时，你猜猜谁恰巧住在同一条街的那头？”我摇头。

“是一个油漆工，名叫阿道夫·希特勒。天哪，我多希望茨威格先生当时能把他从梯子上打下来啊。”

我的父亲在 1938 年从希特勒统治的维也纳逃了出来，这多亏了我的祖父。祖父当时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医生，他之前的一个病人在纳粹军中身处高位。在次日凌晨盖世太保（Gestapo）要逮捕我们全家之前，他冒险向祖父通风报信。全家躲到了非犹

太人朋友的家中，并成功地在几日后登上了开往瑞士的火车。时至今日，我的父亲——一个狂热的电子产品迷——在想到他的全家幸免于在边境被捕全赖于当时没有电脑时，总忍不住轻笑出声。如果他们的名字被列入名单之中，那些纳粹为了钱和贵重物品，也会对它们进行全身搜查。那样的话，他们就永远不可能从奥地利离开了。

父亲一家先是到了苏黎世。由于我的祖父母无计维生，我的父亲和他的兄弟就被送到了阿尔卑斯山麓下的一家天主教孤儿院。我父亲对这段时光最深的印象是被迫在半夜起床，从孤儿院走一段非常危险陡峭的路到最近的村庄，为酗酒的领头修女买酒喝。在某次严重的事故之后，他和他的兄弟设法从孤儿院逃回了我的祖父母身边。那时，他们的瑞士签证即将到期，瑞士当局已准备将一家人遣返奥地利，我的祖父想办法和一个他以前旅游时偶然救治过的美国人建立了联系。这个人没有忘记他，并答应为他们的偿付能力做书面担保，以便他们能获得前往美国的签证。如果没有这个不知名的得州人的热心帮助，所有的家庭成员肯定会被送往集中营的。但好景不长一家里人的钱被偷了，身份证件和车票也消失无踪。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从苏黎世到了热那亚。在热那亚，通过帮忙隐藏财产的意大利亲友，他们订到了开往纽约的雷克斯号（SS Rex）客轮的船票。

正如这场战争中其他难民——应该说任何灾难和冲突的受害者——的故事一样，这个故事中充满了“如果不是因为”“差一点儿”和“在最后关头”的时刻。之所以被反复提及，是因为它最终有一个较好的结局，带着这些回忆的流亡者抵达了他们的避风港——那个公认的期许之地。就我的家族而言，故事大概是这样结束的：“经过了所有那些千钧一发的时刻，结果你看，感谢上帝，他们终于来到了美国。虽然最初的光景非常艰难，他们租住在纽约一座破旧的廉价公寓中，但最终还是想方设法来到了波士顿。在那里，你祖父得以重新开始行医，并将他的儿子们送进了波士顿拉丁学校和哈佛。这就是结局。”

我花了非常长的时间才真正了解到，整个家族在悲惨的流亡过程中遭受了多少不可弥补的损失。如果说欧洲三分之一的犹太人在希特勒的迫害下得以存活，那么在这些成功逃离的人之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保留了他们之前的身份和完整的人性。茨威格的流亡岁月吸引了我，部分原因在于它以一种生动的画面呈现了难民逃离残酷血腥国家的典型经历。他的故事还说明了人们重获自由并不能解决流亡造成的困境。

被征服者是最先体会到历史蕴藏了什么的人。

在依靠社会救济支撑了几年之后，当时我已经上了年纪的祖父终于掌握了足够的英语，并通过了医生资格考试，可以在美国注册行医了，但他在美国的收入始终只是勉强糊口而已。比物质方面的损失更令人痛心的是，这种物质困境破坏了家人之间的关系。

我的祖母有一个表妹，我们叫她爱丽丝（Alice）奶奶。她也从维也纳逃了出来，后来成为曼哈顿地区一个了不起的精神科医师。他人一生平凡普通，爱丽丝奶奶却是个有故事的人。她信誓旦旦地说她曾多年受雇于墨索里尼的一个后代，帮助制定重新安置欧洲犹太人的计划，他们可能想将所有的犹太人迁到乌干达。据她所说，她在古巴革命时期还结交过海明威和他那帮朋友。海明威迫切地想和她上床，她拒绝透露自己是否妥协。在巴蒂斯塔（Batista）政权垮台时，海明威把她送到机场，强迫她登上了最后一架离岛的飞机。她最自豪的事情是以一己之力令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的警卫释放了她的丈夫。但不久之后他们就离婚了一多年后又复婚。我曾偶然见过他一次，那是个有点寒酸的人，下巴很宽。当时爱丽丝奶奶带我看《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的日场演出，他就略带奉承地等在比蒙特剧院（Beaumont Theater）的大厅里。爱丽丝奶奶从他身边走过时并没开口，但随即——在我们经过时——用一个神秘动人的手势把手伸向身后捏了他一下。几年之后，她才向我们说明那个被冷落的男人的身份，眼中闪烁着危险的光，但当时他们已经再次分开了。

我的祖父母居住在维也纳的贝尔维德花园（Belvedere Gardens）附近一间很大的公寓时，同爱丽丝奶奶的关系就很好。她经常乘坐他们黑色的欧宝奥林匹亚车，同他们一起参加一个又一个的文化展。她在他们的家里用餐，还到过他们夏日在阿尔卑斯山中租住的庄园。爱丽丝奶奶在提及我的父亲时，嘴角总会浮现一个宠爱而和善的笑，还带些屈尊纡贵的味道。“可怜的马丁，他小时候备受冷落。”然后她又叹气，“人们总认为父母吵架会对孩子造成可怕的伤害，但相信我，过分相爱的父母对孩子

造成的影响更糟糕。你的祖父母非常相爱，因此马丁在很小的时候就受到了冷落。”

当然，我父亲身为当事人，能对他父母间的关系进行更全面的评价。他们之间 20 多年的亲密感情，到美国后产生了裂痕。他们开始频繁地争吵，场面总是很可怕，青春期的我某天就见识了这些争吵造成的伤害。我父亲当时正郁闷地盯着电视机上某个无聊的节目，突然对我说，“人们总是抱怨‘太可怕了，现在一家人在餐桌旁吃晚饭时全都盯着电视，连话都不对彼此说’。其实，我告诉你，在晚饭时坐在一起聊天也没什么意义。天哪，我父母争吵得那么厉害。”他把手放在额头上，“当时我多希望家里能有台电视机啊。”

他们争吵的由头各种各样，但都在意料之中，永远围绕着钱。在某个时期，还可能涉及婚外情。但他们婚姻中各种冲突的真正原因，是身处一个陌生的国度给他们的社交生活造成的激烈而彻底的失衡。人们一般认为流亡的困境主要表现在同外部世界业已变形的关系上，每日的例行公事也变得陌生起来——充满了各种困难。但在自己的祖国形成的家庭关系的隔阂同样也会非常严酷。就我祖父母来说，有时还因为权力的逆转。我的祖母是个极有天分的钢琴家，经常出入各种社会场合的她，在维也纳社交界的魅力比身为医生的祖父还要大。然而，这个医生的挚爱，这个交友广泛、邀约不断的人现在却只能和两个儿子一起被困在陌生的家中：在四十岁生日前遭到双重流放。与此同时，我的祖父虽然比她大十岁，但由于对工作的迫切需要，不得不飞快地学习英语，被迫步入社会，勉强维持了一种活跃的社交生活。（传统的奥地利一德国主妇总是不堪其扰地忙于各种家务事，因此权力的逆转很多时候是另外一种。一个流亡者就观察到，“只有到了美国，许多的欧洲女性才认识到另一种生活方式，因此，她们之中的很多人都处于一种典型的美式狂欢中”。）

有时，这种之前的生活方式会发生如上的逆转，有时原本的这种方式则会加强，令人更加迷惘。我相信，茨威格和洛特面对的应该是后面的情况。自流落到陌生的巴西山中小镇后，他们猛然发现，他们婚姻之外的世界越来越令人费解。洛特在给英国的哥哥曼弗雷德（Manfred）和嫂子汉娜（Hanna）的信中反复提及她无力缓解茨威格的绝望。在茨威格最后一次离开纽约前，洛特曾对一个朋友说，她现在除了强迫茨威格无论去哪里都把她带在身边外，根本束手无策，她的语调中满是《圣经》中《路得记》般的阴暗。

被迫放弃了那么多东西，人们很容易认为流亡只是意味着放弃之前的身分。然而，这些故事并非完全关于放弃。流亡者在被迫奔赴新世界的过程中，也一直在无意识地散播着往昔生活的气息，正如从扇动的翅膀上掉落的粉末一样——就茨威格而言，是德奥合并前维也纳的壮丽和阴暗，是灿烂的黑色的光。我祖母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一张照片同 1941 年身处奥西宁的消沉的茨威格形成鲜明的对比。她刚刚成年时，茨威格的声名已如日中天，整个奥地利仍处于文化高峰的余韵之中。在这张照片里，她身着时髦的黑裙，腰部有一枚椭圆形的金饰针，头上一顶优雅的钟形帽。她的双手放在臀部，手指朝下，跷着二郎腿，高跟鞋上点缀着醒目的羽毛，一串珍珠项链落在她白色的衬衣上。她对着镜头笑得极其活泼自信。当我看到照片里她这种热情的无所畏惧的笑容时，我总会想起每当她来到我们在弗吉尼亚（Virginia）北部郊区的家中时的那种失衡感——她给我和我的兄弟们大大的湿热的吻，她大笑的样子，她在家中弹奏的交响曲，她在游泳池中快速扭动时显得非常大的琥珀色的眼睛和胸脯，她总是非常慷慨地给我们糖吃，对自以为不上档次的东西根本不屑一顾。她在费尔法克斯（Fairfax）时简直就是一个犹太版的格列佛（Gulliver）。我从她的身上学到了在探索更广阔的外部世界时必须承受的挑战，她流露出的对文化启蒙的热情——她在之前的社交圈子里有很多同道中人——最终激起了我自己的想象力。

年轻的马克斯·布洛德（Max Brod）从小小的布拉格（Prague）踏进茨威格在维也纳的单身公寓时就感受到了这种刺激。他看到了无数的外文书籍，茨威格请他喝的酒令他感觉到自己正在领略“原汁原味的都市优雅”，其他人则注意到茨威格身上那种精致格调的魅力在开始流亡后反而持续扩散开来。至于他在伦敦哈莱姆街（Hallam Street）租住的“漂亮的房间”夜里的情况，则令到访者震惊不已。正如茨威格一位维也纳的旧识所说：“连续好几个小时，作家们轮流大声朗读自己的作品，并礼貌而恭敬地聆听。”这样的场景概括了很多流亡者“夹缝中的生活”。在早期的流亡中，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被迫蹒跚于“自命不凡与高贵和一种波希米亚风”之间——被困于流离失所的同胞和古怪的当地人之间。茨威格在这段时间经常在伦敦的大街小巷游荡，试图去寻找纪念那些早期流亡者——其中就有马克思、列宁和孙中山——的牌匾，来确保自己仍为世界精英公民中的一员，他试图让自己相信皮卡迪利广场

（Piccadilly Circus）周边的路灯照亮的就是世界的中心。

在早期的流亡中，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被迫蹒跚于“自命不凡与高贵和一种波希米亚风”之间。

我父亲的家族和茨威格的不属于同一社会阶级。我母亲的父母是从捷克斯洛伐克迁到维也纳的，祖父的父母来自利沃夫（Lviv），他们都是不久前才成了东犹太人（Ostjuden）的。但茨威格本人对他父母的世界中占支配地位的矫揉造作的阶级意识一贯是嗤之以鼻的，他总是嘲讽地提起父母在他和他的兄弟小时候灌输的只有这样的人才是“高雅”的人而其他的则绝对不是的观点。“他们对每个朋友都要追究一番，看看这个朋友是否出身于‘上流’家庭，甚至对这个朋友的每一个家庭成员和亲戚的出身以及财产状况都要详细调查。”他回忆说。但茨威格又冷静地指出，50 年或最多一个世纪之前，所有这些犹太家族都来自于同一个犹太人地区。

随着年龄的增长，茨威格对这种行径也越来越宽容。尽管他已意识到这种行为与其说是为了赢取地位，不如说更像是那些伟大的犹太人努力想在“文明世界中更进一步”的征兆——这一定律实际上适用于每个社会经济阶层的犹太人。一个“上流”家族——他发现——最终被定义为摆脱了犹太人区那种狭隘、小气生活的刻板印象，通常是因为他们适应了“另一种文化”，“一种兼容并蓄的普世文化”。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的祖父从他父母偏远的村庄中不远万里长途跋涉的行为就是一个范例。照片中我祖母那种自信来之不易，但这种自信的表情在几年后却轻易地从她脸上抹去了。茨威格注意到，这只是另一种“犹太人永恒悖论的命运”，他们正如被困在物质领域的祖先那样，现在一股脑“逃向了精神世界”，但结果是一样的损失惨重。谁能预见纳粹将禁止犹太人从事“脑力方面的职业”，比如医生和律师？茨威格想知道为什么这种对精神生活的投资后来却触怒了大众，正如先前专注于商业活动的那些犹太人一样？

当我开始阅读茨威格的作品，研究他的生平后，我发现他的故事让我离祖父祖母更近了，这使我更加乐此不疲，甚至多年之后也是如此。就算终结他们流亡的机会已经一去不返，或许在描绘这个复杂的流亡者时，我至少可以摸清漫长的流亡过程的构成——追溯其在欧洲的源头，在新世界的发展，在那里华丽新奇的事物和被粉饰的记忆都令流亡者们迷惑。但说实话，我同样喜欢徘徊在这些维也纳的幽灵之间，探索他们神秘的命运，即使在发现有许多黑暗同样也诞生于这座城市的光辉中之后。

维也纳在 20 世纪早期的创造力爆发，经常被描述为某种美妙的梦境，这瑰丽的火焰燃烧于欧洲文明的最后时刻，燃烧于原始的野蛮撕裂并灭绝那场文艺复兴之前。但这蓬勃的精神和紧攥的拳头之间存在某些朦胧的、重叠的领域。茨威格的故事揭示出善与恶之间并非二元对立，而是紧密联结的。维也纳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都在努力应对同样的难题，达成同样的志向，这些难题和志向又激发他们的敌人的暴力情绪。希特勒的计划深受拿破仑泛欧思想的影响——通过武力征服来获取，并通过一种民族主义的文化来维持霸权的统治。茨威格计划的灵感是基于人道主义模式的泛欧思想的梦想，实现的方法是和平的，是跨国与国之间界限的，而它的领导者应该是学者和艺术家群体中的精英。在大变动面前，就欧洲命运进行争辩的双方都受教于同样单调乏味的教育体系，都受到了混杂着性压抑和强硬的军国主义思维的思想的影响。他们都经历了那场信仰破灭的世界大战，并不得不忍受它对社会经济造成的迟缓的破坏。这个赋予人灵感的文化之都维也纳同它的敌人一样忧虑着欧洲的未来，他们对深刻的精神复兴的需要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茨威格认识到——甚至是短暂地认可了——国家社会主义的魅力。在 1930 年 9 月的德国大选之后，国家社会主义的支持者从两年前的不足一百万飙升至如今的六百多万，他将纳粹获胜的原因归咎于那些民主党人的自负保守，将这次大选的结果称作“或许不太明智但根本上很可靠的，年轻人在面对‘高层政治’的迟钝和优柔寡断时值得称赞的反抗”。比茨威格小 25 岁的克劳斯·曼不得不提醒他：“年轻人的所作所想，并非全都对未来有益。如果德国的年轻人变得非常激进，难道我们不该首先问问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反抗吗？”

茨威格和他的法西斯对手在就欧洲危机究竟意味着什么和应该如何应对的问题上，偏偏得出了恰好相反的结论。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他们有很多共同之处——在如何推进人类文明的观点上甚至都是完全相同的。基于此，茨威格在被迫流亡之后，便开始对全欧层面综合的发展观和生产力的概念提出了质疑。针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科技的发展和社会成就，他在自传中这样写：“在我们这个小小的西方世界，没有

一个国家不曾失去自己过去的许多生活情趣和悠然自得。”他们从年轻的时候就知道，奥地利人“自由自在，漫不经心，一味虔诚地信赖自己的皇帝和信赖赐予他们如此安逸生活的天主”，但这种悠闲、传统而滑稽的阶级分明的安全世界，恰是他和他的同龄人要推翻的，他们如饥似渴地投身其中的这场革命般的、艺术般的运动已经如火如荼地拉开了帷幕。

在茨威格故事的核心中，隐藏着他的人生之路在何处拐弯以及他创造的欲望和毁灭的冲动是如何分道扬镳的秘密。如果非要在维也纳的地图上标出这个十字路口的话，那我会选择席勒广场（Schillerplatz）。这是维也纳艺术学院（Vienna's Academy of Fine Arts）前面的一个小公园，就是那个拒绝了希特勒入学申请的学校。学院中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欧洲艺术品，至今仍向公众开放。公园的中心立着一座德国诗人席勒（Schiller）的塑像，犹太神秘主义专家格舒姆·肖勒姆（Gershom Scholem）把席勒称为“自由的传道者”。他曾经这样写道：“与理性主义的弗里德里希·席勒的邂逅，对很多犹太人来说，要比与经验主义的德国人的邂逅更加真实。”茨威格引用了席勒的一段文字作为他研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题词——“崇高的性格只能在一次次战胜感官的阻力时，在热情奔放和瞬时出力的某些时刻显示出来”。也正是从席勒的诗歌之中，茨威格领悟到了足以支撑他道德哲学的基础：自由只能在梦中实现，就像最深刻的美只能在歌中绽放。

席勒塑像的底座上是一个青铜的浮雕，刻着一张巨大的由于恐惧而扭曲的脸，它象征着悲剧。但如果你仔细观察环绕在这张面孔周围狂乱的卷发，会发现里面隐藏着一个大笑的森林之神萨提（Satyr）：他是喜剧的象征。在这个浮雕图像中，悲剧和喜剧缠绕在一起，难解难分，这也呈现了维也纳面临的真正的困境。喜剧的脸孔相较于悲剧要小一些，还被悲剧的长发所遮盖，眼睛也是半闭的；而悲剧的脸孔看起来像是完全发疯了一样。茨威格不可能的流亡的故事——茨威格本人就是一个不可能的流亡者——与这幅令人困惑、充满悖论的图像产生了共鸣。如果我们再仔细去研究如这个谜题般的茨威格的流亡人生的话，我们会发现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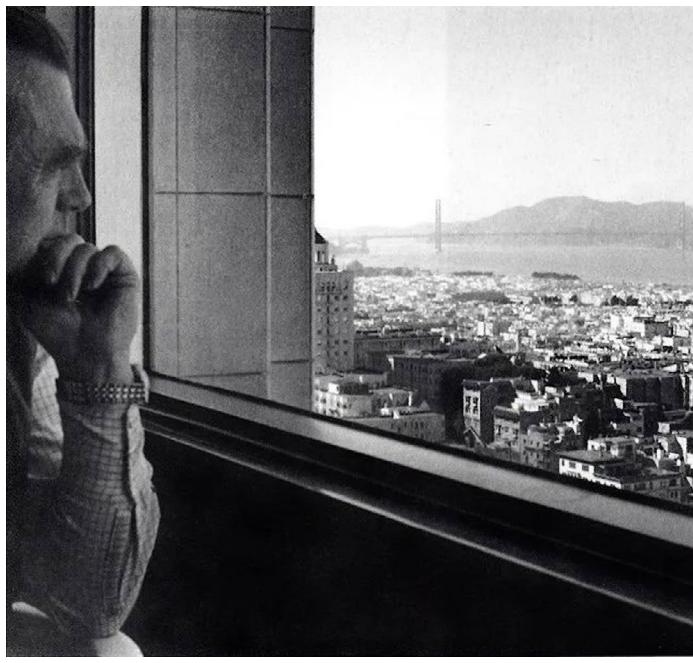


乔治·普罗尼克

小说家，人物传记作家，自由编辑，曾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教授英美文学。著有《追求宁静》《普特南隐身之所》等。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图为切斯瓦夫·米沃什在他的朋友耶日·图罗维奇镜头下。窗外是旧金山海湾的风景。
图片由出版社提供

不是我选择了加利福尼亚。她是被赐予我的。

否则一个北方人为何会来到这个炽热的贫瘠之地？

——切·米沃什，《单独的笔记本》（1977—1979）

这种感觉，无法言说！在这西方世界，我发不了声，我内心苦苦挣扎纠结，因为我在这里，却只能，只能对那边的人们一知半解——半解又不源于对事物的共性认识，只因那一模一样的思维方式。

——切·米沃什致亚历山大·瓦特（1960）

你与所有琐碎的和深邃的阴谋隔绝，在象牙塔里，不用直面与普日博希的争辩，也不用理会科特一家的喋喋不休[……]。所以你抱怨的，无非是在那个国家里没有你的存在，灰色的维斯瓦河仍在那里奔流，桑多梅日的溪流静静地汇入其中。也许正因此，才产生了与那些俗人的争辩，他们一边与客居国讨价还价，一边又在相互争宠，还要假装不在意。[……]感谢上帝，你在这里，在美国，因此得享神圣的安宁。

——这是一九六二年夏天，齐格蒙特·赫兹以他特有的讽刺语气和健康方面的原因，安慰米沃什的话。我们得承认，言语之间满是刻薄，当然也有可能是故意为之。米沃什想要的不只是“神圣的安宁”。尽管远离哥穆尔卡的，还有后来盖莱克的波兰，远离波兰文学圈的“追逐名利”能让他集中精力在学术上，甚至还可能因此增了寿，但在整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他依然觉得自己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生活并非不丰富多彩，但总有一道鸿沟横亘在他自己的激情与大学同僚们的兴趣之间。一九六九／一九七〇学年，莱舍克·科瓦科夫斯基在伯克利度过了一整年，这可顺了米沃什的意。科瓦科夫斯基回忆说，在与诗人的聊天中，总会情不自禁地谈到一些话题，如上帝、彼岸生活、恶……斯拉夫文学的教授们很少聊这些，也可能米沃什不知道该怎么找到志同道合的同僚，同时可以肯定的是，他自己在这期间也很难与人交心。他热烈地渴望着能令自己身心愉悦的交流。

他陷入沉默——尽管这是一个无须为表达自己的看法而担惊受怕的国家，也因如此，（他认为）这里没有一个人能理解（怎么理解——也许还会不公平地理解）他。他的思考绕不开一些“该死的问题”，而在——在加州艳阳之下——这些问题那么地似是而非，不占天时、地利还有人和。他觉得自己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塑造的角色一般，身处变幻莫测的文明时代，听滚石，抽大麻，热衷性革命和反越战。诗人罗伯特·哈斯罗伯特·哈斯讲过一个关于米沃什的故事。他去灰熊峰的住所拜访托尼·米沃什时，仿佛一下子从活力多姿的加利福尼亚迈进了一部讲述欧洲知识分子的电影，色调昏暗，光线阴涩。切斯瓦夫就在那儿写过一封给安杰伊·瓦里茨基的信，信中说：“我感觉自己在一条没有桨的船上，漂在深水之中，因为几乎所有人在嘲讽政治和争论意识形态时都会刻意避开核心问题。[……]人需要的是什么？该干什么？问这些问题，就等于给自己定义，您就能将我划入十九世纪中叶的俄罗斯知识分子行列，但这也许并不会败坏我的名声？”

米沃什谈到加利福尼亚时，总会出现两个关键词——沙漠和荒芜。他的美国正是爱德华·霍珀画里的——孤独和迷失之人的国度，空旷广大，但却吞噬了人物的形象和家园。“梭罗的《日晷》都向我们展示了对于美式‘空虚’的深刻解读，其中[……]孤独的大洋与沙漠串联起孤独与孤独”，塔德乌什·斯瓦韦克笔下的“荒野”，描绘了这样一幅景象：美洲大陆的浩瀚天然超越了所有一切，欧洲的人工雕琢在它面前是那么渺小。美国，用那永恒的深海、高山和沙漠暴露了人类的匮乏，叩问着人类存在的必要，直指人类产品的脆弱。它是“非人的”，首先恰恰是荒野的，“这个地方，我们还以为是熟悉的‘驯化的’世界，却是个‘野性的’邻居”。第一批加州移民是知道的，他们在白雪皑皑的群山中艰难跋涉相互残杀时，就已经明白，在饥饿和恐惧面前，人性是多么不堪一击。

一九四六年米沃什去美国的时候，因为儿时课本里的介绍，还怀揣着一些关于自然风光的美丽想象，可一旦定居下来，他就得接受全然不同的另一幅画面。在去大峡谷的旅途中，他写道，“沙漠，荒山还有巨石，低矮的灌木和成片的枯草绵延不绝”，而让他将此画面深刻烙印在脑海中的要属加州的死亡谷，在那里可以看到生命的虚无缥缈，将人扒皮抽筋，让人意识到存在本身即是多余的：“我头发都竖起来了，紧紧抓着某样具有人类属性的东西不放，因为我突然[……]看见学生的舞会和大学旁的僻巷，还有读着《一小时的思考》的自己。”尽管想象与现实失衡，尽管米沃什喜爱美国的森林，也沉迷于观鸟的乐趣，但让他对哲学本质有所领悟的处境还是“荒野”。

非虚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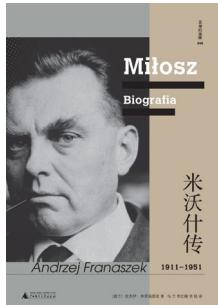
米沃什， 承认生命在“此时”和“此地”

安杰伊·弗劳瑙塞克 | 新书试读

历时 10 年写就，
迄今为止关于米沃什最深入的传记文学。

《米沃什传》有助于读者了解诗人一生中遭遇的苦难，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生活中遭遇的，以及它们对诗人写作全部作品的作用和影响。当我们开始审视我们自己的苦难时，他的诗歌和他的人生经历将给予我们关于二十世纪生活和幸存的多方面的启示。——《纽约客》

米沃什是享誉世界文坛的波兰作家、诗人，1980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在《米沃什传》中，作者安杰伊·弗劳瑙塞克为我们提供了关于米沃什本人及其所处时代的生动图景，同时也提供了理解其作品的丰富语境。弗劳瑙塞克追踪了米沃什个人的奥德赛之旅——经由立陶宛、波兰，到法国，再到美国，最后荣归波兰克拉科夫，终老于此。作者花十年时间写就这部米沃什标准传记，无论深入程度还是厚重程度均在目前米沃什生平及作品研究专著中首屈一指。这本传记基于大量的访谈资料而来，同时大量引用米沃什的诗歌和散文作品。



[点击链接购买本书](#)

他在给阿涅拉·米钦斯卡的信中又一次提到一九六四年复活节期间的死亡谷之旅，他说：“有一次我们和彼得一起走着，在靠近我们社区时，那些住户的灯光让我突然有了灵感[……]灯光中曾包含美国的全部：阵营、安宁、城市，都是虚无，随时随地可以被抛弃，然后变得一无是处，唯有大自然，更确切地说是地理景致，才能又一次为人类文明演化描绘出具体的未来。[……]而欧洲那虚无主义的里子正在被‘声与光’(son et lumière)巧妙地掩盖起来。”

“盐块在死亡谷干涸的湖底闪烁。/ 争辩啊，争辩啊，血脉偾张地说着。/ 从呆立的岩石中何谈智慧”——这是《无名之城》中的一段，在诗中，主角以自身的唯一性、独特性，还有童年起就养成的丰富个性，竭尽全力与空虚对峙。在米沃什眼里，美国撕开了人类存在的悲剧性内核，将它短暂抑或虚幻的本质暴露无遗：这里的真相就只有岩石还有“致命的海洋”，在它们面前——尤其在他灰熊峰的住所窗外，尽是一片乏味的幽蓝——也许只有工作、思考、打磨“人造”的也就是非天然的东西，才能将自己隐藏起来。“如果没有风，最惬意的事莫过于带一本《圣经》口袋书爬到山尖之上，然后读着《约伯记》；但顺序反一反，则会幽怨丛生”。

唯有大自然，更确切地说是地理景致，才能又一次为人类文明演化描绘出具体的未来。

身处此境的还有诗人罗宾逊·杰弗斯。他在卡尔梅勒的太平洋岸边建起了一座石塔，就为了透过塔上的窗户望着波澜不惊的海浪、等待猎物的雄鹰、冰凉的星光。六十年代，米沃什多次想到杰弗斯，还翻译了他的一些作品。他发现他和杰弗斯有太多的共通之处：都在追问思索着诗的意义，希望将诗从美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与根本就无法了解的人类世界的那些溢美之辞奋斗到底。卡尔梅勒的孤独者，高呼要得到“非人的思想”，写着颂诗赞美着各种自然元素，赞美着让一切都毫无意义的轮回——这却是米沃什竭力要挣脱的。在优美的《致罗宾逊·杰弗斯》一诗中，他描绘着驯化世界的景象，哪怕这景象天真、幼稚，但从他的灵魂深处——我们能感受到他世界观的变化——波兰情结正在向田园诗靠拢，这终究要好过屈从于恶魔般的虚无。虚无终将被寓意十字的诗驱逐：

你的头上，没有太阳或者月亮的脸庞，
只有银河系的收缩与舒张，亘古流长
忽而新星起，忽而新星亡。
[……]
玄武岩和花岗岩，
一只猛禽盘旋其上。唯美如斯。
而我与你又如何？从果园里的小果堆，
从淳朴的合唱和圣体光座，
从芸香花圃，河畔山丘，从记载着
热切的立陶宛宣布兄弟结盟的书籍中，我走来。
但，与你却是绝望的慰藉，无用的信仰！
况且你并不知道，我知道的事。大地教导的
不仅仅是自然元素的赤裸。在神的眼里
谁都无法免罪。你如此勇敢，在空虚之中，
向魔鬼们献上祭品：奥丁和索尔来了，
厄里尼厄斯在空中咆哮，群狗在恶嚎，
就在赫卡忒和亡者队列靠近之时。
不如把太阳雕刻在十字架的交叉处，
就像在我的家乡。给白桦和枞树
取个阴性的名字。呼唤庇佑
去阻挡悄无声息的阴险力量，
也胜过你指望非人类之物。

也因此，美国就像一个临时的露营地，闹鬼的地方，充斥着维特卡茨的预言——没有历史的世界，“灵魂贫瘠”的遥远国度，“唯一的本地文化娱乐就是用上几个钟头呆呆地看着车来车往，喝着酒，或者从车里朝路两边的标识牌开枪”。周围的空间实

在太大了，足以让米沃什找到避世之所——能够总结令他出走加利福尼亚的教训。具体点说：检视内心，是什么加深了更早以前的伤痛，那从美好的维尔诺时代起就遗留下来的伤痛。加利福尼亚就像地球上的天堂，鲜花盛开，阳光灿烂，而米沃什的眼界亦跟随着他自己敏感情感的释放而扩大，为此他在给耶伦斯基的信中写道：“对我来说，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生活就是恐惧、惩罚、消灭。[……]从十六岁那年，我就已命中注定如此[……]必须要一直怀揣梦想和目标，这样才能一直做点儿什么，哪怕只是实现部分的梦想和目标。[……]因此我才这么地疲惫。[……]爱的，恨的，我都放手了，来到这里，这个没有爱情和仇恨的地方，在加利福尼亚，最完美的疏离之地。”

在米沃什理解美国究竟有多深的问题上仍有争论。他总是化身成一位温和的观察者，却不是美国文化和社会的参与者。他无法掩盖自己的欧洲知识分子习气，经常穿一身巴黎咖啡馆腔调的紧身外套，轻蔑地打量“本地人”。穿牛仔服，戴牛仔帽，啃着血淋淋的牛排还有芝士汉堡包，沿高速公路行驶上千千米，为了适应这个再次移民的国家，米沃什全都试了一遍。六十年代，从他对大学生反叛行为的立场来看，他的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无论是作为讲师，还是父亲。他向默顿这样描述自己的大儿子：“惹人生气的，经常犯傻的年轻人，但我完全被他的魅力折服。[……]从外表看，他就是一个真正的美国青年。”

在伯克利的第一个十年，米沃什很大一部分时间都在为学生们的不安分而焦虑。起初学生们组织抗议，反对学校附近的银行和政府机构歧视黑人。一九六四年秋，为保护民权，大学生们发起了几场大规模示威演说活动，即“言论自由运动”，并与国家警卫队发生了冲突。上千名学生要求他们在校园内的政治民主权利。“这场运动是属于‘垮掉的一代’的，个人主义的，裹挟着禅宗思想、致幻药丸和所有人的自由，是对老一代的反叛，[……]他们无法忍受‘社会’，[……]还有，他们鄙视普通人，将自己放在普通人的对立面。[……]这些言辞尖刻的年轻人憧憬理想主义，渴望温暖，这些都是现实里的社会机器所没有的”米沃什对盖德罗伊奇如此解释。他对叛逆年轻人的感受很感兴趣，不满足于仅仅以一个追踪新闻事件的记者视角去观察，他要与亚历山大·瓦特一起成为亲历者。他也努力平衡着自己的立场，尽量不做全盘否定，乐于融入这场社会浪潮之中。

我跟着他们走了很远，很远，因为我本身对民权运动怀有好感。但在某些时刻，我逃开了，我说“不”。[……]我很严肃地看待这个问题。这只是全美运动的第一阶段。年轻一代的巨大精力不能只在虚空中打转。[……]我观察了参加运动的教授们：他们满怀仇恨，或者他们对美国的仇恨是真实的，或者是因为赶时髦。[……]但相信我，我不赞同毫无意义的破坏行为，而我们大学的存亡竟然受到威胁。

一九六六年，反对美国参加越战的示威活动逐渐常态化，米沃什的课有时也会受到集会和会议的影响。他在致大学警署的请愿书上亲自签了名，为被逮捕或者被暴力殴打的民主人士辩护。

我都放手了，来到这里，这个没有爱情和仇恨的地方，在加利福尼亚，最完美的疏离之地。

我的身份与两年前相比有了不同，因为第一，不管官方认可与否，只要其本质是反对种族屠杀的，我就支持；第二，欧洲的传统——无论如何警察不能插手大学校园；第三，出了大学校园，就没有其他能抗议林登·约翰逊等人的办法了。只要看过美国飞行员们的说辞（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所说的，是——尤其对欧洲人来说——罪大恶极的，这样的暴行当年亦被纳粹分子所美化），就能判断出越战有多么可怕。内心深处我一直认定，二十世纪的罪行将被后来更大的罪行盖过。因此，我参加了两天的罢工，取消了所有讲座，拿我的事业做赌注。可实际上风险并不大，因为新的管理者们要解雇我这样的人的话，大学很快就会散了。当然我们系唯一一个这样干的人——别人可不是政治动物。

一九六九年和一九七〇年之交，事件愈演愈烈。警用直升机在头上盘旋，催泪瓦斯的浓雾到处弥漫，这样的校园氛围已让米沃什无法苟同。对自己国家的敌视，对古巴等国的迷恋，还有对[……]斯大林主义的崇拜，皆源于他们对整个历史的无知。

暴乱、“手持狼牙棒的黑人分子闯进教室，赶走教授和学生，打砸桌椅，烧毁可容纳千人的礼堂”、激进分子的蛊惑、火烧大学图书馆、破坏架设在校园高处的输电线并因此中断了原子实验室的电路——就是这段时间的惨状。可别忘了米沃什自己的经历，他知道革命性骚乱将如何结局。这次他不想置身事外，他想要找到更深层次的原因和动机，是什么引起了这些骇人听闻的行径。在他看来，依据某些历史宿命论，就是这些内在的东西会导致一个国家的分崩离析。而美国社会已然分化成两个相互仇恨的部分——短发工人、农业州的“大老粗”们和华尔街的“白领”们组成的大陸，对立的是高谈政治、长发飘飘的嬉皮士们形成的小島。这些嬉皮士要么赤脚走进他的课堂，要么一丝不挂地参加学生会选举，让米沃什惊诧得目瞪口呆。他把哗众取宠的搅局者强行赶出教室，还大胆地批评封堵萨瑟校门的人群为资产阶级坏小孩——“这就像射向资产阶级的一道闪电。[……]让他们从内部分崩瓦解”——他的行为为他赢得了学生的尊重。他为此评述道：

把大学分裂成客观的”非政治性机构与政治化的学生两派的计划破产了。也就是说，在无数次的集会和与警察较量之间，授课本身就是学生和全体教职员共同参与的政治性活动。苏联那套，完完全全都是两派之间要阴谋和争权夺利，一直争到最后相互扔炸弹。[……]我们的学生，我们的系是有理性的，也确实感到很绝望，完全放弃他们是不人道的。[……]美国要么遵从宪法精神接受这个敌人，要么陷入内战的混乱之中。

他在系委员会会议上为坚守大学理念慷慨陈词，戴着防毒面具穿越校园，他有种感觉，加利福尼亚变成了一个实验场，在这里比在波兰或法国更能清楚地看到未来文明形态的形成过程。在疯狂的六十年代末期，他把他的观察集结成随笔集《旧金山海湾景象》。这本书可以看作是接续《被禁锢的头脑》和《欧洲故土》的又一本自传。尽管他并不认同自己在流亡，但在书中他将美国描绘成“流亡”国家的先驱，在开篇中旗帜鲜明地写道：“我在这里。四个字概括了我要说的全部内容，由此开始，娓娓道来。这里——意味着在这片土地。在这里，而不是其他大陆；在这里，而不是其他城市；在这个时代，我称之为我的时代；在这个世纪；在这一年。我不是出现在其他地点其他时间的我，我触摸着桌子，感受到我的身体就在此时空。”

必须强调的是，在米沃什眼里，加利福尼亚是个不合理的显圣之地，弱化了一切人文和文化信仰。这里是座“抽象之城，也是大自然的抽象剧场”，就像透过汽车或者飞机的窗户看到的那些飞速掠过的风景，一幕幕暴露出美国病态的“本体匮乏”。他在文中的思考脱离了人与其周围非人的环境之间的矛盾，拓展到更加广阔的范围，去叩问，我们将所看到的自然现象指向某种象征意义是否只是幻想，是否也反映了某个真实的原型或者个体的记忆；还有如何从男人的角度理解女人——这个“大自然的代表”的问题。他的终极思考还是落在宗教上。在这里，在这个有所指的地方，宗教有着魔鬼般的表现。他用几个小时去尝试，因为在极端情况下，受欧洲丰富的意识形态教化的天主教徒必须如此，才能触及内心最隐秘最残忍的真相，领悟恶的层次。“只有上帝能拯救我，因为我飞离了我自己，向着他升起，本我已经不在我的体内，而是高于我。我如蜘蛛般沿着线向上攀爬，这根线是最不容置疑的，它只属于我，它悬于我来的地方，悬于上主你对我说的地方。”——米沃什一边描述这些“景象”，一边强调说：“我们出生，要么是虔诚的教徒，要么不信教，我很高兴，我可以被划入前者的行列。”但是在美国，这里充斥着“多种宗教的喧嚣”，就像在日渐衰落的古罗马，对宗教的虔诚正在消失，急于与现代世俗相结合的教会首先就把罪的概念抛到一边。那又如何去谈社会里的罪恶呢？一切都是被允许的，甚至色情文学和性虐暴力，只要为它们打上介绍艺术作品的标签。垮掉的一代和后来的嬉皮士们，吸引着数千名愤世嫉俗（又互相仇恨）的小镇青年和农场子弟，他们特立独行、放荡不羁，用毒品打发着空虚。在崇尚“前卫”的大环境里，米沃什将视线放到旧世界的美德上，关注美国开拓者们的勇敢、勤劳和坚毅。从另一方面来说，米沃什看到了这个不相信一切的社会的未来。因此，他把“时间”用做书中的一章标题，他指出：“对人来说，没有比时间更好的东西了。”在回答“我在美国学到了什么，其中什么又对我来说特别宝贵”的问题时，他解释道：“可以概括为三要三不要：要普通人的平凡，不要知识分子的傲慢；要圣经传统，不要追求个人或集体的狂欢；要科学和技术，不要想象人性的无辜清白。”

这个“虔诚的人”，站在普通人一边，承认生命在“此时”和“此地”，而不是某个未知的、胜于今朝的未来……维尔诺和华沙时期的激情已逝去多年，随之而去的还有轻率的判断和蔑视。三十年后，马莱克·扎莱斯基指出，《旧金山海湾景象》的前瞻性远超让·鲍

德里亚的知名杂文《美国》。他还将来沃什描述成这样一个“欧洲人”——无论如何，“都在颓废的欧洲面前为美国摇旗呐喊[……]盛赞美国的民主”，因为“民主让美国摆脱了欧洲的虚无主义。那对存在的疯狂抵制和排斥，最终只会演化成凶险的政治乌托邦”。他“在‘模糊’中安定下来，但又避免从‘模糊’中产生某些实际的假设，危及‘人类本身错综复杂’的存在。他不允许自己这么做。大胆又现代式的思考，不怕被质疑过时，这就是米沃什力量的秘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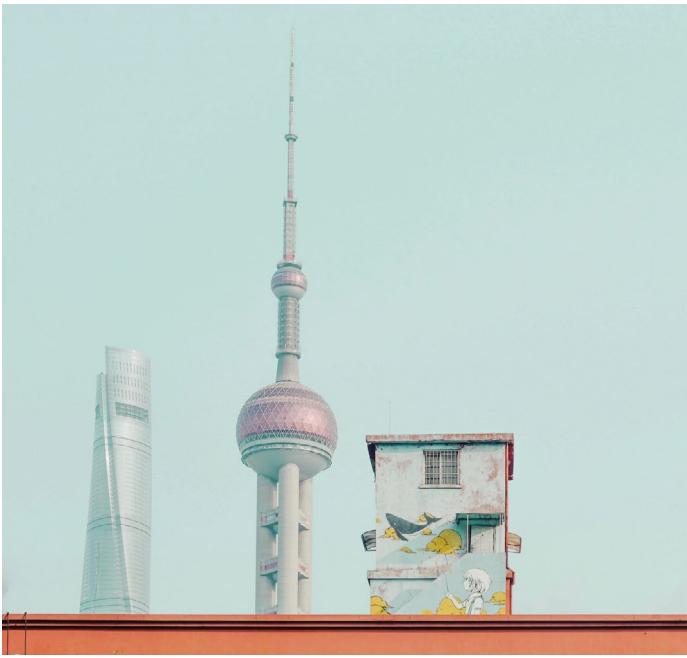


安杰伊·弗劳瑞塞克

生于 1971 年。文学评论家，波兰《普世周刊》文化栏目编辑，赫贝特国际文学奖秘书长。毕业于波兰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波兰语言文学系。主要研究波兰现代作家的作品。主要著作有：《黑暗的源泉》，《关于兹比格涅夫·赫贝特作品中的痛苦论述》（标志出版社，第二版，2008；曾获 1999 年波兰尼刻文学奖提名），《来自地狱的通行证 44 号：关于文学以及精神奇遇的书稿》（标志出版社，2010），《米沃什传》（标志出版社，2012），以及两卷本《兹比格涅夫·赫贝特传》（标志出版社，2018）。另有著作多部，包括记录片脚本。现居克拉科夫。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来自 [Kin Li](#) on Unsplash

专栏

044 Dika “消费我，陪伴你！”

杨樱 | 接力访问

Dika 是个松弛的人，

在我们这里，能做到松弛不容易。

在普通人会觉得需要很正经去处理的那些事情上，Dika 处理起来都还挺时髦的。比如搬家。

4 月底的时候她要搬离上海，朋友圈先贴出来一张黑白海报，上面写着欢送会 & 拍卖会”和时间地点到了那天，又发出来一张照片，她捏着两张小纸片黑色细长的那张是份酒单，一款“白白上海”，白酒金酒柑橘牛奶，主打温柔的告别；一款“不做海报做 highball”，威士忌苏打和黑糖；还有一款叫 oho，其实就是开盲盒，利用家里现有的材料（比如客人带来的杨枝甘露）随机做了什么，下单者必须喝掉。Dika 捏着小卡片的手指有剪得方方短短的指甲。

这份酒单是她在酒吧做调酒师的学习成果，至于去酒吧工作的原因，则是希望先让自己适应一下体力劳动，一天站立 8 小时以上还要端茶送水洗大量杯子，如此这般，也许可以给自己之后去澳洲“做农民”打一点基础——她在 2022 年上海封城期间意外申请到了一份打工度假签证，这份签证只允许她打短工，但可以在澳洲随意移动。在被关在家里的时候，这是为数不多发生的和未来有关的事情。

Dika 出生于 1997 年在英国读书疫情期间回国，曾经是全职的平面设计师、兼职模特、兼职调酒师、全职的教育培训行业从业者，以及兴之所至的纹身师。她接触过很多人，准确地说，她维持一些工作的原因就是试图借此接触各种各样的人，尽管如此，那场“欢送会 & 拍卖会”还是有让她意外的部分。

也许是因为有酒单，也可能海报在网上传来传去，那天晚上家里来了一些 Dika 和朋友们并不认识的人。他们原本以为自己会去一个酒吧，没想到站在了人家的客厅里。

Dika 和其中一位聊天，得知她刚刚搬来上海不久。那晚离开之后，她还找 Dika 做了 handpoke，“手针纹身”——如果你不熟悉，可以理解为纹身行业的手工作业，优点

在于亲近感和工具简单便携——和拍卖搬家物件一样，Dika 会觉得这些事情都给自己带来某种意想不到的东西，“我的东西可以陪伴一个城市里的陌生人，我可以以这样的方式跟这个城市里的人发生一些连接”。

她是在英国的时候学会 handpoke 的。那时候她有个室友，也是她最好的朋友之一，是个塞浦路斯人。“她的国家还挺分裂的，所以我们有比较高浓度的政治观点交流，除此之外我们还交流电影和厨艺，比如《狗牙》；然后她给我做酸的奇怪的东西，我做拉面”。也是和这位朋友，Dika 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交流，后来回国就再也不可能有了”。

塞浦路斯朋友为 Dika 文了第一个纹身。图案其实没有什么具体指向，但有一个挺温暖的细节：有一次她们一起逛街，她们在一家店里的绘图本上留下自画像。Dika 画了当时自己一幅插画里的形象，塞浦路斯朋友画了一个抽象图案，说这是她灵魂的样子。后来 Dika 把这个图案稍加改动，让朋友文在了自己的右臂内侧，这件事是在厨房里完成的。“大家对这件事情态度没有那么严肃，没有那么患得患失……很多人是很紧张的，只愿意花高价去购买这个东西……”

这个厨房让 Dika 的很多朋友学会了 handpoke，彼此像小朋友涂鸦一样文来文去，这种和另一个人微弱又长久的关系让 Dika 觉得微妙又神奇，又有点像她在伦敦的整体社交活动的缩影，随意、不可预测但却是牢固的：等她回国之后，“这种事情锐减”，更不要提上海封控之后的那种沉闷气氛，“一方面可能更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另一方面其实也有很大的精神创伤，不如之前那么乐观。刚解封的时候，大家戾气蛮重的，特别对外卖员或者快递员之类，很多交通事故就是在眼前发生。”

她的专业是平面设计。回国之后先去了北京一家策展公司工作，“服务于圈子里的艺术展览，有熟络的艺术家”。她惊讶于一到晚上就要去大圆桌上喝酒的工作方式，又觉得自己的工作不过是资本游戏里的某个环节，于是辞职搬到上海。当时她的很多在北京的朋友都去了上海，“因为之前很多办活动的地方、有意思的空间都消失了”。

她到上海是 2021 年。上海也和她想的不一样。除了一份教育培训行业的工作，她在上海也做兼职模特。这份工作她是从伦敦开始的，一家定位多元化的模特经纪公司，填的表格就很打动她，“申请人的性别或者身材可以是零到无穷的那种”。她其实没有工作多久，因为当时正值伦敦新冠疫情。类似的期望值她带到了上海，但上海的选择少得超出预期。她觉得是因为市场需求的减少，即便有主流审美之外的品牌尝试寻找自己的顾客，情况也并不乐观。她目睹共事过的品牌短短一年就停止运营——这和整体的经济环境也不无关系——同时国内的模特行业也不在 Dika 的理解范畴之内，她从来不知道有专门的模特学校，以及，“工作的时候我问别人是学什么的，回答是学服装表演的。”

Dika 是个松弛的人。无论是和他人，还是和社会可能发生的种种交集，当它们出现在她的生活里的时候，她会带着善意和好奇心观察它们，而不是呈现某种不由自主的防御姿态，或者进入某种利益权衡。与其说她主动介入很多社会议题，不如说她不设防。对社会周遭的人和事保持敏感成了一种本能，“Dika 对很多发生的事情都有精准的描述”，这是推荐她进行接力的文楚给出的推荐理由。

她会注意到酒吧内部派对上闷闷不乐的陌生同事（他坐在我对面，我当时在洗大家的杯子，然后看到他戴着耳机看剧，自己点了一杯喝的。就是他有点强迫自己来到这个地方，但是发现自己并不属于这里），也会在坐出租车的时候向司机封控时候的生活（只能用热水器里的水泡泡面之类，“这些事情怎么理解？离每个人都近，但是现在又好好像什么事都没有一样，对吧？”）。

Dika 封控的地方，最开始只发了一大包上海青。她每天都吃。“今天煮着吃，明天做汤，后天做成丸子。”后来她把一颗上海青种在花盆里，变成了盆栽。“然后它就开花了。我第一次看到青菜开花，第一次看到青菜这么完整的生命周期，长更多叶子、开花、长到原来大概三倍高，还结了果子。我查了一下，才知道菜籽油就是从这里面榨出来的。”

她给这颗青菜、还有当时种的葱、洋葱等等一系列的“封控伴侣”拍了照片，准备把它们做成一本小册子。照片是用胶卷拍的，但是后期出了问题。

“当时因为一些政策原因，不允许快递员上门取件，快递邮寄被小区集中管控。封控的时候那种统一的快递架，像当时所有的核酸检测点一样，都是临时搭起来的，很简陋。后来下暴雨，胶卷就在等待被取走的过程中被雨泡了。”

“一开始送到一家店，说没办法洗，我就很伤心。后来找了一个熟悉的人，说可以，只是里面会扭曲或者变形。结果出来还挺有意思的，也挺符合当时的魔幻氛围。”

她说小册子如果做出来可能会送一些给朋友。这让我想到她之前在上海做的一系列小物件。那是她刚到上海那年的七夕。她把自己身体的各种照片重新设计（有一些是局部、有一些是模糊、有一些是拉伸变形），做成了鼠标垫、海报、手机支架等各种家居

用品或者装饰品。在公众号里，她这样写：

“作为模特，我常常被要求，被限制，被观看，被选择。我好奇模特身份的更广维度以及自我形象应用的更多可能性。

作为平面设计师的我，则通过对图像的操纵，将自我形象进行实验性的再处理和新应用。

认识我，如盲人摸象。”

她管这一系列设计叫做“消费我，陪伴你！”。这很上海。

Q: 最近在做什么有趣的事情？

A: 刚刚搬来澳洲。

Q: 这件事对你来说新鲜的地方在哪？

A: 第一次踏入这片土地，植被、生活方式、澳语，都很新鲜，包括自己在这片土地上的身份也得在摸索中重新建立。

Q: 最近希望解决的一个困难是什么？

A: 找到农活干。

Q: 希望推荐谁来接力？

A: 很难选！我推荐两个吧，萧勇和赵晨曦。萧勇把艺术书带到非艺术人群的手上，带着大家在北京寻找蘑菇。赵晨曦觉得时尚属于老百姓，并且想 make China lit aga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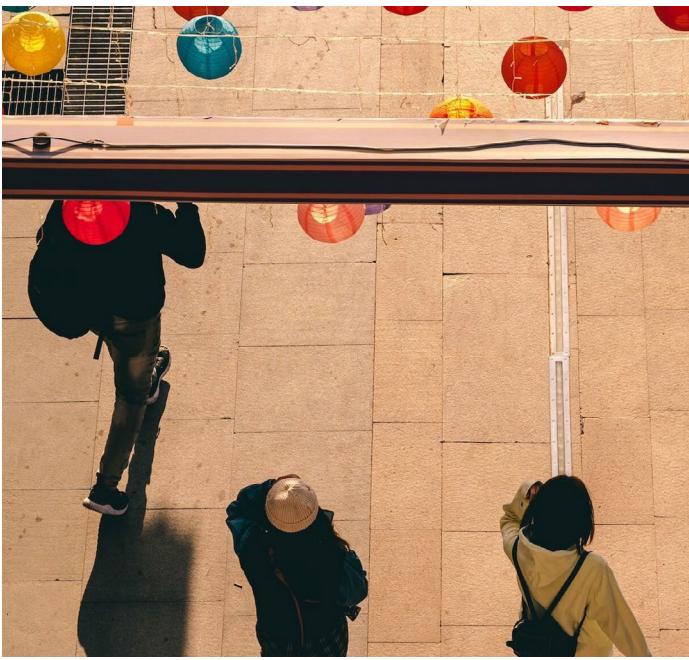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题图来自 [Max Zhang](#) on Unsplash

专栏

045 Sally 一份工作，让我回归到 “人”的视角去接受别人

杨樱 | 接力访问

这也是一个“正常”白领生活被“扰乱”的故事。

Sally 是那种北京姑娘：衣食无忧，爸妈但求她健康快乐；小时候老师看她不努力，找家长说你这姑娘再这样将来可考不上大学，她妈妈当面说姑娘自己高兴就好；长大之后如果不找个班上也不会怎么样，爸妈觉得要是老加班还不如回家躺着，何况现在这工作也不太对劲——怎么就老跟残疾人待在一起了呢。

Sally 说起这份工作，最初倒的确是出于安全的职业发展选择。在进入这个叫做乐平的公益基金会之前，她做过两份外企工作，第一份是在一家科学仪器供应公司做行政管理，第二份是在一家国际文化交流公司做项目管理，一做就做了八年。后者的实际内容是组织外国学生到中国深度参与不同的文化交流项目，到离职的时候，她已经做到总经理，虽然恰逢武汉疫情，忙活了不少时间，但这不是最主要的跳槽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通常不会兼容到一起——常见的那个是原本公司业务四平八稳，她希望更加进取一点；不常见的那个，是 2020 年第一波疫情起来的时候，她就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刷社交媒体，看那些频繁被删的短视频的时候，觉得基础设施不太对了、社区不太对了……就是各种职能部门都失灵了，人也开始释放一些恶意了”，尽管这恶意只是一种宽泛的社会氛围，她身边并没有实际的感知。由此她萌生了一个想法：去看一看所谓的第三部门在发挥什么作用。她开始看各种公益基金会、民间组织和 NGO 的工作内容。

但到这一步为止，她还是一个“不会迈出舒适区”的人。外企生活带来的生活节奏清晰有度：上班就是上班，下班就是下班。在上一家公司的時候，有不少同事是外国人，有时下午三点提议出去喝一杯，她断然拒绝：有病吧，谁想跟你喝。如果要牺牲周末去工作，这对她而言是巨大牺牲。

她最开始在乐平基金会负责一个商业评估项目，同时负责社群运营，这份工作要求她日常和很多公司打交道，递交简历的时候，她觉得和自己以往的经验大差不差，而且也不知道自己即将入职一个基金会。如今这部分的工作还在进行，但从 2021 年起，在一次筹款项目之后，她开始正式负责开发一个面向残障人士社会融入和就业能力提升的项目。

有一段时间，她在各类残障伙伴微信群“卧底”，看大家都在聊什么。按照大多数人的理解，所谓能力发展，其实就是找工作，或者职业培训。总之是会让残障人士在社会意义上变得“有用”的各种预期。Sally 的特殊之处，在于设计项目的时候没有这样的假设。她在之前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工作里接触过大龄心智障碍伙伴，也接触过视障儿童。最初她思考的问题，就是不同的残障类别难以在一个项目里覆盖周全，什么是最根本的需求和问题，她一无所知。

她开始找人聊天。通过乐平基金会此前结识的一位罕见病友、一些相关机构，还有几位多年从事残障融合倡导工作的“KOL”，她得以找到了一些思路，进入了一些残障伙伴日常交流的微信群。即便有牵线搭桥的人，进群有时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时候她需要填一些问卷，给自己设定某种残障身份，也会被拒绝。但只要成功入群，事情就变得相对容易。

这些群日常活跃。那段时间，晚上下班之后，Sally 就开始翻看三四百条的微信群聊。“每天刷，到后来我其实就发现一点：就业或者一些宏大的探讨并不是大家最关心的，甚至有时候出行都不是大家最关心的，很多社群 90% 的时间讨论的都是社交、谈恋爱、找对象。”

在这个圈子里，你能听到许多所谓的专家倡导和公益主张，某种程度上和社群是脱节的。这种脱节如今 Sally 已经司空见惯：“不管是做学术研究，写论文还是企业产品调研或体验，到残障社群分发问卷的人，或者组织一个小组去到什么公司，那些人拿着产品或者问卷接触到社群的时候，只是需要去完成一个被试的动作而已，其实已经没有调整的空间。我认同的理念是，我们做任何事，不是为了残障人士而做，而是应该和他们一起做。”

在观察了这些需求之后，Sally 也想回应一个问题：“在就业之前，残障伙伴到底可以被什么样的项目或行动支持？”2022 年，她在基金会的支持下，正式成立了残障融合实验室。

“残障伙伴当然有一些具备技能，但是他们找不到足够的市场机会，或者因为缺乏自信，被家庭捆绑等原因没办法走出来……另一边其实是去做就业供需匹配，这个桥梁是没有被搭起来的，去哪儿、给谁投，怎么写简历，一些伙伴是完全不知道的。”Sally 曾经收到过很多印象深刻的简历，例如打开简历，一页纸上只有一句自我介绍；还有人写上了“毕生所学”，却没有说清自己到底能做什么。

不过这不是残障融合实验室的核心。如果把服务残障人士这个前提先放在一边——虽然这一切开始的先决条件——Sally 做的事情的确和一个商业公司没有太大的差别。她日常的任务，首先是以企业能够理解的商业语言说服他们加入残障融合的行列，在此基础上，把这些企业的日常业务与残障伙伴的真实需求进行匹配。

“（如果）你是个硬件厂商，你的 Pad、笔记本是不是让残障人士很好地去使用？（如果）你是个互联网大厂，你的信息无障碍优化有没有做到位？（如果）你是个美妆公司，我们残障女性没有美的需求吗？你觉得我们日常不需要化妆出去见人吗？”从企业入手的原因，归根结底是因为商业主体既可以是释放资源的那一方，也是切实涉及到问题改善的服务或产品提供方。“因为社群是不能被代表的，残障本身是一个权利问题。残障融合是不同的受障伙伴跟所处的环境——物理空间，数字空间，认知态度——交互下产生的障碍，这个是我们最终要去融合的东西。”“可能先参与到我们的活动里，了解我们团队，再看看我能带他们去哪儿。我们最希望做到的，就是人和人彼此之间能有自然支持——而不是这里有一位聋人，我就给你配个手翻；这里有位视障，我把 PPT 的文字版本给你——这些是基本的合理便利，但是在现场、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自然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样一个工作状态里，Sally 边界清晰的白领工作模式其实被打破了。很多人会在非工作时段联系她，一些残障社群的伙伴也变成了她的朋友。这是她身份转换的一个“代价”，尚在预期之内，还有一些“代价”则是始料未及。比如有些人会认为 Sally 现在从事助残帮扶工作，“觉得我们作为非障碍者是在扮演白衣骑士，高高在上”。

不久之前，Sally 开会遇到了一位聋人伙伴。她第一次发言用了手语，然后由手语翻译用口语转述出来。但是她第二次发言用了口语。她对大家说，其实我是可以进行口语

表达的，我也是口语使用者，我是想让你们知道聋人群体的多样性。“尽管如此，她依然不能代表聋人这个群体”。

Sally 是一个不抗拒陌生事物的人，不仅不抗拒，接纳速度还很快。她认为这是她推动残障融合工作的优势。与此同时，她也没有特别的同情。“就是那种觉得被照耀了，人家这么不容易，我也要努力啊，就这种，我从来没有过。”但这份工作对她的的确有一个影响，用她自己的话说，“救活了我内心特别颓丧的部分”。“我原来是那种 Who cares 的人生态度。内心里有特别颓丧、很刻薄的那一面，尽管跟我接触的人会觉得我很 nice，但是我不太相信那些听起来太美好或宏大的叙事，羞于去谈、甚至有时候不认同所谓的使命和愿景……做残障（工作）之后，这部分好像我有一些了。”

她认为自己是被一个个个体接触改变的。比如她的视障同事张炜军。在 Sally 找到他的时候，起因是后者当时因为果壳一篇 10 万+文章爆火全网，Sally 想着也许可以邀请后者来实习，而后俩人又变成同事。平日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谊，直到 2023 年新年基金会开联欢会，Sally 收到了来自团队成员心吟和炜军的新年礼物：一条羊绒围巾和炜军扎了满满 4 页的盲文：“我当时其实就已经非常感动，即便我都不知道扎的是啥，反正拿着就整个人不太好了，但依然还是很冷酷的一个面孔。”

后来张炜军把盲文纸上的文字发微信给 Sally：“我看不见，无法跟人眼神交流，也看不到周围人的表情举止，所以会错过很多的信息，但是我知道你应该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在这个时候 Sally 才知道，当时接到那份实习邀请，正值张炜军人生状态很差的时候。

“我看到了更多个体的生命故事，然后我会更加拥抱所谓的多样性，或者这些其实都不是残障的问题，可能更回归到人的视角去接受一个人……我现在觉得外界的这些事情也好，世界也好，其实没有什么绝对的客观事实，（一切）取决于我们的站位、我们的角色。对，我觉得这个是让我感受很深的。”

Q: 最近在做什么有趣的事情？

A: 我们在 5 月 21 日那天有了一款叫“不得事儿”的鸡尾酒，这款酒背后是北京的一家叫 shifter 的个体商户在付诸实际行动为无障碍干杯，我们也希望藉由这款酒来表达另外一些爱，其实我们都一样。

Q: 葛宇路对你来说是个什么样的人？

A: 首先我不知道他对我到底是怎么看的。然后我也有刻板印象，我会把艺术家和文艺青年认为是不太靠谱的、天马行空的、不太稳定的人。

当年经由同事介绍说他要跟我们残障融合一下子，我就不想融合，当时很排斥，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感受到我这种排斥。后来他跟张炜军去成都弄版画，当时我就在北京家里等着看好戏，我想肯定要不然就是张炜军丢了，要不然就出事了，反正张炜军要找我，我就报警，要不然就是找人。都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了，结果没有人联系我。然后我们有个群，我就在追踪他们在成都的动态，张炜军当时说什么葛宇路给他扔下了，在展馆里让他在那刻版画，给他安排了个小姐姐。我心想果然不靠谱，把人扔这儿了。结果没想到，炜军回来就跟我分享了一些他们出行的细节，然后跟他说的一些话，在现场遭受一些“情况”的时候，葛宇路在现场的反应。我也不能说路转粉，倒不至于，对，但是还是觉得葛宇路是很靠谱、也很正的一个人。

然后有一个特别玄学的事。我上一家公司就在葛宇路边上，我每天下班就在葛宇路打车，那会儿路牌还在。我无数次站在葛宇路上，直到我在新闻上看到说路牌被摘了。后来认识他，我也没跟他说这事。

Q: 你希望邀请谁来接力？

A: shifter 的老板苗苗。shifter 除了是家酒吧，还在店里有一个免费供外界预约使用的公共空间。除此之外，我了解的苗苗，如果遇到即将喝多的客人她会选择不再进行酒水兜售（这很不容易）。她是一个不爱喝酒的开酒吧的人，我问她为啥，她说是因为大家知道一款调酒的背后很多看不到的努力，比如调酒师。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题图来自 [Yang Shuo](#) on Unsplash

专栏

046 孟建英 在贵州从江， 认识一个侗族老板娘

杨樱 | 接力访问

聊天打开的契机，是她开始给我讲新编的一出戏。

“老板娘”最终确认见面地点的时候，我和张涵露站在榕江站的站台上，准备坐高铁去肇庆。那是前一次我们约定见面的地方。列车即将进站，张涵露手机收到了讯息，表情随即变得慌张：“啊，老板娘说她已经在回从江的高铁上了！”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第三次重新买票。我和张涵露一起做这期接力访问，“老板娘”是她提名的接力人选，理由既复杂也简单：作为一个在广州附近小镇上做五金件加工的侗族人，她具有编剧天赋，可以把哈姆雷特一般的打工故事嵌入传统的侗戏表演形式里，由此带动起一个打工人大侗戏班。无论是后来在张涵露策展的时代美术馆，还是在她日常的生活里，这位叫孟建英的女士都被叫做“老板娘”，因为叫太多，张涵露一时想不起来她的大名叫什么。

要和“老板娘”完成接力访问，必须见到她本人。语言当然是一个重要原因，张涵露说她会一些普通话。但更重要的恐怕是我对她的生活环境一无所知，无论是五金件加工厂所在的那个小镇——据说在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间去那里打工的侗族人已经占据了镇人口的一半；还是她新开的饭店——在从江高铁站附近，从江，一个侗族人去广州等地的重要交通枢纽；更不要说她的故乡，一个侗寨。在这次旅程开始之前，我对包括地名在内的所有概念连书面知识都没有，但事实是即便我把林林总大的名词堆在一起，也无助于理解“老板娘”孟建英这个人。出发之前，我看了一点侗族和黔东南的书，你或许猜得到，这里面只有学术经费里生长出来的概念。

原定的计划是我们下午到肇庆，坐车去金利镇，那个五金加工厂所在的地方。聊完天，高铁也好顺风车也好，都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回到广州市中心。从江到广州的高铁时间，大约是 5 小时。

好的，所以我们现在怎么去从江？

在下一站桂林西下车，转一次车，车很多。说完张涵露露出抱歉的表情。作为联络人，她觉得有失妥当，一切原本应该如她一贯的作风，干净利落。大家的时间观念不是很一样，她站在站台上跟我说。

没关系，这样我们会和老板娘差不多时间到。

嗯，她会让朋友来接我们。

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从江高铁站前广场。这个安排其实没什么必要。距离实在太近了。车开一分钟，拐弯冲上一个斜坡，到了。我们下车，站在高低不平的水泥地上，看到整群园区模样的房子，只有铁灰色的混凝土坯，像自然博物馆里的远古大型生物骨架一样黑压压一片。好在最靠前的一排店面装修齐整，红色小旗飘扬，其中一家叫“鑫香苗侗土菜馆”，一家叫“贵香烤吧”。铺面很大，写着“主营宴席、旅游团队、各种小炒”。一张巨大的侗戏表演照片。下面的一排菜式图片，有牛瘪和羊瘪火锅。侗族传统菜式，把不经掏空的牛羊胃切碎上锅炖。

我们在门口的排档椅子上坐定，把背包放在一边，接我们的小伙儿，还有后来知道叫老杨的中年男子坐在一旁，没说几句话，来了他们的朋友。老杨指指我们，广州来的记者。你怎么知道我们是记者？

张涵露先说话：“是这样，你是记者，我也是记者，来找他们的都会被认为是记者。而且是汉族记者。他们叫嘎记者。”

“听着好像不能算友好。”

老杨说：“好，特别好！你们汉族聪明，值得尊敬！”

张涵露说了之前和老板娘的合作。老杨心领神会，如果是搞文化，那你们找老板娘出主意就对了，她找一个团队，二胡啊琵琶啊，你们去别的地方搞表演！

杨大哥是黎平县人，老板娘和小伙儿都是从江人。他们三个合伙开饭店。

“原来跑工程车的，工程都做完了，现在结账也难啊。”小伙说。

杨大哥做过大生意，在佛山开服装五金件加工厂，自己开 15 年，儿子接班也开到了第五年。二十年时间里，生意做得最顺的时候是 2007 和 2008 年，七八十个员工，400 多平米的厂房机械全部加满，连加工设备都是自己设计的。可惜没申请专利，搞专利的话，现在不是这个样子。”

他们管老板娘叫“乃龙”，意思就是小龙的妈妈。侗族女人在生了孩子之后，通用称谓就会变成“乃”。而男人会变成“甫”，意思是父亲。

在土菜馆大堂里，挂着一幅“生意兴隆”的牌匾，是和谐侗戏班成员合伙送的开业礼。孟建英也是戏班的成员。21 个落款，只有三个人还没有变成“甫”和“乃”。

“孟建英”会出现在各种行政文件和媒体报道里，朋友叫她“乃龙”，对工友和认识不久的人，她是“老板娘”。

孟建英出现的时候，抱了一只和她差不多高的玩具熊。她夹着熊从车里下来，快步走向我和张涵露，一把抱住我们。黄色紧身短衫和黑色长裤，高跟鞋，风风火火，看着干练。

她到的时候，老杨已经和我们后面的四个老乡聊了好一会儿，两男两女，大堂开一桌，一壶茶倒来倒去。看起来孟建英是为了他们临时把肇庆的见面改到了从江。

孟建英简单说了几句话，就在烧烤店门口的小棚子那边开始忙活。支起大铁锅，煤气灶下面的油桶拎起来咣咣半锅油。端来一个篓子，是生糯米，两种颜色，白色和用碱水染过的黄色。抓起几把扔进滚油，米粒迅速膨胀浮起，她用一把炒菜铲划拉到准备好的大铁盘里。如此重复三遍。手速极快，不耽误和我们说话。

这是要做什么？油茶。

一扭身从烧烤店深处拿来一条鲫鱼，还是杀好的。油锅煎鱼，然后各种盒子袋子里拿出豆瓣酱干辣椒花椒粒，接我们的小伙在案板上开始备菜。黄瓜切段，豆角切碎，拍蒜洗葱。一切眼花缭乱。只记得油锅里的香料爆开，我们咳嗽着后退几步，看着一份香辣烤鱼快速就绪。那边老杨还是和老乡聊天。孟建英脚蹬高跟鞋一刻不停，等她手拿菜刀往铁锅里削玉米粒的时候，我全然不记得她是什么时候洗的炒辣椒的锅。烤鱼和豆角炒玉米上桌的时候，炒米花刚好晾凉。

侗族人家来了客人，不管什么时候，都会招待油茶，而且都是要吃饭的，张涵露说。

我们担心聊天时间不够——回广州的高铁在 4 个小时之后——小心翼翼问她：“还有时间聊吗？”

她端着盘子往圆台面走：“有有有。吃油茶！”

油茶吃起来十分像茶泡饭。我们帮孟建英分碗，每只都盛上小半碗炒米，浇上茶水，舀一勺玉米炒豆角。茶泡饭一样的香气和口感。

好不好吃？老杨问。

挺好。

老杨露出不相信的样子，你们汉族人第一次吃就说挺好，一看就不是真心的。你要吃几次，才可以说挺好！

老杨是他们中间普通话最流利的，坐着的时候一只脚踩在椅子上，手肘支在膝盖上。只有对我和张涵露说话的时候他们才会转换成普通话。侗话飞舞起来的时候，每个人的话语都要比说普通话快上五倍。

老乡是来找老杨和孟建英他们取经的。原本是做什么生计的不清楚，反正现在琢磨着搞点什么可以赚钱。听说这里新开了饭店，也来听听情况。四人中有一个中年男子，戴鸭舌帽，别人介绍，这是黎平县里的侗戏文化传承人。我们表示致敬。他很认真，你们要找人演侗戏，找老板娘就对了，她厉害！

聊天是在客人走之后开始的。四间 KTV 房中的一间，孟建英把涂了指甲油的脚搁在茶几上。黑色的大沙发围成 U 字型。

我们一开始聊的是各种时间。在金利开厂的时间？2012 年。那么是什么时候到金利的呢？2005 年，小孩一岁。开厂的时候小孩多大？读一年级。你那时候多大？27 岁。那时候有多少老乡在金利？几千个吧。现在呢？好像是 8 万。

她有点拘谨，像有问必答的学生，安分守己等待下一个问题。这不是聊天。

张涵露想帮我打开一下局面：在广州的美术馆做完表演之后，后来还有什么人找你？看朋友圈，前阵子你似乎参加了镇政府组织的一个活动？

对。孟建英打开手机，找出一个视频放给我们看。

近日市委统战部、市民总局、区委统战部、区民总局联合金利镇政府在高要区金利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举办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暨反宗教极端思想宣传教育进企业活动，深化反宗教极端思想宣传教育，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金利公司里来自贵州等地的侗族同胞，穿上盛装，载歌载舞，唱响民族团结进步最强音。活动通过政策宣讲引导企业员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进一步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和法律意识，全面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抵制宗教极端思想的防线，共同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要深入学习民族政策，当好民族团结进步的先锋者，为促进企业各族职工交流交融作出积极贡献……通过开展民族团结进企业活动，详细讲解了我国的民族知识和宗教政策。防范抵御意识，进一步促进民族宗教政策法规走入正常生活，走进人民群众。

然后她收起手机，没有什么多余的评价。我们又聊了一会儿在厂里唱侗戏的事情：自己开厂之后生活好了一点，也没赚到什么钱，就是可以生活。大家干活都很累，下班之后想一起玩，这样开心一点，忘记干活的苦。本来就会唱传统的戏，以前老人编的，《六郎探母》《红楼梦》什么的。现在自己出来打工了，可以自己编。平时每个月的 1 号是休息日，除此之外天天上班，8 个小时。不会写字，以前也不认字，全部记在脑子里面，准备去演了，怕唱戏的工友忘记，一句一句说到手机里，微信语音，跟他们再讲一次。10 天就可以排好一部戏。

之前你跟我说过的，有一个鬼的戏是什么？张涵露问。

孟建英看起来很迷惘：有一个鬼……后来她决定不想了，整个人直起来，跟我们说：“我现在编了一个新戏。”开始讲。

有一对男女相爱结婚，女的生了一对龙凤胎之后生病死掉了。老爸娶了后妈。后妈已经嫁过 9 个人了。然后男的就出去打工了，（走之前）把（管钱的）钥匙给两个小孩。后妈的老弟爱赌钱，没钱用了，来问后妈拿钱。没有钥匙怎么给钱？就没给。两个小孩也骗她，老爸没有把钥匙留给我们。后妈就对两个小孩不好了。让他们去放羊，告诉他们早上出去 12 只，回来要 13 只。一天生一只羊，哪里可能？小孩就很害怕。又规定他们不许在附近放羊，要走远一点，希望老虎可以吃掉他们。（老虎没吃），就叫她老弟拿刀去杀他们。

两个小孩见到了后妈老弟，说舅舅，你为什么拿着刀，刀那么白（亮），你来做什么？舅舅说你们后妈让我来杀你们。小孩就求饶。弟弟不敢杀了。原本拿的银两也不要了，给两个小孩，说你们去找你们的老爸吧！两个小孩就上路了。

上路遇到强盗，钱被抢走了，没吃没住，到了一个破庙。姐姐觉得自己太苦了，找了绳子上吊。

土地公公救了她。她说你为什么要救我，你干嘛不让我死，土地公公说你死了你弟弟怎么办。你别多说了，你弟弟已经醒了，你带着你弟弟再找一下，再过几个村就能看到你老爸了。这时候弟弟醒了，说姐姐你在跟谁说话。庙里这时候一个人都没有。姐姐说跟一个老公公在说话，弟弟说在哪里，我怎么看不到，在哪里。姐姐这才知道这是神仙来救他们，这个老公公不是凡人，是神仙。就说（神仙）叫我们去找老爸，老爸就在前面。

后来果然找到了。老爸带着两个小孩回到家，先没有急着让他们露面，而是问后妈小孩们都在哪里，后妈说下大雨的时候两个小孩去洗衣服，冲下河去了。就骗他。老爸说那我不怪你，我回来的路上遇到两个小孩，别人在卖，我买了，你去接他们进来。后妈就去了，一看就是那两个小孩，心想不好了，就要去打那两个小孩，老爸知道她良心真的不好了，想杀了她，两个小孩说不要杀人，杀人犯法，给她 100 两银子让她走。后妈就说自己命不好，这辈子嫁了 9 个人，也没有得到幸福，就上吊了。后来两个小孩就把后妈弟弟接过来一起住，最后还考上了大学。

“到这里我就没有编下去了。”孟建英说。

我已经很久没听人这样讲故事，有点天真，又一本正经。“这个戏好像需要 7 个人？后妈、两个小孩、土地公、后妈弟弟和爸爸。”我在数。

“9 个。还有两个强盗。”孟建英说。“不过一个人也可以演不同的角色。”

“那为什么之前演的打工人那部戏，男女主角换了三次？”张涵露说。

“因为一个人记不住那么多词。还有大家一起玩的话，歌词就是那么多，有些人一直不换，你跟我去你会高兴吗？我也想唱，那就大家分一分，每个人都想玩一下。”

我脑子里还想着故事情节。孟建英已经开始说这场戏的演出设想。

“如果有人叫我去哪里表演的话，那就要排练几个晚上这样。不能耽误工作。去跟别人比赛的话，肯定要选段，人家最多给你三四十分钟。”“这个戏很苦的。《甫求工》又好玩又好笑，但是女主角还是有点苦的。这个故事叫《甘孜（音）母羊》。就是他们俩出生就没有妈妈，吃羊奶长大的。这个戏很苦，我估计在我们老家唱的话，人家会觉得可怜，就会给糖给钱，它是过去的……老的那种……叫什么……”

“传统？”

“对。”孟建英不好意思：“因为我不读书，我就不知道怎么讲。”

“为什么没有读书？”

“那时候不用（读书）。也需要。但是那时候社会上不是说读书的都会干嘛干嘛，别人做官哪里轮得到我？那就不用读了。”

孟建英出生于 1982 年的从江西山镇小翁村。后来搜这个地方，知道侗戏在当地保存极完整，且没有被旅游业商品化，直到现在，不连日常村与村的场戏比赛，每年正月初三都是侗戏表演的大日子。对歌和侗戏表演是日常的一部分，在孟建英那辈人里，对歌相当于聊天，遇到谈恋爱之类的场合，要了解一个人，对歌比聊天好使。

“现在很多年轻人是聊天。以前是不怎么聊天的，以前只唱歌。老家的话，不管去哪里人家都会给一点钱。（现在）去别的村子演，八千一万都有。有吃的，还有东西送。是村子里一起出的，过节也可以，有地方不过节也会请你去，（给）五六千。分了也没有多少，每个人就几百块钱，但可以有饭吃。还会买东西上来，糖啊，饮料啊。就是旁边小店里买的。也可以给现金，拿微信可以扫。疫情的时候人家也会偷偷搞。孟建英又回到新戏上：“比如龙凤胎的那个，他们俩很苦，如果编好唱出来，肯定很多人会给东西。”

“那你之前说的那个有鬼的……”

“可能没有编下去，他们（工友）怕鬼，就没有编。”过了一会儿，孟建英像想起来什么：“就是《甘孜（音）母羊》。老虎过来吃她小孩，鬼帮小孩挡了。就是老妈的鬼魂过来挡住。老虎吃不到他们两个，吃不到就把羊吃完了。”

那为什么金利的厂开得好好的，突然回从江开了烧烤店？

“金利那边也是待了很久了。我老妈也不舒服了，植物人了，脑中风。我在这里可以照顾我妈。我有两个兄弟姐妹，我姐的话在修摩托车，还是不方便，所以我在这里近一点，回去方便。一个星期帮她回去洗头。”

“杨大哥管饭店，我就搞烧烤了。这几年不好做，算起来我的（厂）也算倒闭了，三年就没出过货。没单。看下半年，下半年不行那就不行了。5 年前这里盖房子，有三年是疫情。就修到一半。还剩下那些都没人住。”

“我那个（客户）老板都打电话说自己熬不住了，我说我过来帮你打工，他说我都熬不住了，你还来？就前几天。”

孟建英的工厂从事门把手抛光。在各种媒体报道里，她都有两种照片。侗戏表演时候身着民族服饰的剧照；另一种是坐在抛光机器面前给工人演示操作，穿着格子外套，只有发型不变，马尾辫高高地扎在脑后。

后来我去搜“金利 侗戏”，出来的结果有财新的一篇图片文章（下班后的夜里，女人会涂上最艳丽的眼影，男人的头发梳得笔直，在悠扬的琴声里，他们浅唱工厂生活的悲欢离合，卸掉满身疲惫，游荡于异乡的侗家浪子，在戏里找回了旧时故乡……）；还有《西江日报》（她告诉记者：“业余时间里，在金利的侗族老乡经常聚在一起对歌、唱戏，甚至在微信群、QQ 群里唱。慢慢地，大家组队成立戏班。）

每一次报道似乎都在“穿过”孟建英，或者一起表演的侗族工人。他们会出现在名字，但是名字什么都不代表。最终抵达的是代表现代的打工经历和代表异域风情的侗戏的结合。主要在发图片，显示来自不同文化的碰撞。

后来张涵露发给了我高要镇那段宣传片的公众号帖子。《坚决反对宗教极端思想，筑牢民族团结生命线，高要在行动！》。

这也是孟建英的侗戏班得到媒体报道后的“衍生品”。出于民族团结宣传需要的表演。孟建英也排过宣传二十大的戏。“那个戏的话，有上下句，不能乱编。”

还是说戏的时候孟建英最有劲。她想把侗戏拿去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地方演，或者去哪里演她都愿意。说着说着就有组队张罗的架势，马上开始盘算筹备时间，利索得让人想起之前准备油茶和烤鱼的样子。

我尝试解释接力访问，以及我对金利镇上的侗族工友的好奇。四十年的时间，一代人带下一代人，村里的传统和生活都被搬到了金利这样的地方，现在还有打工人侗戏，到底发生了什么？孟建英的理解出人意料。

“你是不是要叫我编一个，谁先到谁后到金利之类，是不是这样？就是演自己的戏？比如我们几个朋友的话，哪一年来，干了什么，进什么厂，是这样吗？”

我想这倒也不错。如果侗族打工人的四十年可以这样被讲述。

但她理解的点又转了一个弯：“演自己也想演，但是怕别人笑话。可以编。我都是为别人好的，我从来没考虑过为自己好。本来一条路走好了，但是一条路走歪了，如果不成功的话，自己就没怎么好了。”

我听不懂这段话。她突然开始讲自己的故事。

总是在为不干活的丈夫掏钱。开厂赚的钱都被各种各样的事故花完了。唯一没浪费掉的钱是在老家给儿子盖了一间房。然后她问我们：“你说让我把自己的故事唱出来……已经很苦了，还要怕别人不高兴，你说是不是？”

离开的时候，因为实在太近，我们决定走回高铁站。马路对面也是大片毛坯房，像土菜馆的呼应一样，一家商务酒店开在一片烂尾楼里。但这里的一切有一种出于宿命的平静。正如一开始雄心勃勃的旅游开发热情，当它戛然而止的时候，大家也只能接受它。

路口拐弯之前，我给这堆毛坯房拍了照片，还有大道尽头那座号称是国际酒店的鼓楼一样的房子。那里看起来会成为从江旅游业的重镇，如果一切真的可以重振旗鼓，或许孟建英的饭店会成为通往热门景区的必经之地。

杨大哥对这生意有乐观的预期：“这个地方好停车，门前就是大马路，心里对人家好一点肯定有客人。”

但他又说，和当年开五金加工厂一样，如今做生意属于闭着眼睛赌一把。

孟建英似乎连这样的预期也没有：“政府到时候就收回去了，我们（的饭店）肯定也是要收回的。装修了也没办法。可能三五年吧。能不能回本我也不清楚，有生意就快，没生意就慢。”

告别的时候，她张罗着找车送我们，见我们说路程太近，又张罗一起走到火车站，但是很快又像个小女生一样，苦恼于一会儿自己就得一个人走回来。于是，我们在饭店门口说了再见。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题图为电视剧《女佣》(2021)剧照

专栏

047 梅若 为什么要为家政女工办艺术节?

杨樱 | 接力访问

梅若每次面对媒体讲的都是女工伙伴的故事，

这次是她自己的。

2015 年之前和之后, 对梅若的人生来说, 就好像划了一条线一样界限分明。这是她自己的说法。某种程度来说也是对的。

梅若一直在公益行业, 2003 年开始做志愿者, 随后变成全职, 到 2015 年的时候, 这份工作已经把她看待世界的方法、视角和价值观都塑造完成, 但行业在那一年前后遭遇了大环境的变化, 工作暂停。与此同时, 作为一个结了婚生了孩子的女性, 她从个人层面经历了很多困扰: 为什么成为女性会有这么多痛苦, 生活发生的那么多巨大变化应该如何应对。她为此去泰国参加过一些学习课程, 了解女性成长话题的各种“打开方式”。但就连这个举动本身, 也牵扯到前一个困扰: 她离开的时候, 孩子怎么安排, 家庭怎么安排……

当一个人生活中的原有选项被拿走的时候——熟悉的工作方式、舒适的个人状态, 或各种被认为理所当然的存在——生活应当以什么形式继续, 不是所有人都有准备。一些人选择让自己和昔日的时光一起留在了过去, 无论做什么, 锚点都在往昔; 一些人认为自己别无选择, 生存变成第一要务, 集中精力应对当下问题。

梅若属于有得选, 也知道该如何选的人。过去十多年的工作留下的使命感还在, 她依然还想去做更多关于服务他人的工作。只不过在此之前她更多在和倡导、传播打交道, 从未和具体的个体有紧密接触。在一些“理性考量”之后, 她决定和基层的、边缘的女性在一起。

“我就会想, 我不属于社会上资源最稀薄的女性, 但是我都如此多的问题, 那这个社会上有更难的、更边缘的、更基层的女性, 她们怎么去面对人生? 可能这个部分被压抑,

根本没有机会表达, 所以当时我想, 我肯定会去做关于女性成长、女性服务的工作……这里面, 劳动女性(的面向)其实是比较少有人做, 当然也有, 但是很少。”

梅若做了一些调研, 城市流动女性人口虽然多, 但随着整个城市的建设, 在不断向城市边缘扩展。但家政工是一个例外。无论是二胎家庭、养老看护还是日常照顾, 家政工是市场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 她们大多是来自大城市之外、迫于生活压力从事这份工作, 而要在这个城市生活下去, 又没有人际关系和情感支持, 处境会更孤独、更困难。在这些思考之后, 梅若决定成立了一个机构, 面向北京的家政女工群体。

这个叫做鸿雁社工服务中心的机构正式成立时间是 2016 年, 实际上梅若在早一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工作了。梅若是内蒙人, 鸿雁这个名字来自内蒙一首民歌, 说的是鸟儿通过迁徙获得生计。梅若觉得家政工的工作和这个意象有接近之处, 并且像迁徙的鸟群一样, 她们也需要同伴的陪伴和支持。创立鸿雁对梅若来说, 的确是诸多变化的结果, 也是她的工作方式转换后的呈现。她形容这就像“穿越一个历程, 没有办法详细讲述其中的故事”。

不过梅若肯定有一些东西没有改变, 至少是她聊天时遣词造句的习惯, 以及背后的思考方式。比如她会说为家政女工服务“议题稳定性较高”, 也会说某次募集到的一笔钱不能支持整个项目, 但拍了片子, 这些片子“在案外传播上发挥了很大作用”。她有一次去唐山旁听了一个义工活动, 组织者是一位自学公益活动方法多年的工人, 为期 5 天。后来她说, “其实中国民间有很多人在你不知道的地方做这样的事。”

梅若有精英一面, 她在知识体系和专业性的基础上开展自己的工作。如果不提她运营的是一个家政女工服务机构, 上面这些表述套用在各种研究上也无可。不过一旦了解她的日常, 那种案头工作的阳春感觉就消散了: 作为一个社工服务中心的主任(这是一个听上去让人想一想的头衔), 她需要负责人力、财务、行政的各种管理, 负责接待媒体, 负责在想出一个点子之后找人把这个点子变成一个“产品”, 还负责在办公室要搬家的时候处理随之而来的诸多问题。

梅若说自己是一个行动力很强的人。不仅行动力很强, 还很能变通, 有多少资源办多少事, 目标不变的情况下, 困难总可以找到解决办法。

2017 年, 鸿雁社工服务中心做了第一期家政艺术节。如果你只是一个观众, 你会看到一个在北京 798 的映画廊举办的摄影展。这个叫做“百手撑家——2017 年家政艺术节与影像计划”的展览, 核心宣传画面是一双交握的手, 年轻的来自家政工, 布满皱纹的来自被看护的老人。根据当时的媒体报道, “为期两天, 展出作品共有 146 张, 由 5 组人物故事、4 组专题和家政工群像三个展区组成, 题材涉及她们的家庭生活、劳动故事及所处社会环境等不同内容”。

在做这件事之前, 梅若不熟悉摄影师, 她写了微博推文做征集, 还没有钱给人家; 在有了照片、决定做摄影展之后, 梅若以为策展需要专业策展人, 沟通之后发现不是自己想要的呈现方式, 于是把自己变成了策展人。2020 年鸿雁做了第二届, “百手撑家”家政工音乐与诗歌艺术节。以及 2023 年 4 月 8 日的第三届, 身体呈现与影像艺术节, 家政工剧场作品《分·身》在北京天桥艺术 + 艺空间展演。这其中经历了三年疫情, 各种人员的变动和组织, 资金的筹集, 但“百手撑家”作为一个“品牌”得以确立下来。

鸿雁不是一个艺术培训机构, 艺术节是梅若让结构和家政女工、以及家政女工彼此之间互相联系的方法之一。这里面有两个有趣的事情。第一是梅若对艺术节这种组织方式的思考。第二是她对大众传播的直觉。

“我其实有意识地做了一些选择, 就是在具体的情境之下, 什么样的方式是真正能为家政女工服务的。在一个家政工的工作场景里, 她面对的是熟悉的陌生人, 如何表述权益, 获取难度有多大, 都需要考虑。我认为这都是劳动者应该享有的, 但是当时从各方面来说, 我觉得首先要做好这个人群的康乐活动, 让她们的压抑释放出来。她们其实身心都不太好。”

“其次对家政工来说, 最需要的是在周末这一天休息的时候去释放, 去哪儿跟别人说说话, 去吼两嗓子什么的。她要去排解。(只强调权益的话,)在你这上一天课, 特别有意识, 回去以后就离职了, 其实你没有做好事。你觉得你传递了非常好的认识, 但实际上并不能帮助她, 还带来了痛苦。”

“我其实开始去重新理解, 在现在这个脉络里面怎么去工作。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弄, 就开始做一点尝试, 就是怎么更好地去理解这个人群。那个时候大家就说, 我们需要认识自己。认识我们的身体, 认识我们的手, 手就是我们的生计来源, 所以有志愿者就拍了大姐的手。后来觉得挺有意思的, 就做一个社群活动, 每个人讲一个手的故事……然后想着传播倡导, 琢磨起个名字, 一定要起个好名字, 别人能记住。那就是‘百手撑家’。”

“你要做一个艺术节在鸿雁搞没有办法带来影响力,至少得在 3 个城市以上才叫全国,所以我们就找了 5 个城市,而且是 5 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城市,要么是家政工的输出地,要么是用工地。”

“虽然我们做的是家政工工作,但依然要跟社会大众保持一定程度上的链接。展览不能就放在鸿雁去展,那就去 798……一般策展人理解不了,就自己来,几万张照片不停地看……我觉得只有浸泡在这个议题里头,才能够深刻理解怎么把这些东西编织起来。”

这种浸泡也让梅若看到了自己服务的人群很细微的特征。在第二届艺术节筹备的时候,梅若和家政工一起排练一个唱歌节目,这首歌是家政工们自己写的,也由她们自己来唱。不过其中一个家政工,无论录音师怎么用钢琴曲“拔”她的高音,都唱不上去,录音师几乎都要放弃了。

“因为她的高音区已经失去了,暂时唱不上去。这个姐姐的成长经历里,她不需要大声讲话。从小家庭的处境是这样,然后雇主家里也不需要讲话,每天点点头什么的就行了。”梅若说。

当天排练队里的所有人都没有回家,陪着那位家政工姐妹练了一下午,到她已经可以唱出高音的时候,已经到了晚上十一二点。

“你知道她因此有机会知道自己的高音区是可以找回来的,这个故事让更多家政工开始意识到,我们其实缺一个机会而且要更耐心等待更漫长。我们今天的社会是非常快的,没有人等你,慢一步你就会被别人抛出去。在整个旋转的过程中,抓不住中心就会被扔出去。去理解这些东西,在后面我们做传播的时候,就很有力。”

的确很有生命力。你可以在很多媒体上看到鸿雁的故事,准确来说,是鸿雁里不同家政工的故事。梅若会讲述一些,被采访的家政工自己也讲述。这些媒体报道通常都是在艺术节的契机里发布,到了近年,也有报道鸿雁本身的。媒体把更多底层女性故事放到了台前。

梅若还在继续思考鸿雁的工作方法。前面提到她去唐山听了一堂,这是一个教授社工的老师介绍给她的。课程免费,如果来参与的人家境困难,还免费提供住宿。“有很多人是身体上有疾病,或者家庭有很多冲突,还有得抑郁症的,我还看到一个应该是有心智障碍的,也都在那里头参加活动、做义工什么的……不同的人,都是因为身心受到一些挑战。”

这个课程让梅若觉得新鲜。从方法上看,唐山课程有很多和传统结合的形式,比如按摩、拍打和刮痧。与此同时,讲述者会对参与者普及,“人在世上要贡献,不能只是攫取。要对别人有爱,做一个善良的人,这才是真正对自己好。”

就像之前说的,在梅若的体系里,这属于“高手在民间”:无论从类型还是绝对数量,唐山课程的受众都如此之多,而且对于这套方法的信任,令人印象深刻。

她了解的社工方法,都是很正统的原则、个案和小组之类的方法论表述。“尤其像我们做家政工,有点像做成人教育。好多人都初中或者小学毕业,你要和她用什么样的工作方法开始沟通?”虽然本质上都是“培养人如何服务他人”,但是唐山课程的确展示了完全不同的方法和经验,以及成功的可能。

她说要理解这一切,还是得“打开自己和世界的接口”,自我认知决定了局限性,也决定了各种可能性。有的时候她会刻意提醒自己不要自以为是,比如和更年轻的同事讨论问题的时候,比如在外面交流所谓中国公益历史的时候。这或许是她 2015 年以来最重要的心得之一。

Q: 你最近在做什么有趣的事情?

A: 我想到一个非常有趣的巧合,是 2015–2016 年我经历了一次乾坤大挪移的搬家,最近也在经历这件事。好像是我每次生命进入到不同阶段就会搬家。

Q: 你最近有什么需要解决的困难吗?

A: 我最近没有什么特别难的。办公室要搬了,我们的同事就每个人都讲一下对办公室的情感。我就跟我的同事说,我其实没有特别多留恋,如果没有钱的话,没有办公室不也挺好的吗?很多事情如果真的很难,真的就不要去做了。你如果硬来,肯定困难,你顺着来它就是好事了。

Q: 你要邀请谁来做接力?

A: 曲栋。他原来是一个律师,后来做了公益。当很多人对公益有些失落的时候,他选择乐观向前,而且还有创新。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题图为电影《在路上》(2012) 剧照

专栏

048 阿峰

把家搬进一辆面包车， 他要寻找生活里新的“意义”

杨樱、伊险峰 | 接力访问

做这一切的时候，他承认自己的局限和怯懦，
但并不恐惧，也没停下来。

01

阿峰是在 2022 年 10 月初上路的。经营五年的青年旅舍转让给了朋友，所有家当该处理的处理，剩余的整个搬到一辆改装过的金杯面包车上，同行的只有“秘密”，一只拉布拉多犬。就此开始“非必要不合作”生活。

他想象中的“非必要不合作”生活应该是这样的：去一个山里待着，再不会被人天天问去过哪里、有没有做核酸、核酸结果是否呈阴性，不会成为谁的密接次密接，也不会密接别人。远离压迫性的荒诞，远离糟心的消息。

他处于一种应激状态。兴奋。搬到面包车里生活是七八月份做的决定。一旦想好了，随即开始行动。首要的是抓紧驾照考试的最后时间期限，一边看车买车，一边考下了驾照。这算是他人生第一次爽利地把考试考了。从小他遇到大场合——随便什么看起来有决定性的场合都是——就会紧张。这次相当于抱着保险柜冲出火场，肾上腺激素帮他扫平了考试障碍。

开车上路那天，是他人生第五或者第六天开车。肾上腺激素还在。这种游牧生活可参照的样本不多，他身边仅有一个朋友，开着面包车从贵阳到了罗马，走的还是规定好的路线。何况人家并没有把家搬到车上。但他是一个历练过的人。他在街头帐篷里生活过一周。他背包徒步过一年。他和各种各样松散生活的人打过交道。何况眼前生活已经把他内心的对抗情绪挤压到了一个爆发点，他必须“和这个社会慢慢脱离关系”，寻找一种新的状态。

金杯车很整洁，哪怕半年之后都是。刚上路的时候，车里的书桌台上插着一本凯鲁亚克的《在路上》。

不过这个世界还是比他预期的更糟糕。一开始往西北走，开到甘肃的时候，一路上都不让他下车，他觉得西北可能管控还是严，于是买了假健康码扭头往东南开，觉得广东那边的氛围或许会好一些。路上经过桂林和柳州一带的某片山区，他觉得这里不错，于是就停了下来。

车刚停下，路边茶园里站起来一个农民，对阿峰说：“你有没有健康码，让我看一下。”

阿峰觉得自己逃无可逃：“这社会的电子镣铐已经武装到了这个地步，太荒诞了。你看，我躲到这样的地方都不行。”

但事已至此，他还是在面包车里生活。回到过去和继续面包车实验的不可预测性一样多。11月11日，他更新了一篇公众号文章——也是这个公众号2020年注册以来第一次更新——说自己处于巨大的未知之中。他回顾了自己过去10年的人生状态，如今再次走到了临界点上。虽然没有明确这么说，但字里行间都有“加油啊，阿峰！”的意思。一起发出来的还有四张照片：落日里趴在沙滩上的大狗“秘密”、面包车广告栏（可以做从防水补漏到疗愈DJ的各种工作，童叟无欺，吃苦耐劳）、面包车书桌台（整洁）以及夜生活。最后一张照片上有篝火、露营椅和毯子，金杯车上挂着成串的小灯。火光和夜色美好如露营产品广告。

生活如果真是这样就好了。车开出去就可以找到人生的另一种状态。有条不紊，内心平静。后来阿峰说，他开到后来对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已经逐渐模糊了，经常在想现在是什么季节，一年的什么阶段。因为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在哪里，很少打开定位，以至于只有自己觉得自己“在地球上的某个地方”。社会感的削弱让他进入一种虚无的状态。他试图用写作来对抗。以前背包徒步的时候他就是这样，记录自己，记录一路上遇到的人和事。

但这次不行，他找不到自己写作的身份。“我要写给谁，我为什么要写”。如果他写了，那也是一种大脑锻炼，尚有人类对话在进行，哪怕是和自己。那次公众号更新之后，他立下目标，一周两三更。事实上至今公众号也只有两篇文章。他未尝没有写，那是11月底，他试图写点什么，作为对北京和上海发生的事情的遥远回应，但公众号审核无论如何通不过，他又不愿在文字上妥协。于是就算了。

焦虑。他其实无所谓生活条件，最折磨他的是意义。车开在路上——有时候也停在朋友家附近——生活每天都在进行，但没有“事情”做。没有“事情”就无法自洽。不是那种赚钱的“事情”，虽然生活费也是必须的，而是那种有意义的“事情”。

至于什么是“意义”，要从阿峰高中毕业之后的生活说起。

02

阿峰生于1989年，山西运城人，“关羽的老乡”，除此之外他没用别的介绍他的家乡。事实上他和运城的联系也不多，到武汉之后就没怎么在家待过，就连后来和妈妈一起住，也是把她接到了贵阳。

阿峰觉得自己的命运是被高考改变的。他是那种“事情越大我想得越多”的人，高考偏偏要求各种临场应变能力，而他不行。后来也是这样，有时候他被拉进了某种变动之中，其实内心远远没有准备好，肌肉僵硬，神经紧张，所有压力扑面而来。

“高考没考好，也没复读，就读了大专。其实我所有的根源应该就是在这一刻发生的，我觉得我可能要和别人走不一样的路，因为我不可能在校园里一直往上拼，那是别人的路，我的路要在校园之外了。”

高考失利之后，他的沮丧持续了整个大专生活。“后来我想，可能是社会给我开了一个玩笑。”“从小我被灌输的思想，就是如果在教育上已经落后别人的话，在社会上的起点就会比别人还要低。这种传统的观念给我的压力非常重。”

他决心用另一种方式改变自己的命运。“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做其他事，尝试比别人先走一步，比别人更早、更快、更多接触外面，找机会去认识别人在校园里遇不到的东西，包括找实习、主动和老板谈工作，看不上我不要紧，我不要钱，免费给你做。也包括背包徒步去打开自己。也尝试写东西，主动和喜欢的作家发邮件去学习。总是带着这样的劲儿，我就想我一定要这样干。”

所有做的事情里，间隔年带给他的影响最深远。虽然背包上路依然凭的是那股“我要改变命运”的劲头，但是这件事的持续时间够长，历程也够多元。它让阿峰看到了全然不同的世界。

那是 2012 年。一开始他只打算走一两个月。他有一个迫于无奈的原则，就是少花钱。之前实习和工作一年零 8 个月，阿峰攒了 1 万多块钱，这是他间隔年的所有储备，中间也打了点零工，挣了 1000 块钱。后来他总会重复一些数字：搭过 400 辆顺风车、在二三十个陌生人家借过宿，徒步了四五个月，看过很多不同风景和城市。这段描述是为了强调他被“种完全陌生的文化冲击”之前的自我——不是一个平平之辈，多少也见了世面——尽管如此，他还是“整个人被颠覆了很多东西”。

颠覆他的是 2012 年 6 月的香港。游行的队伍就在街上，他要碰面的朋友在中环大街上的帐篷里席地而睡。

朋友叫阿豪。无论是名字还是职业都非常香港。阿豪是一个海边救生员，也教人游泳。他们是在漠河认识的，又结伴走了东北和内蒙，大约十几天时间，相处特别愉快。阿豪教会了阿峰一个技能：搭便车。徒步之处，阿峰没有搭便车的勇气。阿豪和他一起看了一个纪录片，《搭车去柏林》，顺便传授了搭车技巧。

那次见面之后，阿豪回到香港，骑摩托车出了车祸，挺严重，有半年都躺在床上。这半年里他为了解闷，书、电影和纪录片看了不少。看着看着人就变了。“他说自己以前是一个没啥文化的香港混子，骑个摩托车每天浪荡，然后去海边，在救生员的塔上一坐一天。这半年完全改变了他。”有一天阿豪看了一个新闻，香港汇丰银行大厦下面在进行一项社会运动，他有兴趣，就拄着拐杖去了。到接待阿峰的时候，这个运动已经持续了 10 个月。

阿峰后来写过在香港的经历，发在贴吧和天涯上。贴吧是他间隔年旅行的图文直播连载，有几十万人浏览，百度把帖子放到了贴吧首页，有出版社联系过阿峰，看看是不是有出版的可能。天涯发布的时间更晚，但也没有晚到完全发不出来的时间，大约是 2014 年年初。到了 2018 年的时候，阿峰再去找这个帖子，已经找不到了。

香港让阿峰亢奋，他每天写下自己的见闻，7 天写了八九万字。冲击主要来自于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以及背后的社会观念。这些观念与高考失利之后带来的功利心形成了巨大差异，久久震荡了阿峰之后的生活。

他和阿豪一起住在汇丰楼下街道旁的帐篷里。阿豪介绍了他认识一个美国朋友，马克。素食主义者马克光脚、身型瘦弱，做事却很猛烈。马克在运营一个叫做“丰剩”的团体，每天收集大型超市丢弃在地下垃圾场里的过期食物，留给自己一部分，剩余的分享给所有有需要的人。这些食物其实就是在时间意义上“过期”，完全没有变质。包括大量的面包、豆浆、鲜奶和其他新鲜事物。

豆浆是用来洗澡的。阿豪说服阿峰，豆浆可以和人体酸碱中和，是天然去污剂。他们会去体育场免费冲洗，如果过了时间限制，就会去公共厕所。半夜的女厕没有人又干净，他们在里面用豆浆和凉水洗个干净，再回到大街上的帐篷里。

很野。阿峰后来说。他和马克一起背着超市剩食走回中环，去女厕洗澡，有时候阿豪在路上会戴着头套，纯粹是对寻常路人的视觉挑衅。内心规矩的阿峰觉得尴尬，不自觉就要离他远点，阿豪再故意靠过来，让他不要那么在意别人的目光。

阿峰在那一周里认识了很多年轻人，有一些是从国外来的流亡者，还有一些就是原本在街头生活的人。他做过一次关于流浪和搭便车的分享，听完的人把资助金夹在他留下的一本书里。这些都是阿豪教他做的。那时候他还远远不习惯被资助，其实后来也是。最后离开香港的时候，阿豪给了他一点钱，是之前车祸保险赔偿里的一部分，大部分已经给了别人，最后一点留给了阿峰。好好走完间隔年，祝你顺利，他说。

阿峰后来回想起 2012 年自己在香港过的那 7 天，“也没有很特别，就是每天去见一些新朋友，聊聊天”，但是“看到的东西都非常强烈，每天都被强烈冲击着，那个状态是很亢奋的”。

在那以后，他每年都要去几次香港，至少待 7 天，有时候是 10 天。朋友们本身在香港的生活在扩展，阿峰目睹了渐进式的变化，一直到 2019 年年底。

03

关于香港留下了什么，阿峰没有展开，但无疑锚定了他对“意义”的定义方式。事隔 11 年，他语气里的惊奇和兴奋似乎没有褪色多少，那种充满公共性的生活，跳脱传统社会框架的潇洒，为理想而燃烧的热度，仿佛只在昨天。

阿峰说他当时想过很多生活的可能，但最后还是回去上班。“为什么你没有留下来，既然你看到了让自己那么兴奋的生活？”

很难在香港找工作是一个原因。但还有更重要的。阿峰说：“（香港那种生活）我觉得我当时还驾驭不了。（香港的事情）在内地没法做，社会没有开放到那个程度，而且传统

对我的束缚还在。要成家，要事业，要稳定，我那时候想放弃计划，寻找未知，但是做不到。其实我驾驭不了这些东西。”

“驾驭这个词后来在阿峰开面包车上路之后也被提起，就像我现在开了个面包车出来，其实我还没有掌握这种生活方式。内心其实不是很自信的”。邀请他接力的孙大肆很准确地描述了阿峰的人格特点：“很多人都会怯懦，但不会承认；而阿峰是承认的，同时他内心又没有什么恐惧，我觉得这样的人不多。”

2012 年告别香港之后，他去了北京。他最初想当一个写作者，自媒体计划都写了，但回答不上来别人关于商业模式的问题；去过众筹网，想着可以帮助艺术和其他创作的朋友筹集资金；和朋友在不同的地方创业，都没有成功。2017 年，他落脚在贵阳，给一家互联网公司做平台运营。机会出现得很偶然，他住在当地一家青旅，没多久就接下来自运营。他要让这里成为一个青年空间。

关于青年空间的想象，阿峰从香港的德昌里获益颇多。那时候他去香港已经可以睡在之前朋友做的空间里，十几平米的弄堂房子。朋友也带他去别的空间，德昌里是他最中意的一个。那里日常卖唱片和碟片，2013 年那会儿，老板四十来岁，唱片店免费提供给年轻人，让他们在里面发起各种活动，或者就做一些日常的交流。

“那个地方看似混乱分散，不同的人在那里，每天都到天亮，但实际上它是有序的。只是没有组织、没有干预、没有主题，你在那边，也没人问你要干嘛。大家没有事的时候在里面待着看看书，他们告诉我：你来了待着就行了，看你想做点什么，你自己来安排，或者你跟着我们一起。然后他们白天会带我去一些不同的地方，去参观一下，在那里呆着，听他们聊天，基本上没有什么正经事做，就是没有特别明确的目的。”

这就是阿峰对于“青旅 + 青年空间”的设定。他也要做那个不加干涉、不作审查的老板，让各种思想和观念在这个空间里发生，让贵阳多一个接触多元文化的机会。除此之外，如果有在贵阳演出的音乐人来住，票卖得不好的话不用支付房费，阿峰还会介绍下一站类似的低成本演出地点。他之前徒步受人帮助，如今也把这种帮助传递下去。

这种一边上班，一边做青旅空间的日子一直持续到 2019 年年底，公司项目结束，他辞职，并做了正式留在贵阳的决定。青旅一直开到 2022 年 7 月，中间还经历过一次拆迁，阿峰在旧址 200 米开外重整旗鼓。开青旅这事，他一直用自己的钱，没找合伙人，也没找投资。

一开始做空间的时候，他说自己的状态是“强对抗性”的。和自己不是一类的人，都是“他们”。他要改变“他们”。后来阿峰变得平和，在青旅的日常运作里把自己变成实践的一部分，“相当于告诉别人，你不用按照社会上那种标准生活，你也可以有别的选择”。

放弃青旅的理由除了疫情对收支的影响，更多是阿峰对自己状态的质疑。他觉得自己状态那么差，空间也好不到哪里去。倒是如今在面包车上，他还能继续推进当下的生活实践。抛弃了传统意义上的“房子”，日常的社会关系也是流动的，一切都更像当年香港街头的朋友们。

新问题是不知道怎么介绍自己，有时候会说自己是个研究宇宙的民间科学家，这当然是一种戏谑，戏谑的背后是游移。他尝试去掌握一个“无身份状态”。如果没有一个社会支持的身份，别人对他就可以有各种看法：有人觉得他做生意失败之后跑了，有人觉得他又想搞事情。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些都不是。那到底是什么呢？

04

有一次阿峰开面包车开到海南万宁，住在一个朋友家附近的闲置房子里。那天下了小雨，天有点闷，他简单收拾了房子就住了进去。第二天起来，发现自己多了邻居。有个号称大师的人要来闭关。阿峰和大师聊天，后者说自己专治癌症和精神病，方法是在山里找草药，给人服用，也可以药浴。还用流行歌曲改编了佛法歌，给那些人唱一遍。

“我问他如果人没治好怎么办？那人说，死了的话就选个墓地，保证他们家风水好。”

换做以往，阿峰会立时三刻觉得这人是个骗子。其实他当时也是这么想的，一开始冷嘲热讽，或者逗着“大师”多说几句，记录一点素材，只不过一直没想好要怎么写这么个人。后来有一天，阿峰突然觉得这个“大师”算不得坏人，服药洗澡之后起码病人走得干净，很多农村的绝症患者临终也许也会更安心。“我更温和了一些。”他给自己下结论说。

聊起这个的时候，我们正在谈写作。“大师”的确是作为写作素材出现在对话里的。写东西是阿峰眼下生活的一个出口，他定义为自救，发不发表都是其次的，主要是对生活的一种自救式记录。其次是看看朋友正在做什么，他是否可以参与进去。比如一个朋友在贵阳做展览，于是他帮忙布展，也学习策展是怎么一回事。

他前阵子知道阿豪又回去做救生员了，大约是从前年开始。疫情之后，很多香港朋友都失联了。和阿豪四五年没见，再联系上，发现生活变化之大，竟让彼此聊着聊着就陷入沉默。有很多话题阿峰想留在当面聊，他能感觉到阿豪的沉重。

因为想和朋友一起做事——在他确定自己要做什么之前——阿峰无意之中成了其他人生状态的观察者。直到现在，他说很多朋友的状态都是“懵的”，“就好像被胖揍一顿坐在那里”。问各种人接下来想做点什么事，得到的答案都是“想办法搞点钱”。

“我说全部的社会的信息告诉我，国家想搞钱，政府想搞钱，企业想搞钱还在裁员，然后个人也想搞钱，那钱从哪里搞？”

“我就发现所有人都在这个问题里面。问最近要做点什么事情吗？也说不清。前两天我发朋友圈，等待戈多，就是两个人在走来走去，也不知道干嘛。这个社会也不知道往哪走，巨大的未知，巨大的颓丧，我跟孙大肆说，在现在这个荒诞的时代，有点事情做已经非常不容易。”

Q: 最近在做什么有趣的事情？

A: 没想到什么特别能拿出来说的。最近就是学新东西，发现自己还在学习的状态里。不过有一个事情我想说一下，可能接下来想正式进入一个在路上的状态。其实去年在车里已经贴了广告栏，但大部分时间我没有主动去做，我想把这个事情做起来。比如我路过一个卖西瓜的市场，弄一点西瓜去路边卖。我想把这个状态找到。

Q: 之前没有这个状态？

A: 我可能刚知道我该做什么。之前跟朋友聊天，我说我已经没有租房的欲望，也确实忘了自己生活在面包车上，可能车门打开就是生活，我已经默认了这个状态。之前有逃避、对抗，还有焦虑和恐慌，其实是非常不平和的状态。现在渐渐意识到了我就是一个被风吹出去的小船，随时可以靠一靠岸，就是这样。

比如路过一个村，我可能会拉一点东西去那边卖一卖，弄个移动小酒吧，有人喝就一起聊聊天，没有就继续往前开。

Q: 之前贴了小广告没有人找你吗？

A: 有，在路上确实是给干了不少活，刷漆、给别人人民宿守店，还有这两天帮朋友布展。但是我得过心里这一关。还是想太多，我没有那么自然，也没有那么自由。这种生活状态我是有了，但我没能力去实现，比如摆摊我有个摆摊的心理关，我有时候经常不自然。其实我骨子里是一个比较害羞的人。

Q: 希望找谁来做接力？

A: 苗族音乐人叠贵，他也是一个鬼师，还是一个跨界写作者。他现在在巡演，我觉得他很需要发声，所以传给他。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题图来自 [Lucas Hoang](#) on Unsplash

专栏

049 3in “我完全不会说 我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伊险峰 | 接力访问

他是个书籍装帧设计师，也是个体力劳动者，
比如在货拉拉做搬场工人。

3in 在不大的办公桌上小心地铺开他的家什，各种大小、各种材质的纸，一本很厚但切割得很整齐的样书，用 801 聚乙烯醇胶水粘合好的一本样书，几本已经印好的小薄册子，小开张的海报和类似于简介和说明的宣传折页。他开始讲怎么确定版芯、横排竖排，天地左右，字体字号，纸张克数，纱网布……他看我研究那本样书，说如何调 801 胶水，聚乙烯醇，如何切齐纸张。他把小本子翻得哗啦响，看，即使厚厚的而且是 64 开，也能摊平每一页。

这是 3in 跑业务时候的装备，一泽信三郎帆布包装下所有，外加一条毛巾。毛巾很神奇。才看到他在水龙头那绞了一把擦脸，再转身又不见了。

他说他东西很少，夏装四五件衣服，平时住办公室里。他把话题转回桌子上那堆纸上。他在这个行业里做设计已经三年，有一点疲劳，大概因为越来越意识到这个专业里面有一种行会式的无聊——大家做的都是物，并不关心思想，嗯，可能哪个行业都这样，我附和。你们这个行业里厉害的人是什么人？有几个那种手艺人一样的老头，他觉得做得挺好。对他影响大的叫祖父江慎，做了 50 几年的书，有点像是老顽童。那些书做起来都像是给小朋友看的，其实很复杂，但小朋友也会发现他设计中的闪光点，会觉得枯燥。祖父江，他姓祖父江，名慎。

见面之前，他寄来几本刚做出来的书。其中有份绿色小册子，是朋友翻译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简洁，轻而韧。

书籍装帧设计师 3in 是潘赫推荐的接力访问对象。从潘赫到认识他的其他朋友总是给他贴上一些标签，包括但不限于：潮汕人、做货拉拉替父亲还债的人，最了解义乌的人，

等等。

说潮汕人，得说家庭，他说他们家不是典型的潮汕人，虽然在规模上毫不逊色，但在关系上要淡漠得多。他已经三年没回家过年，与疫情有点关系，但并不是主要原因。更多与债务和躺平的父亲有关。

做货拉拉——确切地说，是货拉拉的跟车搬运工，并不是我们第一反应中的货拉拉司机——与他的书籍装帧设计师身份的反差，也是最容易让人关注的一个标签。

至于“义乌通”，他在义乌生长，所有有关义乌的事，都应该问他。有人这么说。

有关 3in 的时间线是这样：

1996 年出生在义乌。父母来自潮阳，在义乌做内衣生意，卖袜子。妈妈管钱，爸爸管货。

2011 年母亲生病。那时 3in 15 岁，读高中。

2012 年母亲去世，留下六个孩子和一个巨大谜团。

母亲去世时 42 岁，六个孩子是姐姐，3in，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可能是想要第二个男孩吧，似乎还包括了意外怀孕。这是 3in 的分析和了解到的家庭秘密。这是他们家最具潮汕属性的那部分。谜团，表面问题是：妈妈不但把钱藏起来，而且还另外要了几十万块钱（父亲的说法），去世之后，这些钱没有下落，甚至买的房子都不知道在哪里。钱和资产都哪里去了？深层问题是家庭中，特别是父母之间如何丧失了信任，以及这种不信任如何毒化了家中每一个人的感情。

2012 年，罕见暖冬，3in 家在义乌的保暖内衣生意遭受重创，赔掉七八百万。

似乎也有母亲生病到去世，家人无暇照看生意以及错失应变机会等原因。

2014 年，3in 考上汕头大学，学新闻。半个月后认为这不是他的兴趣所在，开始自己留意设计方面的出路。

2015 年，在上海 PSA 美术馆结识了上海定海桥、广州上阳台等社群，世界被打开。

2016 年，他在家中整理柜子时发现枕头套里的金子。

“塞在一个衣柜的最下面，上面是冬天的被子，下面是纸箱，纸箱里是枕头。以前也翻过，不起眼，翻一下就放回去了。枕头里发现了金子。”

“就把我爸叫下来，我说你来车里，你看一下是不是之前你说保险柜里找不到的那些金子。他看了以后说是，然后就说你妈妈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些事情，我也不知道她藏到哪里去。那种很失落的表情。他不知道妈妈为什么要这么做，她这个做法深深地伤害到他。我妈生病这个过程，他其实有尽到家人的义务，很用心地照顾她，甚至生意都不管了。”

“就是搞不懂。为什么是这样子。我爸爸长期抑郁，跟我妈的这个做法有关系。一方面我能确认他们感情很深，我妈过世之后，我经常看到他半夜喝大酒，不睡觉，有的时候偷偷流泪。另一方面，直接伤害到我爸的同时，也伤害到我们子女跟我爸的关系，因为他状态很低落。然后也让我对家庭这个概念产生了深深的疑惑，为什么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觉得她这个做法就是像个谜团一样。”

2018 年，律师建议通过遗产分配交割产权以供处置资产。

2019 年，延毕一年后毕业，去杭州工作。

2019 年，法院发传票给他父亲，如果不归还贷款，将按骗贷处置。3in 和姐姐决定首先还银行欠款。

2020 年 11 月，开始做货拉拉搬运工。这样来钱快。

2022 年年初，与三位工友搬钢琴到六楼，没有电梯。拉伤，胸部、肩部毛细血管爆裂。

2015 年有两次开眼界之旅。3in 发现，生活可以有不一样的地方。“我当时啥也不知道，听说有人自称是道家安那其，这是什么意思？那年去上海，后来去广州，还可以这么玩，大家一起租个地方，穿着花花绿绿奇奇怪怪的，不是那种亚文化青年的漂亮，而是一堆人高矮胖瘦不一样，就在那吃在一起、住在一起，一起做些活动，一起玩。我有种进城的感觉，这是我接触不同人群的开始。他们是我学生时代重要的一个对照系，我在县城里长大的，义乌就是一个县级市嘛，外面原来可以有这样的人。”

不过，3in 觉得自己跟他们还是不一样。学生时代还好，他打工赚的钱够花，从汕头

跑到上海去看艺术展，到广州参加活动，跟大家玩。现在还是可以一起做事，但参与得越来越少，因为要打工。从 2019 年开始还债，现在还完了，还是不行。他说他要每天准备着面对各种突发情况，家里老人生病——他指的是爷爷——需要治疗，他爸爸经济拮据，负担不了，3in 和几个姐妹要出力。要攒钱，和朋友玩的时间就少。

“我完全不会说我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即使有一天有条件了，比如说我财务状况好一点，不需要每天为还多少钱操心，也是一样。”

朋友们也不是有钱人，在常人眼中，都是穷人。但他们主要对钱采取一种更随意的态度，一方面对物质需求不高，另一方面，通常会有一些补助，最直接最常见的来源是父母。3in 在前一方面与他们类似，后一方面则完全相反。

“对于怎么生活这件事情，细节上超级不一样，我完全不会觉得睡办公室是一件很苦逼的事情。我觉得挺开心。因为能让我省钱——我所有的考虑都围绕这件事。”

他又数了一遍：全年二十来件衣服、被子、书。身上那件短袖衫是印尼一个大市场里买的，做工和花色都精致。跑业务，干净一点好办事。他说。

我想说他很波西米亚。但我知道，这在他们那个圈子里并不是一个表示肯定的词，可能只有中产才会把波西米亚当成一种去除了大部分物质欲望的生活，而真正的波西米亚们可能更在意别的东西。

比如“体劳”。

“我不开车。货拉拉有个业务就是搬家，在 app 上抢单，有的时候司机单人作业，一个人自己就能搞定，搬家东西多，就要有组队模式，有队长有队员。”

“我是队员，从来不做队长。队长像是升级打怪，干满多少单，多少在线时长，好评率达到多少，就可以申请。货拉拉每个单最大抽成是 30%，对于队长来说，申请这个东西也就多挣十块二十块，不值得。当然，队长可以走私单，自己接活。你可以跟客户说把这个单取消掉，私下加个联系方式就可以自己做，不用经过平台了。”

“后来因为全程录音，这样也不是太好做。”

带他的队长叫路平，吉林四平人，四十岁上下，也是他的入门师傅。

“这一行要教什么？”我问。

“这是技术活，拆装技巧之类。刚开始只能干小活，单身的搬家，东西少，一点一点可以搬大的，五六口人换房子那种搬家。”

“你一个戴眼镜的大学生干这个不会被歧视吗？有人问过你的身份吗？”

“路哥有问过。别人不会关心。主要还是看能不能干活。搬到中午休息的时候，会有人问为什么来做这个，我就说我家里欠钱，他就立刻理解你了。”

“路平也是。家里两个老人得癌症，老丈人和丈母娘。太太是杭州本地人，没有工作。”

他想起歧视这个话题。“你力气不够大是不行的。没有效率，下个单子就不叫你了。路平觉得我还可以，主要是我守时，不藏着掖着，人品好。”

路平原来做酒店管理，挺体面的大堂经理，本来要在西藏大展宏图，有人投几千万弄了豪华酒店，然而疫情来了，酒店亏本关张，就从旅游业里出来了。加上老人生病，也做搬家这样来钱快的活儿。

钢琴那次是私单。每个人分 800 多元。

3in 对各种体力劳动没有陌生感。最早做洗碗之类餐馆的活，长的做过两三个月，每天洗两个小时。上学时还做过布展工人，做酒店宴会筹备，几百人的大会议，套桌布、搬桌子。那是在广州的国际会展中心，那里养了不少日结工，地下仓库里搭几个床，干完活在那里睡觉。两班三班倒，因为布展都是在夜里。布展的活一个小时 8 块，有时连班上，从早上 8 点做到凌晨 1 点，那天赚了 144 块钱。蛇头可能一小时拿 15 块，再克扣一顿饭钱。3in 并没有因此而愤愤不平。

到 2018 年、2019 年左右的时候，他给一位策展人朋友做助理，一小时 50 块钱，对于学生来说，这工钱不错。他说洗碗也就 10 块或者 11 块一小时。我说那跟麦当劳差不多，也是 11 块钱一小时。3in 严肃纠正我：不，麦当劳是 16 块 5，一点点奶茶是 22 块 5。星巴克兼职分两种，学生兼职和社会兼职。时薪都按照正常员工小时工资给，但做工有时限，不给多做。按照正常的劳动时间来规定，那时好像是 20 块，现在不到 30，二十六七的样子。

3in 对各种时薪保持充分了解。他说他现在跟那时的工友还有联系，他们很多人都是中专和大专生，学校劳务派遣，学校还会从中赚一笔。现在这些人大都留在广州，有一个一直有联系的工友在卖汽车。

“工友”这样的词经常会在 3in 的表述中，同样的，他还把所有体力劳动简称为“体劳”。这是一套语言体系。在坐地铁来我们办公室的路上，他路过愚园路 1315 弄的“路艾故居”，他把路易艾黎简称为“路艾”，这个意外邂逅让他很高兴，特意在朋友圈发布。路易艾黎是中国“工合国际”（ICCI）的主席，国际友人，也是工人运动的著名领导人，属于官方认可的国际主义战士一类角色。

我们大体上可以看出 3in 的价值观：对安那其主义有好感，对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有热情，而且身体力行，日常“体劳”。这是他和朋友们最不一样的地方。以往我们遇到的同样价值标签的人，大多是参与过“体劳”，或者是利用自己的技能帮助体力劳动者，比如让他们学会记录自己，比如欣赏某种无产阶级艺术，还有常见的宣传与鼓动。

3in 觉得自己还是朋友们对那一挂的，也和工友亲近。他酒精过敏，工友私交日常靠喝酒。路平会喊他去，他只好说不行啊路哥，我喝酒会死的，喝白的会吐一整天，酒精过敏就挂了。抽烟可以。歇口气的时候，递一支烟，“兄弟，来一根”，然后说几句解乏的话，还是那些为什么做这个之类的话题，他说这甚至都不能算是共情。“共情”跟“生活方式”一样都是更高级一群人的话题，是更擅长使用概念的人才会用的词。他们说话和抽烟一样都是解乏的一种，同病相怜，“你说你家里要还钱，他们大多数都是这种状况。挣快钱，干体力活。年纪大了出去找工作也找不着。滴滴你跑一天就三四百块钱，你干个搬家五六百块钱，能谈价运气好能一千多。大家处境一样。”

“那在生活中你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位置上呢？你跟谁在一起会更舒服一些？”我问。

“我理解就是更信赖或者更喜欢什么样的人……”他想了一会儿，努力理解我们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含义。“我觉得我和更爱哭的人在一起会更自在。会暴露自己缺陷、暴露自己弱点的人，我会觉得待在一起更舒服。这样的人有工友。”最后强调的这一点，倒也不奇怪。

“因为这样的人不那么男性化，有一些女性化特质，你看潘赫就没有太强烈的性别感，这样的人更舒服。”

“我觉得对我来讲每个人的处境都是很个别的，但有一些生活上共鸣，比如我跟工友谈，最近发生什么事情，他还了多少钱的时候，你觉得你跟他处于沟通聊天的状态，可能提一两嘴，就能马上映射到你现在正在遭遇的一些事情。当然，他们不会讲这些，他就递支烟给你，或者像拍小孩子一样拍拍你，然后继续干活，你会觉得这时候是真正表述自己。”

他迅速地把这个问题又纳入到他的“工友”体系中，“我觉得我和他们待在一起舒服，是因为我觉得我在面对很真实的人，我在听他说自己的生活和遭遇，我也跟他们交换我自己的遭遇，这种连接很重要，所以如果回到抽象一点的问题，把我放在什么位置，我好像从来没这么想过，完全没有想过。”

“但路平还有工友是‘爱哭的人’？这些大哥不是都很 man 的吗？”

“Man，但都是性情中人啊。他们可能不会爱哭爱笑什么的，但情感很充沛。涉及自己的事是不内向的，他们只是不是很会表达自己。”

他觉得似乎表达得不是很清楚，说回自己“对我来说是这样的，如果说有一个知识版图。在我上学的时候，还没真正开始干‘体劳’的时候，我学到的东西、我认识的朋友，对我来讲就是我的思想世界的各个坐标，有点像是这个世界的翻译，标注了我的位置。但‘体劳’之后，我发现脑力活动之外，体力劳动还会为你打开另外一个可感知的世界。就像老师傅上手教你手艺的时候，他不会跟你讲要怎样怎样，他没有一个思想的整理，他更多是通过身体和身体的这种接触，大家一起在相处工作的时候，去习得知识。”

约采访的时候，3in 说他很在意体感，所以一定让我们留出充足的见面时间。

“路平教了你什么，你习得了什么技能？”

“一个人怎么组织他的生活。因为他的状况也很难。他为了多一些收入，额外组了一个搬家的大群，他经营得很认真。五大三粗的东北人，但是想法很细。有的时候，我觉得用‘苦命人’这种说法也不是很合适，我就是能从他那里看到一个人在世界上的挣扎是怎么回事。他很像我接触到的一些父辈，能吃苦，能忍。他们觉得男的就应该这样。”

“所以开始做‘体劳’之后，这些工友，还有这些接触到的行业，变成了我现在可能 80% 的世界。20% 是留给过去的、留给精神的。”

这个比例超过了我的评估。3in 还在那里继续独白。他讲到了在义乌市场里长大——我们漫长的聊天里对义乌说得是最少的，在最后时刻，仿佛他口中的人生各个片断开始聚合，发生关联——他在市场里长大，爱好就是逛市场，从内衣走到卖皮鞋的，卖皮带的，卖塑料玩具的。一个小孩，因为父母没有时间管他就逛市场，闲着买点吃的，然后就到处走，到处晃。

“就觉得自己在看人家怎么营生”他说他也可以做,在生活当中,面对困难和问题的时候,他说他感觉父辈和当时逛市场看到的那些人和他的工友,是同样一群人。“看到了那些人,看到人家怎么营生”。

他是他们家唯一在父母身边长大的孩子姐姐七岁的时候才从爷爷奶奶那里回到义乌妹妹也差不多,甚至两个最小的妹妹因为超生而寄着在东阳市,随着养父母姓陈,不姓刘,这样上户口方便。她们知道自己有东阳妈妈,还有义乌妈妈。她们回到义乌家里不过三四年的工夫,义乌妈妈就去世了。

3in 平时和姐妹联系也不多。她们性格各有不同,但都不愿意面对母亲去世后的家庭,尤其是 3in 说家里又有什么事需要他们共同负担的时候。

母亲留下的谜题,父亲的处境,还有家庭,他都没有什么人可以聊。

他记得有一次,妈妈来接他,中学离他家大概不到两公里。路过一个类似于巴黎世家这样的奢侈品店,他妈妈这时停下来接了一个电话,他就看那店。打完电话他妈妈问他,要不要进去看看。他说那有什么好看的。妈妈说,要不要给你买一件。他说你别开玩笑。

“妈妈现在很有钱的,给你搞两件”。当时他懵掉,问:“我们家条件这么好吗?”

他最后说:“你不要给我弄这些东西。”



伊险峰

出生于辽宁海丰张,满族。人生第一份工作是在沈阳铁路局,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媒体,也写东西。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Q: 最近在做什么有趣的事情?

A: 设计新的书,同时开书单,书架上没看的可以接着读起来。准备明年去南美转转,看看有没有商机哈哈哈。

Q: 最近在试图解决什么问题?

A: 攒钱。应对爷爷后续治疗及预后费用,癌症治疗是整个家庭的长跑,治疗以外要考虑远的事情。奶奶也要换几颗牙,也是一笔开销。

Q: 想邀请什么人来接力?

A: 很多人想推荐,脑子里冒出的是一群……兰馨,她是研究三线建设,她正和一个彝族小伙去走访成昆铁路口述对象。子津,之前和另几位认识的朋友做了一个叫“打工谈”的节目,现在和职校学生一起做活动空间。



题图为电影《爱的甘露》(1985)剧照

专栏

050 小镜湖 不管可以改变什么， “上路吧女司机”！

杨樱 | 接力访问

用自我的日常，

对抗看似不可撼动的性别不平等。

“上路吧女司机！”的发起人叫小镜湖，一个新成都人（不知道她是不是愿意被这么称呼）。2023年3月，她和朋友开着两辆车一起自驾乐山桫椤峡谷徒步。当她询问有没有人可以轮换开车的时候，她听到了好几个“有驾照，不敢开”的回答。

小镜湖也认识几个有驾照但没开车经验的男性，他们的反馈就不太一样。“有的会趁我不备开车试驾，有的刚拿驾照不久，非常自信地指导我开车，即便我开车好几年也没被扣过一分。”

在她的公众号名为《[上路吧，女司机！一起自驾去徒步](#)》的推送里，这可能是最温和的对比。如果你一水看下来，你很难不同情女性司机的技能练习条件。总的来说，这是一个“看吧我说你不行你果然不行——久而久之——我果然不行”的世界。

比如，在停车场倒车，收费人看到一个怯生生的女司机“马上露出恨不得帮你开的眼神”在一些地方，有特别宽的停车位，上面写着“女性与残障车位”。

所以她决定每周发起自驾出游计划，10人以内小队伍，以徒步为主，遇到状况较好的路段，就可以为有驾照但车技已经荒废的人士提供陪练，如果不需要练车，也“欢迎做一名鼓励型乘客”。来回车程2小时，徒步10公里。活动从4月开始。

“在很多方面觉得这个社会对女性的鼓励很少，比如摄影或者程序员，甚至只是开车这种掌握一种机械的技能，都很少鼓励女性去做，更不用说用这种技能去赚钱，所以男性很容易在类似的行业里抢占位置。”

“上路吧，女司机”如今已经做到了第8期。

从2022年10月搬到成都之后，小镜湖在做的事情基本上都是这样的，用很日常的

活动，挑战同样很日常的观念 / 偏见。不管是做手工、读书会还是组织户外运动，“郊游造作”发起的活动都是以启发性和陪伴性的居多。

我们聊到之前我经历的一次社交事故。在一个还算是朋友的场合，一位自认开明的男士目光炯炯地发问：“你们经常在说女性主义女性主义，那你告诉我，女性主义最大的诉求是什么？请用一句话概括，因为任何事如果不能用一句话概括，那就代表没有诉求。”

后来发生的对话相比这段一气呵成的质询不值一提，因为不值一提，我一度颇为羞耻，为何不能同样一气呵成掷地有声地让这位男士认识到自己的傲慢与愚蠢。

在这一点上，小镜湖的一句话可以看作一个温柔的回应：“到现在，我一直在做的事情，基本上都是为了缓解我自己的无力感。”

小镜湖是1992年出生的清远人，独生女，家里也不重男轻女。在广州念大学，毕业了就在广州工作，做互联网公司的产品经理。她还挺喜欢做这个的，能找到意义感。后来离职，是因为公司明文规定上班时间变成996，她坚持了一段时间，觉得每天这样久坐实在难以忍受。

不过因为做产品经理，她感受到了那种日常的性别歧视——如此日常，有时候甚至已经变成了某种语言习惯——如果她和男程序员讨论发生分歧，对方偶尔（她强调）会说：“跟你一个女的说不清楚。”或者是，“你们女的逻辑不行。”

她并不觉得自己受到了什么莫大伤害，但她确实觉得哪里不对劲。“其实我一开始感受到职场上的性别歧视，最开始的想法就是想要找这方面的机构或者志愿活动，我能够参与、发挥自己一点点的力量。这是很自然的一个想法。一开始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这就是小镜湖关注女性问题的开端。当她留意的事情越来越多的时候，她开始意识到自己要面对的并不是一个人的难题，也不是一个要解决的问题，而是一种结构性的不公平。她需要做的，是辨识出一个既定体系里、过去被认为司空见惯的问题——比如女司机就是不行的——既然让更多人认识到这些司空见惯理应发生改变。

比如她喜欢的户外徒步。跟女性朋友一起徒步，和男女混合的情况会很不同。如果领队是男性，就会安排明确的性别分工，顺带开玩笑“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这句话在不同人看来感受不同，小镜湖不喜欢那种不分青红皂白就被照顾的感觉，“后来做女性徒步，我们就发现自己来完成线路的规划，完成这些准备一些筹备分工，对人的自信各方面都是有帮助的。”

因为这些活动都嵌入在小镜湖自己的生活里，所以离开互联网公司之后，该如何生活就成了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那是2020年之前，当时她还在和自己拉锯，是过一种“正常”的生活，也就是利用之前的工作技能给别人做小程序外包，还是过一种不那么常规的生活。是什么她没想好，只知道不是回到原来的职场环境里。前者看似是自己最擅长的东西——这是工作最容易带给人的错觉，即在投入时间、生存技能和生活意义之间画上等号，有时候甚至还要加上社会关系。

小镜湖用了一些时间，找到了一个新技能：她考了山地户外指导员证书和攀岩指导员证书，可以去做户外领队和攀岩教练。收入肯定不如互联网行业，但她会觉得自己的时间花得值得。

这就是2022年5月，小镜湖第一次去成都的契机。当时她的首要目的是躲避广州疫情的封控，其次是想参加成都一个叫做巅峰户外学校组织的领队培训。结果因为疫情，培训反复延迟，反倒是在成都玩了一个月的小镜湖，被川西的地貌和成都的人文活动迷住，决定正式搬来成都。

2022年10月，她在成都租下了一间客厅很大的房子，把客厅变成做活动的公共空间，开始一种新的生活。

她之前在广州就做活动，但当时她没有自己的场地，经常在桌游店、剧本杀店之间换来换去，还去过一个精酿酒吧。有时候做丝网印刷之类的手工，材料需要搬来搬去，她时常觉得累。不过搬家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广州的大环境在变坏。小镜湖目睹广州从一个相对宽松包容的城市，变成了时时需要自我审查的是非之地。或者说，带有公共性的活动本身就变得越来越敏感。

成都展示了另一种宽容。这就是“郊游造作”诞生的背景。推荐小镜湖[做接力的月亮和思邪](#)说，小镜湖作为一个在自己家办公共活动的人，有两个能力让他们印象深刻，一个是活动频率之高，第二个是私人与公共状态切换之果断。

活动约定的结束时间到了，小镜湖就会让自己家的客厅变回自己家的客厅。但其实这个做法并不常常能如愿，比如做版画，有些参与者还在继续创作，她也不好意思当即打

断别人。于是在某些和朋友约好了去吃饭的情况下，她就会把一堆陌生人扔在家里，自己出门去赴约。

“郊游造作”最早活动，是小镜湖和朋友阿松希望发起一个《始于极限》读书会，阿松介绍了朋友呱呱一起合作。由于合作顺利，呱呱一度变成了长期合作者，后来主要负责郊游造作的读书会和观影会，小镜湖主要负责手工和户外的活动。

小镜湖也会邀请其他擅长某一种活动的朋友一起合作，比如协助做版画的大炮，带领写诗的阿筝，带领观鸟的Zebra，主持观影的炸酱面，做视障友好包装设计的浪石……

在我们聊天的5月，小镜湖终于实现了去四姑娘山做户外领队培训的愿望，她有半个月都在山里，其余的时间，就和呱呱商量着，根据不同的热点话题或者纪念日来推动各种讨论。

五月的时候，她们打算做一场关于母女关系的读书会，其中涉及一本书，叫《关于女儿》。决定做活动那会儿，这本书的出版方一页被爆出metoo丑闻，呱呱和小镜湖出现了分歧：前者坚决不想再推荐“一页”出品的书，后者有些犹豫，因为她觉得书和具体的人事可以分开，不过，作为活动的组织者，她不能对类似的情绪视而不见——有的参与者会更坚持一损俱损，甚至到了恨不得把书烧掉的地步——但也不能就此影响了要探讨的议题。

“像这种关于之后要做的事情，可能会邀请比较熟悉和信任的朋友一起来讨论一下。”小镜湖又觉得这个分歧是有意义的：“不是所有人都一样意见，所以才有分歧……制约性骚扰的机制现在是没有的，它的普遍性和危害跟实施者会受到的惩罚之间不成比例，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愤怒。”

《关于女儿》后来在“郊游造作”读书会回顾推文中出现过，用了另一个版本的封面图。

公共讨论和社群本身的维持都有“雷区”，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与人的交往和思想交换，经验可以帮助规避一些矛盾和伤害，但更重要的其实是自我对于他人的感知。对小镜湖来说，这一切开始的时间不能算长。“郊游造作”是她发起的平台，也是一个共同体，但如何维持一个共同体，她的经验并不丰富。

“我当然希望可以连接更多的人，或者让更多人受到启发，但是当你关心一个社会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非常根深蒂固的根源，你也会发现有更多别的问题。我们做什么事情都不是一定会有效果的，或者一定会改变人们的观念，但是我会觉得这事不能不做，因为如果我不做，我自己就首先就很难受，然后很窒息。”

这是一个似曾相识的说法，之前[接力访问对象陆冉](#)说，自己之所以选择成为一个独立漫画作者，不是因为勇敢，而是除了这样做她看不到别的选择。

“为什么我会搬到成都来，然后以前也跟一些朋友聊过，有的朋友会说不知道怎么在自己的生活中做选择，但是我自己有一种感受，就是好像没有很多条路给我选。能够让我自己自由地、知行合一地生活下去的方式没有很多，这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

“可能我现在看不清未来的生活会是怎样的，但我有努力去学习一些技能，做的都是我自己认可的事情。然后无论之后怎么发展，我觉得都是我对自己生活负责的一种选择。”

“它也是我争取来的自由，也是我必须要承担的代价。如果我选择我妈比较乐于我做的——比如回老家考公务员——就会有一种比较安稳的生活，但是我同时会感觉自己放弃了生活。”

对于朋友正面的沟通也会尽力回应，这是我对曾经帮助过我的社群欠下的义务。欢迎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对话。

我的接力访谈推荐人月亮和思邪最近在推广的“变革性问责”对我也很有启发，希望能有更多人对此展开思考和讨论。

Q: 你希望邀请谁来接力？

A: 我想邀请Zebra来接力。她是我成都结识的一位新朋友，是可持续生活的践行者，也是一位女权主义者。

我们开始成为朋友，是因为一次小聚会中Zebra聊到有不止一个熟悉的朋友因为理念不合，因为无法理解她的“女权发言”，拉黑了她的微信，她对此表示出理解，拉黑是因为需要对自己选择的生活更加自信，不是因为对她本人的否定。

Zebra曾说，她不会被任何身份标签定义，连“女权主义者”的身份，她也可以抛弃。在这样撕裂的时代里，我非常欣赏这样能够从不同的人的角度思考和关切的人。

Q: 你最近在做什么有趣的事情？

A: 还是“上路吧，女司机”。我定了一个小目标，就是集齐100个人在我这里练车，然后我想让她们填一个问卷，之后也许可以做一个小展览，就是这100个人练车的感受。

Q: 你最近希望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A: 目前遇到了一个巨大的困扰，是关于社群关系的。起因是人际关系的摩擦，与一些伙伴对“朋友”的定义和期待不一致，偶尔会产生冲突。每次冲突发生后又没有足够深入的沟通，留下了我没有意识到的积怨。在最后一次冲突时爆发，最终被扩大化成了一个社群范围的矛盾。

我深刻感受到，一群有共同理想的、受过社会创伤的人聚在一起互相取暖，带着美好的期待，并不能形成美好的乌托邦了。要形成一个较为融洽的群体，是需要共同探讨其中的共识和规则的。然而探讨了也不一定能达成一致。

我希望可以改正其中我做错的部分，化解其中误会的部分，但以目前的情绪和能量没有信心可以做到，也没有确定可以达到效果的沟通方法。现在的想法是，与社群保持一些距离，保存心力，专注做我确定的事。当然，我会尽力避免同样的错误，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小鸟文学出品
卷三十，2023.06
可以留档
请勿商用
有事联系
info@aves.art